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告诉你一个美国



心存感激 ——再版后记

这本书即便是在完成之后我自己也一直疑虑重重。我不知我对美国用这种笔法来写会不会为国内读者接受。离国多年，我对国内读者的阅读热点已全无心得，我所能做的仅是尽我所能地描述我所知的美国。如此，及至此书出版时我仍亦喜亦忧。如今这本书再版在即，听到出版社传来的再版通知，觉得此既在意料之外，也是命定之中。无论如何，这是我的郑重之作。我深深感激所有喜爱这本书的读者们，越洋电话中听到国内亲朋描述这本书销售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总是万分感念国内成千上万与我素不相识的读者。

想到自己终于为国内与我血出一脉的同胞们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好事，不禁心潮难平。

感激所有此书的读者，是你们给了我生命中迄今最大殊荣。我不擅客气，真正是心存感激。

陈燕妮

1994年9月8日于洛杉矶

告诉你一个真美国

卷一

1. 开头

我后来决定不找人写序了。这样，我可以直面你。
我看着你，我告诉你。

2. 引子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在美国多少年来我知道我的不少即将回国省亲的朋友都会是很忙碌的，他们在回国前会到美国的各种服饰店里添置新衣，而且这种添置之彻底可说是从皮包到内衣无一遗漏。所以，我的这些朋友们在临近登机的前几天再出现在我面前时，即便给我的也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我知道他们会带着这些新的姿态出现在国内故旧面前，每次做这种猜测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些隐在心头的冲动说不出口。这种时候，我在内心无数次地反串我这些朋友们的父母兄姐乃至我这些朋友周遭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到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飞光流彩的美国。

我深知我的这些朋友和从中国大陆来的大部分人一样，在美目的生活是很节俭的。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进过美国任何一间像样的服装店，他们在美国的几年中一向穿着从国内带来、不太入时的衣服，又做厅堂又兼卧室的屋中铺盖着的仍是早年从国内带来的大陆式床单乃至毛巾被。而且，大陆式的双人床单尺寸一定会比美国的标准单人床大，但又比标准双人床小。

他们中的不少人会站在一种“高处”定时给自己在国内的亲人寄去一些美国钱，而他们自己在美国的真实生活却是生活在这些美国钱之外的。

中国人对他人的真实与虚假也全在其中了。

1994年的春节是我出外五年后第一次回国，果然，归期日近时我竟也有了“想去店里买几件上好衣服”的念头。我后来深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虚假和真实，都是。

而且，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在太多次来信的结尾都会加上一句“回信谈谈美国生活的详细情况”，每到这时，我就觉得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觉得美国的真髓实在不是一、两页信纸能够说得清楚的。这种感觉积累多了我觉得我反倒对“回信谈谈”这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所以，我想我应该写一封公开的回信。既为朋友们，也为自己。

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些有关美国的真话。

忍无可忍。

在确定要写回信的同时，我想我必须说明一点，那就是我多半只能以我所熟知的纽约为重点来描述美国，别无选择。因为美国各州在法规的制定上基本上自成一体，州内各有自己的一套完整法则，这种无一定规的州立法规之间不但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还可能朝令夕改。不客气地说，人在美国时常会被弄得不知以如何的一个道德标准为本才是与人为善甚至洁身自好。

所以不敢造次。

我所有能做的只是一定谨慎地写我所能写的真实。

3. 感天动地华人潮

有一个中文词汇叫做“社区”。

记忆之中这个词相当陌生，至少在《新华字典》或《现代汉语词典》里绝对少见。而且，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即便是已经列出了“社火”，也没有“社区”。

但在美国的社会之中，“社区”这个词意义深远，所用之广也相当惊人。

从英文的意思来讲“社区（COMMUNITY）”

的意思是所谓“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而从关乎民生一类实际意义的角度来看，这个每天可以上百次地出现在美国人口中乃至各种传播媒体上的词，则代表了某一批人的共同利益。

对在美国喜嗜群居的华人而言，它则昭示了一种血脉相承的休戚与共。

走进美国驻华使领馆，从把护照递进去，美国领事递出一张多少天后领取签证的一纸黄条那一刻算起，无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及方式就在这一时刻之间被改变了。然后，拿到这一纸黄条的人在多少天后领回自己加了签证的护照，从此便开始了各自无辙可循的生活。

中国人与美国的渊源相当深厚，但形成移民大趋势的年代还是近三十多年来的事情。自六十年代起，先是港台而后是大陆的中国人陆陆续续地走进这个绝对全新的世界，很多来美的中国人告诉我，他们来到美国后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是“无论是好是坏，都形同再生了一次”。

中国大陆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比较短暂，只有至多二十年的历史，但这种洪流裹挟的文化场面之壮观、牵涉人口幅度之宽广，在人口上而言是次大迁徙，而在文化上则堪称一次大“革命”。

这可能是有关中国人的最后一次“革命”了，从东到西中国人历经了自己也数不清的劫数之后，这次“革命”带有令人奇怪的仓惶以及令人奇怪的安逸。这多少是和中国人刻苦及容忍的本性分不开的，但一旦说出口来，却给人一种无可救药的兴奋和心酸。

我常常在想，中国大陆在早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大批在国内盲目流动的盲流，他们行无定向，唯一的目的是找一个比在家乡挣钱更多的地方。那么，在美国的我们多半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口族群了，我们于别人的土地上在最原始的动机驱动下处心积虑地植根而且繁衍。我们没有错，我们中的一些人成功了。即便没成功的人也不会立即说漏我们的短处，我们家里的人于是以为我们几乎全都成功了。

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统计：进入九十年代，全美总人口为二亿五千多万人，其中亚裔人口为七百三十万人，这之中，华裔人口为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人。联邦人口普查局预测：至 2050 年，美国人口将增加 50%，亦即从 1992 年的二亿五千五百万增加到二亿八千三百万人。

普查局的此项调查是建立在每年进入美国境内的移民人数为八十万人，以及对美国人的生育率、平均寿命等方面的评估之上的。普查局表示，在未来，增长最快的人口群将是亚洲和太平洋群岛人。

据美国战后每隔十年举行一次的人口调查统计，居美华人人口在 1950 年为十一万八千人；1960 年为二十三万七千人；1970 年为四十三万五千人；1980 年为八十万六千人；1990 年达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人。

在整个八十年代，华裔的增长比例高达 104%。

统计资料显示：粗算起来，在美华裔主要分布在七个州内，这些州是：加州（州内华人人口占华人总数 42.6%）、纽约（17.7%）、夏威夷（4%）、德州（4%）、新泽西州（4%）、麻州（3%）和伊利诺州（3%）。除此之外，分布在美国其他四十三个州的华裔仅占华裔总数的 20% 左右。

在六十年代以前，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重心大都集中在纽约、旧金山和西雅图几个固定的传统移民居住区。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华人们开始向洛杉矶、德州、华盛顿以及麻州的东北部一带散布。

美国究竟还能容下多少华人呢？这无论在美国人及中国人眼中都是个谜。其实即便是公开了的统计数字，在理论及实际上也都是不足为凭的，因为这种数字与事实的出入太大。仅拿普查局煞费苦心统计并公之于众的纽约州现有二十几万华人这一数字来讲，事实上只有数字落在纸面上这件事是真实的，其他的全貽笑大方。人口普查局 1991 年在全纽约进行人口普查时，曾在华人社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劝说”工作，反复说明此次普查工作只单纯是为了“普查”，并不是为移民局扫除非法移民投石问路。为配合此次行动，普查局派出成千上万的临时雇员在市内分片包干，逐户进行普查动员工作，但据行内人分析，即使乐观地估计，此次普查对华人人口覆盖率也仅勉强能达到 50%。换句话说，也就是至少有一半的华人人口未被统计在内。

事实上，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 对华人移民的真实人口数字进行过统计，粗估细量后，各种结论相去甚远，总是不能说清楚。看在眼里的只是每周仍还有无数架国际班机在全美的各国际机场降落，从世界各地来美满面春风的中国人招呼着身边的大小行李，人拉肩扛，走出机场的大门，走入他们想象不出的美国，顷刻消失无踪。

从历史上讲，华人留美的历史可说是渊源悠久。当年，美国开发西部需要工人，故从华南沿海的广东一带输入了大批的华裔，主要在建筑等业界充当低级劳工。在美国 1882 年制定的排华法案废止之前，在美的华裔几乎清一色都是此类男性劳工，这些人在此后的百余年中讲广东话、过广式生活，繁衍子孙。事实上，直到大约 1985 年之前，美国的华人社会中仍可说是由广东话主宰，尤其是形成年代较早的中国城中，1985 年之前如果你操一口普通话去即使是买东西，也会神差鬼使地让对方面露不快。

美国的排华法案于二次大战期间因美国和中国结成共同作战盟邦时才被废止。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及至五十年代，华人移民的来源开始变得比较复杂，华人社区中女性的比例开始增加。这个时候的华人移民大多具有职业训练背景、教育程度也相对为高，到了美国社会后得以进入不同的职业界。

六十年代，自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使得华人移民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改变。七十年代，美国移民法开始着力强调家庭团聚，随着赴美依亲的华人日众，华人社会的成分开始日趋混杂。

就几个华人移民的首选城市而言，大多数华人基本上采取聚居的方式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城中生活。各地华人在更小范围地域的迁移流动只是到了近二十多年来才进发生机。

比如说，近二、三十年新一代华人移民纽约的过程，主要是向纽约中心区曼哈顿华埠之外的皇后区、布鲁克林区等区迁移的历史。就纽约地域方向而言，这是一段东移的过程。

早年间来到纽约的华人基本上讲广东地区方言，在六十年代台湾移民开

始涌现之后，由于语言、习俗的关系，他们放弃了居住在位于曼哈顿下城业已形成百余旧华埠的选择，开始在皇后区紧邻曼哈顿的阿姆赫斯特（ELMHURST）乃至木边（Woodside）等地区聚居。年岁稍长的台湾移民几乎都记得，六、七十年代时，纽约皇后区“11373”这一涵盖了上述地区的这组邮政编号给台湾民间带来的意味。这个属于皇后区台湾人聚居地区阿姆赫斯特的邮政编码为早期浑沌才开的台湾朝野，留下了西方文明无以替代的烙印。

尤其是在1976年，一位居住在阿姆赫斯特的名叫李保玉的台湾移民完成了一部名为《美语通用会话》的英语会话教育读本，并同时出版了一套由李氏一家及其周遭的美国朋友联合录制的配套语言唱片。其中尤以李保玉最小的儿子李东尼录制最为卖力，才在变声的小男孩操一口标准纽约腔，从上学、看病、坐出租车看戏直到带女同学观看家中后院，凡此种种，一并灌录。此教材在台湾推出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在台流行开之后，竟又回流进纽约，也成为居美华人的英文进补教材。更难能可贵的是，李保玉是时已在纽约教育界任职，捻熟美国当地的各项礼节及规矩，她在教材中每一章回后面均注有关于美国文化背景的解释，使得当时大洋两岸的诸看家受益匪浅。

后来，日益逐渐富裕起来的华人逐渐东移，横过50多条街进入法拉盛（Flushing）地区。在此建立了被称为“第二华埠”的法拉盛新侨社区。

法拉盛最早是韩裔社区，有案可考的是1949年12月28日，一位名叫薛胜的华人及其妻子周瑞平开始在法拉盛开设第一家名为“莲芳”的中餐馆。在这之后及七十年代中期华人移民大量涌入法拉盛之前，在此地居住的华人寥寥无几。现在仍活跃在华人社区内的台湾早年移民、原华人促进会董事长程盘铭曾也是法拉盛目前硕果仅存的“开头”之一。

华人陆续迁进法拉盛后，从韩国人手中不动声色一家一家地把店面、房产买下，店面用来做生意，房产用来居住及炒高价钱。十几年来，无数赋闲在家的华人妇女即是利用自买自销翻炒房地产，帮助夫婿大举致富的。等到韩国社区人士开始惊呼法拉盛不知不觉已渐离怀抱的时候，在人数上已经成了气候的华人们已经一本正经地开始讨论是否要在法拉盛的闹市附近集资兴修大型中式牌楼了。

后来，更富起来的华人们继续东迁，进入皇后区东部著名中产阶级住宅区贝赛（Bayside）地区；再后来，华人们又迁入更东边高地税的高级住宅区长岛（Long Island），和真正的白人富豪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

在法拉盛地区“华”化的同时，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第八大道（8AVF.）及附近地区，也渐渐成为华人的另一个聚集地，被称为“第三华埠”。只是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虽有多年，却由于黑人的不断进住，而使治安恶化，房地产价格低落，市场逐渐走了下坡。

反观在美华人的另一个聚居重镇美西洛杉矶，当地华裔居住分布的走向恰巧也是一个东移的过程，洛杉矶多年而成的老华埠，如今大部分已成为早年老侨的聚居区，而近十几年来洛市华人商业及文化真正鲜活的地方则早已是洛杉矶市外的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PARK）等处。更而且，近几年来，被当地民众俗称“小台北”的蒙特利公园市也开始出现类似于老埠在商业尤其是人文文化方面凋零的趋势，比其地理位置更为东向的圣盖博（SANSABRIEL）、柔似蜜（ROSEMEAD）及更往东的可温纳（COVINA）等地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华人前往投资乃至居住，渐成气候。

东向，在中国的风水学上来讲是个上好的方向，中国人背井离乡在外奔波不期然竟也是在步步向东，此不知是不是个吉兆。

4. 租屋而居

人在美国，日常的吃、穿、住中，有关住的开支往往是开销中最大的一头。

美国的房租各州不甚相同，一般而言是因供需间关系而变的，工作机会多或学生数量多的地区房租相对高些。也正因此，就美国整体而言，东西两岸鱼龙混杂的大型都下中房租相对为贵。

东西两岸再相比较，又以东岸的纽约房租为最贵。

无论如何，在美国万事开头之初，住的事情是最首要需解决的。

在美国的几年生涯中，感觉中生活的安逸与否几乎完全体现在住房之上了。

才到美国时，我和四、五个留学生同住在一栋房屋的第一层中。我住的房间相当窄小，但却“奢侈”地有一间和房间相通独用、小到连身都转不开的小厕所，即便如此，房租却是每月四百美元。

和人同住虽有大家分摊房租、水电费彼此都节省开支的好处，但也有无穷无尽的不高兴。以我的情形而言，当时的同住人中有一位正处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与旧的妻子正进行无休无止的感情破裂交涉；与新的人儿又正进行新感情萌发加固，因此，该同住人只要一回家，必定是肩揎电话一通滔滔不绝的沉重与欢乐。而且，这种动作一直可以持续整个晚上，深夜方休。

抗不住几乎是没有电话用的痛苦，不得已很快迁出，搬进一个由华人非法改建在阁楼上的一房一厅中去，自用浴厕。但由于是非法改建的缘故，房间内只简单地放置了一个小型的电炉子权当“厨房”。该房的租金因为是阁楼及无厨房的关系，而已地处治安不靖的南美洲人社区，因此房租为四百八十元。

住在阁楼中景观虽好，但由于建房材料相对恶劣，到了夏季太阳照在哪扇墙上哪扇墙就有如火盆一般滚烫。而冬天里则是屋里屋外满世界冰凉。

一段时间后因为抗不住滚烫和冰凉，不得已又行搬迁，进入一个地区治安相当不错的楼区。这次是我在买房之前租住的最后一处他人之宅，而且一住就是两年。这是一个连带着厨房和厕所的单间房间，在华人社区的通称中是为“统仓”。室内面积大约在二十五平米之间，每月租金为五百五十元。

纽约的房租数字十分可观，在商业中心曼哈顿区，治安好、白人多的中城地带，以及部分上城和下城地区，一套厨卫独立的普通一房一厅，每月租金无论如何也要在千元以上。在纽约华人中，房屋租价高涨的问题一直是无数新移民头痛的大问题。近年来，由于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不懂英语、无一技之长靠华人社区商业而活的华人也日渐增多，华人聚居区华埠及法拉盛等地的房屋因为占地利之便，房屋租金更是居高不下。

在纽约华埠，由于地小人多、寸土寸金，正规的房租已和著名的中城地区不相上下。还能在华埠居住的不少中国人完全是靠着美国政府早年间制定的房租管制法规，在法律限制任意涨房租的庇护之下，用很少的钱租住“管制房屋”。

而在皇后区等华人聚集的住宅区，为了出租目的而买房的精明房主一般会在买下房屋的同时把房间隔成便于出租的形式分别租出去。

由于美国式独栋民房中的房间多是如此间隔而成，格局不够规整，因此

一般而言，在房价上正规楼宇中的房间比在独栋房屋为高。平均而言，纽约的一间和他人共用厨卫、十几平方米的单人房每月房租大约在三百元左右；一个带厕所（厨卫与人合用）的单房租价在四百五十元左右；一套一房一厅的公寓房每月租价更在六、七百元。而状况好、交通方便、设施先进的大楼中的一房一厅房价甚至会高达八百到一千元。

如此高昂的房租，一个月下来，加上电费、瓦斯费及电话费，居住费用平均将占华人社区人均或家庭平均薪水的三分之一至二分穷则思变。

为了缩减日常开支，纽约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乃至新移民们在来美后的头一、二年中是非法租住地下室为家的。在华人聚居的地区，没有多少间华人屋主家中的地下室从未出租给人住过；同样，至少在纽约，也没有多少人在美国的几年生活中没有住过地下室，或者说他们的朋友中没有人住过地下室。

事实上，地下室虽名声不好但在美国出租价格却不菲。举例而言，一套全部装修好、厨卫齐全的地下室一房一厅的出租价格一般也要在五百美元左右。

多少年来，到美国尤其是到美国大都市来捞生活的华人大都是这么慢慢地“从地下走到地上来的”。纽约警方发现，在纽约的地铁中，有一位中国福建人以地铁为家足足过了七年之久，而他按月寄回大陆的美金已经被他的家人用来盖起了两座小楼。

由于华人有这种在住房上的“自虐”通病，因此，常有外族裔人士向有关方面抱怨说，他们的华裔邻居成班成排地同住在只能合法居住一个家庭的一幢房子里，每天人来人往、此进彼出、喧哗不止，既扰乱社区宁静，也影响社区质量。

但面对指摘，华人在习惯上是不加以理会的，一直会依然故我地维持到权力机构出面干涉。

自八十年代末开始，寸土寸金的纽约华埠地区华人关于住的一项更新的发明更是震惊全市，这种发明被纽约英文报界形容为“非人的住法”。

这项发明是将一间大房间或一个大仓库隔成许多小房，每间小房里仅可以摆下一张床，不那么“非人”的或可能摆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写字台，然后，主事者将这种房间分“房”出租，每“房”租金仅一、两百元，进入九十年代，此项发明更有了发展，有精明的屋主更将房内干脆就摆放无数张双层床，然后按铺位招租，每铺月租仅数十元。

在这种地方居住最大的不便还不是来自居住面积上的，最让人难受的是同住的数十个人共用一两套浴厕的大不方便。据过来人描述，每天早上往往是最令人头痛的时间，大家都为了能多睡几分钟而卡着钟点起床，每到这时，哪怕有一个人前一天吃得有点不适而在厕所里耽搁一会，其他人就都得蓬头垢面地去各自上班的地方洗漱。

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供人居住的出租房屋，每一个出租单位都要有厨房、俗厕设备、窗户、烟雾警报器等基本设施，援引此法，房东出租无窗地下室、床位等都是违法的。换句话说，出租这种房屋的屋主，如果租户付不出租金，房东即便告上法庭非但追讨不到租金，反而还可能被罚款。

但中国人的如此住法在美国所违反的最重要和直接的法规是消防法规。进入九十年代，纽约消防局曾多次以防火安全原因对华埠的这类“非人”违规住房进行查封，先后紧急遣散过近千名甘居陋室的华人，结果是每经查出，

必轰动全市。

中国人在异域他邦对居住品质的大不计较，让人印象良深。

但尽管在外人看来不胜唏嘘，出租铺位或违法隔阻房间的情状在华人中却是周瑜打黄盖，两相情愿。大批的中国人来美国的目的相当简单而明确，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这些人每天尽可能多地做工，住处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睡几个小时觉的地方。

在华人社区的有关采访中，我还听说更有的华人力了省钱，干脆三个人合租一个床位，每天分三班轮流上床，每人每天可以在床上睡八个小时的觉。这种关于住房的情状描述起来显得无甚痛痒，不过是一段文辞稍见严酷的段落而已，但亲身见过这种居住环境的人则是实实在在过目难忘。

一位在华埠地区开展业务的刘姓保险经纪人就曾经对这种居住环境有这样震惊的回忆。

她说她得以见到这种居住方法相当偶然，是与她的一个朋友同在一个餐馆工作的王姓送外卖员工给她的自住地址。起因是王经不住她的软缠硬磨终于答应在她指定的保险公司保人寿险。王告诉她他每天能被在“家”里找到的时间只可能是在上午 10 点之前。

她说她在按图索骥找到王的地址举手敲门的时候都没能想出里面的状况，她在门口能够预知的一个感觉是王所在的这间公寓里面绝对肮脏。

等到王来应门的时候门被打开，她被吓了一跳。

她说她怎么也没想到类似于她和她丈夫两人共住的大约 60 平方米一套一房一厅中能挤下这么多人。她说门被打开之后，她的整个感觉是一股浓烈的“男人气味”劈头冲面而来，熏得她眼泪差点掉下来。紧接着，房内无数只眼睛一齐向毫无准备的她聚焦。

这种阵式首先让她未语先“毛”。

她说她当时足足在门口定了五分钟的神才缓过劲来张口讲话。她虽一向对不少中国人的骇人听闻的居住环境有所耳闻，但真正目睹下来心里仍震惊不已。

她说这间房内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外面的厅中并排摆放了五张双层单人床，里面的卧室中也并排摆了两张双层床，能看到的地面上散落着一地的鞋子。

王当时进到里面的一间屋子，在床下的箱子中翻找个人文件，她就在这段时间内看尽了触目皆是男人的内裤。

她实在想不出居住条件这样低劣的人还能有什么闲钱做人寿保险。可当她和王在洗手池边的木沿上填保险表格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王选择的竟是 25 万美元的人身保险，这是她客人选择的保费中数额较高的一种。

他们之间关于保险本身的手续进行得相当顺利快捷。只是在最后，王告诉明显还没缓过劲来的她有关他们住房的一些事情。王说他们住的这一房一厅租金一共是一千二百元，他和另外的 13 个人共同分担房租，住在里屋的人因为相对地少受打扰，因此铺租稍贵。他们 14 个人中有 12 个人是做餐馆工的，每天只是深夜回来洗个澡睡个觉，第二天一清早又起身去工作了。另外的一个人则是在外州的一个仓库里开货车的，每周只是在周末回来往一下，另一个则是为华埠一家菜店卖菜的店员。

他们没有安装电话，伯有不自觉的人猛打长途后又不肯认帐，所有人留给亲朋的电话一概是自己工作地点的号码。“人多了，就不好管了。”王轻

描淡写地说。

而这还并不是华埠最耸人听闻的例子。

纽约市消防局每年都会查出几起有关华人租房严重违规的大案，1994 年新年刚过，消防局查出的一处华人住处状况更是惊人。

这间因为居住过挤而被消防局查封的房屋位于纽约华埠 CANNAL 街 50 号的地下室内。这间地下室仅有大约 40 多平方米，摆放了 16 张床（共为八张上下床），却住了 32 个来自中国浙江省温州一带的华人。这 32 名华人的职业多为农场工人或无照摊商，有四对夫妻，其中有人还是孕妇。

这 32 个人居住的这间地下室与外界的沟通仅有一个小窗和一个出入口，每当住在地下室里的 32 个人晚间用炊时，炊烟从小窗口和出入通道中大量排出，不知情的人从外面看上去，形同失火。而这间违规地下室之所以能被外人知晓，也正是因为炊烟排出时被消防局误认为是火警所致。

这间地下室里的 16 张床上每张床挤睡两人，其中的四对夫妇也是一对夫妻挤一张床。房间内除了床之外，几乎没有丝毫活动空间，每人的活动空间只有 1.25 平方米左右。房东每月按床位收取每床 50 美元的“房租”。这 32 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和浴室，由于“房”内在浴室地区建筑结构上未设排水管，因此，浴室内所用的排水器具只是一个半大的塑料盆，32 个人每晚仅排队洗澡一项就要花去整整一个晚上。

据“房”内的一些住户表示，为了节省起见，他们 32 个人每天晚上都开火做大锅饭，32 个人均摊下来每人每天的晚饭钱才一、两块钱。

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也惊讶得不知如何评价才好。一位记者在拍下这间地下室“屋”内拥挤不堪的情况后，在图片说明中仅用了这样一句：“这是人住的吗？”

即使生活品质低下如斯，在充满“人身气味”的斗室的墙上却仍留有住客们这样一些“豪言壮语”：“亲爱的朋友，您们来到美国，要想一想您们在中国还有太太和儿女，不要在美国为自己而生活。”

或者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再或者是：“此处住有四个人，请不要吵。”

5. 任是谁也忘不了间间中餐馆

在美国，有一个去处是几乎所有出门在外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块也是最后一块基石。这个去处给予中国人的那种真实的踏实感无可言喻。

多少年来，无论是初踏美国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还是被美国玩弄得一无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去处。

这里虽说是中国人最想离开的工作处所，但无疑也是中国人最牢不可破的工作保证。

它也是中国人的祖先给中国人留在海外的莫大遗产。

这个去处就是任是谁也忘不了的中餐馆。

在美国都市，用这样一句话去问一百个近二十年来从大陆移民抵美的中国男人：“你在中国餐馆中干过活吗？”得到的答案中一定有九十个是肯定的。

而这也就是中餐馆之于中国人的真实。

多年来，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对美国中餐馆的感情可谓“爱恨交杂”，既感激它曾使自己安度了最苦难的日子；也记恨它让自己领略了从未有过的大把心酸。尤其是来自中国面对美国曾一无所知的移民，中餐馆在他们的生活中突如其来刻下的伤痕，上可至年逾花甲的老年知识分子，下可及偷渡抵美的年轻福建农民，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一般在美国的中餐馆工中分厨房、厅堂及外卖等几个部门。厨房中除了工资极低的洗碗及打杂一类的非技术工人外，往往是由有一定经验的厨师工作。这些厨师由于主掌着餐馆内饭菜的质量。所以相对而言薪水极高，在不少餐馆中，掌勺大厨甚至就是店内的股东之一，说穿了这种股份无非是怕大厨动辄不干了，餐馆难以为继而拨出的“向心股”。

厅堂部则基本上是由厅堂正副经理及男女侍音组成，负责招呼客人及接下客人的点菜单据，在中餐馆内，这些人的薪水一般是靠客人给的小费维持。如果运气好，同时有幸在一家生意好的餐馆里做工，每天挣个一百来块钱不是件难事。

“侍者”一词在美国华人中也是没人用的，一般的中国人会接着英文称男侍为“WAITER”、女侍为“WAITRESS”，广东人则把其叫做男女“企抬”，这一称谓原是从广东话中对侍者的称呼按音译得来，久了，“企抬”竟成为侍者的另一种书面语言，哪怕是在华文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标题也常有人如此大书特书：“诚征企抬”，常常让初来乍到的人不知所云。

“企抬”此行是中餐馆中比较不受风吹日晒的“俏活”。从一般的其他除厨师外的工作而转做“企抬”的，通常会被目为一种升迁。纽约地区的“企抬”底薪大多在三、四百之间，其他进项全凭客人的小费来补充。如果不是总缺勤的话，这么岑敲碎打，一个月也能“补充”出两千多块钱来。

中餐馆中的“企抬”在工作关系上大部分采取“打共产”的方式。此话在大陆人乍听之下虽酷似反动标语，但实际上道理简单而与信仰无关。“打共产”的意思是全餐馆的“企抬”每天共同将收到的小费汇总起来，结算时共同分账，利益均沾。与此相反，也有少数餐馆采取“打私产”的方式，也就是各“企抬”各人自扫门前雪，每人负责四、五张桌子，收得的小费全归个人。如果按照美国社会的情状，“打私产”才是真正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工

作方法。事实上，资格老一点、手脚勤一点的“企抬”也多是极愿意“打私产”的。

与餐馆中其他员工相比，餐馆老板挑选“企抬”的要求相对为高。做“企抬”不但要具有一定的英语会话能力、懂得餐馆的菜式，一般还要求具有相关的经验。

在餐馆工中，还有一种叫做“Busboy”的工作，这种工作负责收取各张餐桌上客人吃剩的碗、盘及杂物。这类工人没有资格分小费，但工作担子不轻，由于工作相对不具“技术性”，故每月仅能拿个八百块钱底薪。也正因此，不少“Busboy”对升任企抬的向往像多年媳妇渴望熬成婆一样热切。

几乎每家中餐馆都少不了的是外卖部，此也是与中国大陆留学生渊源最深的一个工种，甚至于几乎每一个不靠任何背景来美的中国男人，都曾是一工作的身体力行者。美国的不少中餐馆其实干脆就是外卖餐馆，不设厅堂，餐馆内只有几张凳子可供上门买饭的客人小坐。在这种餐馆中，外卖部就是全部。

这种几乎全由男人垄断的送外卖工作也就是给用电话订饭的客人送饭上门。在美国大都市，意大利人的PIZZA店内在传统上有给客人送外卖的规矩，除此之外就是中国餐馆了。也正因此，中餐馆外卖业的兴旺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

一般的中餐馆每小时付给送外卖员工两块钱底薪，其它的则生死由之，全靠各人各凭运气去赚客人给的小费了。中国餐馆的送外卖员工基本上是骑自行车干活，这种方式在晴天时状况还好，虽说在都市各种车辆中穿行相当危险，但仍多半能够自我掌握运行的大致情况。但到了雨雪天时，送外卖员工一身泥汗，送货途中既要照顾外卖饭菜，又要注意脚下路滑，雨大风大，披肝沥胆，一路艰难。

中国大陆留学生曹庆赴美后在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在曼哈顿中城为一家中餐馆送外卖。1992年夏季的某天他在骑自行车送外卖途中被一辆大型公共汽车撞倒后拦腰轧过，而汽车司机竟从头至尾未曾察觉，直到目睹惨况的过路人代为大声疾呼，司机才知道闯了大祸。

此事发生后，惊动了整个纽约华人社区。在曹庆母校中国学生联谊会的筹划下，华人社区内举行了大型的为曹庆后事料理募款活动，资助曹庆家人赴美奔丧。曹庆的父亲当时是中国江苏省机械工业厅的负责人，白发人先送黑发人。曹庆的遗孀在公祭仪式上泪流满面地对天发问，曹庆，你为什么不等我？直问得满座泪下，状至凄惨。

而这类送外卖员工在工作中被年轧死撞伤的事件并非绝无仅有。

除了这种从天而降的大祸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送外卖员工在送外卖途中被歹徒拦截，抢饭抢钱；更有人在送外卖途中被好事之徒或醉汉刀子扎球棒打，一肚子心酸。

送外卖这种后只要一干上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每天深夜才回家，洗漱一气后凌晨一、二点钟才能入睡。八个小时睡之后，一睁眼又要立刻起身直奔餐馆，一周工作六天，人不但要成为机器，还要成为闹钟。这种干法用餐馆业的行话叫做“长工”。餐馆的全职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大多在11个小时左右，从每天上午11点一直干到夜里10点。而留学生们大部分选择做“短工”，也就是从每天下午五点钟开始一直干到晚上餐馆关门。也有的留学生为了兼顾上课及工作的时间安排，也有两个人分做一份工的，有课的

时候还可以请朋友代劳。大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后报怨说没有时间给家里写信，此话国内人听起来可能多少觉得有点“犯酸”，其实绝未言过其实。

在中餐馆内，午饭及晚饭时间毫无疑问是最忙的时候。而在其他时间里，送外卖的员工还需要去各个住宅大楼发放菜单。这种发放菜单的办法是从居民住家的门底下的缝隙中把菜单塞进门去。如果是戒备森严的地方就只好把菜单放在门中任由人取拾。

也正因为中国人有中餐馆及送外卖的营生，纽约市内不少每日开放的教堂也多被殃及。不少精明的老资格外卖工，一到发单的时候走出餐馆才几条街，等到老板看不见时，就把成打的外卖菜单往垃圾筒里一扔，自己则拐进教堂睡觉去了。个中识途老马说：每到平常天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举行的时候，教堂就成了送外卖人及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无处可去的这帮人都去教堂的长椅上躺着补觉。

在另一方面，鉴于有大多的餐馆外卖单子发送到居民区的楼道内，由此而形成的脏乱局面已经越来越被一些居民视为不可忍受。曼哈顿中城的不少楼内就明白地写着“NOMENU”（禁放菜单），有些地段的居民还曾因为过多的菜单问题而把发送菜单的餐馆告上公堂。

懂行的人都知道中餐馆工作人员是以小费为最主要的生存依赖的，但看似随和的美国人却不是那么守规矩，付小费时往往多是“谨小慎微”。

在多数美国人默守的规矩中，小费应是支付净餐费的10%—20%，但是大多手边不宽裕的洋人故作不知，乱给小费，大原则是只会少给，绝不多给，甚至不给。

送外卖的送东西进客人门，客人接过食物，剩下的就要看运气了。大老远送一趟，老板为的是饭钱，送外卖为的就是这“一瞬间”。一般而言，中餐馆中送外卖的员工，每个月多少也能有一千五、六百块钱的收入。

一分小费得不到的，在行话中被叫做被人“打铁”了。洋人给送外卖的“打铁”，并不罕见。一到这时，也只有自认倒霉。话说回头，多年的行业也养就了一些中国爷的脾气。有的外卖爷一看没有小费即会劈头就问，有时反把客人唬得一肚子腻味。

做餐馆工由于工作时间长、天数多，餐馆内又管饭吃，因此，花钱的机会相当少。每到一周一度的休息日，本分的人睡个难得的懒觉再洗衣服也就过去了。对此有心得的人说，只要不嫖不赌，做餐馆工几个月存个一万元不是件难事。

原就职于中国石油部基建局办公室的徐亮1987年5月来美后在中餐馆内从送外卖做起，历经BUSBOY、WAITER、副经理及正经理等职，一直做到1990年年底。如今，他虽早已改行成为美国某皮件批发公司的地区经理，每年经手数百万元的营业额，但谈及餐馆工作对他在美生活的影响时，他说那段日子无论如何对他今后的性格完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目前在他手下来来往往工作过的来自大陆的男职员，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经历过餐馆工作的。他的同事中，当年做餐馆时最节省的每月挣一千九百块可以存上一千八百元，每天主要的开销只是来往上工的地铁票钱。他的一位下属说，当年在上路的路上甚至连这点地铁票钱都舍不得花，常常趁售票员不注意溜进地铁，有一次失手没溜好被便衣警察当场擒获，该警察也毫不含糊，上来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把他脸朝墙按住，并把他的两腿踢拨开，如临大敌。

徐亮来到纽约后即进入位于纽约71街附近上有103个座位的大型中餐馆

“湘宾楼”做送外卖工。他当时由于要照顾上学的时间，因此每天从下午 6 点做起一直做到夜里 10 点，每小时底薪两元，但如果加上小费则每天可以拿到手 50 元。在做外卖工的时候，他有一次由于要赶超红灯，被一辆计程车撞倒在地，摔破了腿，进医院缝了好几针才了事。

在做外卖工的同时，他在每个周末生意忙的日子里还兼做 BUSBOY。这种时候，他可以分厅堂 WAITER 10% 的小费，每天的收入可达七、八十元。做了一年多的送外卖工之后，他被“升”为 WAITER，在做这一职位时，他最差的时候能挣到一千八百元钱，最好的时候可拿到两千五百元。七个月后，他又被升为经理，开始拿每月两千四百元的纯薪水。那时，他的手下管着十一个送外卖员工、两个接外卖电话及收银员的员工、七个 WAITER 及两个 BUSBOY。

几年的餐馆工干下来，徐亮说他的惊险多多。有一回遇到了移民局人来搜查非法做工的非法移民，徐亮说，他手下的 WAITER 们没有身份的占很大比例，移民局的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闯入，把厅堂中的人一个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出。

但当时自做聪明的移民局官员进门就急着进入厨房，在他们看来，在厅堂工作的人因为每天都被摆在明面上因此不大可能有问题，倒是厨房的人躲在“暗处”易出问题。

直到移民局的人全进了厨房，徐亮身边的没身份员工才一个个屏住气从门边飞奔而去。

在家里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的徐亮说：从中国到美国来的人进入餐馆工作最大的考验是在心理上的，“在北京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这种活”。然而，在适应了这种心理考验之后，做过这行的人在美国生活安逸之后才最明白好日子的得来不易。而他在纽约送外卖几乎丧了命的事他始终也没和家里人讲，他说，在美国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不该说的，最好永远也不要说”。

“餐馆工”一词在现代中国移民史中我想无论如何将是会有一席之地，这个职业给中国一代移民带来的生机，难以诉说。

对中国的知识界而言，餐馆工所充任的角色更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立脚的第一块经济基石。浩瀚数千年的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但在美国被延展及被发扬光大，更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赴美学子延揽利用以更好地发展各自钻研的其他文化。这中间出现的互补及交迭的发展状况，乃至相辅相成的进此厂式，该是喜擅饕餮的中国老辈人所始料未及的。

不知这该算是万幸，还是该算做辛酸。

6. 绿卡之累

八十年代在中国颇为走红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王伯昭，目前已成为台湾影视界的宠儿。

在美国时他曾拍过李安执导的著名电影《推手》。该片后来在海内外频繁获奖。1992年，他从美国起步，又有机会赴中国北方为台湾拍摄电视剧，风头之劲让无数赴美谋求机会的大陆演员羡慕不已。

但是说起外国人在美国闯荡的苦衷来，绿卡之累一定是王伯昭话题才一开头的重要章节。提起绿卡，王伯昭说他在来美国之初积压了一肚子有关的不高兴。他于1986年来美国寻找发展机会，早几年曾在加州好莱坞外围闯荡，没有绿卡的短处让他在事业上几乎一无所获。

在美国演电影是一件得钱相对容易的事，即使是次要演员，正规一点的每日酬金也会在一百美元左右。由于没有绿卡，虽然他这几年在美国每次试镜状况都不错，但只要一谈到实际的是否可以合法工作的问题，他一定吃瘪。在美国虽然也是有一些公司愿意为员工申请绿卡的，但对于结构相对松散的演艺人员，愿代为申办绿卡的公司实属凤毛麟角。在这几年无绿卡生涯中他失掉的机会包括1987年时他曾被电影《太阳帝国》剧组从四、五十个应征者中选中，后来他又曾被选中在一部片子中演一个日本人。这一类的小型角色看起来不惊心动魄，但却可能是一个外籍演员在美国影视界立足的重要起点。

那几年中由于绿卡所累而使事业不顺遂，王伯昭形容他的状况不好到“老是改变住址，给朋友留下的电话永远是新变动的”。

也正因为此，外国人到美国后几乎所有人都把“弄张绿卡”当作自己首要的追求目标。

外国人进入美国，如果不是以移民身份进境的活，在最初几年基本上是没有绿卡的。一般而言，以一外外国学生身份进境的外国人如果要想在美国经由学习而后工作得到绿卡，最普通的算法要需时五到八年。

绿卡指的是外国人持有的合法居留美国的一纸证明。有了这个“证明”，持有人可以在美国无需靠保持其他非移民身份而合法自由居住及工作，并可以自由地进出美国国境。在美国的中国人一般把绿卡称为“身份”，办绿卡也叫“办身份”。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恰尽词意，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没有绿卡。那么从明面上讲你仍是“妾身未明”，一切都等于零。

为保障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法律规定，持学生、旅游、自费陪读等大部分非移民签证者一概不能在美国境内做工。其中，学生们被允许在校内做工，以及在校外做与所学相关的毕业实习。但近两年来，此项条款有所修正，允许保有学生身份者在校外工作，但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0小时。

美国方面的规定还严格地制订出雇主如雇用无法律许可的人做工，其将受到巨额罚款的处罚，希望以此来杜绝劳工市场外国人抢美国人饭碗的状况。

在事实上，美国移民局深深清楚：大批合法及非法进境的外国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生存下去，绝不可能坐以待毙。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几个外国移民集中的州内，几乎遍地都是非法工作的人。由于人手严重不足，移民局在做法上只能采取抽样突检、杀鸡儆猴的手法，以期将外国人非法做工的现象降至最低。但从宏观效果来看，此“杀鸡儆猴”的做法有点矫枉过正，后果其实多少为粗体力劳工市场的供需关系制造了一些障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合法劳工每小时四元两毛五的最低时薪标准，如雇

甲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员工，照法律是应该按规定支付工资的。否则，低于法定工薪的员工在理论上是可以向雇主提出告诉的。而如转而雇用非法打工者，资方在雇用非法劳工的同时就是担了风险的，在付薪方法上还得避开税务局的麻烦支付现金，因此在薪水的数字上一定是随心所欲地能少一点就少一点。与此同时，打工者本人因为也触犯了法律，对于非法打工的外籍工人移民局是**有权递解出境的**，如此，雇主和劳工之间产生的默契足可以阻止这种告诉的出现。因此，在美国非法劳工的薪水一直就是一个不定数，全在于资方认为怎么样的一个数字是自己认为中的最低，而劳方方面也全看给出的薪水是不是可以维持自己。

美国的华人社区与其他一些族裔社区大同小异，是最经不起“移民局抽查”这把杀鸡刀的。社区内保守地估计，有超过80%的门市商家暗地里雇用无工作许可的员工。这些人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八十年代中期及末期，美国国内对非法做工现象讨论得最热烈，也是移民局在华人社区内杀“鸡”杀得最频密、下手最狠的几年。那几年相当的风声鹤唳，移民局的人说来就来。不少整个店内都是由非法工人操持的中餐馆内，常常就是有人暗地里望风的，只要有风吹草动，工作人员迅速四下里奔逃，往往是移民局的人从前门进，厨房内连厨师在内，穿着五花八门的厨界制服从后门夺门而逃，几十秒钟之内整个厨房可以从“厨声鼎沸”突变得连鬼都看不见。稽查人员看到的往往是四方仍是热气冲腾，但却人去楼空的操作间，速度之快难于想象。

更有的餐馆或华人食品市场常常因为移民局的突险，大部分员工四出躲检而被迫歇业一天。

也正因为绿卡与在美移民的生计问题紧密相连，多少年来，围绕美国绿卡的生意一向在世界各地生意热络、行情极好。

美国的移民政策一向是以人道及人才理由为出发点的，而在政策的具体制定及实施上则从照顾美国公民的利益及顺应美国政府的需要着眼。在现存的六项优先分类中，除了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者的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的亲属移民之外，就是有特殊才能的专业人士或劳工移民可以办理申请绿卡手续。

在1990年公布的新移民法中，本着有利于美国政府需要的原则，法案中加大了高技术人材移民的配额，降低了低技能的特殊职业移民数量，并且加进了投资移民的内容。改革后的移民法在新增的投资移民条款中，给予这一移民项目每年度一万名配额。规定中投资移民的投资数目在普通地区须达到一百万元，并需雇用至少十名全职员工；在“高失业地区”等地，投资额将可放松至五十万美元。

而在其他的移民形式方面相比之下则具有相对的随机性。比如说，美国政府不定期地会举行的移民大赦。在这种移民情况中，凡在移民局所限定期限之前人已进入美国者，只要出示有关的证明文件接受审查后均可拿到绿卡。

除此之外，政治庇护也是一些与美国政见不同国家的民众惯常采用的移民途径。但近五年来，由于这项移民手段被大多数的外国人使用，几乎就成为另外一种“大赦”，美国方面对此的限制开始加多，而且对人数配额开始实行心照不宣的紧缩，使得此一途径在1991年之后于常人而言几乎就是子虚乌有。

自 1990 年起美国的移民法中新创了“多样化移民”类移民条例，这种条例中的一些比如让外国人抽签取得移民资格等移民办法相当稀奇古怪。这种由政府举办的“抽签”得绿卡活动定期举行，由于形式独特从而倍受关注。

在 1992 至 1994 会计年度中美国政府已经经由抽签选择了四万个移民人口。而在 1994 及再往后的会计年度中，这种移民每年还将有五万五千个名额。根据 1990 年通过的移民法案，在过去五年中移民美国人数累计不超过五万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均有报名抽签的资格，抽签人唯一需具备的是高中或同等学历。

除了上述合法的途径，非法弄到绿卡的途径也很多。而这一行当在美国一直也是一项除贩毒、倒卖军火之外，民间最具利润的营生之一。在这一途径中，除贩卖假证件及真证件造假外，大一点手笔的方法则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非法地利用合法的移民途径办理。

这一行在美国华人社区一向以来就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行业，由于行内涉及金额较大，故吸引了社区内从黑道到白道的各种人士参与，乐此不疲。其中的黑道之黑往往“黑”到各种帮派组织；白道之白竟也可白至挂牌营业、名声赫赫的移民律师。

各种非法的方法中，最常见的是利用“假结婚”的手段来取得绿卡。

“假结婚”是指无绿卡者通过与持绿卡者或美国公民结婚，利用美国法律中规定的配偶移民条例得到绿卡。一般来讲，进入九十年代，一桩假结婚交易，有身份的一方往往向无身份的一方要价二至四万美元不等。这些费用往往随着结婚双方结婚程序的进程分段付款。

中外社区中也有一些小有姿色的女子，会采用和假配偶同床共枕两年的代价来换取绿卡。在这类交易中，如果婚姻当事双方是经过中介人介绍，中介人往往还要从中抽成。

这类靠欺诈婚姻挣钱却也是不容易的，要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种盘查，一旦移民官认为一桩为外籍人士申办身份的婚姻可疑，便会在当事人中办时予以大量调查，以期能抓住破绽。对当事人双方而言，最要命的一关是婚后接受移民官的盘问。由于移民官可能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而且采用夫妇双方分开盘问的办法，即便是一对真心相爱的夫妇也未必能答得圆满。

在华人社区流传的这种有关移民官问话的例句竟达 100 种之多，非但居心叵测的婚姻当事人必须熟读，连正经的婚姻配偶也必须有所准备，对答娴熟。比如移民官可能会问：你们家的窗帘是什么颜色？你配偶所使用的牙刷是什么颜色？你的配偶穿多大尺寸的鞋？你们家有几个窗户？你的配偶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而更“私人”一点的问题则是：你和你的配偶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你们第一次做爱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做爱时你躺在床的哪一侧？你的配偶今天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我所熟识的一位朋友曾经走过假结婚的路子，但大把钱花了之后却没能成功。据这位朋友事后总结说，他的大事坏就坏在了没能答好移民局官员的一个关键问题上。这个问题是：“你们夫妇在做爱时用的避孕套是什么牌子？”

这真是有百密也难免一疏。我的这位朋友说，当时他因为没有和女方沟通怕答错，就表示“这是我私人的事，我不想回答”。这样一来，他的绿卡就永远没有下文了。

而据一些“识途老马”表示，早年间，即使是通过了移民官提问，也未

必能经得住移民局抽查。移民局的官员有时会对认为可疑的婚姻突然按其申报的地址进行到府抽查，察看当事人报住的屋内是否有其婚姻配偶的衣物、用品，抽查人员甚至于拿着当事人的照片让邻居们证实双方是否确实同居。

为防止越来越多的婚姻欺诈案，美国方面也曾公布了防止措施，要求任何一桩为配偶申请绿卡的婚姻必须维持两年以上之后，移民局才为申请者核发正式绿卡。在最初的两年，移民局只发给当事人有效期为两年的临时绿卡，一旦婚姻中止，而且当事人不能就此桩婚姻的真实性提出证明，移民局有权认定此婚姻为欺诈婚姻，而中止为申请人续发正式绿卡。除此之外，移民局近年更增添了通过婚姻关系取得身份的外国人，五年内不得为其再婚的配偶申办身份的法规。

但即使美国移民法规严格至此，在美国的准移民们仍不息不绝地为自己的移民目的而耗尽心力，而且美国的移民法规最终总是能让很多人走向成功的，只要人们肯动脑子，或是肯等。

7. 买房子置地

大致上，中国人来到美国，从无到有苦拼苦熬，花上个五年到六年的时间一定可以买房。虽说中国人买房往往会因此弄得手头紧紧巴巴，鸡飞狗跳，但房屋本身给中国人带来的感觉却是波澜壮阔、无可比拟。

美国的房价与现下的北京商品房价相比相差并不太远，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小型州内的房价比北京的还会更加便宜。

再细一点说，美西加州一带的房价在美国可说是名列前茅的，甚至比东岸的纽约等地还要贵些。但纽约有一处是美国房价之巅，那就是纽约的城中之城曼哈顿中城等部分地区。

纽约除曼哈顿外的居住区房价，近年来公寓房的一房一厅标准住宅（有合作公寓与共有公寓之分）平均价格在四万到九万元之间，而独立的一家庭小型住宅房，房价在十八万到二十八万之间。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境内尤其是东岸的房价重跌，使得跌后的房价降至八十年代中期房价高涨时的四分之三甚至于到三分之二。

有太多的中国人崇尚这样一个老理：有土斯有财。

按大多数中国人的道理，“家”的感觉实质上是对房屋本身的感觉。即便浪漫到当年嫁给一位大胡须异族男人，在沙漠中寻找温情的华人作家三毛也嗟叹不已地认同说：家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在屋子里燃着灯等你”。

也可以说，中国人关于家的概念首先是一幢房子、一盏灯和一个人。而在这三者中，以房子的取得相对为难，其他的则是“买来就是”或“天涯何处无芳草”。

中国人手里一有几个钱，多半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

在美国，房屋是一般人生活资产中占最大份额的一项，也是美国人最重要而体己的投资项目之一。就美国的普通家庭而言，家庭资产的54%来自房屋、租用财产以及其他有关的房地产股份。也正如此，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中，房地产的任何一次跌价。对美国人而言都是民间整体的一次财务危机。以最近一次为例，英同境内的房地产在1988年到1991年之间的大幅度价格下跌，使得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总值平均减少了12%，也即每个家庭损失多达五千美元。

在家庭资产中紧随房地产投资之后的是储蓄帐户和其他产生利息的帐户，但其在家庭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与房地产相比则远远落后，仅为14%。

美国这个国家是用“房价”把人们隔开的，相同收入的人在房价制约的大前提下基本上是在同一地区中相邻而居的。而这也正是美国人为什么对居住地区内的居住品质那么刻意要求的重要原因。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比如有一所幼儿园迁入、有一家低价位的超级市场的设立等，都有可能造成居住社区内房地产价值的下跌。许多美国人终其一生，最实实在在的投资就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他们的中青年时代付清一幢房子的钱，如果这个房子再因为地区居住品质的恶劣而降值，那么结局残酷。

在美国的中国人在租房刊登中文广告时爱把自己位于房价相对高房价地区的房子写成“高尚区住房”，精于算计的中国人在美国是以买房投资出名的一类人，手上有点钱除了买房子再就是买金子。早几年间，美国政府尚允许国民把买房支付的贷款利息计入年底税表中用来抵减税赋，有头脑的中国人就用很少的一些钱作为头期款买下一大堆房子分头出租出去。不少中国人

家的太太也就辞了工作，专心致志地游走于自家买下的各房之间收租。因此，在以往，华人中一对夫妇拥有五、六栋房屋者大有人在，几栋房都是只放入头期款就出租给别人去住，房主用租户听付的房租填充贷款利息。

但到了近年，美国政府已把私人拥有住宅贷款的抵税房子栋数大大缩减，因此这一华人偏好的投资方式才告式微。

在早年间，也正因为有了如此强大的心理市场做后盾，华人社区内的房地产业一向是与餐馆业齐驱并驶的两大火车头行业。

一般美国人追求的居住品质是社区内成员水平整齐、环境清洁而且人少。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才刚进入房地产学问中的中国大陆居民动不动就想把房买在热闹地区的观念，恰好相反。因为美国的闹市地区恰恰最可能是治安恶劣地区，房价贬值的几率极大。

王金鸣 1984 年前出国前在北京西城区一家上乘饭店工作，来美后一直在美国的语言学校中学英文同时兼做餐馆男侍，月进两千元，数年如一日。他就这么学着英文把老婆、岳父岳母乃至老婆的弟弟都弄到美国来“陪读”或者“探亲”，竭尽孝悌之能事。

才来美国的头一年，他和他以前在北京就认识的一个关系很远的朋友同住在一个地下室的一房一厅中。他住在厅里，每月交二百块钱的房租。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他顶了朋友的名字用一百五十块钱租下了一间厨厕独立、室内居住面积达四十平米的一房一厅地下室。这个价格即便在当时，也是“天价”。拿到这套房间，王金鸣高兴得整夜不能合眼，在这个唯一不足即是治安大不靖的地方，王金鸣一住就是五年。他把老婆接来后，两人毫无疑问地同住。再然后就是他的小舅子来，王金鸣把他安排住在厅里，并拉了个帘围成一方小屋三个人又同住。

王金鸣的老婆在国内是小学教员，来美后由于英文不好，加上没有文凭不可能拿到教师执照，重操旧业的可能全无。到美国后，她完是在华人开办的衣厂里做按件计酬的车衣工人，后来又应征到一家中药店看守柜台。她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在这里买房，以求真正“安居乐业”，王金鸣撞上的这套物美价廉的地下室使她的梦想在一开始就有了有利的起跑点。

可惜好景不长。

王金鸣的房东偶尔来收房租时看到原本报住一人的房子变成了“三人居”，就吵闹着要按华人社区中的规矩加房租。王金鸣吃准了房东因为出租地下室属于非法，不敢硬吵的短处，一面威胁房东如再纠缠就拒付房租，并告发他非法出租地下室；一面答应房东在小舅子在找到新的住处之后一定搬走，但在私下里，他和妻弟约法三章，要他今后进出大门时“放警觉一些”。好在妻弟十分识理，从此之后他每次进出屋门时都会机警地四下张望一番。

就这样，小舅子一连这么“机警”了一年多。

再后来，王金鸣的岳父岳母来了。为了节省开支，王金鸣夫妇又买了一扇布帘，把自己也圈进厅里，让父母住进里屋。从此以后，一对老人家也过开了“机警”的日子，几年下来，许多惊险，不在话下。

就在王金鸣来到美国后的第六年春天，他们夫妻真的买房了。

他们当时的银行户头上已有七万多块钱了。这七万块钱攥得他们俩人一肚子苦涩和欢喜。他们在郊区的中产阶级住宅区相中了一幢价值 20 多万元的独栋一家庭三卧室小房，七万块钱交了头期款和过户费之后，他们又成了“赤贫”。而买房后每月千余元的贷款利息又成了王金鸣夫妻两人的心头大忧。

他们借的是 30 年的贷款，每月交利息钱就要一千多元，夫妻两人在空无家具的大房中足足睡了好几个月的地铺，才算把房子登报租了出去。

在他们自己的房子中，他们夫妻俩和父母各占住房子中的两个卧室，另外的一间卧室和地下室则出租出去，一间卧室租了整三百元，地下室租了五百元，每月收了房客的房租后，夫妻俩添上几百元就把贷款利息支过去了，为此，他们夫妇两人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和别人合用厨房和厕所。王金鸣时常因此自嘲说：真闹不懂为什么买了房之后反倒要和别家的人合住在一起。

王金鸣在北京时就养成了夏天在家里赤膊的习惯，刚来美国时和家里人一起住在 150 元的地下室时也一直积习不改，但到了自己买房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此举反而让他动辄得咎。刚买到房的那年夏天，天气奇热，王金鸣深明理义，硬是憋着自己四处赤膊的欲望，只要一出自己卧室的门一定披挂起来，只在深夜如厕时才会“自我放松”一下。不巧的是，有两个深夜，他就这么“自我放松”着才一出自己卧室的门就撞上租住他另一间卧室的一位在市立大学学企业管理的女孩从厕所出来。该女孩在第二次见到他的半裸真身后，第二天就向王金鸣的妻子抱怨她家的“居住环境”不好，并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她就搬走。王金鸣妻子刚开始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那女孩，女孩又不肯说，等到她和王金鸣猜到是怎么回事后，她不由得替丈夫委曲起来。

如果说王金鸣夫妇买房的本意是要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则冤枉了她们夫妇对享受等级的选择和对美国好日子的认知。但时事弄人，没钱则气短，每月沉重的贷款利息不但压得王金鸣夫妇既不敢有哪个月让房间不自己生钱，更不敢得罪已到手的房客。

为了求全，王金鸣夫妇后来在地下室房客“换届”的时候自动搬到了地下室去住，这样一来，两下里方便。直到多年后的今天，王金鸣仍住在自家的地下室里。而究竟要住到哪一天，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美国华人中，类似王金鸣夫妇住在地下室、手头窘迫的屋主不在少数。而且，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喜欢赤膊的原因。成千上万华人屋主心中的算盘不外是希望出租房屋得到的进款能够维持房屋贷款每月的开销。所以，通常的情形就是，在一幢独栋洋屋中，住在地下室的才是屋主。

在美国买房其实不像一般中国大陆人想象的那么不得了。美国人崇尚借钱，不论是做生意还是买东西，能向银行借出钱来就是当事人的造化，绝非见不得人的勾当。像王金鸣夫妇一样，所谓攒钱买房，亦即攒买房的头期款。头期款一般是整个房价的四分之一。一旦决定买房，买主在经纪人的带领下往往在其所属意的区域看上几十栋甚至上百栋房子，买主才会下决心买下其中一栋。

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尤其是美国经济几年来低迷不振，台湾移民纷纷回台另寻发展，造成了对房屋需求量的减低。尤其是东岸纽约一带的房子，原本当地气候就不被喜嗜温潮的港台人所属意，人员流失导致购买力的减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房地产业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从华人社区内房地产公司的兴衰就可以看出。早在八十年代末，纽约华人对全市各区及长岛部分中高级住宅区的购买渗透已有相当的影响力，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上占有率最强悍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当时的全盛时期，社区内有多达数十家的房地产公司运营，无数外族人开办的同类公司也把华人市场列为工作重点，绝大多数雇有华裔员工。但等到了九十年代

初，华人社区中还能保持当年规模的房地产公司仅剩了两、三家。所幸自九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一穷二白来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中有能力买房者开始进入市场，对尤其是美国东西两岸的房地产业维持及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房屋销售经纪人把在中国大陆人群中打开交际网当成开辟自己事业的转折点。大陆移民形成的购买市场，已成为美国房地产业新兴的一方宝地。

与华人移民相比，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尽相同，更尤其是近几年美国经济恶化，美国本地居民的买房希望越来越退为梦想。

根据统计，到了 1991 年，美国中平均有一半以上的人买不起房子，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付不起头款。这项由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报告说，自九十年代以来，大约有 51.3% 的美国人买不起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中间价位房子。这项数字高于 1988 年的 48.6% 和 1984 年的 48.5%。

可以预期的一个前景是，美国的建筑材料、建筑人工费用仍高居不下造成的与住房需求相脱节的矛盾，在九十年代中，必将使得美国的有房阶层因为后继无人而成为“老化”现象最严重的人群。

而且，这种“老化”也势必将引起美国社会有关建造业界的一次大范围革命。

比如美国是不是也该兴起猛造简易房一类的举措？

说句笑话。

8. 留学生涯

1988 年底，我在北京拿到赴美留学的签证，回来的路上在王府井《经济日报》社外的树枝上发现了多得吓了我一跳的满树乌鸦。

我相信那天栖息枝头的乌鸦总也有上百只，这帮一向黑压压的东西当时被街灯照得竟是通体金黄。

因为记忆中的这一类平俗之雀一向不是个吉物，就把这一偶遇告诉了父亲。当时的父亲只告诉了我一句吉利话，他说：金乌玉兔。

十几天后，当我在北京机场和父母告别时，心里知道这一去可能是三年五载，不吉利地说也可能就是一辈子。我和给我以一米七六血肉之躯的这两位样貌平常的中国老人言别时，满腔无奈。

我向深层候机室转身的时候，停留在身后被指令不能前行的他们给我的最后记忆是母亲眼眶周围巨大的两团红色。

我这一走，我们三人谁都不知道今后。

而我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句“金乌玉兔”了。

我要出远门，外出留学。

王玉平四年前来美国准备在纽约攻读管理学硕士的时候，飞机在旧金山入境，他下机和他十几年没见的经济担保人还没聚满一天，他在纽约的同学就几次三番地来电劝他赶快去纽约打工挣学费。当时王袋内几近空空，只有临来美国前向亲友挪借的几百美元。他的同学在电话中告诉他说，“没有钱的人在美同是没有资格玩的”。几句话把王玉平说得心里发毛，随即让担保人陪着到旧金山机场等了一张碰巧的退票直奔纽约。

王的那位同学当时来美国已一年多了，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中餐馆做 WAITER，并与两个女孩同住在皇后区 500 元一套的地下室里，自住的房间只有 6 平方米大，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王玉平来了之后，他的这位同学把自己的 6 平方米让给他，自己则住到饭厅里。

王到纽约时正是夜晚，纽约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是高速公路上川流的车辆，和拐下高速公路后遇到的几个红绿灯。他的同学临睡前告诉他，因为他是刚来，所以，分摊的房租相对优惠，只有八十块钱。

第二天早晨，王玉平才刚醒来时即被看到的景象吓了一跳。他看见在他脸前有大片大片纽约的雾气冲腾萦绕，这些雾气源源不断地从他床铺上方二尺长一尺宽的小窗外飘扬而入。他的这个窗口距室外地面只有两寸高，纽约清晨地面飘忽的瘴气在把他的身心浸泡起来。他知道，他生命中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王玉平醒来时，他的同学已经出门打工去了，但却细心地给他在吃饭桌上留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告诉他已为他找好的送外卖工的餐馆地点。王玉平趴在吃饭桌上捧着纽约市内地地铁图看了一个半小时后，锁门走路。

这一走，他便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送外卖生涯，这种生涯一直延续到他拿到硕士学位毕业。

和台湾二、三十年前盛行的移民名目一样，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大陆移民人口中也以持留学身份者居多。

中餐馆的工作具有上手快、可随干随辞的优点，因此成为华人留学生中最著名及普及的一种行业。纽约和加州由于华人餐饮业发达，大陆留学生来

到美国，大部分都与这两地渊源颇深。除了在两地就近上学及在餐馆工作两便的学生，每年到了暑期，也总会有大批大批在偏远外州读书的留学生进入两地的中餐馆打工赚取学费。

美国的学校暑假极长，大多数从5月份的上、中旬直放到9月初，外州的华人学生往往考完最后一门课即走出校门，手头紧一点的坐廉价的灰狗巴士，稍为宽裕一点的自己驾车直奔华人聚集的大城市开始暑期打工生涯。

也正因此，每年自5月份开始，各华人聚居大城内的出租房屋即告叫紧，房价也随之升高。当了一年“孙子”的房东们开始扬眉吐气，既可以抬高房价，也可以做梦似地挑拣房客，做梦似地成为“爷爷”。

大部分留学生暑期到餐馆打工都是有备而来，早在一个月前就会托在当地居住的亲友代为找工找房。往往5月份人一到，第二天就开始“操练”。几个月“操练”下来，省吃俭用者大部分都可以挣够四千来块美金。

李声原在俄亥俄州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读书，该小镇原来也不存在，是因为他所在的大学建校的缘故，才聚居了一些和他们学校有关的人，成为小镇。镇上只有两家中国餐馆，而李声就读的大学里，却足有将近60名中国学生，两家餐馆成为历届中国打工学生心头的一方圣地，人心所向。

但由于供过于求的关系使得两家中餐馆的老板十分苛刻，付给打工学生的底薪越来越少，学生们劳累一夜，往往只能挣到十几块钱。相形之下，纽约和加州一带中国人聚居的大城无疑是天堂。李声在他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到纽约打了几个月的工后，食髓知味，干脆转学到纽约来长住了。

在美西加州、犹他州等地读书的学生在暑假的另一个重要来钱的好去处是去赌场打工。在美西紧临加州的内华达州有两个全美著名的赌城，一是拉斯维加斯；另一是雷诺。每到寒暑假，大批的中国学生赶赴这两地工作。而在赌场一方，尤其是寒假期间节假日繁多，赌客也剧增，这时往往也确实需要大批的临时员工参与上作，学生们对赌场劳工市场的注入，往往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在赌场工作收入大体上也是靠小费，但进项不俗。其中负责给赌客换钱的工作，每小时可挣6块钱左右。而做发牌员、女服务生的打工人小费的收入极为可观，有时，客人一赢了大钱随手就“发”给身边的服务人员十几、二十元的小费。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晚上被客人“发”个几百元钱的事时有所闻。

在美国读书的人最大的隐忧就是关于学费的。而就不少相对贫穷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在美国挣钱的目的其实远高于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凡是有资格发给可以延续学生身份1—20表格的学校，只要收费便宜就趋之若鹜。因为在美国延续身份的手段极端有限，贫穷而精明的学生往往为了保住自己的学生身份除了向不大肯通融的校方请病假而外出打工外，剩下的就是向肯通融的学校交钱注册，但却不去上课。

美国移民局规定，不具在美居留身份（亦即不具绿卡者）在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生身份。所谓全日制学生，即必须按学期完成移民局现定的学分或课时数目。如按课目计算，全日制学生必须保持每学期选修三门左右的课程。如果一旦有外国学生未能选够移民局力全日制学生所规定的课程，或者外国学生根本就未能新的学期内如期注册，那么此人在美国移民法律意义上顿成非法移民，成为“黑人”。

关于这一出，行话就叫做“黑了”。

一旦“黑了”的人从原则上讲除非经由大赦、政治庇护等手段，基本上已丧失了在美国境内经由合法途径调整身份的权利。也正因此，唯持全日制的学生身份及挣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两项压力，对于初进美国社会语言不流利、风俗不熟悉、身上又没有钱的大陆学生来讲，负担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挣钱交学费及维持生活成为不少人每天生活的重心，真实的学业成败反到成为其次了。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普遍低迷，各类学校都面临招生不足的危机，按道理，外国学生在美就读，学校方面有向移民局知会学生动态的义务，但不少非正规院校为吸引生源增加收入，往往对学生经常旷课甚至整个学期都难见到人影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这样一来，无疑“救”了不少穷苦的学生。

六十年代赴美的台湾留学生中曾一度十分流行到美国要达到“三P”的口号。此“三P”也就是博士学位(PH.D)、绿卡(P.K)和房子(PROPERTY)。这种口号出现时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不少台湾留学生和今天的大陆留学生一样赤手空拳地到美国。据早年间台湾留学生总结说，当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历了“寻梦期”和“圆梦期”两个十分漫长的阶段，生活才慢慢步入坦途在经历头一个“期”时，当事人一般处在于学校就读阶段，生活上完全谈不上享受，每天忙碌学业。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而第二个“期”则是就业、升迁、安家置产、生儿育女的阶段，这个时段中的机遇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问，但大都也要花上五至八年的时间才能彻底安顿下来。所以，早年的台湾留学生从踏出国门的第一天起一般要持续挣扎到八年以后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出国前的理想。

而十多年后，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奋斗状况与当年台湾的这一代留学生竟有许多相似之处。

近十年来的台海两岸的学生在美的生活档次开始拉开。台湾民众的经济水准开始飞速起飞，民众腰间渐凸，不少富家子弟来美留学，常常是人还没去学校报到就开始四处选购房子和车子，一派繁忙。

相比之下大陆留学生中在国内即有暴发机运的人凤毛麟角，又缺乏真正的经济后盾，所以来美后，呈现出的往往是另外一派繁忙的气象。

按美国方面的要求，每一位没有奖学金来源的留美国国际学生必须具有经济担保人提供的经济担保，保证支付留学人员在美期间的一切费用。但无论是担保人、被担保人，还是美国驻外使领馆专事发放签证的工作人员，人人对这种“担保”的意义心知肚明。担保人的义务其实是帮朋友个忙，填个“介绍信”给核发签证的人过个目。被担保人也深知担保人只要出了担保信就是帮了天大的忙，因为美国人一向忌讳自己的薪水、财务资料被公开。

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美就学的外国学生中有75%的人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在美学习的一切费用的，并未依靠美方乃至外界的经济资助。而中国学生中，这项数字据信高达98%。

但在美国的几年中，不断地也闻听也有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后了解了美国真实的生活情状的艰辛之后，返过头来觉得担保人是唯一可供使用的经济工具，便要求担保人“信守诺言”，为其支付学杂费用，为此甚至不惜闹上法庭，一副翻脸不认人的架势。

1962年出生的蔡憬15岁时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她于1985年来到美国主修“英语为第二语言”教育专业，两年后获得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硕士学位。

位。和几乎所有的大陆留学生一样，蔡憬在求学期间被生活的重担折腾得“水深火热”。她曾最多同时兼做过四份工作，她做过餐馆的收银员、女侍、代课教师等等可以找到的各种工作。

生得玲珑有致的蔡憬说她在纽约留学这几年见过的事情，是她过去多少年梦都梦不到的。她见过餐馆中的客人为争夺舞女吃着吃着饭一言不和举枪就射，子弹猛射在墙壁上镶嵌的巨大玻璃镜上，镜面砰然炸开，向四下里喷溅，满店堂的人吓得没有人敢出一声，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靶子。

她也见过“黑手党”大佬，这个大佬曾当着她的面吓退过餐馆外收垃圾工人。这位工人自恃长着一张意大利人脸，自称也是“黑手党”的要员，隔三岔五地威胁蔡憬的老板要求涨高垃圾收取费。该老板眼见钱去得太没道理，就咬牙托人辗转请到这个被“公认”是黑手党的大佬。

“那天，”蔡憬说：“那个大佬来到店里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红玫瑰花。他微笑着把花放在我的面前，说这是送给你的。”蔡憬说，如果不是老板事前向她交过底，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位相貌堂皇、穿着一身高级西装的绅士会是黑手党。

“他跟每天上下班时间走在曼哈顿华尔街上的高级美国白领一模一样。他没有声音地走到我旁边的桌子坐下，细细地品着一杯啤酒，等待着垃圾工人的出现。那个垃圾工人是我的老板约来的，本来说是要给他涨价的垃圾费的。”蔡憬讲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平静，一副被磨炼得烈火金钢的样子。“垃圾工人当天是准时来的，他一进门就怔在门边了。那个已坐定的大佬回头向他看过来，他们的目光接触得相当奇怪，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然后垃圾工人就扭头走了。”

“大佬紧接着就付了那杯啤酒钱，留下非常好的小费，对我说：我得走了，谢谢你的服务，祝你好运。他然后就走了。”

多年以来，这些故事伴着她走过了漫长的留学生涯，蔡憬在和我说起这些时已在纽约杜鲁大学找到教职任教，不久被提升为专业培训学院院长，再不久又被任命为该校专业培训学院副院长，下辖上千位各族裔师生，走在校区内，一派颐指气使。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人数的增多，目前在美国的大部分学校中都成立有中国学生的联谊组织。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台湾留学生来到美国时这种中国学生组织就已十分发达。不少当年的学子多年后记述自己的留美生涯时，都对这类组织曾给予自己在异乡留学时心灵上的排解，赞叹有加。尤其是地广人稀地区学校内的这种组织长年以来承担了对中国同学送旧迎新的工作，并定期进行多种形势的联谊活动，为在美国没什么钱没什么娱乐又没什么去处的华人学生补充了不少欢乐。

我在美国的几年中曾参加过无数次这类形式纯朴的学生联谊活动，这种活动有时是去校园或野外烤肉聚餐，有时是在校内举行各种球类比赛，也有时是为拿到学位的人儿吃一回庆祝饭，无数次下来深深觉得在美国这块人欲横流的土地上，只有这种联谊活动才是为中国学生心灵及财政的“恰到好处”，才是净土。

发展至今，在美国高等院校中的华人学生联谊组织已经成为台海两岸政府的重要关注点。在一些华人学生成份多样的学校内甚至于还成立有两个倾向不同的学生联谊组织，组织内争权夺利的现象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也说明在美国的不少留学生组织已从以往自发式的单纯联谊团伙改力正式

的一个实体。但在觉得这种形象转变可喜可贺的同时，又觉得加进了政治色彩之后的中国同学联谊会多少变得不伦不类起来。

在留学生涯中，无数中国人采取的是边学边寻找机会的“留学办法”，也有太多的人走的干脆就是弃学从商的道路。

龙虾是美国高档水产中的一大项分支。纽约地区的龙虾打捞生意几乎被意大利人所垄断，二十几个位于长岛的捕捞公司清一色全是意大利人。但这种格局偏让一位人称“中国皮特”的中国人进入其中掺了“沙子”。

此“皮特”真名叫王增欢，自1992年开始，人称“龙虾王”。

王增欢身高一米九几，秦皇岛人，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成为该系研究生，并曾是师大篮球校队的主力。他于1988年3月5日赴美留学时，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未几，他弃学不上了。

他从不隐瞒自己从“王增欢”到“龙虾王”的发迹史，他的这段真实的发迹史说出来像个杜撰故事。

王增欢刚到美国不久曾找到一份在海产店做伙计的工作，每天挣最基本的时薪。由于工作勤恳，他被前往该店送龙虾海产的意大利人荷曼看中，以每天75美金的工薪聘入自己的生意中工作。

荷曼68岁，有自己的一片捕龙虾的私人专属捕捞场，一辈子因为捕龙虾在长岛置有相当数量的不动产。王增欢加入工作后每日凌晨五点出工，直干到中午，下午还要负责向各餐厅或海产市场送货。为更多地赚钱，他每天晚上还要兼做一份餐馆工，直至深夜十一点。在那段时间里，王增欢除了挣下有限的一些辛苦钱之外，并用勤奋肯于为自己奠定了未来。

1992年4月，荷曼突然失踪了。

事发当时，荷曼的捕虾船停在海上，船里船外遍寻不到人影抑或尸体。

一段时间之后，当“遗孀”当得懵懵懂懂的荷曼夫人把荷曼的三条捕虾船之一划归王增欢使用。早用勤奋全盘赢得荷曼一家人好感的王增欢此时得到了回报，他使用荷曼价值16万美元的打捞船每月只象征性地交一些利息钱和海税，开始了为自己打捞龙虾的生涯。

自此开始，王增欢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为了打开自己所捕龙虾的销售网，他除了掌握住荷曼的一些外裔客户及水产市场，并进入华人社区编织销售网。他说，他的推销法宝是向客户讲这样一句话：“我给你的龙虾价钱永远比别人给你的低一块钱。”

他自己捕自己售，不经中间商过手抬高价格，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已将长岛的48家及皇后区大部分华人经营的餐馆、海产市场的龙虾供货划归名下。

捕龙虾的旺季在每年的4月之后的九个月内，王增欢在这段旺季中，每天平均的捕捞总数在一千磅左右，最好时能达到一千五百磅。龙虾在纽约地区餐馆的批发价按重量在三元到四元八之间浮动。王增欢像当年的荷曼一样雇请了两位美国人工作，开给他们与自己当年同样的日薪，他自己担任送货。他说，他每天生意的全部开销在五百元之下。

问到他的准确收入时，王增欢微笑不语，只说：“你还算不出来吗？”

他说他已经不想再去读书了。他后来娶妻生子，养活一家人，他每天给老婆的零花钱是一百美元。

从古到今，中国人是世界上公认承受历练最多的民族之一。但中国人没有哪一次的折磨比这一次移民美国来得更自愿和争先恐后，不少中国人在乡

土和异域间找到的是一条从山丘走向山峰之路，而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不是。
回头再看，这一段路基本上是一些悲惨和一个未知数的惊险组合。

9.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现况

认真而言，在中国，与五十年代盛行的留学苏联相似，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向学之风开始流向欧美。而在欧美之间，美国由于移民条例相对宽松、社会相对开朗，更为“学心所向”。

更由于这次新的流动还直露地夹杂着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内涵，因此，迅速成为一场轰轰烈烈、以“学”为借口的潮流。

这场运动在实际意义上是一场新时期的大型迁徙运动。在自八十年代之后及至过往的十多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可以说有超过 80% 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地与“留美”这一风行一时的重要时尚有所牵连。亲朋好友乃至邻里街坊中先一步得以“迁徙”的人，为身后留下无穷无尽的艳羡和担忧。

那时候，不少年在二十至四十正日正方中的人，更将此视为自身生命中的一个新的始发点。

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赴美攻读比较文学的查建英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小说，这种躁动的题目首先就给人以一种无限贴近当年民间这种疯狂先兆。而且，查建英由于对这种躁动把握贴切，更成为中国留学生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

如今，当中国各方佳境渐开，重看这种躁动时虽已是别样滋味，但在当时，这种躁动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展望，无从更改。

美国的高等教育一向令世界关注，“到美国留学”这一念头不仅只是一些中国人的嗜好，而且也是为世界崇尚的一项举措。资料指出，在美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占外国学生前往世界各国留学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据国际教育协会 1993 年 12 月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2-1993 学年度间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人数达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比前一年度的四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五人增加了 4.5%。

而在众多留美的国际学生中，亚洲学生的数量在近年来占有绝对的优势。

统计显示，在 1992—1993 学年度中，国际学生中亚洲学生人数为二十六万零六百七十人，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 60%。从单项统计来看，学生人数排名在前十名的国家中，亚洲占了九位。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总数为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人，比上一学年增加了 4.1%；日本学生总数为四万两千八百四十人，增加了 5.3%；台湾学生总人数为三万七千四百三十人，增加幅度为 5.3%；印度学生总数为三万五千九百五十人，增加幅度为 10.5%；韩国学生总数为两万八千五百二十人，增加幅度为 10.9%。

在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国际学者中，有 67% 的人来自亚洲，其中 43.4% 的人来自东亚。

在所有学科中，企业管理专业一直是外籍学生的最爱，注册的外籍学生人数共达八万八千一百二十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20.1%，此是企业管理专业接连第四年在同类评审中在就读国际学生数量上领先。在这项评审中，工程专业居第二位，注册的外籍学生数量为七万七千两百八十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17.6%。工程科系此次已是接连第三十五年在受外籍学生喜爱的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中国学生对工程专业的情有独钟在国内时就有所充分体现，在美国，这

种现象更施愈演愈烈。记得 1991 年采访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的毕业典礼时，工程专业的学生队伍中中国面孔不出所料地一大把，我甚至在毕业生排队进入毕业典礼场地的队里行间发现了一个朋友的两个孩子。据一些参加过子女毕业典礼的有心家长感慨说，每次在美国参加毕业典礼时都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在工程一类属于“社会操作”的专业广受亚洲人青睐的同时，聪明的美国白人子弟们却纷纷就读于法律等“社会统治”类专业。在这种“社会统治”类科系内，“国际的影子”少而又少，至于中国面孔则更是凤毛麟角。家长们感叹说，不知这是否是小事糊涂、大事精明的美国人所具备的美国式细心的具体体现。

在 1994 年对美国学生进行的统计发现，美国学生中对商业感兴趣的人已经连续第六年下降，成为目前的 16.1%，而对工程有兴趣的人更下降到 8.7%，计划在未来攻读医疗及卫生的人数则连续六年增加，达到目前的 15.8%。

目前，美国共有三千六百零一所公、私立大学乃至学院，其中私立大学占了相当的比重，为二千零三所，公立学校则为一千五百九十八所。但在这三千多所学校中，只有一千三百七十一所学府被美国教育委员会（AMFRICANCOUNCILONEDUCATION）的评鉴机构认可。

美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由社区学院、正规大学及研究生院组成。其中的社区学院在中国虽可以说是个新概念，但其在美国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却达到了任何正规大学所个能及的地步。

美国的社区大学为公立机构，学生就读的时间往往只有两年到三年的时间，但学过的专业课程被正规大学承认，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正规大学的三年级就读。全美目前共有两千多所社区学院，学生来源往往就取材于学校附近的居民。在美国，有不少老年人在退休后纷纷重去上学，去的往往就是这种收费低廉，对学生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社区大学。

美国正规的大学平均而言，私立大学的水准相对为高。美国著名的老牌名校基本上全是私立大学。但是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公立学校也开始跟进，不但对名牌私立大学的教授展开猛烈的挖角行动，更在自己的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及学生就业情况方面超过了名校。比如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分校就是公立学校中出现的咄咄逼人者。

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是十分崇拜名校的，这种现象在人事任用上也相当明显，在同一个机构中也常常会有校友间相互特别提携的现象发生。

美国每年都会对境内高等学府进行评鉴，并公布结果，以示众生。据《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U.S.NEWS & WORLDREPORT）1993 年公布的评鉴结果，根据学术声望、入学难度、教授阵容、财源、学生毕业率以及校友满意程度等因素排名，在中国素享盛名的哈佛大学连续四年名列榜首。此次是该报连续第七年对全美一千三百七十一所大学所做的评估，被认为是美国颇具权威的一项评估。

这项排行榜根据“卡内基基金会教学促进协会”的分类方法，把学校分为全国性大学、全国文理学院、地区性大学和专业大学几种。

1993 年 10 月份公布的这项排名榜显示，美国最好的全国大学依次为：

哈佛大学（HARVARDUNIVFRSITY）（位于麻州）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位于新洋西州）

耶鲁大学 (YALEUNIVERSITY) (位于康州)
麻省理工学院 (MASS. INST. OFTECH) (位于麻州)
加州理工学院 (CALIF. INST. OFTECH.) (位于加州)
史坦福大学 (STANFORDUNIVERSITY) (位于加州)
杜克大学 (DUKEUNIVERSITY) (位于北卡州)
达特毛斯学院 (DARTMOUTHCOLLEGE)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OFCHICAGO) (位于伊利诺州) 康耐尔大学 (CORNELLUNIVERSITY) (位于纽约州)。

在 1993 年的排名中, 位于前 11 至 25 名的大学分别为: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UNIVERSITY)、布朗大学 (BROWNNUNIVERSITY)、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UNIVERSITY)、莱斯大学 (RICF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HOPKINSUNIVERSITY)、宾州大学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UNIVERSITY)、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UNIVERSITY)、柏克利加州大学 (UNIVERSITYOFCAIJORNIAATBERKELEY)、范德毕特大学 (VANDERBILTUNIVERSITY)、维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OFVIRGINIA)、洛杉矶加州大学 (UNIVERSITYOFFCAIJORNIAATL.A.)、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OFMIGNAN)、卡内基美龙大学 (CARNEGIE MELLONUNIVERSITY)、艾莫瑞大学 (EMORYUNIVERSITY) 和圣母大学 (UNIVERSITYOFNOTREDAME)。

在 1993 年的排名中, 最好的文理学院为位于麻州的安赫斯特学院 (AMHEERSTCOLLEGE), 最好的艺术类专科学校为位于纽约市的茱莉亚学院 (JUILLIARDSCHOOL)。

受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在九十年代, 美国高等院校和社会中的几乎每一行业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根据 1994 年对美国 427 所大学中的二十二万七百五十七名新入学学生的调查发现, 有 32% 的新生表示, 他们选择学校的首要标准是学费的问题。

事实上, 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的确正在走向一个反常的膨胀阶段, 这个阶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愈演愈烈。教育界人士不无忧虑地表示, 这种膨胀如不加以引导及控制, 将可能是导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没落的一个诱因。

但回头看看这个膨胀过程, 校方与学生各自怀有一肚子辛苦帐。

一般来讲, 美国公立高校的学费相对便宜, 私立学校收费则贵些。对于待美国绿卡或美国公民学生, 公立学校在学费上甚至还减免相当比例的学费, 但私立学校则对此一视同仁。美国社会讲求竞争, 在办校方面也多有体现, 从而也出现了院校品质及收费标准鱼龙混杂的局面。在学费收取上美国各院校间往往并无一定之规, 一个学分的收费最低的可以仅是几十块钱, 而一些长春藤名校每学分收费则可高达数百元之谱。美国一般的正规大学每学分收费在二、三百元左右, 在大学中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大致要修满五、六十个学分才能毕业, 本科生要修的学分则更多, 通常是上百个。因此, 在美国读大学本科, 在金钱及精力上都是件十分吃力的事。

非但如此, 美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仍在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凶猛出击, 让人防下胜防。近几年来, 美国高等院校的学费成倍地猛涨, 名牌大学的收费更达到一般人连看都不敢合的地步, 民间一派叫苦不迭。以纽约的学校而言, 近几年来单纯因为学费高涨而引起的学潮频频发生, 学生人数多到几成全美

之最的纽约市立大学。自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学费涨价问题饱受学生示威之苦。闹到厉害时，愤怒的学生们还曾攻占教学楼、封问教室，满身满脸的不可调和、势不两立，有关的新闻持续成为美国主流报纸的重要话题。

从数字上来看，自1980年起至1990年止，美国高等教育费用上涨了126%。而在此同期，美国民间的个人可用所得只增加了63%，仅为教育费用涨幅的一半。同样是在这十年之中，不少优秀学生赖以补贴教育费用的联邦奖助学金总额只增加了47%，形势比人强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国内的学生更多地使用学生贷款。目前的美国学生中有44%的人是靠这类贷款或奖学金来补贴学费的，全美1992年的学生贷款总额超过了一百六十个亿。相比之下，财政上无以为继的外籍学生的情形则雪上加霜更加不堪一提。

进入1993年，美国大学的学费上涨数字更令人不忍卒睹。据非盈利组织“美国大学委员会”统计指出：自1992年秋季到1993年秋季，美国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平均学杂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涨了6%，达到一万一千零二十五元，加上食宿费用，总额共达一万五千八百一十八元。而公立学校继过去两年已经进行了的两位数涨幅之后，1993年又上涨了8%，达到两千五百二十七元。加上食宿费用，共达六千两百零七元。而1992年秋季到93年秋季的通货膨胀率为2.86%，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费用的攀升数字，真正到了“学费猛于虎”的地步。

往高昂的学费压力之下，来自大陆的留学生中，能进入美国名校就读的基本上都是国家派出的公费学生。少数就读名校的自费生几年勤工俭学的生涯过下来，被各种重担压迫的脱胎换骨，变得瘦骨嶙峋、一派苍老。

纽约相当著名的高等学府纽约大学(NYU)近几年来一直在学费问题上位尊为全美前茅，它旗下声名远播的世界一流电影学院曾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奥利佛·史东、伍迪·艾伦乃至台湾名片《喜宴》的导演李安等人。尽管进入该系就读的人中毕业之后有做人导演的，也不乏找不到工作的人，但该专业硕士学位学费之高一向是一般人不敢企望的，几乎是全美最贵的学科。

到了1993年，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五年研究院学习的纯学费已高达6万元之巨，而此“纯学费”仍未包括学习中心付款项的大头“制作费”。在就读该系研究院时第一年要完成三部短片拍摄；第二年要完成一部；第四年还要完成毕业影片的拍摄，一般一部实习片子的制作费用往往要耗掉七、八千到数万美元不等。几年下来，学习中有关的制作费可高达十万元。而且由于学科特点，强调团队作业的学生几乎不可能打工，如此，再加上学生的住宿、膳食等开支，学生们学成毕业后每人身后累积的一定都是将近20万的教育投资。

自1987年始至少截至1993年，台湾学生李良山是此一专业研究生院数年来唯一一位经由正式考试遴选入学的华人学生。李的父亲是在洛杉矶开香菇制造厂的一介老板，多少年来李良山在财政上一直是十足的“伸手派”。即使教育投资如此骇人听闻，在问及行将毕业的李良山有关毕业后的工作前景时，他仍苦笑着表示“还看不到未来”。

而在美国的华人家长偏偏是以望子成龙出名的，但美国名牌大学近年来日新月异的高水准收费标准，使得不少收入不高的华人家长徒生有成绩一流的儿女，除非子弟能获得奖学金，不然也只能“望校兴叹”。

我的一位在纽约华人社区电台工作的朋友，他的两个比他个头还高的孪生儿子一举考上了纽约最著名的史但文森高中。这件本该可喜可贺的事却让

他一路愁眉不展。他的妻子十几年前在访问中国时不幸在广州的一次空难事故中过世，身后就遗下了这两个后代，我的这位朋友酷爱新闻这一行，偏偏行动上又是只求心灵舒适，一辈子生活得十分随意，因此一把岁数了，也不过混个年薪三万来元。这种收入，平时管管两个正长身体的儿子的饭钱加上付掉早年买下的房子的分期付款后基本上已所剩无几，眼看着两个儿子在学业上的壮举，他常常暗自唏嘘不已，感叹自己不可能供两个孩子进名牌大学，既对不住孪生儿子也对不住亡妻。

但在院校方面，谈起经费问题也是一肚子苦水。自八十年代中期全美经济衰退开始以来，尤其是自 1989 年之后，美国大学中来自政府的经费锐减。到了九十年代初，政府对大学的补助减到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学生协会 1993 年进行的调查指出，由于校方教育经费入不敷出，美国已有 38% 的公立大学延缓了对校内建筑物的维修；有 31% 的大学减少课时数；并有 45% 的大学对校内全职教职员职位的空缺视若无睹，不予补充。

受经费困窘的灾难带累，即便连名校也不能免俗。世界闻名的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史坦福大学进入 1993 年都开始制定了大幅度的裁减计划。例如，耶鲁大学为了节省开支以期缩小几近八百万元的赤字，计划裁减 11% 的教职员工、合并三个工程系，把应用物理和物理系合二为一，并且关闭语言学系。不少美国大学依从前的脾气只要有富绰校友捐大钱就会开设新科系、增加特别计划或者增设研究中心，持续不休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太多的学校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一“习气”。

据美国教育专家预估，在今后的十年中，美国的大学将更多地采取缩减课程及学校间分享教学资源等办法来度过危局。未来将有许多学生会到校外上课或者借用其他学校的教学设备。其实在目前，这类方法已经被美国最先一批“绷不住劲”的学校使用了，比如华盛顿及波士顿的一些中小型大学就已开始互借图书馆乃至分享不同的教学课程。而一向习惯于游走校园的学生们也就必须屈驾游走校际之间，不得已地开始校际联谊。

面对危局，难怪美国的四百五十名大学校长及主管人员 1993 年底在圣路易斯研讨美国高校方面抵抗经济低迷对策大会中一致同意这样一种评价：美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基本变革。

10. 当头棒喝！九十年代的美国就业市场

如果学对了专业，毕业后在美国找工作薪水数目不俗。

但是几年的经济大环境不好，美国人开始越来越怀疑自己在近两年的运气了。由失业而导致的惶恐乃至颓废心态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在美国正正规规地找工作，通常要向有关可能要人的各机构先后发上数十份简历，运气好的人才发到几份时就能接到面试通知；而运气不好的，可能一直就杳无音讯下去。

更正规一点的求职，往往还需通过职业介绍经纪的中介。

但近年来，美国境内能提供给求职者的机会总的说来已是越来越少，毕业就等于失业的阴影逼得不少中国学生来美七、八年，已在边学边寻地修了两个甚至三个学位了，还必须呆在学校内一方面保持身份，一方面“等待戈多”。

从普遍的情形来看，美国的就业市场从八十年代中就开始步入衰竭。

与以往五十年不同的是，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美国可提供给受教育者的专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据纽约华尔街日报报道，1993年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空前困难，就业机会创下五十年来稀少之最。就业市场情况的恶劣，改变了许多美国青年开始成人生活的道路。

据报道，九十年代初期，在美国至少有35%的大学生从事着不需大学学历的工作。这个数字比五年前增加了50%。有些大学生目前所做的工作甚至仅是只求经验不求工资的实验性工作。美国密西根大学大学就业研究所主任席滋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的。他说：“以前只要有大学学历，出了校门几乎个个都有工作。但这种好日子已经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

这也难怪，早在1950年，美国人口中只有6%的人拥有大学学位，可到了今天，美国已有21%的人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这导致了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在1989年以后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形，而这据说也是三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事。

这种状况造成了部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重新再认识。这种“再认识”的出现加上高等教育费用的飞涨，又加剧了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走下坡的倾向。据一项对地区性大学所做的调查中显示：即便是八十年代急速扩张的企业管理系近年来也面临着学生人数下降，甚至招不到学生的窘况。

美国的就业市场受制极多，哪怕是在最具一定之规的政府工作中，各州当局对其的重视程度也会影响工薪的水准。比如，政府法院中的法庭传译员是一项要求很高的专业工作，译员除了需要精通复杂的法律名词之外，还要掌握验尸官、子弹弹道专家、警卫专家乃至精神病医师的术语及阐述。同时也必须熟悉千变万化的有关毒品、武器和性器官的辞汇及俚语。而如以纽约及洛杉矶两地的同类工作相比而言，两者在薪金水平上就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相比之下，洛杉矶法院传译人员训练完备，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加州，州政府提供了共有八种语言的正式考试，在考试范围中并加有法律名词和同声传译的考试。

在酬劳方面，洛杉矶的法庭传译员的工资是每半天一百八十元，每一个全天二百一十元。相比之下，纽约州只为全时工作的西班牙语译员举办考试，

法院译员每天的工资只有八十元。

面对近年来的美国全面经济低迷，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采取更多地雇用带有非正式雇员性质的员工的办法，工薪严格地按小时计算，而且每周工作时间也限制在一定数目之下。如此，雇用机构一来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员工的价值，二来也可得免为这类员工支付医疗保险等昂贵的职工福利。

令劳工阶层担忧的是，这种非正式雇用的方式在全美目前已像一种“瘟疫”一样蔓延开去，使社会中出现更多由无依无靠感觉衍生的惊恐。

在美国复杂的高等就业市场中，华人的进入也可说是一个加速美国高等技术职位短继的肇因之一。

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进入美国就业市场，数量惊人，质量也惊人，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世界著名的通讯电器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内，各关键项目几乎全有中国人参与，整个实验室1991年最核心的研究项目也是由几位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中国人担纲研究。我在两次走访贝尔实验室时，在实验室内的长长雨道上游走，迎面随机遇到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中国面孔。就总体而言，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留美学生目前已成为美国科技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不少美国人感叹他说，聪明的中国人十年前可以与人同时起步，十年之后一定不声不响地排在人前。

由于各种就业力量的分摊，不少明事的美国白领开始空前地为自己的前景担忧。依美国社会的惯例，举凡公司裁员总是从最晚进入公司的职员开刀，但到了九十年代，美国的高层次就业情况糟到几十年未曾尝到过失业滋味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变得命运多蹇。

近几年来，由于这种状况的普遍，报章杂志除连篇累牍地向人们介绍如何在自己现在的职位上好自为之才能免除失业恶运的“六种措施”或“十项预兆”。比如这种文章告诉高级粉领（高级女性职员）赶紧去学习电脑的高级程序操作，而且最好使得整个公司中只有你一个人能够驾驭某一方面的电脑问题，造成公司会因为电脑操作的缘故把你留下来。而在分析被解雇之前的预兆时，这类分析文章则说得相当玄妙，甚至于公司忽然没有道理地把你提升到副总经理职位都被说成是可能被解雇的先兆。报上说，这是你的上司在察看你的原位上如果没有你在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美国报章中再进一步的有关描写就是关于不幸已失业者的了。这类文章在九十年代相当集中而且密集，尤其是描写企业的高级主管这一类从来都是事业腾飞者，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依托时的悲凉心境与尴尬处境时，满纸无奈。

这类描写说，他们得和自己以往的属下一同去政府的失业保险部门排队领取失业保险福利金；同一个高级住宅区的几位企业主管人员同时失业，但为了面子，每天属于上班时段的白天内这些人都谨慎地躲在自己的家中足不出户，以免邻居得知自己失业的消息。

有一段故事写得更妙，说是在一个高级住宅区内有一个大白天忽然发生一起车祸，这种突发的事件使得车祸现场附近的几户人家的男主人身不由己地同时出外察看，相见之下大家才惊愕而尴尬地互道“难道你也被……”

与此同时，在当今的美国工作中，来自职业的职业危险已经和失业的危险一样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注意。美国人在近几年中并对高危险性职业也有排名。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美国的各种行业中，计程车司机的死亡率始终高居职业死亡人数的榜首，平均每十万人中就会有15.1人丧生。而其它危险性

高的职业还包括警察，每十万人中有 9.3 人丧生；饭店柜台职员，每十万人中有 5.1 人丧生；加油站工人，每十万人中有 4.5 人丧生；职业警卫人员，每十万人中有 3.6 人丧生；游民乞丐，每十万人中有 3.1 人丧生；商店店主或经理，每十万人中有 3.1 人丧生。

为了使眼下人人陷入职业恐慌的美国人在未来能够更有目的地参与就业，美国的《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根据联邦劳工局及各类全国性专业协会的资料统计出未来十年间美国的二十项最热门、就业机会最好的工作分别是：

1. 税务会计师（会计类）。

据估计，在未来十年中，会计师的需求将增加，增加幅度为 40%。与此相关的热门行业为业务与国际事务有关的会计师。

2. 银行行销专家（金融类）。

目前，全美有 14% 的共同资金是由银行出售的，未来十年这种行业的需求量将增加 50%。相关热门行业为财务分析员、有价证券的管理人员。

3. 电脑系统分析师（电脑类）。

此项工作是指专门为某一行业（如银行、医院、政府部门等）的需要而设计电脑软体及硬体、确定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运作的技术人员。此行业未来需求量将达 80%。相关的热门工作为电脑程式设计师、网络管理员。

4. 锁定市场营销专家（顾问类）。

行销成问在未来将受重视，大型机构未来的趋势是纷纷和这类公司签定合约。相关的热门工作是人力资源顾问、环保顾问。

5. 双语教师（教育类）。

移民的增多使这种教师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相关热门工作是特殊教育教师。

6. 电脑软体工程师（工程类）。

电脑普及化的结果使得对各种软件的需求剧增，仅 1994 年，预估对此行业的需求就将增加 20%，相关热门工作是环保、土木和工业工程师。

7. 环境工程师（环保类）。

随着环保意识的高涨，政府及企业对环保的清理及设计都日趋重视，在 1996 年以前对专事清理有毒废物的环境工程师的需求数量就增加了 16%，今后十年内社会对这类人材的需求只会上升。相关热门工作为毒物学者、工业卫生学者和湿地生态学者。

8. 临床实验室技师（健康医疗类）。

新医学诊断及研究的进行乃至爱滋病传播状况的愈演愈烈。更由于柯林顿新保健计划的影响，此类人材需求量将增 25%。相关热门工作是 X 光技师、医院行政管理人材。

9. 资讯经纪（资讯服务类）。现代社会对资讯需求的增多，人们对资讯精确程度及数量的增多使这一行业走稍。相关热门工作有技术图书管理员、资料库、析师。

10. 索赔估价员（保险类）。

天灾人祸的频繁出现及未来社会对理赔速度的要求，使这一行业往未来十年内需求量将增加 28%。相关热门工作是资料处理员、精算师。

11. 环保律师（法律类）。

有关环保的诉讼近十年来增加了将近五倍，目前有关的待处理大案仍多

达千余宗。相关热门工作为健康医疗、劳资和房地产律师。

12. 有线电视广告业务员（媒体类）。

有线电视在未来的大举发展及联邦为其服务收费的设限，使得广告收入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相关热门工作有顾客服务代表、新商业服务开发员。

13. 老人医学专家（医学类）。

在下世纪初叶及中叶，美国人口老化问题严重，老人医学将变得十分重要。相关热门工作为家庭医师、护士实习员及医师助理。14. 家庭护理（个人服务类）。

来自人口老化及节省医疗开支两方面的压力，使得家庭护理成为需求量最大的行业。在未来十年，其增长幅度将高达现在的两倍。相关的热门工作为托儿教师、护士助理。

15. 专业公关（公共关系类）。

在未来，机构的形象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关行业也将成为极具意义的一门行业相关的热门工作为医疗业的公关。16. 商业服务业务代表（推销类）。

有关商业服务的独立承包商在未来十年内开始大批涌现，为公司。揽电脑程式设计、广告、信用报告及招募人材等工作，这种 BI 行业的需求在未来十年将增长 50%。相关热门工作是证券及金融业的业务代表、通讯设备业务员。

17. 蛋白质化学家（科学研究类）。

蛋白质的药物价值决定了此项科学的光明前景，新的药物正不断地被生物化学家开发出来，市场并期望不断地有新的开发。相关的热门工作为分析比学家、药理学家。

18. 职工助理专家（社会工作类）。

在美国名列前茅的企业中，绝大部分均设有提供员工上咨询的计划，协助解决员工困难。这些咨询包括滥用药物、酗酒、理财等不同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性别认同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行业越来越显示其存在的重要。相关的热门工作为私人心理治疗师、家庭辅导顾问、老化现象研究专家。

19. 通讯经理（通讯类）。

通讯工业的日益先进使得高科技越来越被广泛应用，通讯经理被大量用来负责这些系统的顺利操作。相关的热门工作为无线通讯专业、网络管理专家。

20. 旅行代理公司（旅游类）。

据预估，旅游业在未来的十年内将增长三倍，对旅游代理公司的需求也将大幅增加。相关热门工作为航空公司、租车公司、旅馆业务代表。

11. 华人社区的工作机会

有一天去邻近长岛的一家名叫“真北京”的中餐馆吃饭，去之前，说好了要请客付款的熟人朋友诡秘他说：你时常写作，在这家店你能看到

一个人进了餐厅，座上不过四成满，正在环顾左右壁上字画时，朋友忽然说：你快看门口。

回头一望才知道朋友有言在先提示的这“一个人”，果然是纽约的文化圈中人。这人早年从台湾来美，曾是活跃台、美两地的著名记者，早几年并曾在纽约创办过一家水准不俗的刊物。

而当时在门口的他明显地不是为文字而来。他和门口的收银员结了一笔账后，拎着厨房中人递来的一个装着饭菜的纸袋又匆匆出门了。

然后，我的朋友说：你看到了吧。

朋友又说：这就是美国。

无论全美经济环境如何演变，华人社区的就业市场自百余年前成熟以来一直扮演了协助华人暂度危局的重要角色。华人社区的就业机会以体力工作为主，同时兼具流动性高的特点。

在华人社区的餐馆内，充斥着不少徒有高学历却在专业领域里无法安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虽说是拿餐馆工作权充过渡，但一过渡就过渡了好几年的大有人在。更有相当数量的华人是因为不具合法工作的身份原因而不得不在社区内等候时机的。

了解华人社区就业市场的人对其工薪过低的事实均印象深刻。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美国政府规定美国境内工人每小时法定的最低工资数额为四元二角五分，但华人社区提供的工作职位中，尤其是中餐馆的卫作中，能达此标者寥寥无几。即使是在华资机构中堪称老大的如航空公司、银行等十分不一般的大公司，其工资水准也多是恰好过线。华人航空公司衣着笔挺的地勤人员每小时的时薪也不过是六块来钱；而大部分华资银行衣着光鲜的出纳时薪则几乎多少年来就一直紧紧卡在联邦法定最低工资线华人社区在这方面予人口实的历史由来已久。在纽约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曾有过劳工部长亲自率领属下突检华埠农场，十分钟内就查出六十几件低薪雇用非法移民案及三件违法雇用童工案（其中最小的涉案人只有12岁）。该部长并查出一位现年90岁的老年华裔妇人正辛勤工作，据了解，该老妇每小时时薪只有一元，与当时法定的每小时最低时薪三元两角五分相比差距巨大。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华人社区内非法移民的增多，社区内，特别是餐馆业的工薪水准与十年前相比非但没有什么起色，反而更是大幅跌落，尤其是福建籍的非法偷渡者中几乎百分之百地欠着居中办理偷渡事宜者的偷渡费，因此，急于打工还钱就成为这些人中每一分子的当务之急。而这也就造就了社区内庞大的低工薪就业大军。据老纽约表示，十年前在纽约的中餐馆做WAITER每月可以多少挣个一千七、八百元钱，历经通货膨胀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是这份工作，在生意平庸一点的店内，能保往十年前的标准已不俗了。

目前，在纽约的中餐馆内，餐馆洗碗工人的“公道”月薪是八百元；在菜市场卖菜工人的月薪是七百元。而这些工作都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在华人女性移民云集的农场内，车衣女工的工资常常在一千块钱左右浮动，一些不具技术性的工作如剪线、叠纱等工作，每天时常还赚不到

二十元。

即使如此，不少偷渡者往往还以低于社区内普通工贤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薪水标准取得工作机会，而且刻苦耐劳得到了相当“非人”的程度。一般中餐馆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作十一至十二个小时，这种工作在美国人来讲已属极不人道了，但福建籍人士可以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更有甚者，近一两年来鉴于工少人多的情形更加严重，不少乍到美国的偷渡客为了及早挣钱，干脆提出自己只要小费不要工钱的工薪条件。

如此条件，当真骇世惊俗。

华人社区的工作机会一般都是通过中文报纸和华人开设的职业介绍所来和劳方见面的。在中文报纸上刊登征人启事是一则花钱少、见效快的途径。一般的作业程序大体和中国目前的报纸招工情形差不多，需要人手的商业主事人需先向中文报社通报要刊登征人广告的内容，用信用卡付账后，广告刊出。

这类征工广告一般和其他服务类广告一同被归类放在“分类广告”栏中，需要找上作的读者阅后即可致电应征。美国中文报纸虽然种类多而质量杂，但是高质量、有真正读者的也不外就是二三家日报。因此，虽说是中文报纸在美国，但每大的读者数量却相当可观。

而雇主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求员工的办法其实是最省事的作法。在华人社区内，随着移民人放的增多，职业介绍所也越开越多。好的介绍所口碑极远，据说是很新的移民在还没到美国时的飞机上就口耳相传，一下飞机，牙不刷、脸不洗就直奔介绍所而去。

在职业介绍所拿到的工作，一般都是餐馆工、农场工、保姆等体力工人，偶尔也会有个别的办公室低级职员的工作。介绍所在交易中往往要按比例抽求事人第一个月工资的成，也有不少介绍所采用的是求事人在拿到工作之后就当即付给介绍所五十到一百元有介绍费的。多少年来，华人社区中百废转兴而后百兴转废，但人头熟络的职业介绍所的生意却是长盛不衰。以纽约为例，从八十年代至今，介绍所越开越多，但求职者也越聚越多。在华人社区街头，你如果看到有成堆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身旁一定不会是一个便宜货的货摊，而是一家职业介绍所。

几年以前，在每到寒暑假时，常有放了假的外州华人学生在一些华人开的餐馆门口探问需不需要人手。但到了九十年代，由于来自更贫穷的南美洲人口的激增，这种情形开始在人种上有所变化。目前，在纽约华人社区，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已经由南美洲人渐渐接手，华人老板反而省去了人事纠葛。这些南美洲人在华人社区几年混下来，薪水只求个八百左右，工作态度又相当端正，口碑不恶。

在华人社区内就业机会下甚乐观的同时，一些聪明人开始着手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了。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自己凑够一些小小资本之后，从无到有地自己给自己做起老板来了。

在众多浪迹纽约谋生的中国人中，来自上海浦东的小个子姜国范是个异数。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和所有上海人都不一样。他没读过什么书，为人相当重义气。在美国的十几年间，他曾大富过好几次。

1955年出生的姜国范来美比一般人早些，他是目前中国学生密若繁星的纽约皇后学院早年间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他到美国时还是1977年。

但他这个“早期留学生”只进了皇后学院院门一次，借用了一下校内的厕所就消失无踪了。在一开初，他以每周于十个小时的后，每周拿 150 元薪水的打工生涯开始了在美的生活。当时，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一起，每周六天打工，晚上去中餐馆送外卖，周日去纽约唐人街街头摆地摊卖些小杂货。他也曾经在街头为人拍照，雨天在街头卖雨伞，学得一口“马路英文”。

他发的第一笔财是在 1983 年卖当时在美国很流行了一阵的“椰菜娃娃”。他当年一共从台湾进了三、四个货柜的仿冒“椰菜娃娃”，前后共卖了八个月。他然后发了。

这之后，他开始重回正道，在纽约中城的黄金地段 8 大道和 36 街处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他当时结识了一位同是来自上海、在纽约市立大学攻读财会硕士学位的女孩。他和这个女孩一起在全美各地寻找客源，每到一地先翻查当地的商业机构名录。冬天的时候，这两位飘在异乡一对商人在冰天雪地里冻得脸发紫，脚乱跳，字相互拥抱取暖。但也就是在这几年之内，他们的公司发展成有 28 位员工的大型机构，成为纽约地区颇为拉风的一个华资公司。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后来由于胆大，从台湾进了四个货柜装快克用的小瓶及小袋子，这批货后来被查抄，他一跃而成被美国联邦 FBI 通缉的人物。他后来是在结识了贤淑本份的现任妻子并在妻子的说服之下去自首的，FBI 的人随后在他的手腕上“用激光划了一个看不见的光环”，勒令他不得出纽约。

这样的日子一直捱到 1987 年他被告知免于起诉，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美国联邦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

他的再次在纽约出头是靠做从中国大陆进口箱包的买卖生意。他的这家公司成立于 1988 年，取名 DONY。

DONY 开始之初，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租了一个简单的仓库，姜国范和他的大姨子及两个伙计一同撑起局面。那一阵子，他只身一人到大陆去寻求有关厂家支持，处心积虑地网罗货源。与此同时，他在纽约寻找可靠的经理人材和销售人材。他公司的货不见得比别家的档次高，但在样式设计上下了相当的功夫。他们以美国中下层收入人士为销售对象，主要客源以黑人及南美洲人为主，在样式上参照台湾、大陆乃至南韩经销公司的同类型产品，只要是市场欢迎的产品，他们就加以研究，改造设计后立即投入生产，然后再马上返回美国国内销售。与此同时，他手下的经理人员在每次前往全美各地进行展销的时候，都会留意当地是否有销售潜力，以便尽快地在全美打开市场。

几年下来，姜国范的 DONY 已成为纽约首屈一指的华资箱包批发公司，员工人数达到 20 余人，员工待遇在同行业中也名列前茅。目前，DONY 在纽约、洛杉矶和迈阿密均设有销售基地，年营业额近千万美元。

12. 美国礼仪这门功课

可能是顽劣本性所致，到美国多年了，我仍被美国人在各种排队场合中耐着性子等前面的人完事的容忍精神折服。在美国排队时，排在后面的人一概不动不催，心里即使装着天大的事，甚至可以选择放弃排队，也决不可能选择向排在前面的人放声吃喝。

听任前面的人挥霍他们也是用时间换来的这种“挥霍”权利，在文明的规矩中毫无疑问是必须的。

而这也是美国日常生活的真髓所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要在美国生活，就必须遵守这些规矩。

刚列美同时，时常在进出大门时被美国男人礼让先行。这种礼让有时是十分让人不好意思消受的。美国男人有绝对的耐心为你静静地拉着大门，哪怕当时你距离门口还有五、六步远。才来美国时，我还对北京家门口的北京103路无轨电车站等车时人们站成广大一片，车来时男女混杂挤成噪闹一团争相上车的北京“积习”记忆犹新。所以，刚开始，美国男人给予的这种“殊荣”一时让我难以消受。一来因为无功受禄，于心不忍；二来每每这事临头，本来缓和的内心陡生诸多匆匆忙忙的内疚，脚下要加快不讲，内心的安宁也一下子全被搅散，时间长了才知道，美国的这些出让礼貌的人是为着自己才出让的。

因为这多半是他们的品质所在。

很久以后，大概是在1993年夏天吧，有一天忽然接到年过半百的母亲来信，她先拉拉杂杂写了无数其它的话，在信尾捎带着说是几天前她在挤车时“把胸部挤坏了”。

初看到这里时，不免愣了一下，之后便迫不得已地一个人哭了起来。

之所以当初这么做今天又这么写，绝不是想炫耀自己距离文明比别人更近，只是担忧母亲一定还会有六十岁、七十岁乃至八十岁，那时的她将如何迈上公共汽车如此了不得的门坎。

而不迈这个门坎又能有其它怎样的选择呢？

在美国，一个人的教养或修养程度往往体现在此人对他人的礼貌上。在这方面，且慢说大陆来人，即便是在美多年的中国人效美国人的此“尤”者也在少数。

原因可能是不屑，也可能是不行。

说到底，为女人或身后人开门关门还在其次，美国人的礼貌其实还体现在太多方面。

方面一：在餐馆内或任何公共场合，任何拍到的人不能打搅先到的人。在餐馆内，这种“不打搅”表现在后到的人必须在门口留步，决不能进入餐厅内的用餐区任意游走或自我地方等候。美国人的餐厅内甚至连把两组素不相识的客人同放一桌都是犯了大忌的。而在其它任何排队的场合中，比如邮电局、银行等处，后到的人也是必须在一定距离之外等候的，先到的人正在办理的所有事宜都属于他人隐私，旁人不应挤在旁边观瞻，甚至于帮着出些主意。

方面二：如果你是个男人，要和男女混杂的几个人同出一门你应和其他男人一齐等候女人们走出后再移步出门。

方面三：居家过日子，门前的草坪该剪草而不剪，首先是破坏了整个地

区给人的总体观感，长此以往有损当地房地产价值。再之后的后果就要说是对邻居的大不敬了。

方面四：中国人中互相问对方每月的工资是多少甚至是件十分体贴、而且十分“社会”的事，问起朋友的一件衣物价格表示的是自己对其欣赏有加，但在美国这样做，你则冒犯别人了。

方面五：如果你在公共场所不慎打了喷嚏，你有义务立即向周围的人道一声“原谅我”。而十次中有九次，你周围的人会对你回道一句“上帝保佑你”。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因打喷嚏向你道了歉，你则该回说一句你表示并不介意的话。

方面六：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拜访他人都必须事先预约。中国人以往惯常的那种蹬个自行车有枣没枣兀自去朋友家门外“打一竿子”撞撞运气的做法，相当粗鲁。于公干私，都属犯忌。

方面七：进餐时，你在咀嚼食物时最好不张开嘴。同时，你进餐时盘碗及咀嚼之声应减至最低。

方面八：如果你请朋友吃饭，你在付帐时不应当着你朋友的面数钱，而应该在餐桌下遮掩着做这件事。

方面九：如果你和一些别人同处一室，当你的熟人进门时，你不应该兴奋地隔着房间高声和他（她）打招呼。

方面十：稍微讲究一点美国男人还会在女人走进屋内时起立以示恭敬。

方面十一：如果你做为女主人在家里正式宴客，你自己因为进出厨房的原因而懒于梳妆、不施粉黛，而且满面疲惫，对你的客人而言，你的这种随意的宴客姿态是对他们的不敬。问理，如果你被别人邀请赴比较正规的宴席，你绝不能衣着及装饰随便。这之中有一个借镜：如果你的装束比宴客主人当天的装束更随便，那则是你不敬他人。

许多品质你如果不具备，而你又憧憬着能被美国社会接纳，我的经验是：相当困难。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例子绝对可以权做说明。

刚来美国的第五天，我第一次进入美国邮局买邮票寄信。那时正是中午，一进邮局大门就看见里面开了三、四个收件窗口，每个窗口外只有一个人在排队，而在离这些窗口两、三米远处有五、六个人在稀稀拉拉地向与窗口垂直的墙壁排队。这些人的最前方是否另有窗口，匆忙之中我没看清楚。

我当时进门之后未加思索地站在离门最近的一个窗口旁。站在仅有的一个正在寄包裹的女人身后等候寄信。我当时就曾真实地觉得，自我走近窗口到我气定神闲地在窗口外站定，邮局内就有好几双眼睛向我横扫过来。我当时以为这些眼神是因为看见东方人感觉新鲜，才如此横扫。殊不料当前一个女人寄完包裹我觉得该轮到我的时候，窗口内的一位辨不出国籍的工作人员劈头就问我：“你排队了吗？”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连忙回问：“队伍在哪儿？”那个工作人员反过头来看着我诧异起来，随后他用手往我后面墙而立的那几个人的方向一指，不知该对我说什么才好。现在想起来，他当时一定把我当精神病看了，认为我行为超常。

听了他的话回头青时，我才发现，这面墙而立的几位原来果真是在无言向隅，不言不语之中正等候窗口叫号，这时候四下里静悄悄之中窘出我一身冷汗，艳阳高照之下，可以想见几分钟前我的举止有多么“骇世惊俗”。

这次的经验让我坚决地想，我必须清清楚楚地回味我过去二十多年养成

的所有习惯，从细分类。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过后想想也是十分的追悔不及，但这种事事出有因，单纯对我而言应该不是那么恶形恶状。

这件事发生在我来美后第一次乘地铁的时候。纽约地铁的治安恶况全世界有名，久闻之后绝对的心生悸战。来美一周后，第一次跨进地铁站，心里猛烈地七上八下。那次我是从皇后区家中乘七号地车去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市立大学报到，按路线图指示，七号地铁列车在进入曼哈顿的第一站“大中央站”站时我应该换六号车，我便依图换车。

“大中央站”是一个相当大的地铁车辆中转站，换车的人流得从一条线路的站内月台上下各种楼梯转往另一线地铁的站内台。那一天，正当我满腹忐忑地随着人流往六号车的站台走时，忽听得背后有一个男声高叫“MISS(小姐)、MISS(小姐)”。这个呼声我自从出现第一声就听在耳里，但我当即决定不予回头。原因除了坚信不会有人在这个地方有任何有求于我的事情之外，也多少有点怕性情不明的美国人对我做出任何我所不能预测的事来。我这么持续地又往前走了几步，那个“MISS”之声一直尾随不去。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到了这时我干脆觉得身后的这位是纽约坏人无疑了，所以我的步伐越走越快。

我相信这个“MISS”一直喊了有十一、二声，最后直逼到我的耳后，但几乎就在我有点愠怒地想转过身来的时候，一只男人的手把一样东西一把拍在我的抱着书本的臂弯间转身就走，我甚至没来得及看见他的正面。

低头一看，臂弯间赫然躺着一只我不知什么时候丢失的羊皮手套。

再看那位“MISS”，他竟已被人流冲得无影无踪，我只恍惚记得他穿的是一件美国男人中十分流行的深咖啡色风衣。

我立即为自己早几分钟一直持续着的、自以为是的“抢劫价值”羞愧难言。我甚至觉得十分有愧于纽约。

说是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但有时事出突然，受过严重冲击的顽劣本性有时也会猛然“返祖”。

邮局及“MISS”事件过后二年，当我刚刚觉得自己已经和美国社会融为一体的时候，冷不防的我不由自主地“骇世惊俗”了一有一个冷天，我在街头等候巴士准备乘车回家，在遍身寻找零钱准备头票时几枚硬币不慎掉在地上。当时慌乱之中我手上还左拥右抱着诸多玩艺，眼见零钱掉在地上却不能快速弯下腰去。正在这时，排在我前边的一个年轻人迅速地转过身来弯下腰去捡掉在我脚边的那几个硬币。眼见此情此景，我产即有点不高兴，慌忙对他提醒说：“这些钱是我的！”

几乎是在我说话的同时，那个年轻人已经把捡起来的钱交到我的手上，并笑着接过我的话说：“我知道。”

他做完这件事后，扭回头去继续排队，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把我一个人剩在身后不由自主地脸红脸绿。

对于我这样的外来人来讲，及时领会美国文明水准的点点滴滴当然是必要的。但我想，无论我们为自己的“改邪归正”列出多少条理由，我们这类人在领会进程中带给美国原有文明的伤害，绝对深重。至少，帮我捡钱的年轻人一定会十分介意我当时匆忙之中的那句要命的“呐喊”，更遑论还有不少“我们这类人”根本不想去领会他人的规矩。

我那时浑身僵冷地想，不知道我将面临的生活中还有多少次这种悔恨交

加的感觉。窘在那个年轻人身后时，在纽约已注满整整三年的我，开始觉得要想真正与美国的文明融会贯通，我的前景仍暗无天日。

感觉是，如履薄冰。

13. 有人笑你穿错了

美国女装近年来又开始时髦那种上紧下松的喇叭裤了，这种让人猛然好似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服装符号”搭配上美国女人喜穿的长大上衣，真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恍惚。

美国人中，有太多的爱穿之人是喜嗜一逛街头橱窗的，美国人的英语中还特别有一个为这种嗜好专造的词，语意直白地就叫“WINDOWSHOPPING”（橱窗购物）。每每对橱窗的一番空空浏览下来，苛刻而实际的美国人竟也会从中得到相当的满足。

美国人的服装总体说起来只有“正式”和“休闲”之分，但在应用中却是危机四伏，着实是一个陷阱，不可须臾掉以轻心。

在美国，如何穿著是一门相当大的学问。此行当养活着成十万成百万的美国人。而且，时装设计历来是几乎所有艺术中最具观念竞争的一种艺术，连爱滋病这种新潮的事情也是对时装界的荼毒最深。

而美国的时装认真讲还是相当推崇欧洲，这种推崇至少体现在设计情调上。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及五十七街上的高级服饰店中，充斥的几乎全是欧洲名牌，各名牌店内的装饰也多以现代或古老的欧式情调为基调。

可喜的是，进入 90 年代，美国的高档时装品牌中出现了华人自创的品牌，并且在总营业额名列前茅之外，在美国的消费者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成绩可圈可点。

曾就职于世界著名的 ADOLFO 服饰公司任高级设计师的台湾人郭沥玉，自 1991 年 ADOLFO 公司宣布结束营业之后买下其在曼哈顿中城的展示间，推出自创品牌 LIHLINNEWYORK，郭沥玉的服装走的是高档针织服装路线，一套三件式服装的平均价格在二至三千美元之间。1993 年秋，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次服装展示会，并开始的高级百货公司“萨克斯第五大道”、“尼曼·马克斯”进行展售，瞬间成名。

1983 年诞生的 NAUTICA 牌高价位男运动休闲服装，是由台湾人朱钦骥创立的。十年发展下来，其已在全美各地的百货公司、购物商场中设立了 250 多个零售点，去年该公司的销售额高达一亿七千六百万元。1993 年 10 月份，美国著名的财经杂志《富比士》（FORBES）在专题介绍全美四百家最好的中小型企业时，朱钦骥的公司名列第四。

另一个受到美国青少年喜爱的名牌 BUGILBOY 则由华裔毛昭寰创办。这是一家以青少年为消费对象、专营牛仔及休闲衣饰的服装公司。毛昭寰于 1978 年开始打出这一品牌，他的公司从亏损累累起家，到如今他已是年营业额高达五亿的大企业家了。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并有 13 辆名贵轿车，其中的一辆 1972 年产的 FERRARI（法拉利）DATONAGTS 是以一百万元购下的，据说全世界只有 70 辆。

平常场合中，美国人的穿着随意得出了名，以往的印象中他们常常是一袭 T 恤、一条牛仔裤就可以过整整一个夏天。但这其实只是美国人在休闲时间或旅游季节留给人的总体印象。其实，美国社会在各种场合中对着装的要求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沧桑转换而变得“没了原则”。

在美国的各种场合中，穿着得体绝对是第一要件。把对服装的要求说得如此郑重绝不是想故作耸动，事实上，你在赴宴时可以分离谱地迟到和早退；你可以和女上司打情骂俏；你甚至可以当众说话稍微的不得体，但你千千万万不能乱穿衣服。上述虽然都是绝对的不雅，但这之中有着涉及范围的区分。

上班一族中坐办公室的白领阶层是绝对不能穿牛仔裤之类的休闲装上班的，稍微讲究一点的大公司还会要求男员工一律着西装打领带。

正规的美国的公司对女职员的着装戒律则更多。比如，女职员在办公室内不许穿休闲类的裤装；裙装内必须穿长统袜，不得露出脚趾；长统袜的长度必须高于裙下摆；女职员的头发必须整洁；在办公室内不能着球鞋。也正因此，不少办公室白领阶层女职员在自己办公桌下的隐蔽处都会放有一双方便走路的布鞋或球鞋，为的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换穿。

有的大型公司为了调剂员工的着衣乐趣，还规定了每周中的某一天是公司职工的“随便穿衣日”，每到这种日子里，职员们可以穿着不那么正式，拣自己喜爱的方式穿衣。

美国人对赴宴的服装要求更为复杂，正式的晚宴与一般的自助餐酒会服装有所区分；一般的家庭烤肉聚会又与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不同。常常是你邀了客人做客，客人会反问你聚会的场合正式不正式？每当这时，你应该必知肚明他是为他的衣服问的。而这也是聪明人的做法。试想，如果在一个不怎么正式的场合，每个人都是一身短打扮，唯独你一人独着深黑笔挺的燕尾服；或者每一个人都云鬓高挽、长裙及地，唯独你一人一袭T恤，这种巨大的不协调，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张狂，别人也会看着你在人堆里悠悠晃晃不像个东西。

而且，这在美国是对宴客的主人大不敬的明确表示。

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常常能看到许多美国人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开车去外地与亲朋相聚，但无论如何，在他（她）车子的后座车窗的挂钩上一定还会挂有另外一套洗烫工整可正式见人的礼服，在其他旅行者中，这种“另有一套”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在机场国内航班的候机厅或出口处，总是有不少人一手拎着自己简单的一两件行李另一只手拎着一件长长的、被套在塑料袋之内的正式服装。

而在这方面，大陆人的素质还远待磨砺。

主做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在纽约销售生意的华资中国置业公司经理洪柱森是个性格十分严谨的生意人，他要求他手下的房地产经纪人一定要专业打扮。男人上班必须穿干净衬衫，办公时、袖子不能挽到臂弯以上；女职员上班着装必须是裙套装。后来有一阵，公司需要大批招进新的员工。招工广告登出后，应聘者云集，其中一位大陆来的应征者的装扮除让他极为吃惊之外，至今记忆犹新。

洪柱森说，那天，这位自报姓刘的应征者一进门就引起全公司同事的侧目。这刘氏上身穿了一件深绿色运动服，运动服的拉链半开着，里面穿了一件白色背心；他下身登一条没了裤线的化纤咖啡色长裤，再下面是一双高帮白球鞋。刘说他是纽约州立大学毕业的学生，英语沟通能力极佳云云。

洪柱森事后说，他从第一眼看见刘时就从心里拒绝了他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他不相信这样打扮自己的人能够胜任房地产经纪人的工作，公司的客人在看到如此穿戴的业务员也会怀疑该人的能力，而这甚至会影响整个公司的信誉。

事实上，刘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被录用，他只听说要他回家等公司进一步联系的电话，但这通电话毫无疑问地永远没有兑现。

但在美国，绝对还是有穿着自由的。加州自由名校柏克莱加入即大有崇尚这种自由的好汉。这些人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不满意动不动就裸身示众。他

们有时男男女女站成一排，身上的繁杂零件垂垂吊吊，周身各种经年不见天日的毛发纤毫毕露地任由人凝视瞻仰。该学院中的一位样貌不俗男学生甚至一度干脆整天地裸进裸出，豪放异常。

但这股“急流勇进”认真要想流进寻常民宅，只怕认真要有时无日了。

14. 有关我们自己人的点滴欠缺

中国人在国内近半年来已经经历了饱满的商业社会磨项，十多年前的许多大锅饭留下的不遂已告烟消云散。而早年间的中国人到美国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派生出来的社会态度。

相比之下，晚到美国的大陆人在素质磨炼上比前辈们要简单得多。

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大锅饭，让不少大陆人在初进美国时感受到极大的不适应。北京画院画家张红年说他初抵美国，第一觉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自问：“我该干什么？”

这位在国内一向标榜崇尚自由的人，从来没有哪天像那天那样浑身充满了对“自由”的恐惧。

他回忆说，他当天整天盘桓在脑际的一个下意识是：领导在哪儿？

对美国新世界适应上的恐慌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赴美的、过惯“循规蹈矩”生活的大陆人心中均有出现。从每天为完成领导的指示而工作，到每天必须自己告诉自己要干什么，成为自己的领导，而两种制度只在十几个跨越太平洋的飞行小时中即告转换完毕，实在有点“迅雷”，让人不及“掩耳”。

近年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劳资形态，这对于中国人敬业素质的磨炼，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可当初“不及掩耳”者尝到的苦头是用老板的“大不悦”乃至关业转换来的。这种结果谁都不愿发生，但在一开始却谁都无从制止。

王红兵来美国之前是上海一家图书馆的职员，每天上班的工作除了整理图书就是喝茶及随便看馆内图书。她每天的工作量如果集中起来算，只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她在上海自1985年仆始参加工作，一直如此“工作”直到1989年出国。这五年的工龄培养得她对她的以往的工作量有了一种“习惯”。

来美后，她在一家远亲开的中餐馆中找到一份收银员的工作。她每天坐在餐馆门口的柜台前招呼进门的客人、结算要出门客人的帐单，并兼管收银台旁的小菜柜台的清洁，工作量可大可小，看怎么去干。比如说，客人进门时是只问一声好就将其“传递”到里面的WAITER手上，还是自己稍稍带着他们走两步进入座位；小菜柜台上客人要菜后滴落在台子上的汤汁是立即擦净还是等等再说；有客人要外卖是只是通过听筒向厨房喊一声就坐等别人把菜带出来，还是自己如果看到厅堂内的人员都忙而自己去厨房亲自拿出来，如此零七八碎的事中几乎事事都有学问。

王红兵当年并不习惯主动，她甚至不习惯大工作量。刚进餐馆最初一个月，她还能凭着对工作的新鲜制造一些“主动”，但时间长了之后，她又开始回到以往在国内图书馆的工作习惯上去了。

纽约的华文报纸相当厚，而且每天同时有几份报纸出版。几毛钱一份的报纸足有几十页，由于印刷油墨的关系，每天看完报后会两手黑黑。报纸内从美国经济成长指数到香港大胸女星的择偶条件，无一不有。细看的话，看上整个上午还难免挂万漏一。餐馆每天在下午三点左右时会有一段空闲时间，但到那时，十几双闲下来的手会同抢一份报纸，往往造成缺页少张的后果。而且，多年养成的阅览习惯也使上红兵极不愿不先睹为快。

王红兵从第二个月开始坚持不住了，她开始在上午当班的时间看报。但注意到影响，她还是采取了相当含蓄的办法做这件事。她在收银台后面微微低着头，将报纸平摊在腿上，这样的—个看报姿势让人在远处看来像是在沉

思。她这么“沉思”了五、六天之后，她的远亲老板告诉她：你不要再这样了，她当时两手黑黑地什么也没说。

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里，她果真没有再“沉思”。但在第三十月的一天，老板不在，她心痒难熬，又开始“沉思”。但在她“沉思”快结束时，她忽然听见老板在耳边极近的地方忽然响起，她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刚想答话，她就听见老板说：你下个星期不要来上班了。

相当多早几年雇用过大陆员工的老板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大陆员工不如台湾或其它地区的人敬业。同样是做一份工作，其他地方来的人来做会于得妥妥贴贴，没有毛病；但大陆人做起来就会你说一点他做一点，永远有得挑剔。在纽约法拉盛地区专门经营北方风味菜的“独一处”餐馆经理何允莉回忆早几年的管理经验时说：在餐馆里，客人进门时，台湾员工往往会热情地招呼，而大陆员工则明显热情不足。在她的餐馆里还曾有过大陆员工干着干着心里竟怀了一肚子气，大骂“凭什么他们坐着吃得热火朝天，我们得在一旁陪笑傻等？！”

她说她手下的大陆员工要么就走另一个极端。她说，有一个大雨天，店内仅有一、两桌客人，一个大陆来的 WAITRESS 眼望雨天满面失望，竟站在店中央当着客人的面大声叹说：“唉，今儿又没得赚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种尴尬也不堪回首。在 1990 年之前，赴美的大陆人普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经验不足，再加上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考量不足，弄出不少“咎由自取”的事情来。

记得当年临出国时，一些自称对美国社会经验老到的好心朋友都对我说，到美国后在求职时最重要的是要自己给自己撑面子，在面试时最是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吹牛。而且即使是完全不懂，也要在面试人面前坐怀不乱，把自己说成满分。

后来，在国内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出国指南、在美注意事项一类的书中也多有这种类型的忠告。而且再后来，这种所谓美国“面试技巧”竟被当成了一条“占训”，被口耳相传。

想来，这种忠言是为了矫正中国人在表述自己时的谦逊习惯的，但不幸在运用过程中被不少人运用得矫枉过正了。

纽约美东时报社长杨文瑜自八十年代中期创办中文周报，由于报社内多年的人事进出，锤炼得他也阅人无数。他说，大约自 1988 年起，来自大陆的求职者增多，他也因此大开眼界。杨文瑜说，他曾有一段时间对外正式声明不雇用任何大陆来人，原因是他认为大陆人言辞“狡诈”。他说：前来应征的几乎每一个大陆人在被问及工作经验时，他们往往问也不问新工作的任何细节就豪不犹豫地表示绝对能够胜任。但殊不知美国中文报社的工作与大陆根本不一样。举例而言，当时美国的社区报纸排版多采用剪贴打字稿，题文竖排。而大陆一直是横排内文不说，基本不采用在人工划版之后，看半成品的报纸大样、小样。

而且在美国，公司内员工没有闲人，雇一个人就有等着他的大摊事，不明个中就里的人第二天上班懵懵懂懂常常是干不到一天就会被解雇。杨文瑜说，有一天有一个高个子大陆人来应征工作，两人言来语去的让杨文瑜毫无例外地又生了一肚子暗气。他说，当时报社缺的是一位能使用台湾“倚天”中文软件打字的电脑打字员，而这个高个看到招工广告未事先顶约就直冲进，表示坚决能够胜任。杨文瑜再三告诉他使用此“倚天”软件必须深谙繁

体字或注音符号，这对受过几十年简体字教育及汉语拼音的大陆人来说不甚合适。但该高个闻听此言毫不气馁，大咧咧地追问：那您这里还有什么工作空缺？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干。

杨文瑜说他最后留给高个的话是：“我们这儿缺个社长，你看你能不能干？！”

这之后，他对大陆人来应征工作，一概“小生怕怕”。

15. 谨防违法

美国人可以说几乎人人都违法，只不过是程度问题而已。

美国的法律制定严密，看起来事无巨细，事事入法。而且，研读法规，常常会让人觉得其中用辞的不厌其烦而觉得可笑。但仔细推敲，美国的法律却是世界上少有的博大精深，粗的能推倒一代政朝，细的能及至人类起居的每一处细小。

非但如此，美国人制法机构每时每刻都还在修订对社会的约束，每一个新案、每一个新的判例都可能是造成法律改变或条款增添的契机。这种有关法的变动常常是说改就改，前后绝

无变通的余地。

也是所以，在美国做个好律师功力绝对了得，非但要针对各种制订周全、言辞填密的法律为自己的事主多所钻研，具坚强的狡辩功底，而且还要密切掌握法规的各种出其不意的变动。

对此，美国风行的一句描绘是：律师，就是想尽办法帮人违法的人。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美国惯常犯的毛病是对法律问题的认识不清。非但如此，美国的不少法律竟还是与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认知相悖的。

比如说，在常识中，中国家长气急时在家里给子女一顿老拳，或当众对冥顽不驯的孩子进行推搡或詈骂的举动，是一件属于教育文化允许范畴内的寻常事，但在美国，这种行径却是大不可以，是犯罪行为。

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不同，说来好笑，美国华人社区内的不少社会工作者及相关社团多少年来所做的重点工作，就是向一批又一批初来乍到的新移民进行切莫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违反美国法的叮嘱。比如，他们要向华人们灌输，第一个儿童都不是属于其父母所有，而是美国社会的公有财产，是美国未来的纳税人。打骂子女的后果轻则将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子女将被政府领走送入儿童福利院监护；重则，肇事的家长还会为此遭受牢狱之灾在法规之中，学校里的教师及儿童教育相关人员在发现儿童身上有淤伤或察觉有人有殴打儿童的嫌疑时，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向州政府有关方面举报，校方如果隐瞒不报的话也会受到处罚，州政府在接获举报后通常马上会派专人来查询，以确定举报的真伪。

也曾有家长因外出度假几天，回来后在机场就被直接收押的，原因是他们将不满十二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而犯有遗弃儿童乃至儿童危害罪嫌。美国在1993年曾有一部相当卖座的儿童影片《独自在家》（HOMEALONE），讲的就是一时粗心的父母在旅游出门时忘记带全家中的孩子，结果，被遗忘在家的这位年幼的男孩独自经历了恐怖难忘的几天。

《独自在家》出片后一炮而红，由于票房惊人，也一举捧红了片中乍才出道的小男主角。致使该片在拍摄续集时，该小男孩的身价暴涨，片酬蹿至数百万美金。

相信对这种权益问题只有处于新移民阶段的人还停留在文化扭转的惶惑之中，不能对其融会贯通，其实在美国，哪怕是小小的孩子都是对自己的权益问题相当清楚的。

我的一位叫安他的朋友育有一对长相十分讨人怜爱的双胞胎，这时双胞胎兄弟俩今年才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小兄弟俩人不听他们祖母的劝阻擅自跑到遥远的操场上去玩，回来后被气得无计可施的安地手拎一根皮

带连蒙带吓地吓了小兄弟俩人了一阵。

第二天一大早，小兄弟两人中的弟弟在出门准备上学到门口穿鞋时突然问他妈妈：妈咪，“皮带”的英文怎么讲？

安地的太太闻听此问，直替安地吓得魂飞魄散。

美国的法律制定细致，而且时常随着在日常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更改，反应灵敏。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灵敏，造成了美国法律在感觉上给人事无巨细处处设限的印象，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动辄得咎，极不方便。

我的一位姓翁的朋友几年前曾经买了一幢房子。这房子无论从内外格局还是所处地段都让他十分满意，只是该房门口人行道边长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从中国人的风水学上看并不是个吉像。但这位朋友为事知书达理，生活中一向无邪无杂，对于此树因此也就没多在意。

可是等到他迁入新居准备开始新的人生时，关于树的问题却接踵而至。

春天的时候，大树叶绿，万叶待发，地下的树根也开始表露生的躁动。几个春秋下来，树儿逐渐肥硕，根儿逐年壮大。几年后，大树的根干脆登堂入室，挤进翁家地下室的墙壁，顺着墙壁攀援生长。该树根生命力之强大令翁家吃惊不小，也兼带着为他们一家老小上了一堂活灵活现的生物课。

但这堂生物课不大好玩。没过多久，翁家的地下室开始漏水。大堆大堆不明出处的水沿着树根汨汨渗进地室内，场面壮观，非但如此，在树的上半节也有事情，冬天的时候，大树枝干粗茁的秃树干在冷风之中无数次猛扫翁家屋顶，直刮得翁宅宅顶砖瓦剥落，夜半时分闻之心惊。至此，此树才使不信邪的翁某彻底屈服，每到天气预报有风有雨时，他必定因为树的关系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百爪挠心。

更何况，大树的树根同时也往地上生长，把翁宅门前人行道的路面都撑得炸了开来，行人走在上面稍不留神就会摔跤，而这也可能为翁某凭空引来官司。

痛定思痛，翁某决心修理这棵树。

但还没等他付诸行动，有知法者告诉他，此树是属于政府的，擅砍违法。

翁某在进一步打探之后才知道，确切地说，街区内路边所有的树木都是属于市政府公园局的，私人无权擅动。翁某于是致电公园局交涉，要求该局派人来进行剪枝及整理长出地面的树根。但对方告诉他，公园局在对全市树木做铲除凸出地面树根一类的修整是有统一时间的，个别的申请虽可以接受，但必须要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排队轮候到。与此同时，关于树枝剪枝的问题得到的答复虽是可以立即派人来做整理，但此一允诺重复了多次，一直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安静的大半年等过之后，恼羞成怒的翁某感觉被人愚弄了。他开始直接给所属地区的市议员打电话，首先言明自己是一介选民，然后暴怒地陈述过往有关树的遭遇。

几天以后，果真就有人来围绕他们门前的大树展开动作了。

翁某很久以后对别人说起这事时，仍犹犹豫豫地不能断定自己是因为住对了地区摊上了个负责的市议员，还是因为摊出自己是选民这张小小王牌而得到关于树问题的善终。但美国法律制定严格给民众带来的不便，从中也可以窥见一斑。

其实，不光是砍树，即便是居民要在自己花钱买来的居室内加装浴室或多隔出一间卧室，甚至是加装一个抽水马桶，也都必须事先证求市政府房屋

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 的首肯。在申办这类事情时, 当事人必须首先请一位注册会计师或有执照的工程师代为向有关机构呈交每一项改造计划申请, 逐一求得批准。这类申请能否批准, 部分取决于改造后的中间将不会产生另一个居住单位, 不然的话就又是违法了。而且一旦这处有违反法规建筑的房屋要出售, 过户方面还会要求原屋主对此加以清除。

除了砍树、加修浴室之外, 美国制定在不经意处的有关违法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大把例子:

你未经屋主同意就私自闯入他人的住宅或属于私人财产的地区, 你违法了。此理同样适用于你已将某房租给别人, 但未经住客同意你就进入该房间。

你不能将你店里的酒卖给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 无论这位青年面相有多么老成。

你和你的同业想停止竞相削价恶性竞争, 大家 (哪怕只有两个人) 坐下来共同商量出一个统一的价格来, 那则又违法了。

你在你餐厅的洗手间里未用标语示出“工作人员工作前必须洗手”, 即便你与你的员工都有与生俱来的洁癖, 也是违法。

你拍摄他人的财产或在他人的地域中拍摄 (比如商店内), 甚至于你在地铁、学校、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未经允许的拍照也算违法。

美国的居住及办公处所有严格的划分, 依照法规, 办公室严禁住人。

你将房屋出租给他人, 天冷时, 你提供的房间温度未达到标准你首先违法, 你的房客可以拒付房租, 甚至可以告你。

甚至于你如果想丢弃一个坏了的家用电冰箱, 你必须将冰箱的门事先去除掉。市政府方面有关的理论是“谨防有人无意地进入冰箱内, 不能将门打开, 以至窒息”。你如果忘记拆门, 那你又违法更甚至于你出售的龙虾如果未及一磅重, 你也违法了。

而在问题的另一面, 做为一个美国人也有法律上的被动难为, 可以让人告上法庭的起因几乎处处都是。

比如, 好友来访在你家的浴室里冲凉, 即使是客人自己不慎弄出许多积水而使自己滑倒受伤, 他可以告你, 向你索赔。

你好心开着车带朋友出游, 赶上车祸, 但凡同行者有一点车祸受伤, 无论你是否伤得比他更重百倍, 他也可以告你。

如果你在街上因为地面质量的缘故不慎摔伤, 你第一可以告的是身边最近房屋的屋主, 如果附近没有房屋的话, 你可以直接状告市政府。你伤得越重, 赢的希望就越大。

在这样一种事无巨细处处有法的大环境中, 知事的美国人往往十分谨慎。天下雪之后, 房主们多半赶紧出外打扫门前, 虽然以纽约的法律而言也是规定了下雪后屋主必须在雪停后四小时之内清扫门前, 但大多数人恐怕还是因为生怕有人在门口滑倒来白添事才认真打扫的。

为了解决发生在民间的鸡毛蒜皮层出不穷的小纠纷, 美国各地均设有专解决此类问题的小额法庭。因此在美国, 几乎一切不快都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的, 所以, 以金钱的“大、小额”做为分类非但对纯余钱纠纷, 即使是对看上去最不沾边的权益纠纷, 也不失为准确。以纽约州为例, 其州内六十二个郡及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均设有此类法庭, 凡年满十八岁的人士均可以向小额法庭提出诉讼。此一非正式的诉讼机构及个人, 可不用经由律师提出最高金额不超过两万元的赔款诉讼。

记得临出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在 1987 年，我在我当时工作的报社附近与几个采访对象吃饭，一顿饭完毕，几个人说笑着步出门去。我眼睛近视，偏偏当天又没戴隐形眼镜，说笑之中对着门的方向一迈步时，设想那扇看似门而决非门的出处竟是一扇落地大窗，整扇玻璃从天花板直挂至地面。这个虚无的出口被我一撞，整扇玻璃轰然而下，众人一片瞠目结舌之中，我的左臂被重重地划了一道四、五寸长的大口子，血流满地。

这道伤痕至今还在我的左臂印着，每到夏天总有人看见它并问起这个痕迹的来历。而几乎每一位美国人在听完这段被重复了几十遍的故事后，都不约而同地追问同样的一句话：“你告他们了吗？”

可当时的情形却是和我“告他们”南辕北辙。我当时捂着伤口在该餐厅一位女副经理的“监护”下在隔壁一家工厂的卫生所里草草地进行了包扎。我记得当为我包扎的老护士才用胶布把纱布最后封好时，那位副经理说了一句一直想说的话。她说：“姑娘，您看咱该怎么赔一下。”

以我当年所受的法治教育，她这句可能让美国人听上去完全误会的话让我心领神会，虽忐忑不安但却心如明镜。

后来的结局倒是出奇，该餐厅破例挥手对我放行。原因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人是火爆脾气，看我一身是血又必须为钱发愁，便怒吼起来。但想来他怒吼的原因是因为血的事而不是因为钱的事。这家餐厅的女经理直到送我走出该出的门之后，还在屋外的阳光中对我说他们的这块玻璃是上个月刚换的，因为上上个月也曾有人多喝了几杯之后撞了上去。“当时那个人的头和胸脯都被砸下来的玻璃割得乱七八糟，比你厉害多了。”女副经理讲到这里时停了一下，双目炯炯地看着我说：“可是他还是赔了我们很多钱。”

写到处时，闻听我的一个朋友平白无故地有大祸临头。我的这个朋友几年前在一个治安不太好的地区买了一栋房子，她和她的先生之所以买下来不过是为了出租投资之用。地区不理想的房子所招的房客也不尽如人意，每到月底该交房租时她的房客总能找到理由来和她云山雾罩一番，然后拖延付款。几年下来每次去她家里走动时，总听见她在和房客扯皮。几天前，她的黑人房客从她那栋房子的楼梯上一个不小心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这个一向拖欠房租的房客刻不容缓地一状告上法院，向我的这位朋友索要三百万元的赔偿。

有些无意违法的后果是可以用身外之物打平的。比如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曾发生过一起客人从老虎机上拉中百万元大奖而不能领取的事情。症结所在是这位幸运赢家不幸不满二十一岁，未能达到美国法定的赌博年龄。该“赢家”一场欢喜的结局仅是依法拿回了当初放进老虎机的两块多钱。

而另外一些无意违法的代价则是整个生命。1992 年，美国曾发生了一件让整个美国都说无奈的命案。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日本交换学生服部吉弘在路易斯安那州前往朋友家参加万圣节（西方人多爱狂欢作祟的“鬼节”）聚会时，因不确定聚会地址而误入别家院内，被主人不成抢匪一枪毙命。由于服部吉弘首先擅自进入他人住宅属于违法在先，杀人者在情理之中被裁决无罪。

此事甫出，惊动了美日朝野，两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各路人等的形色评论。无辜中枪的服部吉弘这个日本小男生一脸清淳模样的照片每天都在电视及报纸的重要地方出现，让人在制定严密的美国法律面前无话可说。

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3 年夏天访问日本时，还曾特别打电话给服部吉弘的

父母，除表示慰问外并邀请他们到美国访问。当然这已是法理之外的事情了。

在美国多年，法律给予我的惊讶极多。回想一下，除钦佩其法律制定的琐碎之外，我还十分钦佩在法律和金钱的挤压之下，美国人所焕发的法律斗志。我想我和类似我的一票中国人都不太能行，可能我们不大拉得开栓的重要原因我们民族所崇尚的中庸哲学中不幸包含了“逆来顺受”的章回。最近几年，虽然也听说有不少中国人开始被激发起诉讼斗志，但我想，像是美国人自己在亲朋家的浴室滑倒而反告亲朋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还是耸人听闻的。相比之下，中国人还是厚道。

为了钱，不少美国人可以承受撕破脸皮乃至大义灭亲。

年前，报章曾报道有一位女郎躺在驾着车的男友腿上在纽约游车河。在一个高速行驶的急煞车中，该女郎由于惯性一滚落地，脸被车前的部件及玻璃撞得不善，该女郎扭头即状告热恋中的男友，为了钱可以毫不留情。

拣此之外，美国法律也给人也带来了不少无所适从的惶惑，甚至于让人怀疑美国社会对道德规范及行为准绳的标准是否具有问一性。

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各州的州法不尽相同，有些州的州法甚至和其他州完全背道而驰。比如开赌场这件事在美国的某些州被绝对禁止，属非法之列；但同样是这件事，在有的州就是合法的，而且赌场行业更竟成为州内税收及政府其他收入的主要来源。

情同上理，开妓院这一行当在美国的一些州内被斥为“堕落”之首，各警局都将扫除妓院列为重要行动项目。但在内华达等州，开妓院就是合法的，开得好的妓院还可以声名远播，广招天下同好。在这方面甚至于曾对“妓业”屡禁不止的旧金山市也在正面攻击不成后，拟采取“变害为宝”的办法，考虑是否建立市营妓院。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种变害为宝的粗体构想是在建立市立妓院的大前提之下，为妓女提供可供租赁的房屋，为她们提供健康检查，并对她们的收入课税。据悉旧金山市议会目前已组成了由20个人组成的专门团体，其中包括三名以前做过妓女的人，共同研商色情业的合法化问题。

更让人称奇的是，由于州法中对破产者的追讨范围不一致使美国个别的州成为破产者的天堂。比如，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佛罗里达州就因为制定有对破产者发放住宅豁免中清算的特权，而被全美不少富商相中，全充破产之后的逍遥去处。年前华尔街的交易老手席格在官司败诉后，积欠了二十亿七千五百多万元的债款，但由于该人事先早在佛罗里达州购置了价值三百二十五万的海边华宅，占地七千多平方英尺，在佛州州法的约束下他得以保全这一部分资财。因此，该席格在坐监数月出狱后，大摇大摆地进入佛州，合法地在华宅内尽享阳光。

其实，佛州的这一套法规也是为着解决该地的经济问题更多地吸引投资而设。席格如果在纽约州申请破产处分的话，由于州定破产清算最高豁免额与佛州相比趋于严格，他至多可以保留一万美元的家当；即使是在法规相对宽松的加州，他也只能选择保有一栋价值在五万美元的自用住宅，或一间总价不超过七万五千美元供家小居住的房屋，其余财产悉数将被清算。

基于各方多次对佛罗里达及美国中部几个小州的类似州法予以垢病，佛州各界人士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改变此项州法的行动，但迄今仍撼其不动。据报道，主要的阻力竟来自医界，大多家财万贯的佛州医生们怕医疗纠纷一旦理赔起来，将会连家居生活都不能保全，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法律的真实意味是——你别让我找到机会。那里的人们习惯此说和习惯呼吸一样。

卷二

16. 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校

史密斯小姐是一位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师，八年前，她在结婚后辞掉了教职。当年，她每天早上一进自己的教室门总要向等候她的学生们说：“早上好，学生们”而她的学生们也回说：“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八年后。当她的孩子年满五岁后，她又重复教鞭。

“早上好，学生们。”她在自己多年后重做冯妇的第一堂课开始之前习惯地向教室中的学生致意。

但接下来的情形是教室中死一般寂静。

良久，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小小男生极不耐烦地说：“闭嘴！贱货。”(SHUTUP !HITCN。)

紧接着教室中爆发出一片大笑，不少学生还鼓掌、吹口哨助阵。

这是这位名叫史密斯的女士在 1993 年全国家教育协会教师联合会 (NATIONALEDUATIONASSO. TEACNERSASSO) 中，所做情况汇报。她说：“我实在不明白，我不在学校的这八年过完之后，如今的学生们到底是怎么了？”

美国的公立义务教育共有 12 年，教育开支相当庞大，以加州为例，在该地区，公立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所花的教育经费每年为五千二百元。

美国公立教育的各种权利归各地方政府机构统辖，联邦教育部及各州教育厅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辅助推行工作。在市政府中，市教育局理事会主管教育，根据各州不尽相同的规定，理事会或由市内主要政客推荐，或由市民选出。理事会再物色一位他们认为能力相当的人出任教育总监，或称为教育局局长。

美国的正规公立学校对中、小学所划定的年级界限不尽相同，以纽约为例，公立学校多以学前班一年、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2 年为主。为使儿童及早地适应教学生活，公立学校中听设的学前班，儿童从 5 岁起就可以入校就读。

美国的公立中小教育不但免费，而且还为收入在水准以下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以纽约的公立学校而言，学校中提供的午饭每天都有几种品种可供选择，但大都是美式午餐，比如热狗、披萨饼 (PIZZA)、汉堡包等。但据说这种免费午餐的享受情况多少有点因校而异。比如，质素一般的学校往往提供给学生的这类午餐只有三、四种花样可供选择，更差的学校更可能只有一、两种花样。而在全美国都是大名鼎鼎的史坦文森高中 (STUYVESANTHIGHSCHOOL) 一类的学校，学生们每天的可挑选品种竟可多达十多种。而且，为了满足占该校学生相当比例的亚裔学生的需要，校方还特别提供有适合东方人口味的米饭一类的品种。

即便是中小学校内的中餐方便如此，不少富裕的学生家长（其中尤以台湾家长为多）仍以学校的饭菜营养搭配不够理想为由不许自己的子女食用，而让子女每天自带饭菜。

在中小学校中，为方便学生往来上学，小学生可以申请乘坐校车，中学生经申明，校方参照学生到校的实际距离，也可以获得地铁、巴士费全免的优惠。在学校中，身体有残疾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校方委派的特别人员提供全天候的特殊跟随服务的优惠。

美国公立学校内的课程分上下午两个时间段进行，一般是早上 8：30 上课，晚上 2：45 下课，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美国的小学教学给人的感

觉相当温暖，根据年龄的特点，学生们一般被固定在一个教室中上各种课程。到了中学，学生开始自己在教学楼内跑来跑去地按课程找教室上课。在初中阶段往往是全班一起跑，而到了高中，学生的班级结构则开始松散，学生们一般只按自己的课程进各种教室学习。

我在美国的各种采访生涯中，曾多次进入小学生们形同家中游乐室般的教室，这种地方往往被学生们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整过了。比如，学生们会在窗户上贴满自己喜爱的手工作品，教室内的课桌也可以摆放得如同小城堡。学生们的班主任往往就像这群孩子的亲人一样在教室内的任何地方或站或蹲或坐他讲课。后来，在美国看到任何一幢建筑，不看大门口的招牌单凭着观察建筑的窗户，我就可以判定其是不是一幢小学校舍。因为，有这种孩子的地方，窗户上一定是会挤满他们自己拼剪的花草和万物的。

在小学就读的学生每天中午一般不能回家，要到下午放学后统一回家。在美国大都市内，每天每到下午三点左右公立学校放学的时间，街头往往是最热闹的时段。年龄小一点学生的家长或是家长的委托人早早就开车来到学校门口等候，每个学校门口都是人头济济。放学后，在市内的各主要十字路口还有专人把守，以确保儿童通过的安全。

但在听来如此完备的公立义务教育举措之下，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多少年的这种沐浴之后，公立教育究竟在全美民众心目中是个怎样的形象呢？

情形不妙。

1993年8月份，由《纽约每日新闻》、国家广播公司等机构举办的一次民意调查透露了纽约市的家长们对市内公立学校惊人的信任危机。在接受此次民意调查的家长中，有74%的人说，如果有可能，他们会选择将子弟送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中接受教育。

在全部的受访者中，有79%的人认为公立学校在退步之中，只有12%的人认为公立学校在进步之中，另有2%的人认为公立学校一直维持着现状。

美国的中小学校学生基本上采取就近入学的方针，地方教育局每年都会对辖区内学童进行有关测验，并向社会公布由测验结果推出的学生素质排名。而这项排名也正是有子女在学的父母们参考选择学校的重要依据。美国移民中以重视子女教育出名的族裔如华人及犹太人，有能力的家长多半还会为方便子女读书而向好学区搬迁甚至干脆就往好学区买房，这其实也是造成美国房价有高低之分的真实因素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日益不满公立学校的教育，谋求教育改革的人士要求改革学校入学选择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全美范围内就公立学校学生是否可以自由选校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学童自由选校的“政府津贴券”问题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这一“津贴券”构想的主要内容是除学生不再按学区划分就学外，政府还应给予每一位自由选校的学生相当其学费一半的“政府津贴券”，只要自由选校的学生被录取，学校即可利用学生的“政府津贴券”向政府索取相应的教育费用。

这项方案一经提出，立即遭致激辩。两党在此问题上的共同点是赞成学童有自由选校的权利，而且政府应予适当的补助。支持此项方针的人士声称，这种由学生自己怀揣“津贴券”的办法事实上是把教育经费落实在学生自己对学校的鉴别上，可以在学校中更好地实行优胜劣汰，从而使好的学校得到更多的教育补贴。民主党方面主张只在公立学校内展开此项计划，但共和党

认为，儿童选校的权利应力求完整，主张自由选校计划不应将私立学校及教会学校排除在外。

赞成及反对的两派各说各有理，都认为自己的方案能在变量节省教育经费的同时更好地改观教育质量低落的问题。

在 1992 年为此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有 70% 的美国人赞同共和党的主张。1993 年民主党坐桩之后，共和党彻底自由选校的方案未能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便退而求其次，转过身来求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在 1993 年的选举过程中，最先就此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加州，以二比一的投票比数否决了此项提案，而同样的议案在 1994 年中还将会出现在亚历桑那州及印地安那州的公民投票选票上再碰运气。

但无论结果如何，这样一股来势凶猛的要求公立学校改革的呼声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福音，其在实际上也已成为公校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

在一些居住在坏学区内家长及相关人士的要求下，纽约市自 1993 年秋季也开始实行了允许学生跨学区自由选校（但不带“津贴券”）的方针，但是这项计划反过头来又遭到了好学区内学区委员会及家长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这样一来将使好学校的学生素质普遍降低。也正因此，由于有心人的有心抵制，纽约市的自由选校问题成为一个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半吊子”。

在实际运作中，纽约的几个如 25、26 学区等全市著名的好学区以学区内没有空余名额为由，曾拒绝过大部分外区学生的入学申请，使自由选校计划形同虚设。

事实上，美国公立学校之所以在民众中出现信任危机，有来自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及教学质量严重衰退等多方面的因素。

在教育经费不足方面，纽约的公立学校堪称一个活样板，由于纽约市内人口的膨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多，因此学校内教学班级庞大、校舍不敷使用、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等弊端的恶性循环，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解不开的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越滚越大”。

纽约市的学生数量是纽约州全州学生总数的 37%，但在教育拨款方面，纽约市通常只可能得到 34% 的州教育经费。随着来自各国的新移民的大量到来，纽约全市仅在过去的三年中就增加了十几万个新移民学生，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需要特别照顾的双语班学生。这种状况使得纽约市内公立中小学教育设施面临严重适应不足的问题。在市内几个区中贫穷新移民相对为多的布鲁克林区，公立中、小学中学生人数过多的现象已到了濒临爆炸的局面，不少学校的学生超员量竟是 100%，一些学校不得不把学生上课的时间错开以便教学。

在这一类问题还正处于无计可解的窘况之中时，美国的公立学校又开始面临新一轮的种族隔离的危机。早在 1968 年，美国有 77% 的黑人学童就读于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民权潮流之后，到九十年代，这种种族隔离的现象重又抬头。据有心人统计，在九十年代的几年中，美国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学生是到少数民族学生占一半以上的学校上学的；有 73% 的拉丁裔学生就读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而回想早在 1968 年，这项数字才为 54%。

根据调查，大城市中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现象比小城镇和乡下严重，纽约州的黑白隔离现象最为明显，其次为伊利诺州、密西根州及新泽西州。这种由种族隔离造成的族裔冲突，隐忧将成为一个紧压在公立学校心头的一块巨

石。

而谈到公立学校的问题还远远不止是上述诸种外在问题，其甚至是教学教材上也遇到了诸多麻烦。这种问题涵盖广泛，全美的公立学校几乎个个有份。

据一项由美国推广科学协会主持的研究认为，美国的公立学校科技教育应进行全面改革，因为现在的课程涉猎太过广泛，缺少教育学生如何实际应用科学知识的内容，对学生把理论知识与科技整合方面相结合的引导相当薄弱。

主办这项研究的美国推广科学协会来头不小，它是美国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的相关组织，在现今美国科学界及教育界影响广大。而前述的研究结果是该协会耗时四年做出的回顾性研究，与现今公立学校的教学标准相比，它提出了学生在完成小学和中学几乎各年级的学业之后应掌握的科学知识。

比如该协会认为，即使是 5 岁的美国小孩也应该接受正规而有计划的科学教育课程，而不是只是偶尔做一些诸如去雪地里观察雪花，让儿童认识雪花有六个角一类的小实验。对于大一点的孩子，该协会更认为现在学童学的大部分都是没用的知识。但令我不能理解的是该协会在这种“没用的知识”中列举的例子中竟有化学元素周期表。协会方面建议老师们应教授给学生一些可以广泛应用的科学方法和技巧。比如如何假定出理论来然后测试这项理论或是从实验的结果得出结论。

推广科学协会的这项研究虽不乏偏颇之处，但其所指出的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内容已存在脱离美国社会科技发展进程及走向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纽约、洛杉矶一类大都市的公立学校中，由于社会状态的过度复杂，公立学校教材中在出现了与社会现象紧密相连的东西后，又招至来自另一种立场的反对。

纽约学校有关教材的危机出现在 1992 年，这一年内纽约几乎全市与教育有关的人士或有年幼子女正在就读公立小学的家长，共同卷进了一场大型的讨论之中，这场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就市教育局要求使用的《彩虹儿童》教师教案中央入了同性恋内容，探讨是否有使用不当的问题。

《彩虹儿童》为市教育局推荐使用的小学一年级教师教案，其中在社会、家庭方面的内容里推荐儿童参阅《海瑟的两个妈妈》等描述同性恋的书籍。此一决定出台之后遭到一连串的示威反对活动，不少家长认为教育当局不应让年幼的学童过早地接触过多的社会现象。《彩虹儿童》教材之争更使不少生性保守的中国家长如坐针毡，在反对者中，尤以华人移民学生占相当比例的纽约 24 学区最烈。

与此同时，加州的不少学生家长也对一些公立学校六年级的教材中有让学生了解同性恋者性交方法，乃至教科书中教导学生口交、肛交的内容表示义愤填膺。

一些华人家长们说：“美国公立学校的开放风气实在让我们这些保守的家长左右为难，我们只能眼看着学校的教育把我们的孩子弄得连我们自己也看不清他们了。”

17. 黄皮肤的你能不能在美国长大成人

美国有一种深受青少年欢迎的中价位名牌休闲装 GAP，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沟壑”。每次，当我在街上看到这个拥有众多连锁店的品牌蓝底白字设计十分简洁的招牌时，在心里一万次地想象，这个牌子当初的创始人是否就是为着强调它的对上一辈的背弃及无可通融来赢得涉世未深少年们的青睞呢？

这种东西在中国流通的说法是“代沟”。

有一天随一个看来不像总说谎的老年房地产经纪在纽约看房，看到小颈高地的一幢大宅时，那个房地产经纪劈头就说：这栋房子值两百万以上，当我正端详那个房子的每一扇窗户以判断她讲的是否贴边时，她又开口说了真唬了我一跳的话。她说，这是 GAP 老板住的房子。

我当时看见这栋价格惊人的华宅门口有一个金发碧眼、长相平常的小女孩独自坐在新修的台阶上，我又一次想起我曾想过一万次的那件事来。

可能大陆的家长们都还不大清楚，与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不少华人家长十几年来一直热衷于向美国输出家中“小人口”的行为。早自八十年代起，台湾的不少家庭因为担心子女不能经受岛内联考的压力，而纷纷把自己家中正在上初、高中，甚至小学子女送到美国接受教育。这些小子女们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在亲朋家吃住，在美国生疏的人文环境中自生自灭。

更有一些有钱有闲的台湾家长们，自己也不惜辞工别土，千里迢迢地陪到美国来。

据台湾境管局 1993 年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在就学年龄中出境未返的民众人数已从 1984 年的不足三千人跃升为九十年代初的一万五千多人，这些人口即成为台湾不少家长一手造成、被美台双方都呼吁要求密切关注的“小留学生”。

1991 年，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一项题为《我的美国梦》征文活动中，一位署名“怡然”的台湾小留学生就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早年年幼时来美所经历的思想折磨。

这位时年已届 17 岁，其实已不算小的台湾移民写道：在来美国的前半年中，“每到夜阑人静的时候，许多以前的回忆会突然涌现脑海，有时候几乎令我无法承受，我发现信件为我转达的感情似乎永远不够。偶尔的想起一句以前朋友对我说的话或是一件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小事，就足以令我伤感良久，常常看了同学的来信就悄悄落泪。”

“在这个地方（美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客人，上了一个学期的学校也不曾令我感觉像家一样。我每天在各个教室间来来去去，朋友也没有几个，哪里像以前在台湾时从早在一个位子上坐到晚，50 多个同学紧紧守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那一间教室就是我们的家。”

其实，美国给此“怡然”留下的还只是心境凄凉，不少“小留学生”在美国因无人看管而成为帮派青年的事时常发生，等到做父母的闻讯从台湾来严加管教的时候，才发觉子女已经永远不属于自己了。

目前的美国从治安及教育程度上绝对已有点“华人儿童不宜”的味道了。

美国的研究机构说，眼下的美国青少年比五十年代的同龄人遭到谋杀的可能增加了两倍，自杀的比卒增大了一倍，而被捕的机会率增长了三十倍。与此同时，据司法部估计，目前，全美每年有一百万个十二到十九岁的青少

年成为强暴、抢劫初其它暴力攻击的受害人。

1991 及 1992 年，美国出现了两起震惊全美的校园血案。事有凑巧，这两起案件的肇事者均为华裔，一是来自中国北京的留学生卢刚；另一是台湾移民后裔骆文。

卢、骆两案为华裔在美的形象遗憾地加上了一道阴影。也使校园暴力演变成成为美国人心头的一个敏感心结。

如果把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的犯罪行为说成是青少年，在年龄上并不确实，但他对于美国校园恶性犯罪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卢刚来美后专攻物理，成绩不俗，自恃甚高，行凶前为博士候选人。由于他认为自己在毕业论文答辩时受到指导教师的有意刁难，以及在一些学术待遇问题上自己受到排挤，所以怒不可遏，拔枪而起，在校园内对自己的指导教师及成绩优异的同学举枪便射，造成五人死亡一人瘫痪的结局。死者中既有卢刚心目中的忌恨对象，也有与其毕业论文无关的副校长和行政秘书。卢刚本人在行凶后举止沉着地自尽了。

卢刚案件出现后，曾成为中美两地谈论的热点，在美国方面，不少舆论干脆惊呼“中国人一向被美国人泛知的热爱读书难道就是这样么？”

骆文行凶时则只有 18 岁，在麻省一所私人学院内就读，成绩平均在 B 以上，并有拉奏小提琴的爱好。骆文于 1992 年 12 月 14 日晚手执半自动步枪在校园内滥射，中枪者中有学校教授、学生及校园警卫，结局是两死四伤。骆文的父亲是在美国蒙大拿州开餐馆的，他的餐馆名为“长城”，在当地颇具名气。骆文在邻里间口碑甚好，是标准的好男孩。案发后，骆文主动向警方自首。迄今为止，他的作案动机不明。

唯一可算是诠释之一的是骆文着装怪异，推个光头，总爱身穿上书“厌恶一切”的 T 恤。

卢、骆两案的发生在美国社会中引起的虽是有关警惕校园暴力的警觉，但在美国华人社区内却引发对移民学生在美国校园内的适应问题。移民子弟由于进入新环境产生的新挫折感及调适不良的问题，使得几乎每一位华人家长都惊出一身冷汗。

我的一个朋友家有一个才上一年级的小女儿，当被问到将如何在美国社会中替自己的女儿把好人生关的时候，她说：“美国都乱到了这一步了，我也没有任何能力过多地限制我的女儿。我唯一的希望只是要她不要在 14 岁以前找男朋友。”

在另一方面，从美国的教育水准上看，其与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教育水准绝对不堪匹敌。

美国教育部 1993 年底在详细比较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其它会员国的教育水准之后，首次对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岁学生（相当于美国的七、八年级学生）的数学能力进行了评鉴，结果显示，美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名列倒数第二，仅高于约旦学生。

教育部的有关报告说，在 1991 年及 1992 年接受此项数学测试的共有台湾、韩国、瑞士、苏联（今俄罗斯）、匈牙利、法国、以色列、加拿大、爱尔兰、苏格兰、斯洛伐尼亚、西班牙、美国及约旦。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台湾学生，其在满分的五百分中能达到总分 285 分的成绩；而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只得了 262 分。通常，成绩在 250 分的学生可以做算术运算，开始解题；

而达三百分的学生可以做稍微复杂的运算及推理。

美国的小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学童们直到上中学时才会有正规的家庭作业出现。而等到高中阶段，课外功课则可能多到每天四个小时。在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中，有不少是需要借助图书馆找资料完成的，所以美国都市的不少图书馆中时常会有专为儿童开辟的阅览室，每天放学时间之后，就会有大批的学生来到图书馆。

通过访谈，大部分来自大陆、台湾的家长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虽然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台湾及中国大陆相比具有相对灵活、有启发学童自身思维的优点，但目前美国中小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具有程度偏浅的缺点。也就是说，同是在同样的年级中学习，在大陆及台湾的学校中使用的教材比美国教材程度要深得多。

而在照顾儿女学业方面，各类家长中，没有人比目前美国新移民家长的心态更复杂的。尤其是从大陆来美的移民，在抵美之初的头几年几乎无一例外清一色地家徒四壁。绝大部分移民下会英文，或只会极为简单的几句英文，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外出从最普通、最劳累的低薪工作做起，大部分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难于参加子女学校的“开放参观”、“返校日”等活动，与学校几乎断绝联系。对这种新移民而言，关心子女的学业几成一句空话。

曾就读于北京和平里第四小学的李尧是 1991 年随其父母接到美国来的，到美国后他在上了一年语言班之后，就开始进入正常班学习，过开每天晚上 10 点睡早上 8 点醒的美国学生的标准日子。

他的母亲在把他接来美国，并随同了解到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现状之后就开始后悔了。她说，美国小学生的教育水准整个比中国大陆差得太远，而且存在着防不胜防的犯罪诱惑，长此以往，就儿童的成长环境来讲远不如大陆来得适合。

在事实上，在美国的不少新移民家长由于英文程度低下，在美国与各种机构往来的信件都要仰仗儿女进行翻译，因此，严格地说，这一类家长要想严格管教子女无疑只会流于愿望而已。

所幸李尧的父母英语程度不差，其父是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多年的技术人员，为防止李尧和不良少年为伍，他的父母亲每天都犹如绷紧的弦一样为儿子担忧。他们不时地翻查独生儿子的玩具，反复告诫他不要接受任何人任何原因不明的馈赠。在儿子有一段日子里和一个偷渡来美的孩子玩耍，而且这个孩子还给过李尧二十块钱的事情发生后，李尧的母亲亲自找到学校，要求校方协同阻止儿子与这个同学来往。为了这件事，李尧的父母亲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区区一个孩子的玩伴竟影响了夫妇间的感情，李氏夫妻有时想想也觉得不那么值得。

类似李尧母亲的这种做法看起来可能有点做作，但是在对中国人来说人地两生的美国而言，这是中国家长面对美国陌生文化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消极应变姿态。在有关中美文化对比的采访中，有大多数的中国家长表示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由陌生引起的恐惧感乃至无力感。在他们的孩子越来越对这种文化得以适应之后，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的心态又不得不由恐惧转为无可奈何。

在布鲁克林区，我曾采访到一位华裔单身母亲，她说她 15 岁的女儿第一次把自己的男同学留在家中过夜的时候她曾一本正经地要女儿“立刻让那个

男人滚蛋”，但经不住女儿强调说这是自己的“人权”范围之内的事，任何人都无权过问的威胁，她屈服了。后来，她女儿在之后的一年内竟换着带回来八个不同的男同学，她终于忍无可忍。但在和女儿暴吵一顿后，女儿竟干脆不再回家住了。最后还是她自己耐不住思念，主动到女儿的学校门口等女儿放学时向其“认错”，女儿才终于宽恕了她的“错误”，首肯回家。

这位母亲说：“我真想告诉还没有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如果你有孩子，还是不要让他们先到美国来的好。”她说：“我就是为了能让女儿接受美国先进的教育才到美国来的，没想到我反倒因此而失去了她。”

我的一位采访对象有一次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告诉我，由于她来到美国就在农场中打工，因此，英文几乎一句不会。早年间，她现已十岁的儿子还小时，她曾和儿子一起读英文，但她由于还有家务及工作的拖累，他的儿子在他的耳提面命中渐渐真的成为一个“美国人”，而她自己的英文多少年下来就仍仅限于可以问好和问路的水平。后来终于有一天她的儿子当面指责她为什么连英文都不会，是个“笨蛋”。从那之后，她在自己的儿子面前总是自感矮了一截。她说：“我自己的银行信要请我儿子来翻译，在他面前我还有资格大谈什么在美国的为人之道？”

18. 华裔学生在学业方面的喜与忧

来自上海、曾经在上海长乐路第一小学读书的林骏是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到美国来与父母团聚的。到美国后，他进入纽约公立第 11 小学就读。

刚到美国的学校读书时，林骏说他连老师讲的“请把书包放在课桌里”这样一句简单的英文都听不懂。但在学校中的数学课上，他发现纽约学校的四年级学生才开始学习简单的乘除运算，但当时的林骏已经可以做有关乘除的复杂应用题了。

在上海时几乎不会什么实用英文的林骏大约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适应了美国学校的生活，几年之后，他考上了录取率为 25 比 1 的纽约最好的高中史坦文森。

但他说，他的求学履历其实在华人子弟中并不稀奇。

在美国，华裔学生成绩优异的特点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公众的社会认知，华人子弟的优异已成为一种类似和遗传有关的民族标识。在纽约全市有四所上好的高中是要经过特别的单独考试才能进入的，不受居住区域的限制。这四所学校是史但文森高中、布朗士科学高中、布鲁克林科技高中和拉瓜地亚艺术学校。在纽约的这几个顶尖学校中，亚裔学生所占比例大到今人不能相信的地步。以史但文森高中为例，1993 年，校内几乎没有黑人及南美洲西班牙语裔的学生，该校的亚裔学生比例竟高达 85%，其中华裔占超过二分之二二的绝对优势。

自 1976 年起，美国大学理事会开始以族裔划分统计学生 SAT（全美高中升大学标准考试）成绩以来，在所有参与考试的学生中，亚裔学生的平均成绩最为引人注目。在这专对学生的数学及语文成绩进行评定的专门考试中，全美亚裔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平均成绩远高于其他族裔。自 1976 年以来，亚裔学生在 SAT 数学测验中成绩从 1976 年的五百一十八分，到 1989 年的五百二十五分，上升到 1993 年的五百三十五分。十七年中稳步上升了十七分。而成绩仅次于亚裔学生的白人学生 1976 年的数学成绩是四百九十三分，1989 年是四百九十一分，1993 年为四百九十四分。亚、白子弟的分数竟相差了四十一分之多。

在美国亚裔人口中，华人子弟无疑在教育方面又是出类拔萃的。在历年的西屋科学奖中，华人总是获奖者中心不可少的。

所谓西屋科学评奖活动是对全美国各高中的高三学生在课余及寒暑假中所做的研究成果，在经过层层严格评审后按质量评出初选、复选及决赛得主。此项评奖活动在全美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举办到 1994 年已有 53 年的历史了。

依照西屋科学奖的评选惯例，第一轮的比赛人由各校推荐，全美获得推荐的总人数大约在一、二千人之间。在这之后的初选入围者往往有三、四百人；复选入围者有三、四十人；最后进入决赛的只有十人左右。在这项全美高中生几乎是最重要的每年一种科技评选项目中，华人子弟自八十年代起就把其列为传统的“露脸项目”，获奖子弟中大部分人是生物医学及数学方面的研究为主。

以最近的例子来看，在 1993 年西屋科学奖中前十名获奖者中，华人子弟占了四名，分别获得第 3、4、6、8 名；而才刚进行的 1994 年西屋科学奖的初选三百名优胜者名单中，华裔的人数为七十人。以美国各种族所占人口的比例来看，华人子弟学有所成的比率已远远超过了只占总人口不到百分

之一的比率。

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 1994 年的西屋科学奖入围者中，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子弟首次大批量地出现。以纽约地区的获奖者而言，其中竟有来美才三年左右的大陆学生，这一类学生的适应及接受能力即使是在华人社区中，也造成了震撼。

在 1994 年西屋奖纽约州初选入围的 39 位华裔学生中，有六位是来自大陆的北京、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大陆移民子弟。其中来自青岛的 18 岁女生李若凡是三年半前才来美的地道新移民，她的这三年半移民生涯刚开始时，英文基础极为差劲，几乎每一篇作业都要由父亲协助翻译完成。但在 1994 年的评奖中，她以有关生物研究的成果入围西屋奖。

在随后评出的 1994 年西屋科学奖复赛入围的前 40 名当中，华人入选的七名学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郑诗敏也在其中。郑诗敏 11 岁才从广州来美就读，她以一篇高分子物理研究论文入围决赛。

但是华裔学生在一派学业的歌舞升平中不是没有隐忧。

比如，华裔子弟在语文方面的成绩就是多年来的一个群体弱项，在这方面，华裔学生不但一向屈居白人学生之后，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吃力。相信这种在语文方面的滞后状态，与华人新移民子弟在语言适应上的不良不无关系。

同样以 SAT 测验为例，在语文方面，亚裔学生的平均成绩一向低于白人学生。1993 年，亚裔学生的语文测验成绩为四百一十五分，比名列第一的白人学生低二十九分。而且，与 1976 年亚裔学生的此项成绩相比，几乎谈不上什么增长。

而此项考试自 1994 年起将增加阅读理解。

(CRITICALREADING) 和应用题解答 (PROBLEMSOLVING) 等项，同时，新的写作考试也将于 1994 年 5 月推出。据信，新添考试项目中的阅读理解和写作，均是亚裔学生的薄弱环节，将使亚裔学生在语文方面的弱势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这方面，聚居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华人子弟在语文学习中的遭际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区的不少华裔学生由于英语跟不上，给日常的学习带来相当大的障碍。为因应各族裔新移民学生在语言上的障碍，纽约市内不少公立学校开办了双语教育班，亦即将在语文能力测验中达不到能力标准的 40% 学生另归一班，在凑足 15 个学生时用学生的母语进行授课，以方便学生理解。但这种本意是为了解决市内族裔学生就学问题、辅助学生更快地进入正常学习的教学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却一波三折，竟受到来自家长等方面的强烈拥护及强烈反对两大相互矛盾的意见。

拥护这种教学方法的家长理由比较简单，他们从维护少数族裔学生的利益出发，在道理上也比较顺理成章。甚至曾经有学生家长因为校内人数不够法定开班的 15 位学生数目，在校方决定不开双语班时群起而示威。但另一部分家长却坚持认为这种班级的开设会使得学生产生依赖性和惰性，难以产生学习英语的紧迫感。更因为双语班的学生在理论上讲是要在英文可以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才可以回到普通班级的，因此，一些在双语班就读的学生在心理上有着或多或少低人一等的心态。

不幸的是，这种忧虑不是没有结果，近年来在布鲁克林部分大陆新移民华裔学生聚集的学校中，就出现了不少学生在双语班中一呆就是几年，每年

的英文考试均因远远不能过线而不能回到普通班里去。

随着纽约市内移民的增多及状况的复杂，双语班自身的弊端也有所显露。一些华语双语班的教材百分之百地使用中文，不管是历史课中人名还是地理课中的地名一概沿用别别扭扭的中文译音，使得双语班的学生对这些美国最基本的东西只能用中文沟通。而且，在一些学区内甚至还出现了为保持双语教师的饭碗而多少有点刻意地保持双语班学院人数的倾向。不少教育界行家为此忧虑不已，认为长此下去，一些打着照顾族裔学生旗号的双语教学班，有可能演变成为拖累学生的包袱。

在美国这种社会结构复杂的社会中，来自学生家庭的因素对学生学业的制约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

从细分析一些学业不良的华人少年及屡屡获得西屋奖的华人子弟的就学状况不难发现，成事与不成事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生家庭的境况。这虽是和中國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类古训有悖，但却的确是华裔新移民在美国一连串的真实情景。更真实的境况是新移民家庭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在美国长大的子女各方面的需求，哪怕是在子女的零用钱上。

全美性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孩童的零用钱每星期平均为 14 元。但调查同时显示，这个平均数字对纽约的孩童来讲少得“简直有点羞辱”。纽约华埠的一位李姓华裔学童说：“我一天的零花钱一定要二十元。”他并说他的许多其他同学的零用钱数目也基本如此。

由于家境贫寒，美国不少华人家长不给孩子任何零用钱，而且也不为孩子购置书本衣物，少数的父母甚至要求子女帮忙赚钱支付房子的房屋贷款。前述大学理事会对学生家庭背景资料的一项统计也说明了亚裔家庭收入已日见低下。在 1994 年参加 SAT 考试的学生中，家庭收入在两万元以下的亚裔学生占 27%，亦即四分之一强。而家庭收入在两万元以下的白人学生只占 9%。

事实上，美国青少年边学习边打工的现象十分普遍，但近年来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学生的兼职工作非常难找。一位同事有女初长成，这位女儿几年前从上海移民来美，现在皇后区读高中。平常因为课业繁忙，加上期望孩子能多花时间锤炼英文，我的这位同事虽然日子过得相当紧，但父母并不十分鼓励女儿去做课后工作。到了暑假时，家里开始希望她能出去打工挣钱，认为这样既可以贴补家用，又可以使她增长一些社会见识，但她的父母说他们足足等了两个暑假，整整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只看见女儿拿着电话四处询问个不停，到头来家人也没能如愿以偿。虽说学生兼职打工于学生个人和贫困家庭而言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但一些美国青少年在就学期间打工耽误了学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美国相关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青少年课后打工的时数不宜过长。这些研究结果把青少年课余打工的时间框定在每周十几小时之内。报告说一旦打工时间超过每周二十小时，工作就会占据学生大多数的时间，使他们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减少，经常旷课，在考试和做作业时作弊现象增加。在社会行为上，他们与父母关系的关系变得较为疏远，吸毒及酗酒的比例较高。有关部门呼吁，明智的家长应控制子女每周课余工作时间平均在八小时到十小时之间，而且应仅限于周末。

但即使说明至此，大多贫穷的华人家庭也是对子女的过度打工问题无以为改。更何况在美国，高中生的生活已基本上与成年人的社会等同，甚至更加奢华，不少高中生需要靠打工来赚取自己的汽车保险、约会费用和购买高

科技运动鞋及高分贝立体音响的花费。在我的经验中，大凡徘徊在美国 MACY ' S 等高级百货店内的 POLO、GUESS 等名牌服装柜台外的，除了有钱的美国中产阶级夫妇外，剩下的就是一望可知的高中学生。在这种一件最普通不过的短袖 T 恤就要价五、六十块钱的衣堆中，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成群结队地买。钱不是大多的学生就会去买价格相对稍好但一件牛仔衬衫也要在四、五十元之谱的“那个” GAP。

了解学校风气的不少家长表示，美国都市中初、高中学校里同学之间在着装品牌等方面的攀比风气越来越浓，弄得已经饱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时时担心自己的饭碗会不会被砸的家长为此十分烦躁光火。我的一位朋友有一天在和我外出吃饭付帐时，拿出一个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 FENDI 牌钱包来，未曾掏钱先解嘲地说：“这是我女儿传给我的宝物，她背着我又去买了更好的一种钱包。可能是看着和我血缘最近的缘故才转送给我的吧。给我这件东西时，她大惊小怪地告诉我：妈咪，这可是我花了两百多块自己做工的钱买的呢。”

19. 孩子，你在干什么？

1993年7月17日，55岁、靠轮椅代步的亚特兰大普通居民康拉德被三个入室抢劫的人花了几个小时折磨至死。这三个人的年龄分别为14、15和17岁。

根据警察的报告，这三位还未完全知晓世事的少年在这几个小时中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康拉德用尽了酷刑。他们用菜刀和叉子刺他，用绳索勒他的脖子，用榔头和枪柄敲他的头。他们中

途曾经歌手，打开康拉德的冰箱大吃大喝。而后，他们继续用在康拉德的伤口上撒盐或抓起屋内的各种摆设砸向他等方法折磨他。痛苦不堪的康拉德曾经乞求三位少年用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但少年们怕枪声会惊动邻居，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

当少年之一最后拿起一个铜质老鹰击中康拉德的背部时，康拉德终于停止了呼吸。

三位作案人随后把他们从康拉德家里得到的战利品装上死者的车子，绝尘而去。他们得到的全部战利品是一套音响、一台录影机、一个照相机和一把手枪。

康拉德所在郡的检察官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残酷的案件。”

甫于1993年才被任命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说，青少年暴力犯罪已成为美国目前最严重的犯罪问题。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自1987年到1991年，全美因谋杀案被捕的青少年人数增长了85%。1991年全年，在全美所有因暴力犯罪而被捕的人中，年龄在十至十七岁的青少年占了7%。进入1992年，这方面的数字更加严峻。据美国烟酒火器管理局的资料显示，全年中全美因涉嫌谋杀重罪而被捕的青少年总数达2829人。这一类青少年的种种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校外的，也有发生在校内的。

美国的校园已不再仅只是学童接受教育的专门场所，而成为警局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

早在五十年代，美国公立学校中最严重的学生问题不外是学生在走廊上跑来跑去、上课嚼口香糖及在课堂上吵闹。而到了九十年代，学校中最严重的问题和社会上已完全相同，是抢劫、强暴和吸毒。

据美国学区委员会全国协会1994年初做出的公布，在该协会对美范围内的都市及郊区的两千多个学区委员会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寄回问卷的学区中，有39%的学区表示在1993年在当地学校内曾发生持刀伤人事件；23%的学区发生了枪击事件。而且，全美有10%的教师及25%的学生在校园内或校园附近遭受过暴力攻击。

说来好笑，到了九十年代，已有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教师在才一开始讲课之初就告诫学生说：“在任何公共场合，只要一听到枪响你就应立即匍匐在地。”

在纽约市，一项有关公立学校学生的《学生行为标准及惩戒统一规则》中，对学生持械上学的情形进行了要求。在这份规则中，学校有针对性地限制学生带到学校的凶器品种清单让几乎所有看过的人心惊。

该份规则按学生违规带到学校的凶器的程度分出两个等级。其中，学生一经查出有所携带最多可令其停课一年的凶器竟包括有机枪、来福枪及其他各式长短枪等。

在全美范围，为杜绝凶器到校问题，已有39%的都市学区和10%的郊区学区在校内使用金属探测器；有19%的都市学区和11%的郊区学区在校内装

设了闭路电视摄影监视器。纽约市教育当局由于深知自己身处危局要冲，因此早已开始大量地增加安全人员到各校去以金属检测器去检查学生。在这方面，纽约卸任市长丁勤时真正功居厥伟，他 1990 年上任直至 1993 年卸任，主政四年之中为市内公立学校争取到两千八百万元的有关预算，使金属探测器的运用从全市二十个学校扩大到四十一个学校。受检学生的范围也从高中生扩大到初中生，甚至有些接受检查的学生只有 11 岁，刚上六年级。

纽约教师联合会代表 1993 年在市议会作证时指出，1991 至 1992 年度，纽约市各级中、小学校校园犯罪案件总数为四千一百二十三宗，平均较前一学年度的三千五百二十宗增加了 17.1%。其中，各小学共发生一千零七十九宗和学校有关的犯罪案件；初中则有一千一百一十件。高中生犯罪率攀升的比例更为惊人，竟比上一学年度增加了 39.5%。

教师联合会同时指出，上述数字仅限于该组织成员提供，实际情况比此数字更为严重。

各种犯罪现象在九十年代的美国学生中的普及程度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了。一位在公立中学任职的职员说，他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学生出具的伪造证明，学校内学生出走、少女怀孕、旷课逃学、滥用药物、偷窃甚至卖淫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纽约市乃至全美都极具名气的名牌高中史但文森高中几乎每届西屋科学奖中总有学生入围，有时甚至是多名学生入围的最顶尖学校，前一阵竟也被查出有女学生在快餐店内招揽客人参与卖淫的消息。事情传出，举市哗然。

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在美国社会中已成为一个拿不起、丢不下的“烫手山芋”。学校方面希望家长做青少年教育中的主导工作，家长也在心里返过头来这么期盼着教师方面。但美国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对社会而言，已经是越来越是可望不可及。进入 90 年代，即便是美国学校的教师自身，也开始经历来自学生暴力的恶梦。

以纽约为例，由纽约市教师联盟（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公布的数字来看，纽约市教师受校园暴力侵害的案件到 1993 年已经是连续五年持续增长了。1991 至 1992 学年年度中的这项数字是四千一百多宗，受伤的教师共达一千七百多位，市内的一百四十二间学校由于教师遇害次数过多，已被该联盟列为不安全学校。教师联盟将教师所受的侵害个案按性质分为袭击、骚扰、偷窃、抢劫、性侵犯、威胁等类别，其中仅袭击一项就占了 30%。令人惊讶的是，在很多小学校，这种事例也并不鲜见，总数字与初、高中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减少。为适应现实的需要，教师联盟甚至开办了一些研习班，对教师展开如何在校园内保障自身安全的训练。美国人对于混乱的治理逻辑常常是，如果不能阻止就顺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早在来美之初就曾听说美国的不少公立学校内由于有太多的少女未婚先孕，因此有一些极端一点的学校考虑在校内加设幼儿园来使年轻的母亲们认真学习，而没有后顾之忧。到美国多年后，通过对美国学校制度的了解，觉得这种听闻恐怕是以讹传讹了。但美国关于不良现象顺应其发展的处理法，看来确是不假。比如，在高中生中免费派发避孕套，甚至于在女生中散发《堕胎指南》等宣传册的事情都是有的，而且这种尝试往往是由点到面，在一个市内试行收效不俗后，终将燎原。

在使用这种软性的引导之外，为适应数量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残忍的青少年犯罪案的涌现，联邦参议院在无可奈何之下已于近两年以 64 对 23 票

的大差距投票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对年龄超过 13 岁的青少年如持枪进行暴力犯罪,将视同成年人等同起诉。而在此之前的法律规定:青少年犯罪的惩罚中不包括死刑与此相关的法律修正条文更曾规定:即使被判刑的青少年也不在成年人监狱中服刑。

从实际情形来看,美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发展到今天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更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启迪,比如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对罪犯的描写干脆就达到了“争夸豪杰”的地步,因此在潜移默化中对青少年的误导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

1993 年美国发生的一个震惊全美的青少年残害大案就相当不同凡响。当时,两位分别为 14 岁、16 岁的女孩结伴去游泳池玩完回家,在一向治安不算太坏的德州休士顿市,晚上 11 点半钟应当说是不致有什么危险的。她们为抄近路,二人在走进一片漆黑的林地后遇到了六名黑白混杂的少年。这两名女孩在遭到六名从 14 岁到 18 岁少年的轮奸后,被他们用皮鞋及鞋带整死。令人震惊的是,几位少年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瞩目的应讯过程中,当听说自己将被控犯有杀人罪时,六少年中的一位竟兴奋地对着同伙大叫,“太好了,我们风光的时候终于到了。”

20. 华人移民怎样一个家

在美国到朋友家作客，常常有人搬出一把中心有一个大洞的椅子让你来坐，热心的朋友会十分自然地加上一句：“凑合坐，这是拣来的。”

在美国大都市街头，晚上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一两个中国人扛着一个沉甸甸的床垫，或是合伙搭着一个桌子坦然回家。

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家庭，如果不是暴富之后出国，可以说十中有九都用过捡来的家具。

早年和朋友住在一起的时候有天忽然接到一位同住人兴奋的电话，说是他在街边发现了一个上好的吃饭桌，他兴奋得语调都变了，连连说“家里还有谁？大家都快来帮忙！我已经把这张桌子从街上抬到一边，成为咱们自己的了。”

当时在“家里”的所有人就也都兴奋起来，说是打兴奋电话的这位仁兄立了功，回来一定要好好请他吃一顿。

来自中国西安的张琴已接近 40 岁，在育龄期的最后关头，她的朋友们每年都听她说她想生一个孩子，但直到今天她的这一愿望都未能实现。张琴早在 30 岁时曾经离异，离婚后她一直忙于办理出国的事情，直到 33 岁才如愿出国。在进入美国的第三年时她认识了一个自己觉得相当满意的美国男人，这才下决心和这个男人生个孩子。

她和这个男人没有结婚，各人仍住在各自的家中，财务截然分开。张琴在一家美国人的公司做文秘工作，每个月只有两千元收入，这种收入在美国一交所得税，往往就只剩下一千五百元左右。张琴后来也明说，她至今没能生孩子是因为实在设法挪出这方面的开销，她每月的房租是五百五十元，电话费是两百元，水电费是三十元，有线电视收看费是三十元，汽车保险费是一百多元，停车场费用是一百元，再加上汽油费、汽车修理费、与男朋友互请吃饭费用等，她每月净存款只在一两百元之间。如果她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且不说未来的抚养问题，单单是她在怀孕待产及产后休息的几个月中，她就都可能无米下炊。

她说她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促成自己生孩子这件事，一是尽快和男朋友结婚，请男朋友共担抚养子女的责任；二是和男朋友财务合并。但几年的磨合下来，这两个办法都还只停留在“想法”之上。

在美国，所谓中产阶级的概念应该是家庭人均收入为每年两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需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的男户主，其每年收入应该至少达到六万元。

无数在美国的中国人家，在一穷二白时进入美国。在来美国的最初几年中拼命攒下买房的头期款钱。房子买下了之后，这些家庭又为每月的房屋贷款而焦虑，每月都为自己是否会被解雇导致是否还得上贷款而担忧，条件稍好的人在供房之余还需考虑子女的教育基金及在自己未来的养老储蓄，但人们的生活总线还是围绕着 30 年的房屋贷款的，这么 30 年下来，大多中国家庭中的老老小小就这样一过就过了一辈子。

无论是早期还是现下的中国移民，如果不是在美国拣到暴富的机会，其生活多半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房屋生活”。

在即将描叙在美华人移民家庭财务状况时，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多年来，在美华人家庭由于散进美国社会的各阶层，不具任何形式的组织，并学

得了根深蒂固的美国习惯，对自己家庭的收入及工作状况讳莫如深，这种人为造成的妨碍不但使华人对自己周围经历同样移民过程的人知之甚少，更使得勾勒华裔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群像成为一件艰难的事。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社区的经济认知也十分矛盾，比如，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多半相当有钱，因为中国人中做金铺这种“大生意”的人很多，这种听上去需要很多本钱的生意一向令普通美国人望而兴叹。

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3 年 9 月份公布的对 1990 年外国出生人口的经济调查统计数字表示，在美国居住的亚裔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在三万九千三百九十五元。而全美华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四万一千三百一十六元。

在华人社区的一般认知上，居住在美国大都市中的华人因为地区内物价相对为高，因此在收入上比小州内的华人为高，但在大都市之间，纽约地区的华人家庭总体收入却低于居住在美西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华人家庭。而旧金山与洛杉矶相比，后者中居住的富人比率又稍高于前者。

纽约在不少华人眼中不过是因为低等工作的机会多而暂时采取的过渡权宜之地，或者就是资产雄厚的大富者再谋更富的地方。以人口总数来看，纽约华人中的中产阶级或者上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不高。

姑且不论这种推断具有多大的准确性，单以纽约几近半数的华人家庭没有汽车，而在旧金山尤其是洛杉矶，由于个人交通工具的发达及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匮乏，汽车一直是几乎每个有工作的人必备的生活必需品。虽说在美国，汽车并不是一件奢侈家当，但想要保持一辆甚至两辆汽车每日常的正常开动，保险、修车等方面也还是需要一些钱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上述“华人社区的一般认知”应不是空穴来风。

多年之后，当我移居洛杉矶后，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华人看上去竟是那么的有钱。在富人聚居区，豪华得每栋都几近百万甚至几百万美元之谱的超级大宅中走出来的几乎全都是中国人。而且，几乎在每家中国人常爱去的中餐馆门外，华人食客价格昂贵的汽车们齐齐地停放在门外，也每每都活像是一次次汽车大展。

但令人称奇的是，洛杉矶等美西地区的平均工薪竟是比纽约还低。不少人把这一怪象解释为因为台湾、香港等地的富人多选在与亚洲往来便利、气候中又没有过冷或过热的美西居住的原因。而且据知台湾富人也多愿在美西再安一“窟”的，一家中的生意人往来奔走，眷属们就安居享受。

循此道理从细观察，果真在洛杉矶的确是有在台湾大赚特赚了的人一家齐齐地从不上班的。

自然，富人移民自是有钱坐镇，与我们要讨论的华人移民奋斗过程多有距离，但这一现状无疑也是一种状况，在此一说。

但光就美东与美西比，有一个例外需加以摒除，那就是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及附近地区。该地区的华人多为学者型，以“钱”做度量既失之确切，对他们也似乎是一种不敬。

在纽约方面，亚裔家庭的经济状况统计显示，纽约市内的一家之主平均年收入大部分介于两万五千元到七万五千元之间。

据人口普查局统计资料显示，纽约全市共有 155,873 个亚裔家庭，其中近半数的一家之主保持了中等收入。

这种统计在事实上只是对纽约市内合法居留的部分亚裔家庭的经济状况统计，其他因为身份、税务等方面的问题原因而排拒这类统计者大有人在，

而且实际数字往往几倍于已经接受统计的人数。

对于单纯的纽约华人家庭收入情况人口普查局并没有特别整理予以公布，但在美西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却有一份公布出来的有关华人家庭的调查资料。在浏览这份资料之初，首先应该弄清的一个概念是，在蒙市聚居的华裔以台湾侨民为主，这些人中不少人早在来美之初还在台湾时，就具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及家产积蓄，这一点上与纽约不少初来乍到手里仅有几百元向亲朋挪借筹换的美金的大陆移民不大相同。

这份由蒙市成人教育中心主任杜英慈主持的统计，对蒙市一百位华人社区活跃人士做了有关在美生活现状及居美心理状态的问卷调查，在所有发出的将近一百份调查问卷中，只有三分之一回参与这份调查的华裔移民来美时间超过十年的占 53%；三年至十年的占 27%；三年以下的占 20%。这些人全年家庭收入在五万元以上的占 68%；三万六千至四万九千元的占 16%；两万一千至三万五千元的占 6%；一万至两万元的占 10%。

在这些囊括了各年龄段华裔移民中只有 20%的人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极稳定；有 44%的人认为非常稳定；有 33%的人认为状态一般。而在回答对于美国社会是否适应的问题时，有 21%的人认为极为适应；54%的人认为非常适应；17%的人认为大体适应；另有 7%的人认为不适应。与此问题相类似，只有 13%的人认为在美国社会自己的潜力发挥得极好；37%的人认为相当好；37%的人认为自己有些潜能未能发挥；6.5%的人认为自己仅偶尔能发挥；另有 6.5%的人认为完全不能发挥。

而在心理状态上，有 6%的人认为在美国生活得极快乐；60%的人认为非常快乐；17%的人认为普通；另有 17%的人认为难得快乐。

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移民的后来者的。参与答卷的人中 10%的人认为新到移民的前途无可限量；49%的人认为前途美好；19%的人认为他们可能会有前途；16%的人认为未必会有前途。

21. 满坑满谷偷渡人

人之所以能够忍受痛苦，就在于他怀有希望。

早自八十年代起，有人就开始把一些中国人的希望诱向美国。

大约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美国的一些不安份华人开始有了一条新的来大钱途径。这种钱来得无须体力、没有痛苦。操干这种行当的人在 1993 年一艘名叫“金色探险号”的船绕着地球走了无数苦难道路后几乎成功地进入纽约皇后区海滩之前甚至可以说并不十分违法。

这种途径使不少华人一夕致富，也十分漫画地为繁荣全美华人社区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后来这种致富法也造成了华人社区年仇杀不断，惊骇他族，美国警方甚至于专门为此组建了特别的行动小组。

这种途径即是：走私人口。

不知为什么，在美国习惯上把偷渡进境的人员称力“人蛇”，把人口走私的主使者叫做“蛇头”。这种交易本钱小、获利大，很快成为华人社区中仅次于毒品交易的大型交易。据美同移民局 1993 年公布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有案可查的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大陆人约有十余万人，偷渡行业所涉及的美金全额高达数十亿元。早年间，美国政府对于非法入境的外国人采取了极为宽松的态度，外籍人士只要踏上美国国土，就可以以申请政治庇护为理由无人看管地等候出庭，而十有八九的结局是，这些人一经释放转瞬间就会混迹于茫茫人海中，再也找不着了。他们最有可能和美国移民局的再次会面日期，将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办身份时，那时的他们不是出庭应讯而是出面领取绿卡。

美国移民官员自己也承认，他们最不愿意外界知道的事情就是，偷渡者只要能进入美国的拘留所，就算是偷渡成功了，这之中多半的原因是美国拘留所已过于拥挤，一般非法移民的等候聆讯时间通常为一个月到半年之久，在下一股偷渡者涌进时，原在拘留所无刑事记录的拘押者就会被放出来。平均下来，偷渡者在拘留所中呆不到一、两个星期就会被放出来。

据了解，华人以美国为目的地的人口走私活动早在十几年前即告出现，但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成团成队地结伙而来。通常，偷渡人口中多为中国福建省人，其中又以长乐、亭江、连江及福清四县人氏为最多。

据熟知内情的人士说，在大陆有意偷渡赴美的人通常是要经过“财务能力”调查的，并非人人都可以报名。

在福建一带活动的蛇头往往通过和全球联通的网络调查每一位有意偷渡者的背景资料。偷渡人应具备的“财务能力”重点是在海外要能有亲友代为担保付钱；或者甚至就是偷渡者自己就在中国有能力把钱付清，符合这两项条件之一者才会被“录取”。一旦获准被“录取”，有意偷渡者只须交纳个人身份证件及照片数张以便日后办理假证件之用，报名手续即告完成。

境外付款的办法是人蛇在偷渡成功后，由偷渡者本人用电话通知自己在海外的家人或亲朋，带入的和出钱的两方各自带钱带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偷渡者到达美国在用亲朋的钱赎身之后，所欠款项要由偷渡者本人做工偿还。也有的偷渡者是利用借高利贷赎身或干脆就为蛇头做工还钱。

几年来，由于这种人口走私活动，也出现了不少人蛇在海外亲朋无力凑

足偷渡费，或蛇头方面的调查工作不够周密，致使人蛇已到美国，但钱却不知在哪里的形态，这也就造成九十年代间华人社区中频繁出现拘押人口情事，无钱赎身的人蛇往往会被蛇头关押起来直到有人为其支出钱来为止。

在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州，自 1992 年以来，警方连连破获蛇头非法关押人蛇的案件，其中以 1993 年 6 月下旬在皇后区贝赛等高级住宅区发现的几十个人蛇被关押案最为轰动。当时，警方在逃脱出来的人蛇报警下，在两处宁静的住宅中一举救出三十余位人蛇。这些人被关在地下室等处，每天吃着蛇头外出买来的简单食品，头枕着电话本等简单的用品睡觉。他们中的女人蛇甚至被关押者们强暴。

偷渡之旅在不少人蛇眼中是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重大抉择。也因此，这条路上的丧生者也不在少数。

在华人社区多年，时常能听说有的偷渡者是被蛇头安排在运货的大长卡车中的夹缝中瞒过美国方面的进境检查的，而在这种路途中，赶上天气不好，几个甚至十几个人蹲坐在冰冷的车厢夹缝中，紧张加上寒冷又不能出一声，“稍下留意就被冻死了”。一位偷渡者这么告诉我。

太多不幸偷渡者的偷渡旅程十分遥远，有不少人甚至从非洲等地辗转而来。一路上耗费大量钱财不说，光是在时间上由于需要不断地等时间等接头人，最长的竟有走了五年之久的。

中国人往美国的偷渡路途大致分空路、水路和陆路三种途径。

空路的途径就是乘飞机到美国。这种途径历史悠久、口碑不错，是偷渡者偷渡的首选办法。据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工作的华裔王凯蒂表示，每周经由飞机带来的偷渡者多不胜数，这些人最通常的情形是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一经讯问每人千篇一律地表示自己要求政治庇护。曾多次被海关及移民局人员请去充翻译的王凯蒂说，这些偷渡者中有不少人持假的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护照在不一定是大陆的地区上机，绝大部分人都与移民官合作。而移民官在问过话之后通常留下偷渡者的联络地址、电话并订好出庭时间就把偷渡者放了。

事实上，偷渡客在上飞机前和下飞机时从有证件变为无证件，完全是“老马识途”的蛇头们想出的办法。一位目前已在纽约打上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餐馆大厨工的偷渡客回忆说：当年，他们在上飞机后，蛇头就立即发给每人一把小剪刀，要他们去飞机上的洗手间内把自己的身份证明剪碎冲进厕所。因为“没有证件对付美国的移民局官员反而比有证件要好”。

一般而言，在以往，各航空公司在运载有偷渡客抵美后都会装做不知情。在苦无对策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定下规矩，凡发现一位无证件入境者就会对其所乘飞机所属的航空公司罚款三千元。美国移民局并规定，乘飞机抵美的偷渡客在申请政治庇护滞留期间，食宿都要由载运的航空公司负担。由于有的庇护案件常常一拖半年都没有结果，偷渡者住在机场附近的旅馆里时航空公司还要派人看管，所以无不叫苦不迭。据悉，中国偷渡者对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都有所连累，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及欧洲的德航、法航、英航甚至冰岛的航空公司，也都吃过类似的苦头。

而以往中国一些边检人员对出境人士机场检查方面存在的疏忽，也是助长偷渡风气的因素之一。在纽约一些专营此道的人士口中，九十年代初北京机场边检人员的任何一个对明知是偷渡者而特别“放水”的暗中收费是每位三千到五千元不等。

记得在 1988 年底我乘中国民航飞机赴美留学，在飞机即将抵达进入美国的第一站旧金山时，机上人员要求乘客出示自己的证件。在全机人员中就查出一对夫妇的中国护照上一片空白，任何签证也没有。当时坐在此夫妇身旁的人们都为如何进入美国境内而着急不已，不少人还为他们夫妇的“粗心大意”指摘了一番。但在记忆中，该一对夫妇当时非但不急，很偶尔地还有笑意浮上嘴角。

当偷渡已经成为全美国人都熟知的一件移民难题的今天，回想当年机上那一对夫妇的笑意则十分可以理解了。他们当时明显是已经得到了中国边检某个人的“放水”，正稳操胜券地等着美国移民政策对他们的另一次“放水”。

走陆路偷渡是比较艰辛的一种偷渡办法，这种途径大多通过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进入美国，美墨边界长约两千公里，几乎每个白天都会有各种人等聚在墨国的一端眺望美国。入夜，这些人就开始行动。

据管辖美墨边界的史提夫·金说，参加偷渡的中国人往往先进入南美州，然后再转往墨西哥，到达与美国交界的边境后，人蛇安排他们和要偷渡的墨西哥及其它南美州人一起住在旅馆内，到了半夜，偷渡的人们就上路了。

在经由陆路进入美国的偷渡者中以墨西哥人为最多，其次是萨尔瓦多人，中国大陆人是仅次于南美州几个国家之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价钱方面，蛇头把偷渡者带到离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洛杉矶的价格因偷渡者来自的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墨西哥本地人偷渡往往只须交纳 350 到 500 美元的费用，其他南美洲人往往要付 700 到 1000 美元，而中国人由大陆到南美，又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境内，通常的费用会在一万五千美元到两万五千美元之谱。

才到美国和朋友们住在一起时，有一天，同住者中的一位说是他的一个浙江朋友就要到纽约来找工作了，而且会暂时在我们租下的房子中小住，和我们分摊房租和其它费用。据这位同住者说，将到的这位是一个月前从墨西哥那边靠游泳游到美国来的，说是这位勇士当时和他弟弟一起把一身干衣服和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吹足了气的塑料袋中，“用嘴叼着塑料袋游到了对岸”。我们一干人听了，不由十分佩服其人的胆和勇。

等到见面时才看到这位游泳好手竟是一介书生嘴脸，身高且瘦，竟有一米八几。大家本念他旅途比他人艰辛的缘故想好好待他，不料这游泳好手在来纽约的第二天就向他的旧日好友、我们的那位同住人报告说，他经由游泳带来的钱“在乘地铁时被黑人持枪全部抢了去”，他身边因此只剩下一块来钱了，言外之意下外是他将不能交房租和伙食费了，更需要大家的帮助。

大家见他说得鬼鬼祟祟，时间上又有惊人的巧合，便一下对他大反感起来。他也识趣，十分不自在地住了两周之后，就搬走了。

走水路就是乘船偷渡，这种途径是偷渡各种途径中起步最晚的一种，自 1991 年之后才开始盛行。人蛇用以偷渡的船基本上是台湾渔船，走海路的人蛇每人的偷渡费为三万美元。这个价钱包括偷渡人从大陆出发起直到到达美国止的所有费用。

美国的海岸线绵长，渔船的容量又大，往往一次就可卸下 50 到 100 个偷渡客，大的船儿还可能容下数百人。因此，海路偷渡时兴之后，一度给美国方面的围堵工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在早期的船运过程中，距离中国较近的檀香山曾是人蛇船靠岸的首选之地。人蛇一到檀香山虽未最后到达美国大陆，但在此处就可以自由搭乘飞机去美国任何地方了。

后来，大抵是鉴于与空路及陆路相比，美国海防对偷渡者的防范起步相对为晚，对策也相对为拙，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 1992、1993 年，直奔美国的大陆人偷渡船堵不胜堵，让美国人伤透脑筋。

由海路而来的偷渡者让人很容易和最早乘船进入美国的欧洲移民相联想，但与那时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一船船涌向美国的人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和大笔金钱关联着的“货物”，如果以一条船上可载一百五十人计算，那么每人的偷渡费如一概也按三万元算的话，则每船的“价值”在四百五十万之谱。

干脆拉的就是一船黄金。

但这种争拉黄金的局面自一艘一百七十五英尺长的近海货轮“金色探险号”的到来而宣告结束。

22. 著名的金色探险号

“金色探险号”是近年来成百艘载着大陆人蛇往来公海的人口走私船之一，该船于1993年6月6日凌晨令人为之语塞地赫然抵达纽约皇后区洛克威地段的门径国家休闲区的海滩沙洲处。

它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忽然出现在海岸巡防队基地门前的，如果不是因为船自己不慎搁浅，船上的三百号人蛇将全部逃进纽约茫茫夜色中，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将他们从芸芸众生中剥离，然后驱离美国。

然而，船搁浅了。

船在离皇后区陆地几百米的地方功亏一篑地搁浅了。

6月6日凌晨，“金色探险号”全船三百口人中只有几位水性极好的人游过了这几百米的距离，进入皇后区陆地，开始他们人生的新路去了。

另有十位水性极不好的人在几个月来带给他们无限憧憬的“金色探险号”和他们无限憧憬中的目的地之间，满腹遗憾地死了。

当美方发现“金色探险号”时，剩下的几百号人有人仍泡在只有华氏53度的水里，有人吊在船边，有人挤在船中央，一团混乱。

相信这艘据悉是自1991年8月以来美国当局劫获的第二十四艘人口偷渡船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对美国现行移民法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

一位仅仅知道儿子上了“金色探险号”的福建母亲，在间接听说探险号出事并有十人溺水死亡时，从福建特意订长途电话过来辗转打听儿子的下落。她说她的儿子从家乡出发已有三年之久了，前几个月刚来信说已登上“金色探险号”，离到达美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设想到紧接着她就听到船出了事的消息。

事发后，“金色探险号”上的人蛇中有不少人接受了中西媒体的访问，其中不少人但言说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经由在媒体中曝光，好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

他们中有的人此番“探险”早自八、九个月前就开始动作，有人甚至是先行到非洲后才搭到这艘声名大噪的“探险”船的。

这条船的偷渡之行是从台湾经由曼谷、东非、绕行好望角、西非，穿越大西洋而后到达美国的。

一位二十五岁的“金色探险号”人蛇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仍坚信自己能被美国接纳，他说他只要离开了拘留所就会“每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把全部的欠款还清，把老婆孩子接来”。

他说他早在八十月前就开始他的赴美行程了。1992年10月，他和另外的五十多个怀着同样目的的人一同在闽江口附近乘小船出海，然后上一条大船，经过长时间的航行先到了非洲肯尼亚的莫巴萨港。前来接应的蛇头将他们五十几个人掩藏在离港口不远的一个大仓库内，又等了一个月之后，另有五十几个和他们相同心境及装扮的人到了。

三月底，这批人又与已在肯尼亚的另一批人汇合同上了“金色探险号”驶向美国。

几个月的航程就这样开始了。

据一些健谈的人蛇说，这几个月的行程苦不堪言，最艰苦的一段是“经

过一个叫什么角的地方时，船上的很多人都病了”。这些人们拥挤着消磨过船上漫长的时间，满心憧憬。他们吃在船上拉在船上，共同体验了一生少有的远洋经验。

当船在纽约搁浅后，美方的卫生检疫人员上船检查时，看到船上满船舱满甲板的粪便，在这些污物之中，并放有一些拉拉杂杂的食品和煮炊用的小炉灶。检查人员没走几步就走不下去了，不得不宣称暂缓实施检查工作。

最令人闻之毛骨惊然的是偷渡船上女人蛇的遭遇。由于船上的女人数量少得可怜，因此女人蛇们成为船上蛇头代理人、保镖以及船员的性攻击对象。

“金色探险号”事件发生后，偷渡船上女人蛇所遭遇的这类问题得以披露。据报道，上过偷渡船的女人蛇很少有人能幸免未被人蹂躏。船上的“有实权人物”往往以“不给饭吃”做为威胁，逼迫女人蛇就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夫妻同船的，说是有时“连做丈夫的爱莫能助”。曾有一对女人蛇夫妻同时上船，但几个月的海上生活过去，等到了美国之后，做丈夫的却表示要与妻子离婚，原因是做妻子的在船上被太多的男人玩弄过。

在漫漫行程中，每当船到达中途停靠地补充给养时，不少女人蛇孕妇则必须无奈地去附近的医院打胎。为了免遭蹂躏，有的女人蛇曾坚持将近一周粒米未进，但最后仍别无选择地屈服了。

据知事的人说，女人蛇想要在船上不受屈辱，必须事先用钱来向各方打点。

据了解，在美国福建人圈子中，目前男人找老婆事先都会问清楚女方是不是乘船来的，如果是的话则免谈。也正因此，一些在船上呆过的女人蛇下船之后往往自暴自弃，干脆进入色情场所谋生。

“金色探险号”在驶抵纽约之前为一籍籍无名、游走于东南亚一带的近海货轮，船长 175 英尺，名为“东升号”。事发后，该船被联邦没收。联邦法警处于 1993 年 8 月 8 日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正式拍卖“金色探险号”，起价为一万七千五百美元，法警处在标售通告中声称将“依原样在原地售出”该船。1994 年 1 月，“金色探险号”正式被原籍克罗地亚的萨维地亚（NIKOLASEVERDIJA）家族以七万五千元购下。主要经办人、56 岁的尼古拉·萨维地亚是于 1956 年从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克罗地亚移民来美的，现以买卖船舶为生。他表示，船龄在 24 年的“金色探险号”在状况上还是能够从事近海运输的，而他的一个儿子却建议说应把此船作为一个披露移民冒险来美的实物博物馆向民众开放展示。

在“金色探险号”出事七个多月以后，1994 年一开始，《纽约每日新闻报》记者葛瑞格·史密斯和陈婉莹获准登上了这条著名的偷渡船。他们在观看了残留在船上的三千五百页信件、英语练习本和日记之后，曾撰写长文向世人公布了曾在船上的两百九十个偷渡者和十位船员的内心折磨。

按船上入的传说，“金色探险号”上的印度裔船长相当厚道，他此次身负运载此一票人的酬劳是美金两万元。但早在船搁浅之前，此笔他存放在船内保险箱内的钱就已被身怀绝技的船上其他人“取之”了。

究竟人蛇大军在纽约的华人中占有多大比例？没人能说得清，但是有一点可以一提，纽约的大型由福建人组成的社团“美东福建同乡会”，几年来已迅速攀升为大纽约地区最具规模的组织，据该会的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称，目前，同乡会直接与间接的会员达十多万人。

自然这一数字并不是说该会会员全是经由偷渡而来，但福建籍人士势力

的飞速窜升，无疑可间接他说明一些问题。

不得不指出的是，福建籍人士在海外势力的壮大，其实和他们的本性有关。大部分福建人心齐，对自己的乡亲肯舍出血本来帮忙，而且他们大部具备了勤奋的品德，不少做为人蛇偷渡进入美国的福建人，到美国后绝对地奉公守法。他们中的不少人来时光棍一条两手空空一屁股欠债，但刻苦劳作几年以后，个个都有了自己的生意，而且持之以恒、不遗余力地从福建老家慢慢接出自己的全部家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几年下来，不声不响之间，大纽约地区的小型外卖中餐馆，大约80%以上是由福建人开的。而且，目前在纽约华埠，几家超级规模的大型酒楼“金丰大酒楼”、“怡东大酒楼”等处已不约而同地被揽入福建籍人士的麾下，或聘任福建籍的管理人员经管。与此同时，华埠的律师楼、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等机构也纷纷在自己的宣传中特别加入提供福建话服务的项目。

记得刚到美国时，我的房东林小姐即是福建长乐人。我至今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她全部公开给我们的只是“林”这个可能是她自己的也可能是她夫家的姓氏。

我来美国时她已是一介老板，她买下租给我们住的是一幢地处皇后区WOODSIDE、当时价值在三十五万的多家庭房子，她经营的名为“长乐”的外卖中餐馆就在距这幢房子半条街以外的街转角上。每个深夜，我部能听到好几个人的脚步声从我住的一层的门厅外一直轰响到地下室。后来听人说这种脚步声是在林小姐餐馆打工的福建人从餐馆回来弄出的响动。这些人睡在地下室，但究竟有多少人、这些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乃至这栋房子的地下室究竟是怎样的格局，由于和这些人彼此作息时间下一样，在我心中一直也是个谜。

我唯一知道的是林小姐和这些人工作时间是相等的。

时隔多年，当我早已买下自己的房子并在纽约安居乐业后，我仍能十分清楚地记得林小姐当年告诉我她对自己在美国买房和饮食享受的独到心得。她说她当时买房时不少当地人都说她疯了，闹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买当地最贵的一栋房子。据说当时那栋房子已上市许久，因为价格过高、原屋主又不肯降价而无人问津。她在听说这种情形之后就买下了这栋房子。她说她这么做的目的——一是这房子离她的餐馆实在太近；二是她想“买给外国人看看”。

她说她在美国将近八、九年来的生活安排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所不同的只是以前是在别人的餐馆给别人做工，现在是在自己的餐馆给自己做工。多少年来她感受到的美国生活只是单纯的一个“累”字。她说这种毫无变化的生活甚至反映在她的午餐上。她说以往给别人做工时不便“造次”，她常常是盛上一碗饭夹几筷子榨菜到炉灶前面吃，后来这种吃法竟成了她的午餐习惯，几年下来，即便是在自己的餐馆里，她也是用米饭拌榨菜打发中午饭的。“金色探险号”搁浅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纽约华埠成为中西媒体记者聚集的重地。有人手的大型电视网记者甚至整天守在华埠福建籍人常去的几个职业介绍所门前，逢到自认为带有“人蛇痕迹”的人便不顾一切地追问：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怎么来的？”

“你来到这里有多久了？”

“你每天怎么生活？”

那几个星期里每当美国人打开电视机，内中全是相关的新闻和评论，我至今能记得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在华埠职业介绍所门前徘徊的小个子华人在问答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记者有关“你来美国已经多久了”的提问时，不卑不亢地眨着眼说：“两天。”

23. 移民们被推到台前

几乎每年，我都有可能采访到一些等够了时数的外国移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宣誓仪式。这种仪式往往在各地选择各种会场举行，成千上万的移民们在美国国旗之下集体宣誓将效忠美国之后，统统成为美国正正规规的一员。

每次去参加这种仪式在任何一个会场中看到的就都是成百上千个满面春风的这样的脸，而他们的亲人们往往是在会场的观礼台上就座，满眼是泪地看着这一仪式在眼前演示。

每次去参加这样的仪式，每次就都有这样一个担忧，觉得眼前如丛林般的人林，给美国造成的一定会是一种尴尬，因为每次在任何一个这种仪式之上，到来的人数如果以其住房而言，都将占满整整几幢大楼。

那么，美国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和姿态来迎接他们的呢？

根据美同联邦人口普查局 1992 年年底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1985 年至 1990 年间涌入美国的移民总数将近五百万，使全美外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多达两千万，此数目还不包括非法入境者。

与此同时，另外一份来自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人年增长率在 1% 左右，但外国出生人口的增长率却达 4.2%，移民年增长率为 17.6%。而这种移民数量的猛增还在逐年加剧，仅在 1992 财政年度中，全美移民总人数就高达一百二十万。在这之中，合法移民占八十一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人来自亚大地区；十四万三千七百人来自欧洲；两万四千八百人来自非洲。

美国宽容的移民政策究竟给美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一直是近十年来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一个纠缠不清又不便大过声张的“心结”。

早些年间，移民美国的世界新移民在经济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带给美国的弥补及调剂作用，确实曾为美国社会各领域及层次的多样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最早移民美国填补了美西掘金及尤其是修筑铁路时低等劳力空缺的事实，就是一个无需多加诠释的例子。但随着这种移民大潮无休无止地翻滚，移民这种在美国曾经有着特别意义的“社会现象”，开始褪色。

近十年来，首先是大批美国上生的中产阶级开始绷不住劲了。这些人中，有些即便是早年间相当支持宽松移民政策的人，也开始用辞暧昧但语意鲜明地表示“真愿意回到四十年前的美闰”。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美国的经济自八十年代末期一直持续低迷，美国人在不堪经济衰竭的负担的同时，对外来移民的看法开始有了巨大改变。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境内的贫穷使本地人出现了在美国境内大规模迁徙的现象，这种情状使得无数美国人开始觉得已自顾无暇。但凡经常看看报纸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不明白，这次的迁移其实是美国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竞争就业机会不敌而导致的一次无奈的投降。

勤于读史的人相对清楚，美国历史上屡次出现的民众在本土内进行的重大迁移行动，都是美国人为了寻找更好生活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种转变。而九十年代的这新一回合，却给人一种出让“城池”的悲状。

人口学家注意到，美国人口的这次大迁移基本上是由相对贫穷的白人主演的。这些人从纽约及加州等地迁出，流向美国内陆地区。这个过程简单地描述起来就是：贫穷的外国移民迁入，贫穷的本地人迁出，从而造成更深化的族裔隔离。

充斥全美的这一无可奈何的本土人迁移路线大致如下一从纽约州往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

从加州往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亚历桑那州、内华达州。据一般估计，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合法及非法移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美国境内六个所谓“移民前线州”内。这六个州分别是德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加州。尤其是纽约和加州在传统上被称为“社会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中心”（UPWARD MOBILITY），但据 1985 至 199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五年中，纽约州流失了九万一千多个本地贫民，德州和伊利诺州各迁出六万一千个贫民。加州的此项数字则为四万两千个。

与此同时，上述几个被公认为移民茂盛的州承受了更多的东西。同样是在 1985 至 1990 年间，加州增加了四十四万五千一百五十个外来贫穷居民；纽约以第二位的姿态共承受了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二人；德州则是十二万六百五十八人。而用于这些移民的费用大部分都是由当地的州政府支出，在美国移民问题显现出在他们看来无可饶恕的弊端时，这些“受害州”的主事者们曾经悲愤地指斥联邦政府的无能，“联邦既不愿花钱，也没有阻止大批合法及非法移民入境的动机和决心”。

美国《新闻周刊》1993 年 7 月末曾对美国的七百五十位成年人进行了电话民意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语意直露地希望外国移民选择其它的国家落脚，而不是美国。

在这项据信误差仅在 4% 左右的调查中，被访者中有超过 60% 的人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各方面发展均有不利；有 62% 的人相信是移民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59% 的人相信许多新移民需要依赖社会救济，从而增加了美国人的税赋，占被调查总人数 80% 以上的被访者认为，非法移民的问题是日前美国空前严重的问题之一。

也有 74% 的被访者表示，他们不同程度地担心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会被恐怖主义分子利用，从而更方便他们在美同本上进行无益于美国的活动；也有 65% 的人担心移民会传播爱滋病。

在此同时，美国的移民权益维护团体也开始越来越强硬地捍卫移民利益。纽约市人权局局长戴雷昂就曾表示说：“不幸的是，仇视移民的观点已经蔚为风气。我觉得新移民已成为我们许多问题的代罪羔羊，使人公然发泄排外偏见。”但据《纽约时报》报道，部分维护移民权益的人士强调，与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陷入排外暴力浪潮的西欧国家相比，美国对移民的宽容将可能延续。

但是，严重的问题并不仅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移民掺杂在美国社会中，甚至给美国带来了平均文化水平全然崩溃的后果。

比如，1993 年教育部公布的一项耗时四年研究而成的“全美成人读写能力调查报告”中指出，九十年代中，有将近半数的美国成人读写能力低下，英文水准只能做一些类似填写银行存取款单。从地图上找出交叉道等工作。这整整一半美国人下能写一封简单的抱怨信，甚至不能在时刻表中正确地查看公共汽车的班次。

此报告是在美国境内抽样调查了两万六千多位十五岁以上年龄层的人之后得出的结论。教育部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境内成年人母语不是英文以及美国的教育程度降低是导致这种测验结果令人沮丧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呼应的事情是，随着世界各地移民的大量涌入，部分移民聚集地区甚至开始讨论

通用语言是否应“独尊英语”的问题了。这件以往在美国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强大的移民攻势下，也成了问题。

事实上，这种因移民原因使得美国文化处境尴尬的现象近十年来在美国的太多方面露出痕迹，而且愈演愈烈。比如，不谙英文的外国移民在纽约等移民城市法庭中屡屡造成的语言障碍纠葛，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尤其是在纽约州，由于法庭中双语传译人员的极度缺乏，造成不少下暗英语的涉案外国移民在法庭上陷入表达困难的窘境。美国法庭上所有文件记录都采用英语，当事人的口供或传译员的传译一旦出口，就被认做是法庭依据。近年来，由于不懂英文的当事人剧增，以传译错误而上诉的案件也随同剧增，但由于证明困难，得以翻案的案件几近于零。

在纽约，大部分搞过涉及不懂英语的外国移民个案的法官和律师都报怨具有资格的传译人员过少，使得许多案子严格地说属于违规“操作”。由于无人传译，堂堂至尊的州最高法院的庭讯过程中，甚至出现过一名法庭书记员为解燃眉之急不得已冲入一家邻近的韩国杂货店，力劝店老板进法庭帮忙传译的事情。而在纽约市有鲁克林区的一件杀人案的听证过程中，因为缺乏传译人员，法官竟不得已要求另一越南裔同案被告充当翻译。由如此素质的“传译行”代劳，法庭上的热闹可想而知。在一次对一件有关毒品案件的庭讯中，法庭上不称职的广东话传译员的胡翻乱译之离谱，竟使得在旁听席上旁听的中文报纸记者为其中的翻译错误大笑起来。

为了适应移民日多的现状，全美的各级法院已经裁决，在各州刑事案件中，涉案人拥有一名称职的翻译员的权利已作为司法程序中心不可少的一项条件。

面对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美国在1993年出版了第一个有关反对移民现行政策的详细报告。此部由休斯顿莱斯大学教授唐纳·贺多(DONALDHUDDLE)所著的报告指出：截至1992年，美国三大类合法移民约在一千二百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并有四百八十万非法移民涌入。为迎接这批移民，美国人在合法移民身上耗费公帑两百五十六亿元，而非法移民事务则为各级政府增加支出达一百一十九亿元。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两百五十二万的特赦移民，为了操持，政府的净支出达到五十亿美元。此外，因为外来的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导致两百零七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在这些失业的人身上又损失了一百一十九亿元各项福利等社会保障一类的支出。因此，单仅1992年一年内，美国政府合计为移民事务支出五百四十多亿元，而移民们缴纳的税金则远不能与此支出相提并论。

贺多预测，在1993年到2002年之间，美国纳税人还将为合法及非法的移民支出六千六百八十五亿美元的款项。

近十年来的美国移民政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后果考验。并仍在制造着后果。

24. 非法移民的问题

一个经验是，在美国大都市，尤其是在移民人口集中的都会地区为移民族裔拍照，人群中十有五、六是会立即掩上脸迅速背过身去连连说“NO”的。

在纽约的华人社区中，我从事多年的电视工作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现象，每当在一个平常的公众场合摄影记者举起摄像机拍摄时，镜头前的人往往捂脸的捂脸、走避的走避。有时候到

一个诊所的工作间中拍一些描写医护人员工作的镜头时，在文字采访上进行得都很顺利，除了当事人坚不肯透露姓名之外，其余一概有问必答，但等到摄影灯一开，这些小姐一个个就像有人教过一样，齐崭崭地背过身去，百呼不应。

后来有人告诉我，由于社区内存在大量非法工作的非法移民，因此人们怕你是“为移民局来搜集非法移民材料的”或者“怕移民局凭着这个摄影凭据来抓他”。

有一个很可能早年间也是移民的黑人州警有一天向前来就移民问题采访他的记者说：“你想想吧，如果你只邀请了五位客人来吃饭，但却下请自来地来了十五个人，你该怎么办？”这位州警声音嘶哑他说：“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在美国的任何人都知道，在美国以往摆下的这桌宴席上，来吃席的人数之多已经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了，有明着吃的，也有偷偷吃的，呼朋唤友越聚越多，更要命的是这种吃法已经几乎不是美国人自己所能控制的了。

近十年来，美国所容纳的外来移民人数已比全世界其它国家接纳的移民总数还要多，而非法移民更是势如破竹地利用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达到自己的美国梦，这让无数美国人觉得很不好玩。过量的移民问题近十年来在美国人心头成为越缠越紧的死结，尤其自1993年夏天之后，全美上至总统下至不足挂齿的普通街区的居民联谊会会长，莫个踊跃地挖空心思为国家寻找拦阻对策。无数美国人开始说：是时候了。

美国的移民政策一向宽松，不少美国人对这种移民政策进行了多年的抨击，但却常常在美国的人道理由之下败下阵来。此次“金色探险号”的纽约“探险”未遂，给这种抨击加了无以言喻的助力，使其成为一股洪水。

自“金色探险号”出事后，美国全国就非法移民问题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辩论。在辩论之初，尤其是“金色探险号”人蛇在赴美里程中的痛苦万状被披露出来之后，一些美国人深深为此而感动。认为近年费尽千辛万苦来美的非法移民与1620年乘“五月花号”赴美的英同清教徒一样，身为美国的原驻民应该为这一壮观的行为感到骄傲，并为之鼓与呼。

但当有关当局把美国为杜绝非法移民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乃至财力代价公诸于众时，特别是继“金色探险号”事件之后，人口走私这一行当带给美国社会的绑架、劫持，乃至因人蛇费付款不加而产生的撕票和因分赃不均产生的谋杀等社会问题，才使得美国人开始正视自己的社会及生存处境。

美国移民局拘押问题移民的预算在1981年只有一千五百七十万元，但到了1991年，此预算蹿升至超过一亿四千九百万元后仍旧明显地不敷使用。1980年以前，只有被视为可能危害美国安全或潜逃的移民才会被拘押。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大批古巴和海地人无休无止地涌向美国，促使美国开始大范围地捉拿企图偷渡进美的非法移民。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1993年提出的统计报告显示：在1992财政年度中，全美被捕获的非法移民人数达一百二十

万，几乎与合法移民的总数相同，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5%。

另据美国参议院在1993年下半年提出的数字显示，非法移民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监狱中人数成长最快的人群，其数量占联邦监狱囚犯总人数的25%以上。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任何一天内，美国共有四十五万两千多个被定罪的非法移民破关在年中、或被假释和缓刑，美国1993年在此一项目上的花费高达七亿二千四百万元。

其实，从纯数字上来讲，华裔非法移民并不如美国朝野一般人估计的那么夸张。据移民局1993年夏天，也就是“金色探险号”偷渡船搁浅以后公布的评估数字显示，截至1992年，美国境内共有四百余万非法移民，其中的四十九万人居住在纽约大都会地区，而且他们之中的80%住在纽约市内。移民局的这项统计数字是从过去十一年中的记录中收集了一亿多份资料，并参考利用人口统计局的资料、申请合法居留者的档案及非法移民被捕的记录等材料综合而成。

分析资料指出，在非法移民停留位居全美第二的纽约，最大的非法移民来源地是厄瓜多尔、意大利和波兰。

“金色探险号”事发之后不到两个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即于7月26日公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新政策的重点在于防范偷渡活动和防止恐怖份子进入美国。新政策要求对走私者施以重罚，同时加速时非法移民的处理过程，使非法移民最快在两个小时之内即可被递解出境。新政策还要求增拨一亿七千多万元预算，用于加强边境巡逻及扩大境外机场例行检查等措施。

此新政策甫出，虽立即受到美国许多亚裔团体、移民律师及人权、宗教团体的反对，但却实施在即，无从更改。

为了防范越来越多的中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海岸防卫队也开始派飞机前往外海巡逻。海岸防卫队的飞机对海岸以外大约十三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当发现可疑船只后，即会立即向海岸防卫队总部报告，总部会派遣一艘快艇前往调查。

与此同时，饱受偷渡问题困扰的加州州长威尔森也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现有法规，停止向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教育和其它服务。据他估计，仅在加州洛杉矶一地就居住了将近一百万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加州的纳税人每年必须付出二十三亿元来为全加州的非法移民提供各种服务。

但是，在容纳非法移民的问题上，加州其实已开始渐入佳境。比如，移民局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就全美而言，非法移民最多的虽仍是加州，纽约位居第二，再其次是佛罗里达州、德州和伊利诺易州。但加州的非法移民在过去的六年內从占全美总数的50%减至40%，与此同时，纽约市的非法移民比率却从原来的10%上升至15%，成为夺目的“后起之秀”。

虽然相信“金色探险号”所造成的震撼在近期内将有一个了结，但未来美国的移民政策更深一步的发展走势还要受经济大环境是否持续低迷的影响。如果美国的经济状况在近年內仍不能有大的好转，那么日益高涨的反移民言论无疑将更多地转化成反移民的法律。

事实上在美国最近开始实施的一些有关社会福利享受方面的法律中，就已出现了连绿卡持有人都不能享受的不少硬性条款；而且在即将实施的一些与人道问题有关联的法规比如医疗保险保护法规一类的文件中，第一个考虑予以“不理睬”的，就是非法移民，这种更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美国民

众反移民情绪的人道水平线。

在经济原因和人道原因的争执中，美国人觉得他们得先顾肚子。

同是在 1993 年加州州政府提出对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吃其不消”之后，在 1993 年年底，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更是宣称由于对非法移民的抓堵不力，佛州将控告联邦政府，除非联邦政府答应偿还佛州州政府支出的“照顾非法移民”的费用。

紧接着，在一个月之后的 1994 年 1 月份，纽约州议会电公布了一份有关州内非法移民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合法及非法的移民每年使纽约州耗费 50 亿美元。这份名为《我们拥挤的海滩》的调查报告，希望联邦政府中止新移民入境，“直到弄清楚移民对美国的影响为止”。

据这份报告估计，目前在纽约州内约有 49 万非法移民及人数更多的合法移民，这些移民与原住民争用州内的福利救济、教育及司法系统的使用等项原已告紧缺的社会资源。纽约州政府威胁说，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目前的移民政策，纽约州也将可能参加进控告联邦政府的行列中。

1993 年 8 月的一天，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一片长满灌木丛的山坡上，三位美国人把一张张崭新的十元美钞分发给闻讯而来的任何人。

此举一出，立刻引发哄动。

此大排长龙的“任何人”几乎全是从墨西哥偷跑进入美国境内打工的非法移民，他们中有的人一拿到钱后，立即跑到附近的食品出售处去把十元美钞换成食物和饮料。有人在当真毫无缘由地拿到自己那份后，旋即公开表示“觉得怪异”。

但相信此种“怪异”注定只此一次，因为三位散财人是三位行动艺术家。他们散发的每张钞票上都有三位艺术家的签名。此次边境散钱的闹剧在这三位行动艺术家眼中据说完全是一种实验艺术表现，他们说，散财本身就是在“身体空间、知识空间和公民空间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和政治宣言”。他们宣称：在美国社会大众纷纷责怪非法移民耗用纳税人的钱和公共服务时，他们所要表现的是非法移民的实际角色。

这个实验作品所耗费的钱部分来自联邦艺术基金会的赞助。艺术家用五千元完成了这个行动艺术作品。五千元中，他们用五百元印制传单及复印钞票存档，其余的钱全部直接递送给非法移民。

这三位艺术家对非法移民在美所扮的角色持同情态度，他们认为：非法移民大多努力工作，购物时又和所有美国人一样交纳购物税，对美国经济有所贡献。

“当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变得不理性时，艺术家就必须变得理性起来。”他们说。

25. 你尤其不能评说别人的暗皮肤

到美国多年，太多地听到周遭先我来美的明反对我说他们自己来往的朋友全是美国人，这些人往往爱大声地宣告同样的一句话：“我一般是不和中国人来往的”。更有甚者还会添上一句“我现在一般很少说中文”。初听这种话的时候，我往往自己在心里会不由自主地为对方与我的对话形势不由自主地内疚一下。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内疚其实不过因为自己是一介常说中国话的中国人罢了。

意识到此之后，我开始对上述人等极端反感。

在美国住了几年，这样的宣告面对面地听了无数次，心里暗自觉得生就一张黄脸在美国这类中国人面前有点费事。

我无意暗示别人不能做这样的宣告，只是和这些人聊这些话时大部分时间鼻眼相对，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来自同一血脉的呼吸，这么直露无藏的话和自天而降的藐视，让我不知接句怎样的话才既不伤讲者的成就感，又无损于我做人的最后底线。

种族歧视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各族裔社区心头令其自卑又激其自大的一块沉重。这个至少在美籍华人说来已是自百年之前就开始尝受的不快，多少年来不但是美国历朝的“头痛”，也是近代导致无数次社会动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不仅限于“歧视”的温和了，变得充满火药味。

在各种族裔的纠葛之中，黑白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尤其古老而意义深远。早年间美国，即使是黑奴时期之后，公共汽车上也还曾划分黑白隔离的乘车区，并且也曾有不许黑人使用白人餐台的制度。这种划分虽然已被破除，但黑白之间的“高低”隔阂仍几近烙印地存于民间。在纽约等移民聚集区，严格他说，黑人普遍地在心态上是不想和白人过下去的，他们无疑是深知自己和白人在状态上是有着千万不同的，但相信是由于祖上习惯的原因，他们平素对白人的举止相对收敛。

但近十几年来，由于黑人家庭的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使得黑人在各种压力之下开始不顾规矩。近十几年来，由于里根、布什政府在执政中努力劫贫济富，使美国社会中的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更趋严重。从1977年到1989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幅中有70%为最富有的1%家庭所获得；最贫穷的40%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就已相对贫困的黑人家庭是最大输家。

据统计，在九十年代美国中等白人家庭的资产净值是四万四千四百零八元，而中等黑人家庭的资产净值仅是四千六百零四元。两者相差几近十倍之多的悬殊，使得黑人成为越来越不具理性的族类，邪火一触即发。

贫穷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得黑人的犯罪及居住区脏乱等问题成为不少美国大城市内的严重社会弊端。多年来美国黑人饱受各种轻慢究其原因也有很大部分来自其“不争”的咎由自取。

在纽约找房居住，或是选择餐馆工作，“附近黑人多不多”几乎成为第一要件。黑人少的地区房租自然高些；餐馆工作中，位于黑人区的餐馆请人也相对难些，工资也须付得比其它地区高些。黑人居住区域的扩张使得白人、亚裔人种纷纷“敬而远之”，时常是在整幢大楼中，只要进住的住户中有超过五户的黑人，该楼的楼价就会因此而有所下跌。但也有特别的例子，纽约的本森赫斯特地区是以意大利裔为主的白人居住区，由于黑人社区近年来的扩张，本森赫斯特的居民下愿意被黑人波及，遂联合起来一致“抗黑”。

在该地区内，黑人一旦进入，便可能受到极不礼貌的对待，曾有当地地产商试图将黑人住户引进社区，但地产商的办公室玻璃立刻被人砸烂，求售的房屋也被烧毁，其架势不容太多话。

其实说到底，对黑人种种的不敢恭维倒不是由臆想而出，而是来自经验。曼哈顿区内著名的黑人聚集区哈林区是市内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地区。近几十年来，随着黑人移民的增多，黑人居住区域也在市内各地蔓延，引起其它族裔的恐慌。在曼哈顿地区，盛传一百多年前的哈林区是市内居住品质相当高尚的地区。后来由于黑人的迁入，白人们开始撤离。几十年下来，由于哈林区治安日恶，无数曾在当地置产的屋主将房屋求售不能、白住不敢，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弃屋而去。八、九十年代的哈林区街头遍地污泥浊水，黑人居民成年累月地仁立街头，吸毒、贩毒、打斗、打劫等犯罪现象在社区内是绝对的家常便饭，使得许多人提起哈林区即“敬畏万分”。华人中偶尔有人驱车路过时，同车人也会相互提醒关严车门车窗，以防黑人“热情过度”，开门进来向你强行要钱要饭。

由于大批屋主弃房而走，哈林区内无主房屋、空置房屋到处都是，是纽约市内房租最便宜的地区。一些胆大的中国人舍命挣钱，在区内开设中餐外卖店，但店内顾客付钱买饭区与厨房是严格用防弹玻璃分开的，顾客付钱或领取食物均须通过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口交接，收款人员与顾客隔着防弹玻璃讲话、算帐。

曾经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画家林琳大着胆子住进哈林区，并将自己的英文名字取为“比利·哈林”，以示对黑人邻居高犯罪率的不介意及对旅居哈林区的纪念。而他对黑人社区的满腔热情到最后并没有得到等同的回报，1991年8月18日凌晨，林琳夫妇在曼哈顿中城为游客画肖像时受到几个黑人的挑衅，双方简单争执之后，结局竟是林琳被对方一枪毙命。消息传出，全市震惊，但相信最震惊的还应是林琳本人，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对他满怀族裔和谐、世界大同理念的最大戳伤。

极富戏剧性的事是1993年才卸任的纽约黑人市长西丁勤时（DAVID DINKINS）就出身于哈林区，据他自己说，连他这样的“高尚黑人”小时也有小偷小摸的轻微犯罪记录。

近年来，随着贫穷的南美洲移民大批进入美国，美国境内这种“不便言喻”的“恐黑症”有转为“恐南美人症”的倾向。大批来自南美洲的移民在美国各地定居，肤色黄中带黑，生活嗜好之一是彻夜聆听南美音乐，而且犯罪率飞速攀升，大有取代黑人之势。

九十年代初，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种族纠纷是在1991年发生的洛杉矶黑人暴动案。

这次暴动的肇因是1991年3月3日黑人夫业建筑工人罗德尼·金恩因为驾车超速行驶，被20多名警察在高速公路上追逐了四、五十分钟之久。经由多面围堵，金恩不得已停车后，四名白人警察用警棍大力殴打金恩数百下之多，并用脚踢他。这一切都被当地居民乔治·郝莱代用家庭摄像机录下。

第二天，郝莱代将其拍下的长达八十一分钟的录象带以五百美金的价格卖给了KTLA电视台，播出之后，全美震惊。时任总统布什表示，看后觉得“恶心而羞耻”，他表示“不知如何向孙子解释”。

而全美黑人对此录相带的反应更为强烈。

3月6日，洛杉矶警察局长盖茨为此事进行公开道歉，将此事称为警察

的“偏差行为”。他的道歉随即被视为敷衍，要求他引咎辞职的声浪高涨。

3月11日，有关此案正式进入程序，洛市大陪审团开始对整个案件中的证人展开听证。至此之后，整个案件在公众的超级关注下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调研及相关的法律过程。其中经历了洛市警察局长涉嫌包庇涉案白人警察而受到洛市市长及市民的反、洛市改革警政规章、重组陪审团（原十二名陪审员中没有一位黑人）。到了1992年4月29日，陪审团作出的判决是四名打人的警察无罪，只保留对其中一位警员过度使用警力的控诉，但此项也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

判决一公布，群情大哗。

当天夜里，洛杉矶的黑人们开始四出烧杀抢掠，而洛市警察则完全不出动。三十日一整天都是暴动，黑人及贫穷的南美州人在街上任意砸烂店面入内抢劫，并且放火焚烧商店。30日当天就有17人死亡、450人受伤、1086处大火。当天，加州州长签署命令，派四千名国民兵进入洛杉矶“镇压”。但由于国民兵动作缓慢，洛市烧杀抢掠的局面并没有被控制住。5月1日，烧抢的行动更加严重，并已从中南区向外扩张，波及好莱坞、比华利山庄、观光区圣塔蒙尼卡等地。到了5月2日、死亡人数已经增至50人、受伤人数达2116人（其中226人生命垂危）、1291处大火、9476人被捕，整个财产损失高达五亿五千万美元。

在眼见危局出现而制止不力的情况下，总统布什下令紧急加派四千名正规陆军、一千名联邦警察和FBI人员火速进驻暴乱地区进行平暴，到了晚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局面才得以控制。

虽是如此，洛杉矶的五千座建筑已然被烧毁、三千一百多家商店也已被抢劫一空。

洛杉矶暴动事件的发生，向美国朝野昭示了这样一个信号，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已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为阻止种族歧视现象的蔓延，美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遏制工作。美国现时的法律规定，所有歧视案件的受害人可以要求政府的检控当局，向对方追讨不超过五万元的歧视赔偿。联邦政府于1994年开始实行强制性的种族合居的分配居住行动。1994年1月13日，联邦政府在警察的护卫下向位于德克萨斯州、过往六十年间没有一位黑人永久居民的维尔度镇的国属国民住宅中，输送黑人住户。实行强制种族合居的行动。此是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联邦政府首次实行如此强烈的有关行动。

但这一系列举措成效究竟如何，美国朝野未敢乐观，虽然历届美国总统都在此问题上不敢有须臾放松，但几乎任何一位美国人都承认，这个古老的美式问题从前是、现在更是美国内政中的一颗要命的“连环雷”。

26. 以亚裔的名义

不少在美多年的亚裔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不论你如何努力，你仍会因为外型的关系被美国人认为是外人。在这一点上，欧洲的移民就没有什么麻烦，如果说他们的第一代在生活形态等问题上还有需要适应之处的话，那么到了他们的第二代移民则已与美国人情景交融了。但对亚裔人，哪怕你是第四五代移民，哪怕你早已是说不出自己祖上原籍的美国公民了，不少美国人在见到你时第一句话仍可能是问“你会讲英语吗”？或者“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就

曾对此有如下回忆。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曾出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在国务院大楼中的盛大午宴。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明及夫人当时也在美方被邀之列。但等在美国大名鼎鼎的贝氏夫妇出现时，傅建中听到国务院的接待人员先人为主地趋前寻问其是否是中方邀请的客人。

这种下意识的举动其实正是在美亚裔因为面孔关系导致的“外人效应”。

这种效应让为美国纳了大半辈子悦的亚裔美籍人士一向心里不平衡。

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1992年公布的普查资料显示：在十美被调查的人口中，德国后裔最多，每四个人中即有一人有德国血统。华人在美的人数则名列第二十五。华裔也是亚太高中人口最多的族裔。

早年间的美国亚裔移民在与他族相处中，基本上以忍让为本。多少年来亚裔的这种“不争”的心态，几成标志。但亚裔与美国其他族裔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磨擦仍时有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在有关政策制定方面的排拒亚裔的倾向也时有发生。而在此之中，华、日等裔侨民所受的磨难相对为多。

在华裔方面，三十年代曾任《纽约商报》主编的朱夏在其著作《美国华侨概史》中总结说，早在美国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末叶美西金矿采掘及修筑铁路工程完工后，美国的排华运动即开始由民间情绪转为官方政策。当时即由加州国会议员促成了排华法案的通过，长期禁止华工来美。“所以1924年的移民法律，在施行国族来源的摊额制度下，就根本没有华人的份儿。而且规定除了土生土长之外，华人没有归化入籍的资格。不仅如此，还规定华裔的外籍妻室不准于1924年7月1日之后的十年内来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虽将排华法律取消，但华人的移民额也只剩有一百零五人，形同虚设。”再加上早自华工在抵美掘金时美国民间就有的自发反华运动，也就是说，虽然华侨在美已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却曾遭受百年以上的受排挤恶运。

但无论当年中国人参与掘金、筑路功高德重，在近儿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华人移民空前大量的涌入，单就华人移民而言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市政服务等方面对美国原住民都还是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这一现象在加州洛杉矶蒙特利尔市相当明显。

自七十年代中八十年代初，大批华裔尤其是台湾移民蜂拥进入蒙市，致使该市在几年之中迅速成长为新兴的中国城，人称“小台北”。在这个新移民与原住民在社区族裔比例迅速转变的混乱时期，蒙市的许多问题成为地方乃至全国的头条新闻。比如当地人民对于因人口剧增而变得拥挤不堪的交通引发了愤怒；富裕的华裔大买房地产，以致把当地的房价炒得高到原住民不能负担；在公共学校中，华裔青少年与其他族裔学生频繁打斗；不少华人新

移民由于缺乏公共道德，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在行车时不顾一切地抢车道、不注重个人卫生形象、不参加无薪公益活动等等都使当地其他族裔大为不满，成为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大问题。

这种现象造成的族裔反感，为华裔在当地的生存带来极为不利的反面条件。而且，这种族裔间的反感愈演愈烈，甚至于连台湾方面以同际华人俱乐部的名义捐给蒙市图书馆两万本图书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好事，也成为一场争端的导因。

在美西如此，美东地区的华人重镇纽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不快。且不说华人社区内经济自成一体的现象多少年来就广为各族裔垢病，比如，在社区就业问题上，华人开办最多的餐馆、杂货店等行业中非华裔的雇员多少年来几乎全无，只是在近几年中才出现为数极少的南加州贫穷移民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体力工作。而且，华人的各种生意中，因为只做华人生意所以店招中只写中文的商店为数可观，这种现象使得包括纽约华埠、法拉盛及洛杉矶蒙特利尔市等华裔聚集地区的原住民们越来越强烈地抱怨他们在街头看到太多不知所云的中文店招。

在美的亚裔遭受排挤的历史中，在美国的日本侨民的遭遇也比较著名。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政府曾因为战争派别原因，把在美居住尤其是在西岸居住的日本人拘禁在集中营中，或将其迁往中西部其他州内。后来，美国政府对此十分内疚，而且自五十年代开始，这份内疚与日俱增，美国政府一度对在美的日裔进行了十分真诚的补偿，尤其是在住房、就业等生活的实际问题上更是对日本侨民恩惠有加，提供补偿性的优待。当时，连带得不少仅仅因为和日本人长得相象的华人也跟着受益。但等到后来，日本人在美国的经济势力庞大起来，尤其是日本汽车工业等先进工业对美国市场的侵入，使得美国的尤其是靠汽车等工业支撑经济命脉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极强的仇日情绪。

更兼日本人近二十年来日益财大气粗，在美国大肆收购美国公司乃至在美国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使相对贫穷的美国人产生难于分庭抗礼的无力感，心里不是滋味，和当年中国人因为和日本人长相相像连带受益一样，这次中国人乃至几乎所有亚裔又连带受开了害。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陈果仁事件。

1982年6月19日27岁的华裔工程师陈果仁携同三位友人去酒吧饮酒，庆祝他即将结婚。陈在酒吧中闹小事与两位失业的白人父子发生争执。当天稍后，陈在一家速食店又与该二位白人父子相遇，该二位便尾随陈走出店外，从汽车内取出棒球棒将陈击昏。送医院抢救后，陈果仁在医院昏迷四天后终于死亡。此事发生在号称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据报道陈氏是被肇事的白人父子当成日本人而遭活活打死。然而，恐怖的事情还是后来发生的：该案的承审法官查尔斯·考夫曼于次年的3月15日判决对两名只做了一夜牢房的凶手罚款一万零八百元，并支付七百八十元的诉讼费用。他让该二人各自先交了三千元的罚金，然后以缓刑的名义开释了。

判决公布，舆论大哗。按底特律当时的法规，杀死一条狗都可能被判刑三十天；一张交通罚单也可能导致当事人被判刑九十天，陈氏一条命相比之下让人觉得不象话的轻贱。

为此，华人社会立即成立了“美国公民正义协会”，在全美范围内寻求声援，为死者要求公道。联邦司法部迫于群情不得已进行了重审。华裔导演

崔明慧后来据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谁杀了陈果仁》，此片获了大奖之后，陈氏事件家喻户晓。

后来，在 1989 年，北卡罗来那州的华裔卢明希又曾被误认为是越南人而遭人杀害。

亚裔人士因面孔相近的关系，在美国每一个族裔纠纷中，感觉中同在一条船上。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美亚裔与其他族裔间的矛盾则以韩黑裔冲突为最著名。这种现象尤其在 1991 年洛杉矶暴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洛杉矶暴动在明面上是黑白裔之间的族裔冲突，但纵观全过程，黑黄之间的种族积怨其实成为第二大局面被揭开。在此次事件中，黑裔暴乱者似乎有一个共通的默契，那就是在沿街进行的“打砸抢”中，专挑韩国人经营的店铺下手。据警方透露，在洛杉矶地区遭到破坏严重的前 500 家商店中，有大约 100 家是韩国人经营的商店，在暴乱发生的几天里，韩国男人手执各式长短枪枝向任何一位未经允许就进其店内的抢劫者一概开枪。

韩国人生性暴烈，虽长相与中国人差不太多，但其强悍的性格普遍而言却远在中国人之上，相当出名。在洛杉矶种族暴乱之前，就曾有一出关于黑韩之间的争端出现。这件事情是一位黑人小女孩在一家韩国人开的店铺内买东西时顺手偷了一块巧克力糖，等到其去付账时，收款的韩裔老板娘声色俱厉地要求小女孩把巧克力糖交出来，双方遂为此爆吵。吵在气头上，韩裔老板娘竟从柜台后拿出枪来一枪把小女孩打死了。

在纽约时，我也曾经见识过韩国人动气时的样子。有一次，我在纽约街头看到不少人围做一团议论纷纷，走近细问才知道是在 5 分钟以前，一个黑人在街头从车外抢了一位正驾车等待红灯的韩国妇女的皮包，哪知这妇女登时恼怒异常，把车在街当中就地一煞就冲出车来一路狂喊抓贼。据说那黑人多半是抢惯了不敢出声的亚裔女人的东西，一见这位驾车人如此冲动，慌忙中虽跑了几步但紧接着看到满街的注目礼，倒吓得不知该怎么动了。

那妇女在抢回自己的提包后又在众人围观之下痛斥了该黑人一气，才放其一马挥手喝令黑劫匪走人。

相信也正是倚仗自身的这种刚烈性格，令其他族裔人士敬畏三分的美国黑人区中，最多的商店就是韩国人开的铺子。由于多半韩裔店主基本上自请家人或韩裔熟人在店内操持，而且一向对进店行为不轨的黑人不择言辞，一概痛斥，因此不但被黑人社区指为只知赚黑人的钱下作回馈，也在无数的下层黑人中埋下仇恨隐患。

不光是在洛杉矶，黑韩裔之间的矛盾在纽约也一向激烈。自八十年代末及至九十年代初，纽约地区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纠纷。闹得最剧烈的是发生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佛来布什大道附近的韩裔“红苹果蔬果店”的黑韩纠纷。事发起因是一位黑裔妇女因为涉嫌偷吃店内水果而与店员引发肢体冲突，随后招致当地整个黑人社区在该店外集体示威，示威者阻止进店购物者购物，并扬言一定持之以恒地闹下去，直到这家店关门为止。

为了摆平此事，当时纽约时任市长丁勤时曾出面进行调停。华人因为与韩裔同是亚裔的关系，还曾组织大批人员前往购物，以表示声援。但无奈“红苹果”最后还是没能保住，不得已而关闭了。

在洛杉矶的黑人暴乱事件发生时，纽约的一些在黑裔社区内设店的黑裔深知韩黑之间的积怨，为了保护自己，还曾在自己开设的店铺外挂出“黑人

店铺”字样的标语牌，期望如若纽约的黑人连带突发暴乱，能得免洛杉矶韩裔店铺所受的损失。

与此同时，更真实的事实是，随着亚裔移民的不屈不挠地持续增长，亚裔一度曾有的“模范少数民族”的头衔开始下保，亚裔犯罪活动也成为美国的重要犯罪问题摆进情治机构的卷宗。

在七十年代以前，亚裔在美国的情制机构信誉大致良好。与在美国的其他族裔相比，亚裔在早年间除了因身材的关系常常成为大城市抢匪的主要袭击目标外，基本上是以不咄咄逼人的姿态存在的。但自七十年代起，美国媒体上开始出现有关中国城青少年帮派活动的报道。到了八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亚裔犯罪活动异军突起，一举成为美国情制单位的重点观察目标。

在八十年代初期，在美华人甚至还曾一跃为美国重点注意的国际恐怖活动活跃人种，在那个时期之所以获得这种“殊荣”全是因为台湾方面的台湾独立活动支持者与台湾执政党之间的内斗外移所致。加州总检查署 1981 年向州议会提出的在美国国际恐怖活动回顾报告中，就曾首先提到“台湾极端份子”的孽行，这些孽行包括了在 1980 年一年中这些极端份子于在加州进行的 5 件恐怖活动，此数字几近加州当年全部国际恐怖组织所制造的 12 件爆炸与暗杀活动的一半，这类活动中的目标“大小通吃”，爆炸目标中既有民宅也有航空公司。

在这之后，在美的亚裔犯罪如开闸之渠，一发不可收拾。美国联邦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 1992 年 12 月 30 日曾发表报告证实说；从事贩毒、暴力抢劫和其它非法活动的亚裔犯罪帮派组织，已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威胁。报告在分析中指出：九十年代中，亚裔的犯罪活动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并且有所分工，基本上“各做一摊”。比如华裔帮派已主宰了海洛因进口美国的市场；流窜不定的越裔街头帮派分子常以极端暴力的手法打家劫舍；日本帮会则致力于在美国洗钱和购置地产。

据纽约市平民犯罪委员会的统计，六十年代中期，纽约全市每年平均共有不到四百件谋杀案，但到了 1992 年，全市的谋杀案件已增至二千零二十件。其中尤以辖区囊括华埠的纽约市警察局五分局的谋杀案统计数字为最高，该局 1992 年前八个月的谋杀案数字已达到 1991 年全年的数字。

面对凡此种种的麻烦，美国执法单位正面临着特殊的困难。随着亚裔犯罪案件的增加，纽约地区几个亚裔聚居区的警察分局均成立了专门对付亚裔犯罪的专案组，由长期在社区活动的高级华裔警员担纲。虽如此，在美国的情治机构中，仍普遍存在着办案人员对亚洲情况严重不了解、亚洲语言人材严重缺乏的现状，跟不上亚裔罪案近十年来的飞速蹿升。比如说近年有大量中国大陆福建移民涌入纽约，但整个纽约州内，无论是联邦、州，还是地方级的执法官员中仅有一人能操福建话办案。美东地区一城市在起诉一桩有组织的亚裔犯罪活动中，因为办案人员中缺乏能懂亚裔语言的人，无法翻译窃录下来的电话录音，致使整个案件拖了一年之久。也是因为“病急乱投医”，美国的有关部门甚至建议把 1997 年以前想离开香港的香港皇家警察成员作为专门人材招收进美国有关机构中，以充实对付亚裔犯罪力量的不足。

伴随着亚裔犯罪量的增长，相对沉寂了几十年的美国境内反亚裔暴力的现象开始普遍“死灰复燃”。据纽约市警察局统计，自 1985 至 1990 年，市内反亚裔暴力事件共上升了 680%。更随着在亚裔犯罪活动中，一些华人卷进毒品交易、偷渡交易乃至卖淫交易的事实陆续被揭露，使得不少美国人

对华人极为反感,这一倾向,使得大多数规矩做人的华裔也连带受害。自 1993 年夏天中国“金色探险号”偷渡船在美国被拘押后,华人的整体形象更是受损严重,居住在紧邻纽约、号称“花园州”的新泽西州高级住宅区的部分高收入华人居民,在稍后就曾纷纷接到来历不明的恐吓函,要求华人家庭搬离新泽西市。这类恐吓函措辞恶毒,把在美华人称为“躲在宝马车、奔驰车后面的罪犯”,“利用开设洗衣店、餐馆和按摩院来欺骗美国”,“并带着大城市的犯罪帮派俱来”。函中还表示,如果华人居民不在 1993 年夏天离去,那么“将到处留下华人的骨头和鲜血”。

而且,非但如此,九十年代在纽约曼哈顿也开始出现以清算亚裔为主要目标的诡称爆炸案等案件,亚裔在美国与其他族裔的关系前景面临情势严峻的考验。

有一天,在一个华人社区内举办的新移民法律权益讲座上,主讲人一进门就不无心酸地插科打诨说:“早年间中国人移民美国是为了发财,现在如果再移民则是在找死。”

27. 白人至上

在美国的各种种族争端中，有一句话听上去极不合逻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其精辟。这句话是：你唯一可以用以出气而不犯种族歧视法的人种是白人。

当然，这种“出气”的定义是以不构成刑事

责任为底线。

也就是说，你怠慢几乎任何族裔的人都有可能已属作奸犯科了，但怠慢白人的性质则只限于“怠慢”本身。

在被争取族裔权益，乃至争取人权的各种势力顽强扭曲之下的美国现行法律，已开始有太多的白人惊呼在不知不觉中，美国最不被法律保护的人种就是白人了。

在这个题目之下，美国白人在法律的框定下实际上的确是有苦难吐的。任何事情弄到极至时就会有平衡的东西出来，对美国白人无可否认的一些天然优越，这种游离于保护之外倾向的无奈也可算是一种平衡吧。

比如说，在美国占总数三分之二的大学中均设有专门提供给少数族裔学生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虽只占有所有奖学金的 4%，但白人学生是不具申请资格的。而且在纽约市，黑人市长丁勤时在带着浓厚的族裔色彩于九十年代初期上台后，对外打出和谐族裔冲突的旗号在市内进行了不少让利于少数族裔人士的优惠行动。比如说发展了市政府给少数族裔及妇女主持的商业特别贷款计划，将这笔无分族裔纳税人的贡献划分给了设定族裔的部分人，把白人剔除在外。而且，在九十年代中，美国的不少为了使族裔矛盾得到缓解的最终办法总是以牺牲白人的利益做为圆满结局的。

非但如此，白人的须域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小。在美国少数族裔越来越多自认歧视的不满声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为了吸引各族裔市场及力量，开始谋求在自己的用人政策上兼收并蓄，利用各族裔面孔来做调和。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各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台一类以直观形象为主的领域可说是众目所矚。在九十年代，有大量族裔面孔的电视台会被认为是“正常台”，如若不然则一定会被指为专营“白人一统天下”的“一介顽石”，如此一来族裔问题反倒被搞得不甚自然。

美国的一位在总统大选中曾和布什对阵的共和党人布肯南（PATRICKBUCHANAN）一向主张严格移民法，虽然该人在选举中失利，但他在对美国人口结构的预测，给不少美国人一个惊吓，更令不少美国白人毛骨悚然。

他说，1950年，美国的人口仅为一亿五千万人，其中 90%是欧洲裔；而今日的美国人口已成为两亿五千万，但白人的比例下降为 75%。依照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到公元 2050 年，白人在美国将接近成为少数人种。

相信这一预测不仅是美国白人的恶梦，也是大多数对美国心存向往的中国人心头的一个“不高兴”，因为美国如果不是白人的国家，中国大众对它就失去了兴趣。不然的话，北京的使馆区中应是非洲或南美洲国家的签证最是一纸难求。

美国最正统的白人其实是 WASP，这四个英文缩写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恩格鲁萨克逊后裔的白人，宗教信仰为基督教。

这种白人在外型上并不难辨认，而且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凭借对欧洲人的肤浅观念甚至直觉予以判定。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富甲一方的洛克菲勒、福

特等家族都属此 WASP 列。其他显赫如肯尼迪家族及在美国财大势大的犹太人富则富矣，但均非“正统”。肯尼迪家族因为是爱尔兰后裔并且信奉天主教，所以虽外型神似，细分起来也是 WASP 的“非我族类”。而犹太人则比这相差更远。

据知美国的哈佛大学早年曾是 WASP 中向学者的大本营。美国著名犹太裔记者白修德就曾经在其名为《追寻历史》（《INSEARCHOFHISTORY》）的回忆录中，就自己在哈佛大学求学时被视为二等公民的经历，做深刻的追忆。

但到了非白人都已经逐渐“蚕食”美国政经商学中的各个要冲的今天，美国白人对 WASP 的强调已经根本谈不上了。太多的美国白人在历经国家的多年移民政策并眼见结果之后，重新开始推崇白人至上的观念。他们开始推行自己的一套社会结构构想，希望把美国人拉回到几十年之前的“白人天下”，其实这种观念的再生不外是白人对当今社会失望的一种宣泄。

在事实上，美国白人迄今仍是美国社会的统领，直至九十年代，这种白人作为主要统辖的局面仍基本完整地存在。美国大多数具有规模的重要企业，仍是由白人主导。如果认真地说，在美国宣扬白人至上的观念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应是不具太大的阻力的。也就是说，白人至上的思潮在美国其他族裔中也不是没有其社会基础。

单以在美华人为例，几乎每个人都把与白人靠近认作余有荣焉，不但在居住地区的选择上、工作环境的挑选乃至工作同事的搭配上，几乎无处不以白人做为夸耀的第一要件。而且几乎在每一位居美华人心目中，除了白人，自己一类的黄种人就是最高级的人种了。这种甘居第二的下意识，其实正是未经雕琢的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翻版。说出来是一介耻辱，但品下去却绝对真实。

事实上，美国居民中人种的“级别”非但在华人心目中，在其他各族裔眼中也是有鲜明排列的，这种排列桌面上不说，却是人人心中肚明。这种排列是纯种白人、生活起居完全美国化了的犹太人、亚洲人、南美洲人、黑人。这种约定俗成的划分方法从前到后基本上是既按肤色分类，也参照族裔犯罪人数所占比率。

更何况这种排列还有着房地产价格等硬指标的确认，原则上说，上述排列顺位也基本上是美国多族裔聚居城市中因人种因素使房地产价格依次渐廉的排列。

鉴于美国近年来种族积怨过多，族裔之间的仇恨已从过去的怨气升级到事件都带有血腥味的新境地。更有鉴于西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等地的白人对外族移民的仇杀行动，刺激美国白人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也开始把仇视移民及宣扬白人至上当成重大己任，不择手段地希望能达成目的。例如，1993 年 7 月份美西捕获了八名白人至上主义分子，这些人涉嫌阴谋炸毁洛杉矶的一座规模庞大的黑人教堂并杀死因挨白人警察殴打而闻名遐迩的黑人金恩，以期在全美掀起种族暴乱浪潮。

在纽约华人聚集地区，民众发现自 1993 年开始，区内的电线杆上、商户的门窗乃至公共汽车的车窗上，都出现了白人至上团体散发的招人加入的贴纸。贴纸上留了一个纽约市的联络电话及一个西维吉尼亚州的联络电后，供民众联络之用。民众如果打纽约州的联络电话，可听到三分钟的电话录音，内容是为白种美国人提供相关“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并提供有意加入的成员多达三百种有关图书及杂志的目录。

28. 形形色色的歧视

在美国，除了种族歧视之外，有关歧视的“雷池”还有无数。

比如你去找工作时，当你出示了临时居留证后，负责招工的主管却对你说，他们公司只招收美国公民做员工。

你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你的房东借此拒绝为你维修房屋。

你去应征一份工作，但该机构的主管却在接待你时告诉你他嫌你年纪太大或因为你是个女人，他不想把这份并不受年龄或性别等因素限制的工作给你。

你的老板因为你讲英语有口音而拒绝继续雇用你。

凡此种种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各方各有道理的状况，在美国则是居高临下的一方违反了反歧视法的。

在美国这种聚集了过于复杂族裔、性情乃至习惯人群的地方，各种法规也在年复一年中得到了稀奇古怪的完善。比如说，美国的诸多法规中对根本就是非法偷渡而来的非法移民的权益也从人道的角度来以法律保障，如此，让人难于分清究竟是应该守美国的国法还是应该享受美国的人道权利。

在这种对定义中受害人的强力保护，衍生出美国人权观念无所不在的干预地位。

美国的人权局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状况总地归纳为三大部分：一是就业方面的歧视；二是住房方面的歧视；三是公共服务方面的歧视。受此类法律保护，受害者在遭受歧视后一年之内都可以随时可以向人权局投诉。

与此同时，对歧视他人的人绳之以法的方法很多，例如你是个房主，如果你嫌弃房客有一个又哭又闹的孩子，或者你因为房客的族裔关系等原因拒绝了房客的租赁请求后，你如被投诉，你则将付担此一租户后来租到的房屋租金与你当初出租房屋租金的差额。

美国关于歧视的法规说句实话绝对有点矫情的味道，或者说让中国人如我者看来有点矫情。这类规章中不少条款的过分程度使人常常不觉疑窦丛生。因为，一个过度的法律在制定的同时，必定是影响了另一批人的利益。那么，被这种过度法律损害了利益人等的人权问题其实就在这种维护人权的法规中被断送了。

也正因为美国的人权观念过于发达，因此，才进美国国门的人尤其是对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而言，最初得以窥见美国人权观念的全豹时，感觉竟是如坠五里雾中，常常觉得匪夷所思。也正是由于美国人权概念的不同凡响，进入美国的世界新移民往往到了美国得到的最初的惊诧，是对自己权益的再认识。

美国人对歧视的观念十分奇特，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曾在市内“翻”出一种市内不少服务性行业都对女性顾客有多收费的行为，其中包括洗衣店内对洗涤女人的衣物时，往往比男人衣物为贵，这种事情被披露出来之后，店方违反的竟也是性别歧视法规。

但这一举措在一般中国人的衡量中，一定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性别尊重”。

如今，这类法律被美国人玩弄得日臻完善，人人都不放过个中的任何机会。曾就职于美国加州意外保险公司的女职员拉娜·安勃斯特 1993 年 11 月

赢得了一场较具典型意义的官司，她控告她原工作的公司因她怀孕而解雇她。她说她的雇主曾威胁她说，她如果怀孕就会被解雇。后来，当她果真拿出有关的证据证明她在 1991 年告诉她所任职的理赔部经理她怀孕了之后，她的工作考绩就被列入“留公司察看”之中，60 天后，她的公司以她工作表现不佳为由将她解雇。

结果，她赢得了一百二十万元的情绪抑郁赔偿金和一百五十万元的惩罚赔偿。

美国八十至九十年代著名的集体性别歧视案是加州幸运连锁超级市场一群女工状告雇主不重视妇女权益，只选择男雇员升迁的案件。此一案件缠讼十年，从 1983 年开始，也是直至 1993 年才出现结果。

十年前，一群在幸运超级市场北加州 188 家连锁店中工作的妇女，向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集体诉讼，对该店一向将女职工分配做收银员和糕饼熟食部服务员的做法表示不满。她们表示，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她们失去了得到培训和升迁的机会。

此官司一闹多年，劳资双方各不相让。资方坚持自己没有违反民权法，劳方却举出大量事例证实自己的诉讼理由。比如，一位在“幸运”工作了 21 年的女工黛安·史其尔斯基就作证说，她和她的儿子曾一同在超级市场中做收银员，但她的儿子在不久后即得到了在职训练的机会而得以升迁，她却一连做了数十年的收银员。

这场官司最后以资方同意庭外和解收场。

结果是该超级市场方面同意赔偿七千五百万元给众女工，并将投资两千万美元在建全该公司男女平等措施上。喜讯传来，在 1983 年至 1993 年期间在幸运北加州连锁店服务的一万四千名女职工人人有份。这笔赔偿金按女工年资深浅制定偿金，每人所得从一百元到五万元不等，每人平均可得五千多元。

在这种有关人权的法律日益被普及中，新一轮的法规又在纷纷出台。在纽约市，自 1993 年年底开始，一项关于反年龄歧视的新法案开始生效。在这项法律中，在大型高级商店乃至电影院中，民众领着自己又哭又闹的小孩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在超级市场中购物及在几乎任何地方徜徉，也开始受到法律的保护了。纽约市人权局的这项反年龄歧视法规定，任何人如果在公共场所中对此有歧视言行就是违反了年龄歧视法，均将受到最高达十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法律给人越完善就越混乱的感觉。比如在纽约新的反年龄歧视法中，如果嚎陶之中的小孩可以尽性的话，那么该小孩周遭人的饱受骚扰、不能尽兴就不是被人歧视了吗？

从根本上看，美国的一系列反歧视法规真正是属于“劫富济贫”，也就是把优越者的优越截杀，转给自卑者去化解自卑，而这也是美国社会在明面上推崇倍至的一个主旨。

卷三

29. 中西国菜

今生今世我想我最不能改的就是一副地道的中国胃。

在美国境内旅行，最不能忍受的不是长途跋涉，不是昼夜兼程，而是没有中国菜。也因此，每到一地，我都会自己也不明缘由地问当地人：“附近有没有中餐馆？”而每问每答中，回答竟总是有的，而且是“就在离这里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

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感觉坦然，去不去吃到还在其次，主要是因为知道了“就在离这里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竟也有和我同出一脉的故乡人在煎炸爆炒，连空气中似乎也都能闻到故乡菜浓冽的香气。

也就想起纽约家门口的几家我最熟悉的中餐馆中的几道我最喜欢的菜。

只觉得天地纯正深厚。

美国的中餐馆之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说还能身处异地而牵强附会地要恪守中国人的传统，那么，吃中国式饭菜几乎是唯一既能满足自己也不影响他人的选择。

在美国的华人最可仰赖的行业也就是餐馆业，在全美各稍具规模的中国人社区里，都有类似于中国餐馆同业联谊会形式的组织维护业界利益并维系同业感情。有一个说法曾经是，在美国的中餐馆一年的营业额竟高达90亿美金。

但大凡对美国中餐有些饕餮经验的中国饕餮客，或文雅一点称其为“美食家”，在听到对一家中餐馆的推荐时，一定会跟着问一句：“这是做给中国人吃的那种，还是给外国人吃的那种？”不这么问的人或者是在美国吃得还欠火候，尚不了解美国的中餐业；或者就根本是个“伪食家”。

中国菜在美国享有绝对的声誉，面对这种声誉，强大得使人几乎就相信其是一项天工。

我是在中国人社区住惯了的人，家门口就开着一家名为“东云阁”的粤菜海鲜酒楼，该酒楼生意极好，每晚都开至第二天凌晨才肯罢休。该店旁又是一家名为“东兴”的中国食品超级市场，卖一些即便在中国也不易买到的中国食品。因此，来美国几年中我和我的许多华人邻居一样，过着居家一日便一日中餐的中式生活。也正因此，每次出门旅游，吃的问题成为最至关重要的大事。在正常的状况之下，美式的快餐在我来讲一天内最多一顿，而美式的正餐对我的影响力则更小，顶多两天一顿。因此上，接连几天的旅途生活对我来讲，说身心俱疲不如说肠胃俱疲来得贴切及迫切。

美国境内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中餐馆。但同是中餐馆，端上来的却并不一定是“中菜”。早几年去外州游逛，见到随处都有中餐馆的踪影十分为自己的中国胃庆幸，但等到真下筷子时却觉得十分的不是滋味，只觉得入口一股乱七八糟的味道，菜内滋味既未吃透、配料也稀奇古怪，不知吃下的是什么。

早年间还真就此追问过行内人好几回，行内人回说这种不大能适应中国人胃口的中餐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吃甜酸的味道而出现的“美式中餐”。也有些人说是因为中国餐馆内的外国客人以犹太人居多，所有的菜就都基本上是照着这类人的口味“订制”而成。当年的当时，我还曾为这种“谄媚”中餐微微地气愤过一阵子，认为这是在误导美国人对中餐的认知。但后来看到这种“谄媚”早已遍地开花，也就失却了劳动生气的兴趣。

据在这类餐馆厨房工作的人描述，这类中国餐馆中的做菜法其实是中菜西做，厨房以四种调味料为主，这四种调料分别为甜酸、宫保、鱼香及白色调味酱。而举凡这类美式味道中菜馆的菜单基本都一样，最基本的几道菜不外是宫保鸡丁、左宗鸡、干烧牛、木须肉及北京鸭等，喜欢“中餐”的美国人只要记住自己想吃的菜名，到任何一家中餐馆中都可以要到同样的东西。

在这种店内的菜式制作方法简单而且单调，客人点了菜后，厨房立即可以予以“归类”，或“走鱼香”或“走黑（宫保）”。所有的菜基本上都过过油，只不过火候不一样罢了。如果“走鱼香”就是拿已炸好的菜及配料加上鱼香调味酱再回锅小炒一下。

有一回去纽约上州艺术家聚集地乌兹达克去度周末，在满街黄毛蓝眼中竟也能找到一家叫做“小白熊”的中国餐馆，而且该餐馆竟也是由一票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中国人在服侍招呼。可能是中国人太过稀少的缘故，我们被热情的中国话一直招呼到落座，然后我又被热情的中国后询问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看到周遭座中与街上殊无二致地是一派黄毛蓝眼。想来这家餐馆一定又是甜甜辣辣的那种格调，就故意开了个玩笑问服务生是否有“豆瓣鲤鱼”这种菜。

服务生竟说“有”。

那天我们大概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这“豆瓣鲤鱼”是最后一道上的菜，服务生在端上盘子时强调说拖延了时间是因为临时去买鱼并打电话向会做此菜的其他人请教此菜的做法所致。当时大家不由生出内疚来，觉得这种兴师动众的结果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意。

但等打开盘子一看，才知道这种玩笑开得不好玩，“临时抱佛脚”的好心厨师“佛脚”抱得过了火候，纷举着筷叉的我们不由得对着盘中两条被烧得焦黄一片的小干鱼发起愣来。

后来我干脆自己摸出了识别“真”、“假”中餐馆的窍门。举凡客人一进门就供上一小筐排叉并随带供上一小蝶酸甜透明浆要你沾了排叉吃的中餐馆，生有“中国胃”者的正确做法是立即起身，先请服务生原谅自己鲁莽就座，再象征性地给他一元以下的“歉意费”，之后，乃去。

美国中餐馆的盛景到了1993年却开始经受起空前的一场考验，而且这也是中餐馆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历练。

1993年夏末，美国公益科学中心突然公布了一则研究报告，指称在美的中餐馆中宫保鸡丁等十五种广受欢迎的中菜内钠、脂肪及胆固醇的含量过高。据称，公益中心的做法是从在华盛顿、旧金山及芝加哥等地开业的二十家中价位中餐馆中选出十五种受欢迎的菜肴做样品，将其中的各种配料公开，研磨成粉末后送进实验室做分析。营养学家藉此发现，一道宫保鸡丁菜肴中含有76克脂肪；一盘招牌捞面中含有360毫克的钠。

此研究结果公诸于世后，引起全美范围的哗然，中国人倒还能保证多半不受影响，因为这些人祖祖辈辈就是吃这一类的东西长大的；而近年来已日渐注重食得纯净、严格按照进食营养比例亦步亦趋的美国人则完全承受不住这种来自科学方法的检验结果，致使中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

这份不可低估其价值的研究报告，使美国从南到北的中餐馆生意平均下跌了25%至30%。尤其是在华人稀少的郊区，中餐馆门可罗雀的现象尤其严重。

不少着了慌的餐馆老板曾想出多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以求渡过危局。在芝加哥城中国餐馆同业为此召开的会议上，有人主张向公益研究中心提出告诉，要求赔偿损失。对顾客方面，有人则主张采用张贴告示的办法，告诉民众“中餐馆的食谱是可以改的”，“顾客要我们少放酱油，可以。顾客要我们不要烹炸煎炒改用蒸熟的办法，也可以。”

到了这种时候，中餐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已经不是是否负担“谄媚”后果的问题了，这一文化问题已干脆成为一个能否撑得下去的民生问题了。

这场仗，有得好打，至今都不算完。

虽然我不是中餐馆老板，但想来在美华人中凡是曾饱受中餐馆恩惠的，无一不为此难过不堪。

30. 把根留住

朋友的一个才满五岁的小女孩，两年前才从中国来美。刚来时一身中国大连小女孩的标准打扮，完全不会英语，一口大连腔。

今年再见她时是在她和她妈妈一同去学钢琴的路上。

当时正是雨天，车窗玻璃一概雾气蒙蒙。这个我两年没见的小女孩开始一声不响地用手指在车窗的雾气上写字。她先写了一个歪歪斜斜的“工”字，我当下猜想她下面的字一定是“人”，甚至是“作”。

但她接下去写出的却是“LIKEYOU（喜欢你）”。

我才知道，她最先的那个“工”字原来是个“I（我）”。

当下，整个雨天我都不能心平如水。

到美国的前两年，每当我看到一张中国式的脸上的嘴中一个汉字也吐不出来，就觉得是一种天大的荒诞，而且不可理解。到了后来，这种事见得多了，就对中国式的嘴不再寄予专一的期望。

一般而言，在美国的中国文化除了中国菜为美国普遍认知之外，绝大部分中国文化如果说在美国有所发展，其实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内进行的发展。以往在国内时，常听报道说某人把中国的某项文化传播到了美国，“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之类的说法。到美国之后，知道不少当地的情形之后，才觉得以往的不少报道有所谓“语焉不详”、“含混带过”的毛病。其实所谓的“美国人民”，准确他说应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民”。事实上，且不说一些小的项目，即使是在中国妇孺皆知、一向也称说是“中外驰名”的青岛啤酒，在美国也是中国饮料界的头牌，虽也畅销，但流通圈子基本上也只限于华人开办的商场及餐馆。

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自以为惊心动魄，到美国来也只是华人对其有关关注兴趣。香港歌星张学友轰动港台大陆三地，他在纽约的演唱会在华人社区内都到了出现炒卖假票的地步，但可以说不会超过十个纽约本地的音乐迷知道他是男是女。

九十年代初，有关中国文化方面只有华语在美的“权益”比以往有了不少斩获。比如，经过有心人士的多方奔走，美国大学理事会 1993 年 5 月正式宣布自 1994 年起将中文列入大学入学资格测验第二部分（SAT II）外语能力测验选项之一，与全美高中生见面。这项原本只包括法、德、意、西班牙、及希伯来文的外语测验，1994 年除增设中文外，还增设了日文及“英语做为第二语言”两科。

与此同时，全纽约市的华人几十年来在语言权益上的最大收获莫过于 1993 年纽约市竞选财务理事会终于发行了中文版的系列选举文件，并明文指出，根据 1992 年 8 月国会延续的联邦选举法案，纽约市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及皇后区的华人选民在需要时必须得到中文选票和华语协助。

为监督此项法案的执行，纽约第一次开始提供用华语投票协助的 1993 年 9 月 14 日的民主党初选中，纽约市选举局共派出了 106 位华语翻译前往 60 多个华裔选民集中的投票站协助投票。司法部选举权益司在是次初选中派出至少 22 名专员前往华埠各投票站监督选举过程。华裔选民如对华语协助不满，还可以致电司法部专设的投诉热线报怨。

由于华语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日趋重要，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家长均以让自

己的子弟保持祖上文化为己任，但这种看上去易如反掌的事情在实施过程中却历尽折腾。

协助我赴美的经济担保人夫妇是一对绝对少见的厚道美籍华裔，他们在大儿子杰佛里几岁大时举家赴美，选择在旧金山定居。杰佛里在稍长之后渐渐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变得不会说中文了。我还没出国时就听说，杰佛里在十岁出头的时候和他妈妈讲话已经无法全面沟通了，有一天他想向他的妈妈要一把剪子，但由于不会说中文的“剪子”二字，只好伸出两根手指作剪子剪东西状。

为了保持中国文化在下一代人心中的印象，不少家长可谓努力得处心积虑。我的一位朋友说，有时他几乎准备放弃这一念头。因为坚持下去艰辛太多。他说：“我和我老婆要和数也数不清的阻力做斗争。”他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和他的妻子商量如何改进三个子女的中文进度问题。”因为，只要有半年放任自流，这几个孩子就会把一年前还说得过去的那点中文都忘干净。”他说他的孩子们小的时候还能在家长的督促下学一点中文，但等到他们长到十几岁时，就开始嫌用中文表达不方便而渐渐荒疏掉了。他说：“最近的半年来，我和我老婆已经把要求降到最低，只求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和我们一同说中文。但是，”他苦笑了一下：“这种目标现在看来也难达到了。”

他说他们夫妻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感觉在和一只看不见但无所不到的手在打架，虽深知力量悬殊，但却不得不斗。

在大都市居住的华人家庭相对而言少了一些麻烦，家长们可以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里去读中文，富裕的家庭逢到假期还会送孩子去港、台、大陆等地的旅行夏令营，希望能拉近子女和祖上文化的距离。在这方面，比大陆移民早到美国十几年的台湾移民走前了一步。据台湾派住在美的侨委会服务组、北美协调会文化组及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联合做出的统计指出，全美目前有五百多所中文学校，招收从幼稚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童，总人数多达六万四千多人。

所谓中文学校，其实并不是全日制的主流学校，它是由热心宣扬中国文化的人私人出面筹备及注册、只在每周末或每天主流学校放学后时段及寒暑假开课的学校。中文学校的学生都是美国公、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而中文学校的校舍也多半是租用公立学校的部分或全部校舍，利用公立学校周末无课的间隙进行中文教育。

但这么多的中文学校中，水准难免良莠不齐。

以纽约的中文学校为例，“良”者就有每年能招收几千学生甚至可以自行编撰教学材料的。而“莠”的学校则可能连合法执照都没有，教室就是主办人家里的地下室，可能每年连十个学生都招不到。

但尽管中文学校水准不一，收费却个个不菲。也正因此，在美国要想维持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不是件便宜的事。

由于在美的华裔移民近十年来以台、港人居多，因此，在中文教育方面也以港台方面延续下来的中国文化为准。截至眼下，绝大部分的中文学校都使用台湾方面出版的教材，教授繁体字、并使用台湾通行的注音符号。

记得刚到纽约时生活艰涩，找工作成为每天才翻身起床就涌上心头的头号大事。那时候，我每天例行的公事就是翻看中文报纸找适合于我的工作。有几天正好看到一个叫做“至善”的中文学校征招中文教师，虽说薪水不太

高，但是工作环境无疑清洁高雅。来美前我已是民政部《社会保障报》的编辑兼记者了，并自信在这份行政正局级、时兴编采合一的报纸中于得并不含糊，以这种“文字身世”来教懵懂之中的中国孩子识字绝对胜任愉快。

但天不遂人意，当即播去的电话被立即转给一位“罗校长”接听，该“罗校长”才听我自我介绍了一句就追问了一句：你是大陆来的吧？我当即对他的研判力予以肯定。但紧接着该“罗校长”一口回绝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提出的求职要求。他当时说他正在忙，无法和我做仔细的长谈，我当时脸皮也是极薄，经他浇一头冷水也就未再多说一句话。

再后来，等我当上了当地周报的记者后，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这位名为罗符卿的“罗校长”。刚开始不熟时还不是太好意思开口，后来彼此熟悉了就笑着追问他当年为什么薄情寡意。不想他仍无比认真地说：如果你今天去应征，我还是不能用你，不是你的资历不够，而是我不想我的教师在课堂上随手写出简体字来。而且，大陆通用的是汉语拼音，而台湾则用的是注音符号，两者听上去虽发音一样，在字形上却差之千里。

但在事实上目前纽约的中文学校中已有不少大陆来的教师，在几年的采访生涯中也曾多次和他们交谈，他们告诉我，这两年来纽约中文学校在这方面的“妥协”首先要拜大陆移民的增多，其次要归功于有幸任教的大陆籍教师勤学苦练、处处留心学习繁体字的结果，至于注音符号，他们说“只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搞定”。

不过，认真要谈起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的纠葛来，前述的 SAT II 在为确定中文注音上到还真的出现了一点风波。

其实，有关在 SAT 测验中增设中文项目的腹稿早在 1991 年就产生了。美国大学委员会为此并组织了由 12 人参加的筹备小组，决定试题的大方向和总原则。而设计考题的具体工作则交给了教育测验中心（EST）。1993 年 4 月，当 EST 公布有关的模拟试题并在各地举行中文测验说明会时，人们发现，在听力测验、语法及阅读测验三大项测验题中，语法测验部分被获准使用的注音方法中，EST 选用的中文注音符号为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这个决定其实是根据有关机构 1991 年在对 48 位在美高中担任中文教师使用的中文注音方法所做的调查而来的，这次调查显示，参加调查的教师中有 68% 的人使用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注音。但此一决定触发了无数台湾来人的心气，当时虽有不少中文学校的教务部门立即准备改向学生教授汉语拼音，但更多的台湾侨民赶紧口诛笔伐，从民间到当局派出的有关驻外组织无不行动起来，在这场似乎是在挽救台湾文化及颜面的运动中，热心者收集了来自全美八个州近三百五十位在中文学校任教的教师的意见，要求增列注音符号为语法测验部分的标注符号。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此要求终获 EST 首肯。

与此相对座的，美国大学中的中文教育做为中国文化在美发展的另一个枝干，已有了相当的声势。

在美国的大学里，中文教育的渊源相当悠久。早自 1979 年，耶鲁大学的这种教育就已开始，但当年的中文被列为“不普遍学习的语种”之列，美国有关方面对语种使用的普遍与否端视学习人口的总数，而不是使用人口。所以，多年来华人虽无休止地蜂拥移民来美，但由于当年中文的学习人口增长不甚迅速，所以曾与阿拉伯文、俄文、日文同样被视为同种。

但等到了八十年代，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几年之间美国大学增设中文教

育成风，尤其是 1983 年之后，中文教授的空缺职位增加很多，全美大约有五百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

发展至今，这种“学种”已经进入美国中学。据一个名为“全美外语中心”（NATIONALFOREIGNLANGUAGECENTER）的机构 1990 年的统计，1990 年时全美就已经有一百三十七所中学开设了中文教育课程。而“美国教授外语评议会”（AMERICANCOUNCILONTEACHINGFOREIGNLANGUAGES）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美七至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七千三百五十四人在校选修中文。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人的电影近年来开始在美国走红。这种走红可说是以九十年代初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美国的个别影院上映和描写早期华裔功夫片明星李小龙的影片问世作为发端的。在美国电影市场上，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也曾有过日本电影热潮。中国电影最突出的时段是在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小电影院中曾放映过一些华人拍摄的“移民影片”，但多是演过几场之后草草收场。多少年来，亚裔人士如果想看充满自己文化的电影，还是得到自己社区内的外语电影院去。比如在纽约曼哈顿的华埠，最多时华语电影院有七家之多。

进入 1993 年，美国电影业中忽然刮起了一场中国风。除了因为美国观众中掀起的香港功夫片热，香港动作片名导演吴宇森被请进好莱坞执导《艰难目标》（HARDTARGET）外，从夏末到冬初，共有五部十分“中国”的影片在全美上映，这是美国多少年来从没发生过的事。

这五部影片分别是《霸王别姬》（FAREWELLMYCONCUBINE）、《喜福会》（THEJOYLUCKCLUB）、《喜宴》（THEWEDDINGBANQUET）、《蝴蝶君》（MBUTTERFLY）和《拼盘》（COMBINATIONPLATTER）。其中根据同名全美四大畅销小说之一改编的《喜福会》，更曾在美国五百家影院放映，在票房上甚至于一度曾达到过全美排名第七的盛景。可惜的是这之中只有一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出自大陆导演之手，其余的不是由美国华裔编剧美国人导演、就是由台湾方面制作完成。而且在这一年中，中国电影在美国不光在放映场地上有所突破，在制作成本上的成绩也相当不俗。早在 1982 年，描写旧金山一位华裔美国人被杀事件的影片《陈的失踪》（《CHANISMISSING》）曾在制作费不超过两万五千元的前提下，收到高达一百万元的票房。而时隔十多年后，中国人的一部制作不到 1 百万元的片子《喜宴》，票房据报道竟高达数千万元，被美国报章评为 1993 年回收率最好的一部知名电影。

1993 年的中国热，使得即使是专事研究中美文化的学者也被闹得一头雾水。其中，陈凯歌的一部《霸王别姬》甚至还获得了一向以刀枪不入姿态示人的美国新潮歌星玛当娜的叫好，她在观片激动之余还和陈凯歌做老友状合拍照片。有报道说她还为陈召开了私人放映派对。

据电影界人士分析，这几部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在美国获得成功，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片子多以西方观众的情趣为着眼点，着重反映中国“民俗”，因此被认为“十分中国”、极有看头。以一部《喜福会》为例，这部大出风头的片子曾让美国影院内看出一片唏嘘声。影片结束时，几乎每个女性观众都眼眶微红。一些精于此道的影院负责人还差人在门口逐人散发纸巾，以示此片与众不同的悲剧效应。但在看过这部片子后，我个人觉得不过是一部结构紊乱、稀松平常的片子，内容虽展示了中国妇女多少年来之苦衷和遭际，但这种展示仍流于浮浅。不少中国人在看过这部片子后也表示心境平平，不能被激发得激动不已。

31. 中西文化之间

我对东西方的风情迥异其实有足够的理解，而其中最让我心服口服的一件事就是，竟有中国不常见而美国几乎人人都有得的病。

这是一种叫做“花粉热”的病，在美国的人几乎人人不能幸免。每到每年四、五月份乱花迷人眼时，这种病就也开始“上市”。新来美国的人

据说在美国呆上三、四年之后就会染上。

果真，在美国住到第三年头上，我也得了这种一年一度的美国病，打喷嚏、流眼泪乃至面红耳赤。那几个星期中常常在开车途中迫不得已地停下车来，在路边“泪流满面”一气。同事中有更“美国”者每年每到此时竟会住进医院，苦不堪言。

而且美国医生中，竟也有专治此病的郎中。

对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生的男人来讲，听说他们当年的最不高兴是“手痒”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说是这批人中在十几岁的年龄时，“几乎没有人没偷拿、偷毁过别人的东西”，而且，理由就是“手痒，没有为什么”。来到美国在深深知道了西方社会的“万圣节”一类节日的意义之后，不由深深地为当年在中国“手痒”的一批人打抱不平起来。

“万圣节”(HALLOWEEN)在传统上据说是一个关于巫婆和魔鬼团聚的日子。这一天中，巫婆骑在扫把或是猫背上魔鬼骑着山羊赶赴约会，然后狂欢庆祝。而另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则是，此节由九世纪塞尔特人祭悼死者与死神的日子演变而来。在万圣节这一天，相传所有的死者都会回到人间。

在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每到一年一度的10月31日万圣节这一天，儿童们可以合理合法地穿着各种装神弄鬼的衣服、戴着面具沿街敲门索要糖果，如果遭到主人家的拒绝，儿童们则可合乎传统地对主人进行恶作剧(TREATORTRICK)。所以，每到这一天，几乎每个有心的家庭都会备上一些糖果，以便儿童们敲门索取。没有糖果可送的人家，主人得到的恶作剧在传统上往往是用肥皂划玻璃窗或是在窗户上弄出各种怪声等等。

可惜的是，随着美国治安的日败，有些孩子在万圣节中拿到过被人下过毒的糖果，也有的孩子在主人给的点心中吃到了钉子，更有治安部门每到过节前夕就会呼吁民众谨慎过节，家长们要看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让拐卖儿童等恶性事件在节日的掩护下发生。

也正因此，每次过万圣节时，看到仍有一些儿童身穿彩衣兴高采烈地出发要糖果时，我心里都会涌出好一阵感动。但几次看到儿童在敲邻人的门时，他们的父母在相当醒目的近处百倍警惕地为子女望风；当子女要到糖果后，做父母的要神色紧张地先行仔细查看的举动，心里又觉得相当苦涩。我想，在人心这么险恶的当代，人世间的美好和欢乐无疑将做为代价全盘殉葬。而像万圣节儿童索要糖果这种对沟通邻里关系绝对有好处的节目，相信一定会断送在混乱一团的二十世纪末叶之中。

而万圣节赋予儿童的另一项特权则不太好玩。而这也许正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出生、“手老痒”的男人们当年孜孜以求的“自由”。

这项特权是半明半暗地允许儿童们可以满街互相扔鸡蛋，新潮一些的儿童还会买来男人剃须用的润滑泡沫喷剂姿意在建筑物、车辆上喷涂。这种半合法化的胡作非为在这个节日中虽会带来相当的不安定因素但却是“合民理”的。连续几年来，美国几乎各地在万圣节过后都有程度不同的半大青年

趁着万圣节行打家劫舍之实的报道。这种事件理虽不具，但在民众心中却多少“认账”，觉得是性情中事。

文化的不同造成童年生活的大相异趣，让人不知该悲天悯人还是额手称庆。

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各族裔的人部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成为美国的一项杂景。以中美文化而言，就常常会有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比如在美国的华裔虽不如美国人那么肯在旅行方面花钱，但华人爱在穿、用方面买上好的名牌货；华人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与美国人有本质的方法区别，一个是稍加引导、基本放任，另一个是一管到底、唯老独尊；华人在数字中最厌恶的是和“死”谐音的“四”，而美国人最厌恶的数字是“十三”，为此，美国的很多大厦中都是没有“十三层”的，常常是在“十二层”之后紧接着见到的就是“十四层”；美国人在行走之中看到前面有黑猫跑过时多半是会认为晦气绕道而走的，但华人则、一般是认为听见乌鸦叫才最是不祥；华人喜欢用现金买东西及支付任何开支，但美国人为着事事有凭有据而尽可能地使用信用卡或支票付款；华人一旦有了闲钱喜欢用来买金子和房子，认为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是保值的，但美国人则比较乐于买股票或公债；在做各种投资时，华人一般采取少借快还的方法，不喜欢身上牵挂着债务，但美国人却是尽可能地多借钱，把自己的借贷信用用尽，再慢慢还帐。

华人在买房时绝对忌讳把房买在墓地的边上，但在不少美国人的观念中却会为了求得安静而买墓地边上的房子；中国人忌过新年的那一阵时间中说“死”字，美国人则认为那几天中踩到破了的的地砖是要倒霉的；华人往往以“福”字倒挂作为一种福气到来的吉兆，但美国人一般认为兜里揣个有兔子脚的钥匙链才能避灾；在农历七月广东人称为“鬼月”的月份里华人一般不举行结婚、买卖房屋一类的重大人生转变事项，而美国人在月份方面几乎是百无禁忌。

由于美国人不大懂中国文化而出现的误会的事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要属中草药方面的事情。自七十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重新撮和了中美关系之后，美国人对中医、中药的认知乃至承认，仅限于针灸。对一般的中医，采取概不认其为“医”的方针。而美国有关的进口药品、食品检查机构对中草药的认知也仅限于认定其为“食品”。因此，长期以来，中草药在美国一般是以“食品”的姿态进口的，这种未求甚解的认知对繁荣美国华人社区的中医药业界倒竟还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89至1990年，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个华裔问题研究小组通过对美国人及在美华裔的问卷调查发现，即便经过了多年的美式文化熏陶的“半美国”式的中国人，其在诸多方面与美国人仍有着相当的距离。

32.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在美国的中国人自己给自己编出了个词汇，叫做“玻璃天花板”。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在美国的企业中，华人在升迁过程中往往升到一定的位置后就再也升不上去了，这就如同有人在华人的头上放置了一块“玻璃天花板”，虽看不见但却觉得到。

华人社会为了这件事一直探讨了好几十年，每次一旦有了有关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讨论，就一定有这个“玻璃天花板”出现。

曾任一家公司经理的戴安娜·冯是一位五十二岁华裔妇女，不巧遭到老板解雇。她的老板给她的解雇理由是“缺乏自信心。”令人为之语塞的是，这位老板为此而举出的例子竟然是因为当冯接到解雇通知时，没有和老板闹个天翻地覆。

这个故事摘自《纽约时报》。

前述事例是该稿件在评述华人雇员为何在机构中升迁缓慢的原因时走笔带到的。文章虽是美国人甲美国笔写的，但看后不能不叹称入木三分。

该文说，太多华人升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也和戴安娜·冯一样，是因为表现得不够自信。

文章列举说，华人雇员通常不敢或不愿向上司直言自己想干什么或想要什么，而美国人却认为面对面地提出要求是正常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工作中适度的上下级之间面对面的冲突和争辩，有助于激励员工的上进心。

文章写到这里并教导说，缺乏自信的毛病是可以经过如下训练而得到扭转的。这些训练包括：与人多一些进行目光接触；使用更多以‘我’作为开头的句子；更加多地重复自己的话；更多地使用正确的身体语言（在这一点上，文章举例说，比如坐姿端正，而不是东倒西歪）等等。

该文分析说，华人的一些传统习惯也成为升迁里程中的障碍。比如华人有尊重上级和老者的传统，这使得华人雇员在上级面前不愿畅所欲言，这也造成部分华人给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而这多半会被美国上司认为是缺乏能力的表现。

在华人在美发展方面可以预见和回顾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被《纽约时报》不幸言中的上述这一点。

华人多年来处心积虑地要提升自己在美国政商各界的影响力，但上述这种涵盖广泛的印象无疑让人遗憾。即使是在大部分华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至少是美国学校中的教师在整体评价中国学生的时候仍是多用“聪明，但在课堂上永远不言不语”来作评价。

更多的时候，华人自己“不乐群”的习惯也是自己生活中遭受损失的导致者。

比如说，太多的华人在美国居住却不甚了解美国的状况，又不愿向当地人讨教，因此，由于不熟悉美国有关法规而使自己吃亏的例子时有所闻。以美国的医疗机构来讲，内中有不少照顾低收入者的减免付费办法，比如单单门诊一项就有按病人收入情况分有从十几元到两百多元不等的收费标准，而且即使是诊病，也有对低收入者甚至可以完全免费的“收费方法”。但不少对美国医疗作业不熟又不肯就问的华人，宁肯采取看了病后趁人不备偷偷溜走的做法，也不采取问过之后合法不付看病钱的办法。更有的低收入华人妇

女因为害怕负担大笔医疗费用，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得了乳癌宁可在家里偷偷哭，硬是不愿意去医院问诊。其实，在医院中这类“大型癌病”患者也是可以在填报自己的收入后按收入等级决定付钱与否的。受这种医疗制度的保护，有的低收入者甚至还可以申请得到医护人员免费地到自己家来做全天候特殊护理服务。

在美国的华裔一向被认为是不需要别族帮忙的“模范少数民族”，华人们往往喜欢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生活形态上也多自成一个相对自闭的小圈子。直至今日，在美国居住的华人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只看中文报纸、只看中文电视节目及中文录影带、听中国音乐，对发生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新闻关心程度大于美国本土新闻。

这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华裔并不热衷于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热心参与美国的一切政治活动，相反对故土政坛却知之甚多。这种状况其实可以从在美华人社区中多少年来都还存在着“亲国”与“亲共”也就是左右两派之分看出。随着台湾两党政争纠葛的出现，在美的台湾人中也出现了“拥统”或“拥独”的两大派别，这些人甚至在海外社会的大型会议中因为使用闽南话还是使用“国语”的问题相互指责，大打出手。与对故土政治的高度热情相反，他们与美国社会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几乎完全无缘，以局外人的心态对待美国主流社会的一切事端。对他们而言，美国只是一个安居地。

但就亚裔人士在美国的总体发展而言，华裔的总分还是颇有成绩的。

以美国亚裔人士为主要读者的《A 杂志》(AMAGAZINE)在 1993 年冬季选出了对美国人最有影响的 25 位居美亚裔人士，其中华裔占了具绝对优势的 17 名。

名列这 25 位亚裔榜首的是华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播宗毓华。该杂志的述评说：宗毓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即便在美国各族裔中间统计，也没有几个媒体人物知名度能超过她。

依次排下的人物中，具有中国血统的共有 16 人，他们之中至少有 9 人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包括在中国大陆出生的贝聿明、田长霖、杨雪兰和蔡至勇；在台湾出生的何大一、赵小兰；在香港出生的何杰民及王颖。

这 25 人的排列是：1. 宗毓华 2. 黄哲伦(华裔剧作家。最著名作品为《蝴蝶君》) 3. 井上健(夏威夷州日裔联邦参议员) 4. SCOTT SASSA(特纳娱乐总裁) 5. 丰田(加州日裔联邦参议员) 6. 松井(加州联邦参议员) 7. 史提芬·赵(制片顾问、前福克司电视公司总裁) 8. 何杰民(因参与电影《七月四日诞生》及《谁杀了肯尼迪》制片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共同制片人) 9. 杰森·史科特·李(在电影《李小龙传》中扮演李小龙者) 10. 何大一(纽约市艾伦·戴蒙德爱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11. 谭恩美(英文畅销小说《喜福会》作者) 12. SONNY METHA(柯那福出版公司编辑) 13. 王颖(电影《喜福会》导演) 14. 克里斯·李(三星制片公司掌管制片的资深副总裁) 15. 赵小兰(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总裁) 16. DENNISHAYASHI(美国民权办公室主任) 17. 汤婷婷(华裔小说家) 18. 贝聿明(国际著名建筑师) 19. TEDDY ZEE(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执行副总裁) 20. 田长霖(柏克利加州大学校长) 21. MICHIKOKAKUTANI(书评家、文化评论家) 22. IRENE NATIVIDAD(全国职业妇女委员会主席、菲美基金会执行主任) 23. 马友友(大提琴家) 24. 杨雪兰(通用汽车公司主管消费者市场开发事务的副总裁) 25. 蔡至勇(金融家)

为了在美国社会中对华人的业绩做一番提醒，以及有成就的华人对自我

予以肯定，在 1990 年 5 月，以贝聿明、李政道、马友友为首的一些在美国的华裔名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的组织，以网罗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有相当成就的华裔”为己任。该会成立伊始，为中美两方人士瞩目，会员中也的确不乏大名鼎鼎之士，除有陈香梅、马友友、贝聿明、田长霖等中国人熟知的人外，还有吴仙标（前美国德拉瓦州副州长）、包柏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夫人）等人，绝大多数会员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

由于此会建树的“脱俗”形象太过鲜明，所以被海外不少人闻之吃味不已，其在舆论界也曾被评论讥为“自命不凡者的小圈子”。旧金山的英文《亚洲周刊》的批评则更加尖刻，该刊形容百人会是“一个没有伴侣的高中生，已经穿戴整齐，却不知该向哪里去”。也有舆论预言：这种组织的成立，“除了使华人社会更行分裂外，其自身在会员招募的前景上也将陷入困境”。

据该会执行理事长、美国美华协会创办人王恭立表示，此一团体的宗旨是“做中美人民的桥梁”和“扶助在美华人利益”。在会员的选择是“经人介绍、对百人会的宗旨有兴趣、并由会中的常务负责人士们同意”的人才可入会。他同时也承认，到 1993 年年底，在百人会成立已满三年之际，会中的会员仍“只有六、七十人”。而且，年在二、三十岁的新一代优秀华裔未能有幸被网罗，至于说八十年代之后来自大陆的优秀人士方面也全然空白。

33. 无足轻重的华裔政治

华裔在美国政府任职最高者竟为一个样貌小巧的女子赵小兰，这位在布什主政时代曾高就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和平工作团负责人的小女子，多年来一直被在美华人奉为“乖女”及参政楷模。

到了克林顿时代，赵小兰仍旧官运不衰，自 1992 年 11 月起她改任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总裁，形象趋向“民间”，为此，她常到美国各地为基金会争取各族裔的支持，并为需要帮助的社区而奔走。

赵小兰眉目清秀，身材匀称，并且胜在年轻，1993 年她与另一年纪比她大上很多的议员结婚，消息甫出，曾轰动一时，不少英文媒体使出对好莱坞明星的私生活报道方式，争相挖宝，甚至连赵氏婚后所住的华宅到底是谁出的钱、产权归谁都探了个明白。

在美华人的政治觉醒相当晚，但一旦觉醒之后立即手忙脚乱地披挂上阵。在将近十年的忙碌下来，华人的政治竞争每次都会现出底气不足和状态不佳的窘境。也因此，华裔的政治角色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九十年代初的大选中，美国华人的政治力量在东西南三岸又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在几个华人社会普遍看好的重要职位竞选中华人都告失利。与 1993 年有五位美籍日本人和一位美籍韩国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相比，华人在重要的民选席位上几乎毫无斩获。

在 1993 年风起云涌的各种选举中，先是曾被布什任命在联邦教育部任副司长职的大学女教授姚李恕信在德克萨斯州竞选联邦众议员职位败北，然后是曾任德拉瓦州副州长的吴仙标竞选联邦议员失败，再后是竞选加州洛杉矶市市长的胡绍基在 46% 得票率的基础上，以些微差距失利。

现年 41 岁的胡绍基出生于洛杉矶，原籍广东，为第三代移民，1975 年在加州柏克莱加大获都市计划专业硕士学位。他曾于 1985 年当选洛杉矶市有史以来第一位亚裔市议员，1989 年再度获选连任。他在洛杉矶 1992 年的种族大暴动之后曾力主洛市警察局局长盖茨的请辞，并提出一套深受有色人种好感的暴动区复兴计划。他的出马竞选曾被居美华裔寄予参政的最大期望，他的落败给华人参政的前景蒙上了相当大的阴影。

华人中另一个参政的范例也出在加州，其是连任二十年加州州务卿的华裔“政坛不老松”余江月桂。这位曾被选为“全美最重要的百位女性”之一的华人妇女，从美国社会最小职权的公职——学区委员做起，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历任加州东湾阿拉米达学区委员、学区教育委员会主席、加州众议员及至加州州务卿。更为轰动一时的是，她在 1974 年竞选加州州务卿时，曾获得破记录的三百万张选票。而且，此职位一经进入她手，她一下子就把持了五届之久。

出生在父亲开设的洗衣店内的余江月桂曾就读于柏克利加州大学、米尔斯学院及史坦福大学等名校，拥有教育博士学位。参政几十年后，已年届七旬的她表示希望在从政政绩的结尾能以成为美国派驻中国的大使告终，传说中她并以此做为交换条件在克林顿竞选时在加州范围予以协助。但事实与此有所出入，1994 年，她虽被派驻亚太地区，但并非中国，而是拥有六百多个岛屿的密克罗尼西亚。此结果虽差强人意，但同样也获得了余氏的默准。

在民选席位上如此不顺遂，在任命职位上九十年代的华人也是观之凄凉。

在克林顿政府上任后，其对华人的大部分政治任命因为职位无关痛痒，使不少曾预估华人中可能出现至少一位华人部长的全美华人失望不小。据粗略统计，克林顿在上任第一年中对华人的任命计有负责国会议案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周玲庄、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庄雷修、财政部助理部长周武修、商业部长特别助理余雪洁、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周英烈、交通部研究技术署副署长石家舜、美国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余江月桂、国防部主管环境安全的助理副次长沈棠、美州银行执行副总裁张之香、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曹文梅等。

可喜的是，在州一级的任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一代留学生已经开始有人出头。亚利桑那州医疗保健费管理局局长唐敏芳就是在一个七十年代赴美留学的大陆留学生。

1968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唐敏芳曾在中国甘肃省主持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她于1976年来到美国，1979年去关岛做社会医疗工作。1985年12月，她在夏威夷大学取得医疗保健硕士学位，毕业后赴亚利桑那州担任医疗保健管理局担任业务主管。在1985至1992年中，她曾多次获得关岛和亚利桑那州的多项荣誉奖章。1992年，她被升为亚利桑那州医疗保健管理局副局长，1993年被升为局长，负责州内50万人的医疗保健服务。

而被华人一向看做是参政争夺重镇的纽约市，华人参政的成果一向疲软。

在纽约市现存的158个民选代表席位中，联邦众议员占13席；州参议员占25席；州众议员占61席；市议员占51席。除此之外，市长、市主计长、市议会主席以及纽约市五个行政区的区长共占8席位置。

在1991年与1992年的纽约各级民意代表的大选举中，占全市人口6.7%的亚裔在158个民选议员位置中，虽然在华埠及法拉盛所属选区均有华人出面竞选最低的民意代表职位——市议员，华埠地区还出现了数位华裔竞选人与外族人同争一席的奇观，但结果却和历年保持了绝对的一致性，那即是全军覆没。

虽然纽约市在丁勤时就任市长后曾任命了十余位华人为市府亚裔事务办公室、都市计划局等一些专业部门及结构相对松散的委员会主管，但这类不甚具政治实权、带有极强政治酬佣色彩的职位对反映华人的呼声和需求，多少有爱莫能助的遗憾。

纽约市的少数族裔中，民意代表席位不论是在数目上还是重要性上，12年间增长最快的是黑人。目前，纽约黑人占全市人口的25.2%，而其在民选代表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为24.7%，两者数据相当接近。相形之下，华人在参政道路上的功课还远远有得要做。

在寻求华人政治力量的壮大时，社区内不少人士习惯于用在美的犹太人做例子。但多少年比较下来，华人一直无奈地停留在“纯比较”之上。其实用犹太人做个例子权作憧憬并不离题，只可惜这种憧憬让华人追赶了几十年也没能有大的斩获。

这种几十年的兴叹其来有自，既有人口方面的原因也有财政方面的不足。

早在十年前，纽约市立大学的统计就显示，纽约市有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八百犹太居民，占全市人口的15.8%。而且，这一干犹太人几乎个个都不是吃素的，大都是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身家，其中不少人是大众传播界、

学术界乃至文化艺术界的领袖人物，形成整个民族绝对财大气粗的阵式。

就整个纽约州而言，在传统上，纽约市的天主教徒是民主党的主要票源，而纽约上州的新教徒则是共和党的票源，为数在两百万人左右的犹太裔人口由于在投票中并无一定之规，因此，经常扮演扭转大局的关键角色。

而华人在许多方面和犹太人比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微不足道。

自七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就任纽约市市长、而后又连任两届的犹太人郭德华（EDWARD KOCH），早在得势当初就曾用一句十分出名的短句刺伤了相当一部分纽约忧国忧民华人的心。

这个短句是：华人根本没有多少选票。

至今，这句话仍在华人社区内被当做选民教育的杀手锏代代相传地用来耳提面命。不幸的是，郭德华的短句并不是空穴来风。

华人社区进行选民教育起步并不算晚，有关投票率对华人权益的影响的一些简简单单的因果关系也一直絮絮叨叨地在华文媒体上反复进行宣讲。但华人的投票率仍自始至终倔强地显示它的低落。

八十年代初，华埠华人的实际投票数就仅维持在两千票左右。后来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曾达到过五千张左右。再等到进入九十年代，纽约华人在人口及地域上都已有了大规模的扩充，据皇后区华人选民协会估算，九十年代初，纽约曼哈顿区因为涵盖了华埠，华人实际选票应在一万张以上，而皇后区的华人实际选票也应在一万二千张以上。而且根据选举局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年9月，纽约曼哈顿区、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三区业已登记的华裔选民共达五万五千多人。但由于太多的华人对美国主流政治兴趣缺乏，实际投票率在每次选举中都不能超过登记选民的一半。美国的选举日是公定假期，不少人因此在投票日当天宁可在家枯坐。

据选民协会统计，即便是在美国最热门的总统选举中，即便是已登记为选民协会会员、对选举有着相当认识的华人，也有10%到20%的人不去投票。

也正因此，多少年来，即便是华人自己的竞选人出面竞选，在对“自己人”选票的估量上无一例外地战战兢兢未敢乐观。而投票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这些战战兢兢之人对自己判断能力的疑惑。

自己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郭德华一类的“外人”。也是所以，1982年，当纽约市评估小组对在华埠地区修建一所监狱进行投票时，手中握有两张决策票的该犹太佬郭德华，把自己的两票一古脑地投给了“支持”。

除却选票的原因，华人社区还有人人心不齐的短处为人公认。在社区内的不少社团负责人中，经常是彼此积怨一大堆。即使是成立社团这件事上也是摆扶不平，不是社团成立起来连会员都招不齐，就是社区内的“同好”谁也不服谁，往往是相同性质的社团成立了好几个。富于戏剧性的是，每谈到心齐的问题，华人社区甚至连如何在政治选举中摆正自己的位置都不能统一认识。最为近在手边的例子是，当一次选举即将出台，如果竞选人中中外混杂，华人社区内一定会为究竟该支持谁而争执一番。从情理上来讲，大部分的人赞同“血浓于水”的理论，会无话可说地加入到扶助参选华人的一边去；但也有华人会认为另外的外裔竞争对手以往对华人的事务堪称关心，在民意基础上又掌握了大多数的选票，因此认为与其支持一个没有太大把握的华人竞选，不如出面声援一位在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并言明将为华人谋得多少福祉的外裔政客来得实在。

而后者，多数是要被骂做“汉奸”的。

但这之中孰是孰非一言难尽。

纽约华埠历史上中国人唯一一次有些规模的大型行动是 1982 年抗议市府决定在华埠地区建立监狱、也就是郭德华连投了两张“支持”票那件事。当时，参加抗议的华人人数竟达两万多，让社区内外大大地“跌破了一次眼镜”。此次抗议的声威在美国华人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据估计，当时参加游行的人数几占在华埠工作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非但如此，次日的《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等报并纷纷将此新闻连同图片放在封面新闻的位置上，以示重要。

可惜的是，到后来监狱还是建了。

更可惜的是，此次的“跌破一次眼镜”果真仅此一次，既空前了，也绝后了。

34. 当舞蹈演员跨出国门

有一个下午途经法拉盛图书馆，在门口看见一个样貌稀松平常、脊背有点驼的中年男人双手插在衣兜中迎面悠闲走过。刚开始时没多在意，只觉得这个中年男人脸庞在某一瞬间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熟习。

觉察到这种感受时，我不禁回头向这个寻常男人的背影多看了一眼，也恰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他是谁了。

他是史钟麒。

这是一个早在七十年代以一部相当诗意而公式的电影《生活的颤音》融化了相当一批中国女人的上海芭蕾舞男演员。

当年，他的这部片子问世时，我还是个斜背

书包的中学生，对这部片子中男女主演的风采崇拜得五体投地。关于这个电影，是我和我中学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整整一年的重要话题。

眼前的史钟麒已是青丝有衰。

他十分“美国华人”的松懈步态让人觉得美国的再造功能之强，无以言喻。

记得当时站在图书馆门前，我呆立了不知多久，许许多多感叹交融混杂在我的内心僵硬地被咀嚼和消化。

我也深知，放弃这种咀嚼，已是万不可能的了。

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由于专业的特殊性甚至普遍性，中国舞蹈演员在美国的发展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个案。

美国的舞蹈业界可说是“十分大众”的领域，任何人只要有时间、肯花钱就可以进入舞校学习，成为圈中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又是世界艺术家聚居之地，因此，在这种兵就相见的地方要想真吃上舞蹈饭，则必须经过一番超国界的世界级厮杀，才能如愿。当大批中国舞蹈家身怀十几年积攒下、几乎是其毕生唯一饭碗”的舞艺辗转赴美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既特殊又普及的舞蹈市场。

访问了不少在美生活的舞蹈演员，他们中有太多人在回答自己才刚面对美国舞蹈业界既艰难又尴尬的局面时，那种不知何去何从的震撼带给他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自己以往的十几年“白活了”。

一般而言，在美国发展的舞蹈演员，尤其是专攻中国舞蹈的演员不外有三条谋生出路可循。一是改攻世界通用的芭蕾舞，以期能进入美国的芭蕾舞团；二是改演现代舞，这种舞蹈种类虽不如芭蕾舞来得正规及演出频繁，但无疑也是保持自己专业技能的一种途径；第三就是彻底改行，以求温饱。

当然，多少年来，在美国发展的中国舞蹈演员中也有极少数的人仍未放弃跳中国舞，这种“坚持”所面对的市场极小，基本上跳不出唐人街及在各种教育机构中进行民族文化示范的圈子。转攻芭蕾舞这件事对男演员来说尚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对女演员来讲，由于涉及足尖功夫，则就不那么方便了。

在由中国民族舞转攻芭蕾舞在美国寻求发展的中国演员中，早年间以《放排歌》及《牧马人之歌》两段名舞闻名全中国的原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孟建华可算是颇为成功的一位。

早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孟建华 1984 年赴美留学，抵美后即改攻芭蕾舞。这位中国当年率先掀起男演员柔软肢体演出的民族舞男星，在短短的两个星期

内就学会了芭蕾舞中几乎所有的高难托举动作。走出校门后，他先后在旧金山剧场芭蕾舞团、瑞吉蒙特色蕾舞团及华盛顿芭蕾舞团中担任主要演员。

美国的芭蕾舞团中，演员多与舞团每年签订雇佣台约。新人通常在每年的九月份入团，紧接着就参与排演圣诞节演出节目。芭蕾舞演员中按级别基本上分四个等级。最高一级的演员是首席演员，在中型芭蕾舞团中，这类演员的周薪可达 600 元左右；次一级的演员是独舞演员，这类演员的周薪往往在 500 元左右；再次一级的演员是群众演员，周薪往往在 300 元左右；最低档的演员是见习演员，周薪只有 150 元左右。但如果首席演员请的是客座演员，则酬佣多半按每场 800 或 1000 元计算。

美国芭蕾舞团的薪水平庸但却制度严格，为保持与剧团的合同，演员们必须遵守团内的每一项要求。演员们每天早上一般在 9 点 30 分时必须参加团内的早课，而且每天部必须进行排练。越是级别低、挣钱少的演员越是要坐在地板上观摩整个排练过程。

当年，孟建华在旧金山剧场芭蕾舞团中在美国圣诞节传统节日《胡桃夹子》中曾扮演王子，他作为客座首席演员在圣诞节前后一连演出了 25 场，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中国王子。

除孟建华之外，中国芭蕾舞演员在纽约市芭蕾舞团、休斯顿芭蕾舞团、旧金山芭蕾舞团、新泽西芭蕾舞团等大型美国芭蕾舞团中均有加入，而且不少人还成为舞团中的要角。但这类幸运只有少数演员才能轮到，据分析，在全中国粗算下来总计上百名赴美发展的舞蹈演员中，所占比率不及 5%。而且，得以进入美国正规芭蕾舞团的，多半都是男演员。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美国，芭蕾舞男演员发展境况比女演员的发展普遍高出许多，无数功底不错、在国内被各界看好的中国女芭蕾舞演员在美国的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且这一现象据说不仅是在中国演员身上有所体现，在其他国家来美发展的芭蕾舞演员中同样存在。美国颇具威望的《纽约时报》也曾为此发表评论，评论的题目就是《舞蹈团总是给男演员以保障》。对此，孟建华的解释是，美国男人一般崇尚追求高效率赚钱的职业，而跳舞这一行除非跳成大角色，不然是挣不到什么钱的，因此造成美籍男演员的匮乏。

而由中国舞改攻现代舞的人，境况也不太妙。美国是一个人材荟萃的地方，更何况现代舞对舞蹈技术要求相对为低，“圈外人”甚至也可以客串。因此，通常的情形是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临时舞团招人，往往也会有数百名舞者闻风而来；常常是舞团虽只招收一、两个人，前来应试者也会多得挤满了考场外的走廊和楼梯。

实际上，由于近几年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很多有根底的艺术团体也纷纷进入转型期，境况相当艰难。拿在国际舞坛上极具知名度的现代舞大师阿尔文·尼克莱（AWINNIKOLAIS）的舞校（AWINNIKOLAIS & MURRAYLOUIS SCHOOL）来讲就是正经历这种转型的一个典型。尼克莱是美国现代舞五十年代的开拓者之一，在欧美享有众多的推崇者。多年来，尼克莱用自己的艺术探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舞蹈理论。他所拥有的自己的舞蹈团，曾经是纽约六大舞蹈团之一。在全盛的八十年代，他开办的舞校除占据了纽约的最佳地点外，还兼有宽大、设施完善的特点，舞校内光是教室就有可容纳 100 多名观众类似于实验小剧场的排练厅。

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自 1991 年上半年开始，因为演出事宜安排不

顺利等原因，整个尼克莱舞团没有演出任务。加之政府因为财务紧绌，对艺术教育的投资逐年减少，社会资助也受经济大环境的制约越来越难于取得，到了1992年下半年，尼克莱旗下名噪一时的舞校不得不从曼哈顿闹市19街老校舍中迁入下城一个关闭了多时的制衣仓库中重新建校。

新校舍中非但没有像样的排练厅，连唯一的用来练功的房间中新装修的地板也异常坚硬粗糙，每天上完课，学生们都能在身上找到斑斑伤痕。舞校课室内，漏风的旧木窗仅用塑料布遮盖了一番，每到风起时。塑料布被风带动发出的巨大响动甚至盖过了课堂上的节奏鼓声。天冷的时候，由于没有足够的暖气，学生们一旦停跳就必须披上厚厚的衣服御寒。与此同时，舞校内工友已被精减到几乎全无，因此，在新校舍启用第一天，80岁高龄的现代舞大师老尼克莱只能自己充任管家，在寒风中颤巍巍地为学生打开大门。

纽约另一个著名的现代舞大师玛莎·格雷姆（MARTHAGRAHAM）旗下的舞团的待遇也是十分羞于见人的。在她的舞团里，舞者没有固定工资可拿，演员的一切财务来源都随着是否有演出而定，常常连排练都没有钱发。但即使有了演出机会，舞者每场演出的报酬也不过在100美金左右。

即便待遇如此恶劣，来自世界各地无数存有“只求艺术不为报酬”念头的舞蹈好手，也只能在积极表现的同时等待老演员退休才能有幸顶替进去。

大师的舞团都尚且如此，其他的舞团更是“阮囊羞涩”。美国舞团多年来的状态十分不好，即使是在小型的芭蕾舞团，每天要跳六、七个小时的演员们在团里常常什么都得于。非但如此，好一点的舞团一年还能有大半年的演出合同，而差一点的团每年只能有三几个月的演出时间，其余的时间里，演员们必须自寻出路，不少演员在这段日子里只得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

在旅居纽约的中国舞蹈家中，原上海歌舞团舞蹈编导及演员胡嘉禄的境况可说是寥寥几位仍在自己本行中孜孜以求，并能达到在美国“吃舞蹈饭”地步的艺术家之一。

胡嘉禄1990年赴美留学，起初学习西方现代舞，后改为专攻现代舞编舞。刚到美国时，他和绝大多数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一样干过去餐馆送外卖等“低级职业”，并且一干就是一年多。回顾以往，胡嘉禄说他当时内心相当平静，而且，同事中有人对处境有了任何想不开，反倒是他去劝慰别人。

“刚来时我已经40岁了，从舞蹈界年轻一辈口中的‘胡老师’一下成为无论风雨给别人送外卖的，我的状况比任何人都更从零开始。”多年在美国经受了金钱乃至境遇起伏的磨炼之后，胡嘉禄轻松地总结他心目中美国金钱与事业的关系说：“人没钱的时候必须用精力去挣钱，等有了钱的时候就可以用钱来买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后来，他又去过纽约上州的一家体育馆内教儿童学习芭蕾舞、现代舞，并为儿童们编排体操。至此开始，他总算做上了和以往职业有关的工作。这份工作由于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虽然每天拿到手的工作时间只有四个小时，但每小时的薪水却高达20元。

胡嘉禄的时来运转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再后来，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加上他的运气不坏，他开始受聘为美国、香港乃至中国国内的现代舞团编舞。这种经由正规聘请的编舞者薪水不错，比如，为美国的舞团编一个演出时间在十分钟的舞蹈，编舞酬劳可以拿到一千七百多元。也正是靠这些好机会的“托举”，1993年，来美甫才四年、常自谦说自己在经济上只能达到“基本平衡”的胡嘉禄动手买了他第一栋一室一

厅的公寓房。

多年以来，中国民族舞蹈在美国的发展空间可说是仅只停留在存留上，离发扬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这种民族文化多半也仅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一类中国人多有聚集的城市中通过各族裔文化展示才能得到体现。

在纽约这个聚有数十万华人的城市里，有一个名为“新苗舞蹈艺术中心”的机构，其可说是城内既首屈一指又硕果仅存的中国民族舞蹈中心。“新苗”成立于20年前，是“由几个台湾留学生玩起来的”。目前，该中心旗下网罗了一票中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如陈帼、胡嘉禄、李忠梅等人。建团多年来，中心虽有时会有一、两台节目推出在以华人为主要观众的范围内演出，但其基本工作仍脱不开舞蹈教学及在大、中、小学校内进行舞蹈示范教学观摩。

在以往的“新苗”中，由于经费拮据，艺术家们基本上是仅凭着对舞蹈事业的爱好而工作。后来步入正轨之后，艺术家们才开始有像样的薪水。在中心内，舞蹈家们每教学生上课一小时薪水是17元，排练时每小时8元。以往外出参加一次演出，演员们得到的酬劳常常仅是二三十元，而现在已改成60到100元左右。但这种听上去薪水颇高的演出活动不是时常能有，即使有，一些演出场地往往与纽约相距遥远，舞蹈家们要开车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演出地点，一来一回所花的时间、精力加上演出，平均下来时薪并不高。

专攻中国舞蹈的演员们的另外一个财源是为华人社区内的大小宴会、大公司年庆等场合表演。这种在美国华人社区时兴了无数个年头的“时尚”，对经济境况普遍不好的演员们来说不无小补。这种演出要求水准极低，观众的所有要求只是好看而已，但每场演下来酬劳却比较正规，一般演员可以白吃一顿饭，还可以拿上一百多元钱的红包。最好时还可以拿到两百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年来，随着中国赴美舞蹈演员人数的增多，这种演出场合中参与竞争的人员及艺术品种也不断增多。早年间以唱歌跳舞为主的社团聚会演出，近年来开始加进了小品、魔术甚至于杂技中的蹬坛子蹬桌子节目，而且，来自中国的诸如杂技等特殊技艺常常博得以往无缘一见的“外人”满堂惊呼。也正因此，由于演出品种及人数的增多，分摊到舞蹈演员身上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发展至今，局面干脆就是没有极好人缘的演员休想拿到演出机会。

所幸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移民乃至文化对美国更多的渗透，美国一些机构联欢或大型商业娱乐演出中都加进了中国文化节目，每有这种机会，往往是中国舞蹈先拔头筹，这种演出一般薪酬相当可观。胡嘉禄说，在这类演出中，他最多拿到过每场350美元的酬劳。而另一位当年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舞蹈演员陈帼，1993年就是靠到佛罗里达州著名的迪斯尼乐园中的大型歌舞中客串一段中国舞而悠哉了整个一个夏天。

在中国舞蹈演员分赴美国找寻前程的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另一些事颇值得记取。在美国的不少中国舞蹈演员由于生活没有光明出路，个人在品质上又稍具虚荣，酿出悲剧的事情时有发生。早在八十年代末，一位在中国极具名气、荣获国内外多项舞蹈大奖的林姓芭蕾舞男演员在美国陷入经济纠纷，被债权人从美国到香港追踪控诉，有关消息登得沸沸扬扬。

在纽约华人中最著名的一个精神病患的例子也是关于一名陈姓中国芭蕾舞女演员的。这名毕业于上海舞蹈学校，并曾任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的美丽女孩，当年也曾在中国国内的有关比赛中得过大奖，被圈内人公认是一块“绝妙的舞蹈材料”。可惜的是，她在几年前进入美国未几就告因治疗精神

疾病住进医院。关于她发病的原因社区内有诸多猜测，均不得要领“个别了解她生活习性的人猜测说她的发病是因为自己大没有生活能力而被美国社会打垮。在她发病的日子里，凡是到医院看望过她的人，都知道她已不可救药地对美国社会上的人产生了恐惧。她不停地打对方付费电话向她伪朋友乃至远在上海的家人反复表述自己对社会的恐惧，她当时的名言是说她周围的人“都想害她”。

她也曾有过离家出走的记录，一个人一直不明缘由地走到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州，后来被宾州警方送回纽约。那一阵子，关心她的人还曾在纽约的华文报纸上刊登附有照片的寻人启示，一时间闹得满城皆说。

兼知她以往的丰采和现在的病况的人，无不为其的陨落而惋惜。

舞蹈演员身材条件突出，专业又诗意浪漫，在生活中稍不把握就会成为至少是社区舆论的牺牲品。个别在国内获过大奖、颇具名气的一流芭蕾舞女演员到美国后时常陪着不同的台湾商人进出社区各种场合、饭局，一身珠光宝气，被各种人的太太警惕，在台湾人圈内被人传说各种说法。虽然不少传言可能是捕风捉影，但听着自己国家来的著名演员被外人如此评品，不少大陆来人连带着不免尴尬得心生凄凉。

大陆著名舞蹈演员、28岁的李忠梅是近年来赴美的大陆青年女舞蹈演员中比较独特的一位。这位出国前在国内已拿了半年国家一级演员工资的女孩1990年赴美时虽拿到了美方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食宿均须自己打理。她在美国选择用以维持生计的办法是到一个90岁高龄的犹太老人家里去做进住女佣，这样一来，她可以用做工换抵房租。事实上，她的这种生活并不轻松。如果仅仅是伺侍高龄老人一人倒还罢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犹太老人生性好客，每周至少大请客一次，几十个人的聚会一散，留给李忠梅的常常是上百个碗碟。她到纽约后需要同时研读英语和舞蹈，每周课时多达30多节，下课后还要十三、四个小时的家务，成为同行中的有名的“拼命三郎”。

但即便生活紧张如此，1993年，李忠梅还是在美东大西洋城举办了首位中国舞蹈家专场独舞晚会，同时更在纽约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舞蹈团。

认真讲起来，去问十个舞蹈演员，会有九个人告诉你，他们到美国来是要寻找个人生存空间而不是舞蹈空间的。胡嘉禄表示，这种现象其实应归咎于中国大陆对舞蹈演员的选拔办法。他说，中国的舞蹈演员在选拔办法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不少演员根本就是在对舞蹈毫不热爱的前提下被选进舞校的，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在由中国到美国这种人生转折过程中转行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由于攻读舞蹈专业的学生签证不需要托福成绩，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来美，因此不少国内演员多半还是靠“读舞蹈”出国的。但到美国后由于舞蹈演员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而且由于大多舞蹈演员在多年的习舞生涯中，未能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因此在美国生存压力的冲击下，往往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站在人生的角度从后往前看，特别是对于到美国发展的中国舞蹈演员而言，中国式的舞蹈演员培养方法从根本上就是罪孽深重。中国的高级别艺术团体对舞蹈演员的招收是从儿童十一、二岁甚至十岁之前时即告开始，被选中的儿童集中进入舞校或学馆内统一学习。舞校内的教学方针基本上是“以舞为主兼学别样”，除舞蹈之外的文化课学习基本上以辅助面目出现。

同时，剧团内一切都形同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大团体，事事有专人监管，

不用学员操心。如此，造成了大部分舞蹈演员文化程度低下、对社会毫无适应能力、个人生活能力极差的生活素质。秉持这样一种素质，不少舞蹈演员在美国可算是吃足了苦头。有的演员在美国已呆了八年了，甚至于仍下会开一张私人支票，每次汇款回大陆开支票时都必须找可靠的熟人以现金兑换他人的私人支票，汇走了事。

一般的舞蹈演员在美国放弃专业之后，多去做农场、餐馆等类型的工作。一些心气高的人还会去学会计一类的专业课，另寻出路。70年代在国内颇具名气、曾主演过电影《生活的颤音》的芭蕾舞男演员史钟麒，八十年代未赴美后即转行到了农场做工。他在国内即有自做衣服的兴趣，这种功底使得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已成为一家韩国业主开设的农场中首屈一指、手艺高超的打样师傅。他在业余时间兼修服装专业课程，薪水数目在纽约舞蹈演员的圈子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介阔绰。史钟麒目前早已远离舞蹈，最大的梦想早不是满堂掌声，而是何时能走出韩国人的农场，自己做一回自己的老板。

在纽约众多的改行者中，原武汉歌剧舞剧院的舞蹈编导章仲林是其中最具先驱及成功意义的一位。章氏目前不但在纽约有大房好车，还拥有颇具规模的事业。

据与章仲林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原江西乒乓球队教练邓忠良回忆说，他和章仲林的相识相当“诗意”，但却情状细腻。有一个雨天，当时都在送外卖、素不相识的章仲林和邓忠良各自披着雨衣在曼哈顿骑车送外卖，两人恰好走到一个红绿灯下。邓忠良回忆说，当时正巧是一阵大雨才停，两人同时来到红绿灯下时正巧是红灯，“我们两人的自行车同时停下，我们同时撩开遮在眼前的雨衣帽子，一抬头，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邓忠良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认识那天的那十几分钟。那时候雨过天晴，我们俩同样的装束、同样的职业，彼此觉得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那种相同命运给我们造成的联系，让我觉得特别有宿命感。”邓忠良慢慢他说，“再然后，我们从送外卖的雨天慢慢走到今天。”今天他俩已经在纽约合伙经营一个名为“家乡”的大型冷冻食品公司多年了。这家颇具规模而且规章严格的公司以专营冷冻水饺、包子为主，发展至今成为纽约同类公司的“龙首”。

35. 中国画家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以画家自诩者之多，多到让人麻木的地步。尤其是在纽约，天气好的时候在街头常能看见市内的画家们在外卖画，而且这种自诩艺术家的涉猎范围之广，几近不明廉耻的边缘。

纽约最著名的景观就是满街满墙被人瞎涂乱划的“涂鸦”。这种“涂鸦”多是用油漆画成的，一旦“完稿”则很难去除，偏偏这种艺术牵涉面极广，街头巷尾无论是平凡的寻常建筑物。还是高高的高架桥栏下，这种东西说来就来。在纽约只有很少一些地区的建筑得以免沾这种艺术，“涂鸦”艺术近十年来不但已经成为历届市政当局的老大难问题，而且也是民间多年来各种社区会议中的大小主题。

即使有百害无一利，仍有一些纽约人是靠这种“艺术”成名的，头衔就是“著名涂鸦艺术家”。

在这个城市住久了，我渐渐明白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自诩画家者大凡是如下三种人：

一是真画画的人。这种人具有一定的功力。

但大凡这种人，有一半人是不能依靠作画为生的。

二是有钱的而没什么事做的人。这种人中以日本学生最具代表性。有钱，但没有其他才气，“钻研艺术”就成了消磨及升华生命的一个突破口。

三是无技能寻求其他正当职业者。

我的一位早年在国内画画的朋友到美国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不得已进入艺术学校报到上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劈头就向他和其他学生罗列了长长一串美术工具的单子，从油画的各款刮刀开起直到画布的规范。

第二天，我的这位朋友进入美术用品店仔细看过后惊出一身冷汗。他看见在美国最便宜的画布每卷也要八十多块钱，而价格高的一卷十来米长法国画布的标价竟是一千美元。美国颜料的基本价格在十元以下，但其中的紫色、粉绿、湖蓝等每管卖价竟也在数十元之谱。而且，从数量上说，美国颜料的种类可说是中国的几十倍；在中国通常只是三种的油画用油，在美国的同类产品品种竟多达上百种。

从此以后，他把在美国画画的中国人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用得起美国美术用品的，另一种则是用不起的。中国的颜料一向有易乌、画面效果偏灰黑的尴尬，美国的这类东西则效果光鲜，同样是玫瑰红加白色，中国颜色出来的效果是发暗的桃红，而美国颜色调出来则是一派明艳。“鲜得出来，深得下去”。

无力使用美国美术用品的人，就一直恶性循环地画那种发乌的画。

在近十年的美国美术界，中国人给美国人带来的震撼是有太多水准一流、各种基本功超级扎实的“美术移民”拿着一纸录取通知书，按部就班地进入美国的名流大学就读。这些人基本功之优秀，使太多美国的业界人士暗自吃惊，纽约普拉特大学的一位美术教师说：“这些中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基本功都比我好。”

而美国给中国画家的感触则是美术工具的陡然丰富。这种超乎想象的突如其来，使大多的“美术移民”反倒陷入多少需要重新适应的不知所措之中。

中国画家到美同后以纽约、加州及芝加哥等地为最多。发展到今天，在美国的中国画家之多，已多到彼此“伤了感情”的地步。

在几乎任何一位画家眼中，能找到尽可能品质高的画廊订立合约是患定生活状况的首选。在美国，“和画廊签约”的意味是和商业画廊签下一纸为期二年到五年不等的商业契约，大部分画廊平时不支付旗下画家的任何生活费，但定期为其举办作品展。也有一些画廊每个月会支付画家一些小额生活费用，但大都言明将在其日后出售作品时扣抵。美国一般的画廊与画家卖画的分成比例是五五开，但这也是要视画家与画廊的水准差距而定，因此，也有相当的分成是采用三七开及四六开的。

中国画家之中最常见的自我推销路于是拿着自己作品的幻灯片走进画廊毛遂自荐。想在美国好好生存的画家如果身后没有画廊的支持，往往徒有天工而无处施展。对此，不少中国画家深有感受。原北京画院油画家张红年在初到美国时带了自己大批的画作，在一段相当长的开始时间内局面打不开，经济困窘。他的房东有一天动了恻隐之心，带了一票人来看他的画，其中一个人就指着他的几幅小画问，这几张卖多少钱？当时的张红年咬着牙开给了对方一个“天价”说是“每幅两百元”。后来，当他找到画廊之后，又曾把当年这些小画之一拿去试卖。张红年说，当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这幅小画挂上墙，有一个客人就指着尚靠墙而立的这幅小画问价了。画廊的负责人那时是十分知道张红年曾为这类画设下的底价的，见有人来问，就依着自己的定价习惯回说“两千元”，说时还向张红年飞快地做了一个鬼脸。

这个问价的人当时就不声不响地开好了支票，付了钱。

中国画家来到美国，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了顺应美国艺术市场的需求及艺术潮流的走向，是否改变自己以往画风的问题。

在美国的中国画家在创作技法上虽各有不同，但在画法归类上不外分写实派、抽象派和中国画派三类。

美国是一个充斥现代抽象艺术的国家，而这个领域的发达盛况也给不少中国画家，尤其是不少功力稍差的中国画家带来希望。不少人到美国后面对美国看上去庞大的现代美术市场开始改行专搞现代艺术，希望在这一种相当“美国”的道路中寻到蹊径。不可否认的是，不少艺术家在美国的这类艺术实践中对自己的创作内心有所发掘，而且不少人在艺术创作材料上也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

在纽约的中国画家中，几年来现代作品最为骇世惊俗的当推陈强。

陈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两年。1986年赴美在爱荷华大学进修版画，近年来则从事传统油画创作。但他在纽约的真正成名倒不是因为他的油画和版画，而是因为他的两件观念艺术作品。

他的作品，胜在胆大。

1992年4月至6月，陈强在纽约艺术家聚集地苏荷地区搞了一次名为《灵在世纪末》的观念艺术展。在这部作品中，他拍下纽约许多流浪汉的照片，他除了把这些照片编号后分贴在苏荷地区每一家的大门上，并把这些照片制成路牌贴在一些路口的真正路牌之上外，他本人还带领着一些流浪汉在街头用慢动作进行行为艺术表演。他解释说，他的这一作品借由流浪汉对生活的态度及精神状态表达现代人没有着落的感觉。

1993年，陈强又推出了名为《天堂的留言》的第二件观念艺术作品。

为创作《天堂的留言》，陈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遍走曼哈顿下城的前前卫酒吧的厕所。他利用这段时间拍摄了五千张厕所内写有脏话的涂鸦照片，将这些照片做成一百六十种不同样式的四十万张明信片。1993年7月至

9月，陈强每星期都会选择几天将这些装在写有“天堂的留言”字样的信封中的名片铺放在苏荷地区的街道上，任人拾取。平均每次要铺放两万个信封。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九月份他举行名为《天堂的留言》室内艺术展为止。而作为作品《天堂的留言》的另一部分则是将这些厕所涂鸦照片整理编撰成一本书，名为《东村酒吧指南》。

对于他怪诞、大胆的作品，陈强解释说由于社会及文化的原因，人的本性被极度压抑，无处也无法渲泄，就只好在厕所内交流。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厕所涂鸦才是人最本性、最自然的东西。

有一天晚间，纽约市公职党内初选结果揭晓，我奉电视台之命采访涵盖华埠的第一选区两位预料之中命定会输的市议员竞选人。当晚六、七点钟，我和摄影记者才把车于停稳在百老汇下城街区上，一推门一脚就踏在一个素白的大信封上。当时脑中出现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会不会是陈强的那个艺术？”低头细看，果不其然。

可感动的是当时我们的停车地点离苏荷区已有相当的距离，而且环顾左右，四下里全是这种信封。打开信封，内中物件虽已在预料之中，但打开看过之后仍相当高兴，毕竟陈强是一介中国小子，而脚下则是别人的纽约。

在全美搞抽象艺术的中国人之中，周山作、周大荒兄弟在芝加哥所走出的创作道路曾被目为奇迹。周氏兄弟曾先后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曾在国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展览中心及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他们自1986年在游历欧洲之后来到美国，最开始的状况是带着几百美元挤住在极小的公寓里。但在美国几年发展下来，他们所参加过或自行举办的画展总数多达六、七十个，数量惊人。他们的作品尺寸动辄在一百英寸以上，二人的巨幅作品卖价据知已达36万美元，多幅作品被美国、香港等地的著名建筑采用力陈列品，作品《人·自然》被列入1988年《美国在世艺术家百科全书》。

到了1989年，周氏兄弟在芝加哥购进一个总面积达一千六百多平方米的三层楼作为创作基地。

除了周氏兄弟外，与美国各类现代艺术所面临的尴尬一样，美国的现代美术场面虽大，但终究不能为中国画家架构出一个稳固的经济市场。十几年来虽陆续也有中国画抽象画的画家举办过各种规模的展览，但真正的市场并未曾真正打开。也正因此，不少对在美国发展现代艺术兴致勃勃的艺术家来到美国体会到这种真实，而且在自己独创出自己风格的现代艺术却无人问津后，不禁黯然。圈内明眼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局面：“人人喊出声，个个不出色。”

中国画家在美国的发展史中，有一个章回不能不提，这就是“云南画派”的鼎盛及式微。所谓“云南画派”，是在技法上打破了传统的国画技法的一种画派，其利用在宣纸上用笔两面润色，以使画面色泽效果奇特。这类画作说白了就是一种工笔重彩画，画面以色彩绚丽、线条流畅及装饰性强为特点，并且画幅多为极大。在题材上，“云南画派”多取用云南风情的人物、景观人画，画面效果明朗。此一在美国兴起的“画派”代表人物为原云南画家丁绍光、蒋铁峰。由于代理人推动成功，在1987、1988、1989年云南画派的全盛时期，美国著名的艺术杂志《ARTNEWS》（《艺术新闻》杂志）接连刊登整版广告专做推荐。而且，云南画派的画作紧接着在日本乃至大片欧洲都有了可观的销售。据知，全盛时丁绍光的一幅画原作在日本卖价最高可达25万美

元，加上限量印刷品的出售，每张画的总收入竟可达 100 万美元之谱。丁本人则在好莱坞影星群聚的地区买下了价值百余万（一说是五百万）的华宅。

这种盛况很快在中国画家中被艳羡。凭心而论，云南画派画面创意虽美，但其对技法要求不高。为盛况吸引，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画家们开始一窝蜂地画开云南画，一时间“云南画派”在美国直热到一有中国画家去画廊推销自己时，画廊的主管就会问上一句：“你会画云南画派的画吗？”

随着这一热潮的猛烈兴起，人人闻风而动，云南画派模式的画很快行情下跌，时至九十年代初时，已经乏人问津。

中国画家在美国画梦相对长久的是写实派油画家。

中国写实派画作在美国走红多年的一个原因是，这类强调画技的东西相对缺少竞争对手，而且这也恰恰是中国画家经由专业训练之后的所长。美国人中，即使是艺术院校的教师，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连一个鸡蛋都画不圆。故在八十年代中期，功力十足的中国写实派画家进入美国如人无人之境，发展虽普遍的并无大红大紫，但却相对扎实。而且，加上美国有不少老派人等喜欢找画家为自己作像，因此来自肖像订件的财路对写实画家而言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如果说在中国时，中国真正的画家们大半是在用心作画的话，那么由中国转赴美国发展的中国画家们在美国呆够两个月之后就知道在美国自荐的功用往往比扎实的基本功等其他东西更有用。除非画家在一开初就投靠了一位比其更善交际的经纪人，不然功力达到一定程度之上的画家可说是靠交际吃饭的。

更尤其在纽约，画界人头粥粥，竞争激烈到把不少不擅言辞的画家也训练得每每外出都带着自己的作品介绍；从来不信邪的画画人也会进入教会，宁可每周花时间去听对其而言万分枯燥的证道，也将其视为一条收取作品订件的“重要管道”。

更由于画作的订件来源及一般画作的销售管道与每个人的生计紧密相连，因此，性情中的画家按规矩均对自己的“身后事”密而不宣。

原为中国黑龙江省美协的画家李斌 1979 年时与创作伙伴曾以一本连环画《枫》轰动全国，此作品并曾获中国第六届美展连环画一等奖。出国后先是在日本发展，于 1989 年转赴美国。由于在油画肖像画上技法纯熟，移居美国短短四年内，李斌已成为声名远播的肖像画家，他的订件肖像中甚至包括了纽约市长丁勤时和台湾的蒋纬国。几年的肖像画生涯下来，他已成为曼哈顿中城最黄金地段三大道与 59 街附近两处公寓的业主。而李斌对自己热衷肖像画的解释是，他想“以肖像养创作”。

由于受竞争乃至其他种种原因的影响，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写实派画家在制作肖像画时，在制作上开始出现一个越来越不是新闻的“肖像制作”方法。这种“肖像画”的制作是在画布上涂上底料及显影药涂料之后，用幻灯将照片打在画布上显影之后，略做绘画性技术加工即可。这种“肖像画”制作法具有真度高、交件快的好处，但其无疑已称不得是画了，而是一种印刷。这类在织品上做印刷物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十分普遍，不但有有关的美术印刷品出售，而且在寻常的照相馆中也有提供此类人像放大服务的，收费仅数十元。此一项在中国画家们之间流传的技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而且有所延用。不少圈内人忧心忡忡他说：这种技法的普及于中国画家在美发展路途中，绝对是一枚定时炸弹。

在美国，不少多金的大家族在收藏方面多有自己的收藏顾问，而这也给功底深厚的画家带来不会被埋没的一种保障。在美国的写实画家家中，最早在美国举办有影响画展的中国写实画家是陈丹青和陈逸飞。其中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曾以“西藏组画”扬名中国的陈丹青于1983年6月在纽约瓦利桑德利画廊举办的个人画展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主流画廊举办个展的写实主义画家。而真正造成美国人对中国写实主义美术有群体认识的画展则当推纽约大中央画廊于1986年举办的陈丹青、金高、张红年、李全武和王济达作品联展。当时的盛况竟是美国的《纽约时报》、《ARTNEWS》（《艺术新闻》杂志）及CBS电视台均做了大幅报道，这在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个大小画展举办的美国，殊非易事。其中，《ARTNEWS》中报道的标题就是《从中国来的写实主义》。在接下来的1987年，纽约哈夫纳画廊更从国内邀请了一些写实画家举办展览，成为一时盛事。

在众多来自中国的写实派油画家中，原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油画组负责人陈逸飞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奇迹。

尽管当今的中国画家不少人陈逸飞到美国后的作画技法及方式负有微辞，但其在美国商业社会中得以惊人的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逸飞1980年赴美时也是一贫如洗，曾在博物馆中靠修补古画为生。他几乎是中国画家中最早进入美国发展者当中的一个，他的所履所及为后到美国的中国人留下明鉴。

陈逸飞是在纽约投靠了大名鼎鼎的哈默画廊后，生活才有了转机。在此之后，他迅速成为美国行情最看好的中国写实油画家。他东方仕女系列画中的一幅《夜宴》曾达到中国画家拍卖价中的最高价：198万港币。

他目前的每幅30×40英寸的肖像画据知卖价已达四万美元，而他和画廊的分成是画廊分四，他分六。而如此尺寸的肖像画在他而言“只是一个星期的事”。在哈默画廊中，他的画被摆放在当代仍在世画家作品的最显著位置上，而且，哈默出版社为他出的画册也被用玻璃罩子封好放在最主要的厅内供人“瞻仰”。据哈默画廊的职员讲，陈逸飞是该画廊作品售价最贵的在世画家之一。1994年初的一个平常日子我去哈默画廊参观时，看到一幅陈氏的大型油画作品《芭蕾舞演员》赫然悬在二楼当代画家作品最主要陈列室的墙上，标价为11万美元。1993年陈逸飞在上海拍他的实验电影《海上旧梦》时，哪怕在夜半三点也有人从世界各地打电话给他催画。

但在九十年代，普遍而言中国的写实派画家的好运开始下沉，确切点说就是发展至今，由于写实画派在美国整体都走颓势，美东的一些重要的写实作品画廊基本上已经不再和中国画家保持一如以往那种相对紧密的“承包”关系，而改为松散的联系。而且，九十年代美国写实主义市场的情形也糟到连一度极具规模、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写实主义画廊大中央画廊自己都基本处于倒闭状态。祸不单行，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中国画家（尤其是写实主义画家）在竞争上又遇到来自前苏联地区移民美国画家们的威胁。这些人的出身社会背景和中国画家相同，功力也和中国人相差不大，大部分并非等闲之辈。而且，自1993年以来，港台等地对中国画家作品疯狂采买热也已大大降温，在全美及国际的不利情势围堵之下，中国画家今后的路无疑将更形多艰。

对此，当年中国大陆写实主义画家在美发展的“第一人”陈丹青却表示情势的发展在意料之内。“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构成过情况。”陈丹青说，

“而且，美国在八十年代对我们已经很够意思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但在谈到是否会有回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时，已当了11年纽约居民的陈丹青说：“不大会了”

他说：“一个摊子都放到这里了，再回国等于又出了一趟国。”

在美国的大城市，仰赖独特的地利之便，画家们更有一些偏僻州内基本不具的生存空间。它们之中一是去街头为游客画像；二是搞花布设计及图样制作。

以纽约而言，通常画家的最后一条而且也是最多人走的谋生之路，是到街头为人画像。往往是一个小凳、一个画板、几个纸框就构成画家们整年赖以吃饭的家伙。在纽约操此行当的人众多，上至中国国内美院的教授，下至还根本没入门的学画人，每人在自己面前摆放上一张时常是借来的样画，就算营了业。街头画家的画像生涯往往是看天吃饭。每年春、夏、秋季天气不算冷的时候上街，三季下来收入可达一两万块。街头画像者中最著名的事件是中国画家林琳1991年在街头画像时由于与黑人发生冲突而被人一枪毙命的事情。非但如此，这种画像生涯除了得防犯歹徒的攻击外，还得对付警察的“执法”。

一般画家上街头画像，按纽约的法律归类都属于“无照非法摆摊”。为了防堵这一违法行为，纽约警方在维持治安的同时，把对这一类问题的查禁工作也做得从严从细。我在来美几年之内，就曾无数次在街头看到警察抄堵违法画像者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轻者是警察没收画家的画具；重者画画人还会被逮捕，被关押两、三天后罚款一、两百元。不单如此，被关者还会像真正的犯人一样被照像和打指纹存档。

为了维护街头画家的权益，代表纽约街头画家、有六十多位华裔画家参与的“街头画家联盟”在林琳死后不久宣告成立。这些画家在民权律师的协助下开始了争取合法街头画像权益的活动。在1993年下半年纽约市政府为此召开的专门听证会上，该联盟的负责人倪军证实说：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纽约街头画像的华裔画家人数已达一百多人，他们中既有在校学生，也有已经毕业的人。这些中国画家大半采用天气晴暖的半年上街为人画像，天气寒冷的小半年在家里搞创作的办法定度过美国生涯。

在纽约街头画像的价钱是，黑白的每幅15元；彩色的价格要贵些，通常在25元左右。客人如乐意为像加纸框，则每个纸框的加装及成本费为五块钱。街头画像画家几乎清一色是大陆人，他们三五成群地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时报广场等处结伙作画，主要赚纽约游客的钱。据了解，街头画像的生意在早几年，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末期时画者的收入还十分可观。但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赴美中国画家人数的增多，开始出现“狼多肉少”的状况不讲，中国同行间还竞相压价。即使在一同作业的一批人中，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常常是大家出发前讲得好好的统一了价钱，但是到了客人挨个比价时，一定有人和客人“咬耳朵”（圈内人对和客人私下另外商量价钱的一种比喻）。

在纽约这个特定的文化城市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画家们的妻子只要是曾经和美术打过交道的，几乎都操起了花布设计这一行。

纽约是美国时装设计的总汇处，制衣及相关工业十分发达，全市时装工业每年的经济影响力高达220亿美元，因此时花布设计的需求相当可观。美国人在时装文化上对欧洲崇拜有加，就时装设计就整体而言，美国时装往往

要比欧洲的节拍晚上一年左右。每季的欧洲时装发表后，美国的厂商往往有样学样，拿到现货进行改装。而这之中，花布图样的改色、修改花式一类的事情因此层出不穷。而这就使得纽约花布设计在早几年薪酬极好，每人每月进帐四、五千元十分平常。行内人说，此行业原由韩国人和日本人所把持，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城更有大量韩国人开设的此类培训班，学费极其高昂，每两、三个月的学费为二、三千元。以往，这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无论是否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在经过了半年到一年的密集培训后基本上均可胜任工作。

八十年代后，大批的中国画家进入纽约渗透进这一行业，由于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在完成样件的质量和创意上均比他人高出一筹。但与街头画像情形相近，中国人的大批介入，使得此行业中竞相压价之风甚盛，虽是人人不情愿，但却个个不已。

几年来，中国人已经不可逆转地攻陷了这一领域。迄今，不少中国人开办了主持专接花布设计定单然后分派下去的工作室，真正进入了美国正常的时装操作管道。在这种工作室中，通常分别雇请数名画家工作，工作实行计件付酬，小的画稿每张数十元；大的画稿每张可达几百元。一些资深工作者也可成为工作室内的长期雇员，享受医疗保险一类的福利。

而太多中国画家太太们从事此一行业的一个公开说法是，希望维持住一份固定薪水，以便自己的丈夫能专心从事创作。

但话虽这么说，中国画家在美国的发展步骤中，他们中不少人曾经十分熟悉的“从事十分自我的创作”，已越来越成为一种飘渺的概念。不要说仅仅是“力稻粮谋”的现实所迫，而且在日复一日的美国冰冷而真实的旅居生涯中，还能坚持对无疑不具经济价值的行为予以追求的自赏者，已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美国的冰冷给中国画家指出的明道是，保全饭碗而放弃以往。

36. 也是车，也是祸

来美国多年，父母在给我的每一封信后面都会诲人不倦地用括号注明“千万不要自己开车上街，至嘱至嘱”的字样。虽然多年来每次写信回家均会向二位老人晓以在美不开车将寸步难行之类的利害，但下次的北京来信仍是一通原封不动的“至嘱至嘱”。

搞到后来，在美国每次拉开车门跨进驾驶座，干脆有了一份欺君瞒上的莫名罪恶感。

在美国，汽车之于人的意义十分严重而独特。这一点可以从驾照在美国人身份证明中的重要程度看得出来。在美国，驾照由于具有姓名、照片、住址、出生年月乃至身高等各种身份资讯一应俱全的特点，实际上是美国人日常拥有的最重要一个证件。民众每当在邮局领取包裹、购买枪枝等各种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最能够过关的证件首推驾照。在内华达州，甚至于在离婚手续中出具的身份证件也是驾照。

据说，不少留美的年轻中国男人不大情愿回到中国去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留恋能在美国更方便地开车。这样的归纳我还是听我所任职的电视台中一位交游广阔的摄影记者讲的，为了印证此说，他并举出了大把人名和他自己。

乍听之下，这种理由多少有点荒诞。细品之后，却觉得不无道理。

在美国生活的多数年轻男人都会对每年国内各汽车制造厂家生产的各型车种中的新款了如直掌，尤其是对世界名车发展情势的追踪，简直比对女人的热情还要高涨。每每出行，如果车里有两个以上的年轻男人，在高速公路间各款杂车施施然游走左右的一路上，话题中能绝口不提车的，相当罕见。

外出采访，和男摄影记者驾车出门，高速公路上如遇有级别高的敞篷奔驰，甚或罗斯莱斯等名车从旁驶过，摄影记者的眼睛一定确凿地依时放光，自始至终地彻底尾随。更有着魔者还会紧紧跟上，一脸能多看一眼是一眼的不清高。

非但如此，每次外出如若途经高级车的专卖处，摄影记者们也必定罔顾肩揆巨硕摄像机的沉重，痴迷地隔着落地玻璃表情复杂地观望。

美国多少年来都是世界上的汽车大国，近年来的严重经济不景气对汽车工业的冲击并不算大。以九十年代初为例，1992年美国的汽车总产量为九百八十万辆，1993年产量又跃升为一千零七十万辆。到1994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被顶估在连续13年屈居日本之后将再次回到第一的宝座，总产量达一千一百二十万辆。

事实上，与美国汽车生产的势头相比，日本汽车近年来的确在走颓势。比如，1992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为一千两百五十万辆，而1993年则降为一千一百一十万辆。而且在美国汽车市场上，近十年来在占有率上一直呈上升趋势的日本车也逐渐式微，一度曾占据30%左右美国市场的日本车到1993年时占有率下跌到24%。在这一年中，由于美国车车价的涨幅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从日产汽车中夺回了2%的市场。

进入1994年，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提升，日产车将被迫提高车价，涨幅最高将达10%，此数字将比美国车的涨幅高出几倍。分析家们表示，1994年日产车涨价后，它同美国车的平均差价将从一千六百五十三元上升到二千八百四十八元。此也被预言将导致日产车在美国再失去一个百分点的市场占有率。

汽车在美国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装备，在美国大多数地区，没有车连工作、生活都无法进行。所以在美国一般城市的一般情形下，车成为除住房之外生存中的第二要件。而另外一个无从查考的有关车之于美国人意义的传说更让人对美国车的地位无从小窥，这种说法竟是美国现存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由他们的父母在汽车后座上“交接”出的产品。

那么也就可以说，对当今的美国人来说，汽车不但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一个蜜月旅店房间。

在美国，买车是件相当普通的事。买一辆品牌一般的新车，价格只在一万到两万五千元之间，相当于一个有职业的普通人一年的薪水。但买新车的一个弊病是买车人一般也会连带着为新车买全保险，而这笔开销往往在每年千元乃至数千元之谱。以纽约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由于治安不好，一般新车的全保险价格在每年两千元左右。不少美国人是用贷款买的车，那么更是将被贷款机构要求买起全保险。也因此，美国入风行的一句有关感叹和中国人关于买车的感叹竟有惊人的相似：买车容易养车难。

不愿意把钱过多地花在汽车上的人通常会去买一辆旧车（也就是二手车）。美国的二手车市场价格从一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端赖买家的经济状况乃至车辆已行驶的里程、车辆的内外保养状况及所选车辆品牌而定。也有时用几百元钱就能买下一辆旧车来，运气好的人小小地修补一番即可大大地使上一气。

美国近年来经济大不好、治安大不靖，充斥着收入一般的平民和偷车贼，因此，二手车的交易远比新车来得活络。为配合二手车买卖，美国市面上并专有车辆折旧价格的有关书籍可查，这种书每隔一段时间会重新出版一次，以利人们在交易中有所依佐。美国社会对于汽车的运行状况相对讲究，就美国人的一般概念而言，美国 1974 年以后所造、引擎设计为 6 个缸的中型车最佳基本寿命是 7、8 万哩；而 8 个缸的大型车是 10 万哩左右。美国人使用美国车，通常哩数达到 6 至 8 万哩就需换车了。相对而言，日本车在美国移民阶层口碑不错，一来其有体积小及省油的优点；二来盛传它的寿命高于美国车。这种说法在美国华人中尤其盛行，也正因此，在美国华人社区内的二手车市场上，同样年份、同样状况的日本车往往要比美国车贵上许多。

近年来，由于治安的恶化，美国的汽车发展已经进入另一片蹊径，美国商人开始赚起独特的“治安钱”。美国的开车族现下在自己的车上加装装甲防弹的个案开始增多。这类在其他国家远还连想都不曾想到的个案内容主要包括改装业者将轿车的座椅部位的车身加装合成轻装甲、门窗加装防弹玻璃等。经过强化了了的保安车，可挡住一般的 38 口径的手枪子弹，或威力更强的自动步枪的射击。这种改装价格不菲，光是改装基本的防护设备就要花上数万美元。比如，美国欧格拉公司推出的凯迪拉克 STS 保安车除了车价基本要价在四万五千元之外，还要再加上四万元的改装费，其总价高得惊人。

发展到今天，美国保安车的强化工作甚至于已经出现了更新换代的进步，更加强化的保安车颇具专业水平，这类车中装有防爆油箱、安有防盗车门、配有特殊轮胎以便在轮胎遭到枪击后仍可如履平地地开走。

与美国汽车普及概念相仿，美国的车祸也十分流行。而且三、四十年以来，车祸早已成为美国人致死原因中最大的罪魁。据美国公路安全保险研究所指出，1992 年，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死亡人数为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五人，此数字低于 1991 年的四万一千五百零八人，是 1961 年以来高速公路车祸死亡

人数最少的一年。而在 1961 年，美国的此项数字为二万八千零九十一人。

居美几年能毛发无损地未经任何车祸，当堪称好运。

美国的车祸在实际上带给当事人的是一种十分矛盾的意境，一定一半是喜，一半是忧。如果你在车祸中只是别人过失的带累人，那么你真实的处境是介于性命安全与捡到个发财机会之间。原则上是伤得越重，你因车祸所得的赔偿就越可观。美国主做车祸案子的律师多如牛毛，常常是案子不获赔偿就全当学了“雷锋”，不收律师费。因此，当事人尽可以在向律师陈述清楚案件经过后，回家等着律师通知领钱。

但如若遇到稍具规模的车祸，理赔的进程会相当拖沓，这种时候，当事人往往等上一、两年也等不到最后的结果。

由于美国的汽车保险制度相当严谨，因此，人在美国出了车祸，当事人之间鲜见争吵，大家下车先互抄保险号码等相关资料，等警察赶来做过事故记录后就可各聘律师打官司追究责任。

这之中，有财产和无财产的人在官司中的位置及状况十分不同。

有财产的人出了交通事故，如果所保的险不幸不能涵盖所有的赔偿，那么就要把自己的私人财产赔进去。因为对方的律师很方便地就可以从信用局查到肇事者的财产状况，那时这种索赔一方的律师可凶猛地进入角色，好勇斗狠，主动权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可以把对方的财产有多少就告进多少。

没有什么财产的人一旦打起这类官司来，则显得“身手灵活”得多。比如说一个月薪只有一千三百多无的中下等收入人士，平素也没有什么积蓄及不动产，偏偏他开车出门撞坏了别人的腿，对方伤势严重。但肇事者为自己车辆所保的险最大保额也只是二万多元，那么，车祸中的断腿人则自官司开打的第一天起就不应该巴望能有“值回这条腿”的赔款。这也就是说，这位不幸被撞到的人全部可以索赔到的大约也就只是这二万多元。

所以，近十年来，在美国尤其是华人聚居的大城市，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靠给入送外卖维生，这些人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游走，被汽车撞伤的案例相当多。在从事这一相对危险行业的留学生们之中，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在街上被车撞了但有幸还神志清醒的话，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看清撞你的是什么车和什么人。如果是一个黑人驾着辆破车，那你趁早起身走人；如果是一个白人驾一辆奔驰，那你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装作不支继续倒地不起，等候警察和救护车，并且加重上报伤情。

在美国关于汽车的陷阱很多。因此，美国人讲究的两个不借中其一是钱，其二就是车。

把车子借给朋友开，只要发生车祸，如果保险也上在车主名下的话，车祸记录就进入车主的保险。这样一来，保费提高不说，万一车主有财产，对方就告车主，同样是有多少财产就告多少。

近几年来，美国各州又发展出了不少新的有关车祸责任的法规，美西一些州的法律甚至规定：不论什么样的聚会，客人如果酒后驾车出事，供酒的主人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来纽约第二年时，我曾出过一次车祸。但这次车祸留给我的却是一些关于财务方面的美好回忆。

1990 年夏季的一个雨天，我的车在纽约交通最繁忙的威廉斯堡桥上被后面的车猛撞了一下。当时我和我大夫同在车里，身体上唯一的不适就是头被突如其来来的撞击弹向椅背，颈部因此稍稍地被扭了一下。

下车察看之下才知道，我们遇到的是一起连环车祸，肇事者是我们后面的第三辆车。这车在雨地里没能停稳冲向它面前的车，这辆车又冲向我们的车。与此同时，肇事之车后面的一辆车在车祸瞬间发生后也没能反应过来，撞在肇事车的车尾。事发后，连接曼哈顿与皇后及布鲁克林两区的威廉斯堡桥大堵特堵，严重影响了交通。

警察在事发二十分钟之内赶来，做好详细记录后，四辆当事之车作鸟兽散。

我们为此次车祸聘请的律师是位据称以“磨”工见长的犹太人，专擅和各方斡旋，为当事人“磨出”更多的钱来。在叙述了有关情节并签署了一些文件之后，我们便被嘱回家为稍稍扭了的脖子去频繁地看医生并等候消息。

这一等就是两年。

再等到通知时，我们被要求参加调解应讯。在此之前，我们已获得了有关车子被当作全损车辆的全额赔偿。撞车时，我丈夫还是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学生，车被撞坏后，他又去买了辆新车，那部已被检验认定是全损的车就交给了我，权应近程奔走的不时之需。

但怪诞的是这部车很快就被别人看中从我家门口偷走了。

车祸调解应讯时，我丈夫业已毕业，当时人尚在中国，接到消息后专程赶回。我们的律师在我们应讯前匆匆向我们嘱咐了几句应答要点之后，我们就被几个坐姿十分不正规的人在一间类似教室情状十分不工规的“应讯问”里分别被盘问。

所问问题不过是对事发当天的情况以及当事人关系的质疑。

然后，我们每个人得到了八千多元的赔偿。我丈夫因为有返美应讯的一趟奔波，赔偿金额比我高出一张北京到纽约往返机票钱来。

而这钱仅仅是赔偿我们两人稍稍扭了脖子这点微不足道的皮肉损失。

原以为这事已经了结，一年后的夏天，有一天不期然又接到了“磨工”律师的电话，说是当年的这个案子又有赔偿下来，每人七千元。

一别就是一年，我们的这位律师已开始不明原由地蓄须，看到我们时，他声音低沉地自夸说：“我从天上为你们抓到这笔钱。”此事过后好一阵子，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同事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新人脖子后面满是黑斑，右手臂的表皮也形同枯木干缩得毫无美感，问过之后才知道是车祸使然。本想追问他得到多少赔偿，但他轻描淡写他说他的车祸发生在十来年前的中国北方，在去北戴河的路上，“除了治伤，什么都没有得到。”

很美国地想一下，如果他的车祸是在美国发生的，以他的伤势相信他得到的赔偿一定接近天文数字。当然，若有那笔钱，他如今断然不会与我同事。

多年来，中国人在美国也是颇出过一些令人心惊的大车祸的。仅以大陆文化界人士为例，美国的车祸荼毒即可见一斑。一位饱受车祸荼毒的是中国当年星星画会画家兼诗人马德生。此位腿部有些残疾的旅法人士在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观光时遭遇车祸，同行的外裔女友当场死亡。事发后，旅美及旅法的部分大陆艺术家曾小规模地发起了一项为马氏捐款活动，并有多人前往相距遥远的救护医院探望慰问。

另外一个著名的车祸虽不是发生在美国境内，但一祸就要了两命，惊动了不少中国人，十分惨烈。早年间在中国主持编撰中国社会学丛书的学者何维凌，1991年为筹办一大型中国商品展，在墨西哥遭遇车祸丧生，同车遇难的还有他不满三十岁的妻子。据悉遇难时他们的身体竟被甩出车外。

我属于生性惧怕速度与惨况的那一类无胆之人，每次看到汽车也就别有一番滋味。虽说汽车乃至车祸之于我的意义迄今仍是恩大于威，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有关美国汽车之类带给我的种种所闻所见。

读者诸公他日赴美的话，大家小心，是为同勉。

至嘱至嘱。

37. 婚姻物语

1990年我刚到纽约未几还在一家中文报纸作记者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日早上忽然接到报社转来的一通电话，说是有一个中国人到报社来请求帮忙找自己忽然不知下落的太太。紧接着就和事主见上了面，该事主后来就因此成为我的一个走得很近的朋友。当时他说他的太太没有任何缘故地带着他的儿子不见了，几天来他已找遍了纽约她所有可能去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后来，我为他在我的报纸上写了一则消息，请他的太太回心转意；而他也在别的中文报纸上登了小型向他太太“求饶”的广告，但都一

无所获。

直到1994年的3月份我已回国准备此书的出版工作，寸听到美国方面的消息说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在加州找到他的太太了，是她在沉默了几年后第一次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他自己目前已经得了乳腺癌，而他在加州长了四年的儿子已经基本上和他视若路人了。

这对中国人而言可能也算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入乡随俗”吧。

无论远看或者近看美国人的婚姻，在多少年后都还会觉得对于美国人在对待家庭温情方面的特殊细微，中国人往往会毫无准备地陷入无从理解的泥沼，美国的不少高级白领或出身良好家教家庭的人，尤其是在美国历经性泛滥等社会动荡之后，往往视与家人团聚为生活首要。这种团聚往往会细小到保证每个周末陪同家人吃一顿饭。在美国的多少年中，常常能遇到秉持这一观念的中年人。究竟这算是美国社会的“怪现状”，还是时事演变使然，难于归类。

须知，美国当今的一代中年人是从当年的“嬉皮”一类思路极活跃的一代经历而来，这一代人的家庭观念如果单纯从出身家规严谨的传统宗教家庭解释，不太贴切。

而美国人婚姻状况给人的另一面却是完全的另一种嘴脸。流传在美国社会上的说法是，美国人中“几乎人人都有外遇”。美国的娱乐节目及杂志也一直视外遇问题为相当重要的话题，而且这类问题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美国的外遇数字被越估越高。在这些人的口中，1976年时美国结婚五年以上妇女有外遇的人数曾被估高达75%；而到了1990年又有一些此中专家著文说，美国的所有已婚妇女中有50%有婚外情。但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意见研究中心社会调查小组近年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全美已婚或结过婚的人之中，有婚外情的人数比例只占15%。此项调查是从1988年起每年向美国国内的一千四百位普通民众进行书面调查得出的结果。这项调查并发现，在1993年之中，有21%的男人和13%的女人承认自己在这一年中有婚外情。

如果抛却婚外情不谈，美国人现存的婚姻状况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构架呢？

据美国商业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美国的单亲家庭增加，离婚率窜高，婚姻维系期减短，无数家庭至少拥有一个继子（女）。

这项调查显示，九十年代初，美国二十至二十四岁适龄女性只有38%登记结婚，比七十年代下跌了25%。在离婚人士方面，调查发现，三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离婚比例最高，达40%至42%，三十岁以下的女性离婚率紧随其后，也高达38%至39%，而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的女性离婚率也达到30%至36%。

调查指出，大部分离婚者的第一次婚姻维系期在六年左右。二十至三十岁的女性大致只能维持三年半到五年之间。大部分妇女在离婚后再次结婚，但是她们的再离婚率也相当高，达 21%，也就是说平均五名再婚者之中有一位会再次离婚。

从不同的角度看美国人的婚姻，会有不同的颜色。美国人各种形形色色的婚姻观念一经汇总，相信连美国人自己在对自己群体婚姻观念的认知上，也是一头雾水。

在赴美的大陆人群中，在美国颠沛流离、无可预测的生活中，离婚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相反，能在美国这种大起大跌的社会中患难与共坚持下来的年轻夫妇，倒相对令人感佩。在中国夫妇的各种导致离异的因素中，各种人为的、“时代为”的状况多管齐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的婚姻经历了严重的考验。在这类婚姻中，不要说婚姻中的一方会因为赴美签证的问题致使夫妇连续几年不能团聚，从而影响感情；即便是夫妻双方都能如愿来美的婚姻，也还会经历各种旁的诱惑。

至少，在我身边的朋友们除了一些有孩子的夫妇，太多的人是在美国葬送自己的婚姻的。这些人中有因为婚姻另一方长期不能签下证来美而且导致双方感情淡泊的；有因为另一方经不住另外多金者追求而离异的；也有因双方就学的城市不同而渐渐离心离德的；还有另一方受不了枯燥的爱情生活而与他人出走再也没有露面的，形式千奇百怪。

林敏和刘民勇都是北京人，同是 1957 年生人。当年他们曾一起下乡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插队，彼此认识时都才十八岁。后来，刘民勇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林敏也返城进了工厂，并从职工大学毕业了业。他们于 1982 年结婚。

他们二人当年在北京康乐餐厅举行的婚礼首开同龄同学、朋友中的先河。他们的婚姻曾经是周遭朋友中被公认最情深意笃的一对，夫妻关系中的许多患难坎坷让他们觉得除对方外别无选择。

刘民勇于 1987 年从原单位停薪留职赴美国纽约自费留学，半年后为林敏办妥了赴美陪读的一切手续。原想夫妻俩人很快能异地重逢，但事与愿违，林敏在后来的两、三年中屡屡地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却屡签不中，眼巴巴地看着身边的朋友和朋友的老婆们一个一个地出国，从自己身边消失掉。

她当年甚至相信冥冥中绝对有一种力量在和她为难，她甚至明白这种力量不是要她的青春就是要她的婚姻。

结果被她不幸言中。

刘民勇赴美开初一切正常，并定期去曼哈顿四十二街从黑人手中买廉价的电话号码，然后驱车数十哩去紧邻纽约的新泽西州给林敏打电话。出售这种电话号码是纽约穷人中的一个公开秘密，作业流程是先由大胆的黑人在别人打电话时偷抄到他人电话卡片上的号码，或者干脆就是偷到大公司的电话卡，然后在纽约四十二街巴士总站一带出售给缺钱打电话的贫穷移民，每个号码收费五至二十元不等，价格视出售者的贪婪程度而定。有的出售者并附加有“售后服务”项目，每个号码都会为买家核察无误后才“钱货两讫”，这类电话号码的寿命可长可短，从被偷窃之时起算到被电话卡持有人取消为止，时间可能是十几分钟，也可能是一、两天。由于此一类买卖属于非法，因此便在纽约警方严厉取缔之中。这样，力求稳妥的买家往往要到远离纽约市中心地区的公用电话上使用。在使用这一类电话号码的问题上，中国人显示出的“协作精神”是无边的，一个电话号码买到手，往往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小时之内恨不得有几十个人都在同时用这个号码同时打往中国的不同省份。刘民勇因为林敏的关系，当年曾是朋友中买号码频率最高的一位，几乎是每周必买，从无遗漏。

他们的关系这么坚持了两年多，刘民勇首先萌生“告退”之念。他的这个念头的起因倒也顺理成章，是他和他到纽约的第一个女室友长时间的耳鬓厮磨有了爱意，该女生得眉目清淳，又有美国的硕士文凭，相形之下，林敏决非对手。

一来二去，先是刘民勇不再热衷去四十二街买号码了，后是林敏哀怨不已一肚子委曲，因为一点小事也会与刘纠缠不清。二人言来语去愈发恶形恶状。

后来，林敏在“识途老马”的指点下得到了加拿大的签证。本以为这对他们的感情来讲是一个调养机会，没想到刘民勇在几次赴加看望林敏后，双方因得以当面互相翻账、盘洁，甚至互相埋怨对方不能在海外艰苦的生活中搀扶一把，关系反而急剧破裂。林敏当时初进加拿大，短期内仍得不到进入美国的签证，英文只能结结巴巴地讲不到十句，极希望刘民勇能到加拿大多住些日子，一来为的是一番温存；二来也算是一种夫妇间天经地义的扶助。

而当时的刘民勇则也是焦头烂额，一方面要到餐馆打工挣足学费，另一方面要保持全日制学生身份维持学业，自顾不暇，心里反倒希望没有学业压力的林敏能在经济上帮一把手。

事实上，他们之间互相的需求非但不能满足，由不满足滋长的怨恨也随之水涨船高。几次之后，无休无止的争吵倒尽了刘民勇的胃口，再加上与女室友细心体贴形成的对比，他后来决定不再去加拿大了。等林敏费尽力气拿到赴美签证赶到纽约想要弥补时，他们之间的东西已经彻底地被挥霍干净。

他们最后曾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家做有关婚姻的最后谈判，当时已年过三十五的林敏百感交集，扬言要自杀，刘民勇则一派无动于衷，面如铁板。

林敏回到加拿大后即大出血不止。她没有收入，看不起医生，一个人躺在床上几乎死掉。后来，她的一个朋友告诉她有一个洗碗工人因事要请假一个星期，林敏强撑病体顶了这份工作，吃睡都在餐馆，一周后她拿到300加元的工资。她用这300元买了一份医疗保险，保险文件一到手，她立即去了离住处最近的一家医院看病。据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医院立即为她按急诊处理。在急诊室，光是护士为她换床单就连换了十二条，每条床单的中段都血红一片。

林敏出院后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地最发愤的中国学生，一、两年之中凭着职业大学和十几句日常英文的程度考进加拿大排名第五的大学研究生院主攻建筑钢结构。

林敏的经历让人难忘。

一个非常危险的现状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婚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双方当事人对于如何解决婚姻纠纷，比在中国难把握得多。九十年代，发生在旅美大陆人家庭中的悲剧日渐增多，凶杀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其中1991年的吴卫民（译音）杀妻案及1994年的王卓杀妻案属于相当轰动的案例。

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吴卫民与其妻王丽娟（译音）在中国大陆结婚，1987年双双赴美，进入印地安那州波里斯市的普社大学留学。1991年7月二人在美离婚，但离婚之后，吴卫民仍不断地骚扰就读于普社大学物理系博士

班的王丽娟。

1992年3月8日，吴卫民从普杜大学把王丽娟绑架出来，驾车直奔加拿大后将其杀害。王丽娟的尸体是3月12日被加拿大人在一个公园里发现的，警方说她是因头部中枪而死亡的，并且她的手、鼻及面骨均被割掉。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二十九岁的吴卫民于1993年9月认罪。

而另一件轰动的大陆人士家庭罪案是年仅23岁的中国上海女留学生丛霖被其结婚四年的丈夫王卓枪杀的事件。来自中国大陆黑龙江省的留学生、24岁的王卓1990年在美国与丛霖结识并结婚，并于1993年从肯塔基州的白瑞亚学院大学部毕业进入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攻读数学硕士学位。王卓高校后，丛霖继续在该校大学部读书。1994年1月下旬，王卓在听说丛霖与本校的一位印度裔男生交往密切后返回白瑞亚学院在丛霖的宿舍内将其枪杀。

命案发生后，王卓自行报警。

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在观念上逐渐打破了婚姻双方彼此“负责”的框架，也由于美国与中国的法律制度存在着衔接不良的弊端，因此，美国华人中重婚案等有关婚姻的罪案并不少见。更由于近年来中美两地人脉的频繁流动，以取得绿卡为目的的婚姻层出不穷。描述婚姻中女方以到美国为目的而与居美男方行结婚之实的“过埠新娘”这一特定意义的词，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这类动机不纯的婚姻中一方饱受虐待的案件也频繁出现，成为美国华人社区近十年来异军突起的典型社会问题。

据统计，全美目前有20%到30%的夫妇经常发生暴力行为。每年，全美成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妇女数目超过一百三十万人，有人估计没有报案的家庭暴力事件更有三百万宗之多。

美国的一位州参议员说，美国被人谋害的妇女中，有一半人死在自己的丈夫或男朋友手中。他说在纽约州，这些遭配偶毒手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遭枪击而死。

让人感到略为放心的是，展望未来，美国民众的婚姻状态将步入稳定，今后的变化将不再像过去的二十年那么惊天动地，富于戏剧性。

人口普查局1993年7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九十年代美国的婚姻趋势虽然是未婚父母人数上升，但离婚率在经过七十及八十年代的“爆炸”后，已有下降的趋势。据美国个中行家分析说，进入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一蹶不振，竟也是遏制离婚率攀升的重要原因。分析说，因为经济压力的增大，人们独立谋生相对困难，对家庭的维系起到了巩固的作用。

这种听来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在美国其实现实得顺应天理。这看来多少也是美国人饱受经济恐慌中的“安知非福”吧。

38. 找个洋人过日子

即使是在美国，如果听说谁的配偶是位外裔人，仍是件让人小吃一惊的事。

一些与美国人通婚的中国人表示，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最不能忍受的是夫妻的财务截然分开。一位和金发碧眼结婚未几的上海画家归纳说，这种财务分开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把婚姻推向麻木的最佳手段。

“你想，我和她在家、在床上，两个人各自的什么地方不碰不看？可是每个月她的银行给她寄来的存款报告，我看一眼就像触了电一样不自在，不知眼睛该往哪里放。”他说：“我虽然知道她目前的薪水数目，但对她现在及以往的整体财务概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在财务上如何帮助她或是否可以请她适时地帮助我。我们之间唯一不能说的不是他或我是否有了外遇，而是个人的银行存款数字。这种隔阂有时想起来真让人想不明白我们在床上热火朝天的所作所为是真还是假。”

大多数美国人在感情上的豪放开朗和在财务上的谨小慎微，让人印象良深。

而更“懂事的美国人还会拉着热恋中爱得惊天动地的伴侣去律师楼签下一纸“婚前协议”，事先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保障。实在让人对这桩婚姻的前景满腹狐疑。

我曾经就婚前协议一事问过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他正和自己的一位同事热恋。

我问他：“如果你和她结婚的话，你会要求她和你去签一张婚前协议吗？”

他说：“当然。”

我又问他：“那你是在真爱她吗？”

他说：“当然。”

“到美国去，与白人结婚”这一念头，相信是不少中国的单身之士美国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虽不像“到美国读书”，“接近西方文明”等由头来得冠冕堂皇，但却确实是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男女心底隐藏的一项巨大憧憬。

根据全美健康中心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在全美范围内，亚裔与白裔通婚的婚生子女数目仅次于黑裔与白裔通婚的婚生子女，居国内异族通婚婚生子女人数的第二位。白黄通婚的普遍，可见一斑。

统计资料并显示：1989年全美异族通婚出生的孩子共有十一万五千人，而在1968年只有二万二千一百人，两者之间的差距为五倍。

究竟异族通婚在婚姻素质及持久性上有怎样的表现呢？对此问题的回答，过来人见仁见智。

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任工商记者的哈尔滨女孩刘敏不但生得高头大马，并且也是一位中外通婚的尝试者。几年的时间下来，她对这种婚姻的体验颇有心得。

刘敏1987年自哈尔滨赴美，她是由未婚夫李芷担保留学的。但等刘敏到了美国的第二天，李便告诉她，因为绿卡的原因，他无意与她结婚。愤怒之下，刘敏一口气掀翻了专门为她准备的接风酒席。

1988年4月，刘敏在其就读英文的学院餐厅里结识了正在该校读中文的美国人杰姆斯·米勒。他比她小一岁，人生得即便在美国人里也少有的英俊，并曾做过发型模特。当时，刘敏正在餐厅里端着一盘食物找地方落座，已在一方桌边坐定的米勒怯生生地向她递过来一句马马虎虎的中文“坐这儿吧”。

刘敏的这一坐，坐出了自己今后多少年的伴侣。

他们二人在相恋一年以后结婚。

许多看过刘敏婚礼录影带的中国人都哭了，都说那种场面中“洋溢着一片献给中国人的真情”。

时隔多年，刘敏仍说，她庆幸自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说：“我觉得凡是和东方人结婚的美国人都很接纳东方文化，认同东方人的习俗和礼节，中外通婚的婚姻中，夫妻双方必定有一方要跟随另一方的生活习惯。而在这方面，杰米（她丈夫的昵称）随我。”

“我家的饭都是中餐，而且有时我几天没做饭，他还会因为太久没吃到中餐而不习惯。”

刘敏说，她和杰米的婚姻之所以美满也和杰米一家对她的完全接纳分不开。按照美国的传统习惯，男女成婚，举行婚礼的大部分费用都由女方的家庭负担。尤其是婚纱，新娘讲究的是戴自己母亲或祖母的。但当时她和杰米结婚时并没有通知杰米的父母，等他们从区公所办理完法律结婚手续后，他们才告诉杰米的家人。

杰米的父母立即要求他们举行婚礼。但在当时，刘敏仍是一介学生，生活十分清贫。杰米家人知道了她的顾虑后，笑着为他们的婚礼支付了全部的费用。

他们的婚礼共有四百位宾客出席，来自刘敏方面的朋友只有八个人，剩下的人全部是杰米父母、兄姐的朋友，人人都为杰米娶了一位中国人而高兴。

“我们从认识那天起就没有吵过架。结婚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比刚结婚时更相爱。”刘敏说，“这就是我的异族通婚体验。”

“几年来，他从未对我讲过‘敏，你应该这么做！’一类的话。多少年来，每当我为他做了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他都会对我说‘多谢你’。杰米这样的美国人对妻子的疼爱和中国不同，他们非常能理解女人。”刘敏说这话时略带哽咽。“记得我和他刚结婚时英文差得一塌糊涂，连各种蔬菜的英文名字都叫不全。那时杰米就带着我到超级市场去逐一认识蔬菜，并细心地把它们写在卡片上让我用起来方便。”

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感情惊人地细腻，杰米经常当众恰如其分地抚摸刘敏的手臂，并情感十足地吻她。

“我十分欣赏美国男人把男人的风度体现在对女人的态度和爱上，他们眼中的‘LOVE’和中国人口中的‘爱’有所不同。杰米他们家是信天主教的，对生活相当严肃。有一阵，他的大哥瞒着自己的妻子、三个孩子同另外一个女人有了关系，杰米的全家驱车赶到他的大哥家，对他进行‘批斗’，说‘我们米勒家不容许有这种事’。”

事实固然是我们无从对愿与中国人通婚的美国人进行调查，看到底有多少人属于“米勒家”的，但无疑中外通婚中这种关于人的“碰巧”重要的还是各人各随各缘。

纽约华人社区最著名的异族通婚者是一位名叫吴世珊的老人。她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她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期对华人社区进行无偿服务，成立了著名的吴阿姨热线服务中心，为华人民众提供从寻找工作、语言辅导乃至婆媳不和斡旋、公婆拌嘴调解等项服务，深得人心。

现年七十三岁的吴世珊是安徽合肥人，大伯吴中英曾做过甘肃的正守使，父亲曾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实业家。吴与美国富兰克·瑞士勃在中国上海相遇，当时他是联合国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她则是一个主攻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于1945年结婚，1946年移居美国。

回顾自己将近五十年的中外通婚经验，这位行走起来仍健步如飞的中国老人说自己好在是个“会忍的人”。谈到异族通婚的甘苦，吴世珊曾在华文社区周报撰文说法，用自己的切身历程以喻“后进”。

她的文章朴素纯善，出人意外的是她对异族通婚进行了几乎全盘负面的解释，现不妨择取部分紧要章节原文照录。

吴世珊说——

如果有人认为幸福还包括了整个家庭总体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和自己同族人结婚比异族通婚要幸福得多。

比如，一是吃的问题：每个人吃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中国菜虽然天下闻名，但是要洋先生或洋太太天天和你共赏砂锅鱼头、榨菜炒肉丝等菜，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就好比你自己不能每天对洋芋、牛排发生兴趣一样。

如果与本族人结婚，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一日三餐是人生少不了的大事，夫妇口味不同，生活上的乐趣也就少了一半。

二是社交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彼此的朋友、语言文化及父母亲戚等问题，所以比起吃的方面又要复杂多了。

（吴世珊在这里分了三个小部分进行引伸）

第一是中国朋友的问题。一旦走出了国人队伍与外族人通婚，同胞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出外靠朋友”这句话恐怕就轮不到你说了。比如在你清闲之际，偶尔想找几个朋友摆一摆龙门阵，但这种念头在你来说恐怕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朋友们认为你已跨出了国人界限，不便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和你谈天。而且，如果有你的洋先生或洋太太在场参与，大家还要改口来说英文。有很多中国成语，有时是无法用英文表达出来的。这种东西积累多了，大家感到谈话无味，来往的机会就会逐渐减少。

第二是外国朋友的问题。也许在失去了中国朋友之后，你就想走极端把自己全部洋化，加入洋先生、洋太太的阵容。然而据我所知，你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无法和他们融洽无间，中外风俗不同，洋人常以喝酒为乐，谈话也限于“笑话”范围，中国人受传统礼教的熏染，在思想上相对守旧，不太能随俗。而你“不太能随俗”的态度在洋先生或洋太太眼里又似乎是太煞风景，这类聚会往往使你有孤掌难鸣之苦，那种失落感真非笔墨能形容。

第三是父母亲戚问题。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础，而孝道是维系家庭关系于不坠的法宝。供养父母、照顾亲戚几乎是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想法。而西方人以小家庭为主，家庭中以夫妇加子女为限，绝对没有中国人那种肯为父母、亲戚做出一些牺牲的精神，在这两种不同的想法之下，常常会出现种种不愉快的事情。

在社交问题之后，三是子女问题：美国虽然是个民主国家，但种族歧视是很深固的，混血儿的命运有时比黑人子女还要悲哀。黑人孩子虽然到处受人歧视，但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社会可以依存。而混血儿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一只无岸可靠的小船。因为他们既不是炎黄子孙，又不能加入进白种人群里，他们内心所受的痛苦常常让他们怀恨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再加上他们中外通婚的父母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同，教导子女的方式未免也有差异，在这种经常彷徨的心理下，也许本来会是聪明有为的孩子反而变成了社会的败类。

四是老年问题：中国老年人的最大乐趣莫过于含饴弄孙了，这首先与美国老年人的情趣有区别。并且，在美国的下一代很少和老一辈住在一起，因

此人到老年时，连孙子的影子都可能不常看到。

吴世珊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尽量避免异族通婚，“何必去采他人之花”？

认真分析起来，在美国的华人社会普遍的认知中，对中外通婚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一项由基督教角声布道团主持的社会调查显示，有达到半数的华人父母不赞成子女同外族人通婚。同时，有将近半数的已与外族人通婚的华人表示，异族通婚的婚姻比同族婚姻遇到的困难更多。

在华人家长如何看待子女的与外族人结合的事情上，有 75%的人担心外族配偶不会向华人那样忠心。这部分人多半认为外族人对感情不认真，热情来得快也去得快，易合易离。另有 25%的人则担心子女找了外族人做配偶，别人会说闲话，认为其没本事。

事实上，冷静地来看无数的中外通婚的男女，他们真正彼此认识还是在双方从热恋的狂热中脱身出来后才意识到彼此之间巨大差异的。这些差异曾经被视为双方互相吸引的最引人之处，但一旦脱去浪漫的外壳，转瞬间即变成婚姻的最大杀手，锐不可挡。

在美国纷纷杂杂破裂了的中外通婚个案中，位于洛杉矶的加州高等法院 1993 年 7 月份裁定的一桩破裂了的中外婚姻争夺子女抚养权的案件，可谓叹为观止。

华人王绪农于 1974 年自台湾赴美留学，读完大学后先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后来自己开餐馆。1977 年他与法籍女子西薇·柯雷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王钟黎，谐钟爱巴黎的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1987 年，维持了九年的这段婚姻宣告破裂。

1988 年，柯雷单方面决定将他们的女儿带回法国，从此音讯全无。从 1988 年 11 月起，王绪农就开始打官司控告西薇·柯雷私自带走女儿，要求能与女儿见面并拥有监护权。加州法院曾裁决王绪农有单独监护权，并无需付给前妻和女儿赡养费。但与此同时，柯雷也在法国一状告至公堂，申明女儿有气喘病，加州的空气污染严重不利女儿居住，她从法国法院也拿到了女儿的单独监护权，并要求王绪农每月支付一千二百元的赡养费，而每年与女儿团聚的日子则少得可怜。

为此，王绪农不服，辩解说与柯雷结婚时曾有协议书，子女如在美国出生须按美国的法律行事。为此，他缠讼五年终于得到加州高等法院的裁决：西薇·柯雷必须赔偿王绪农一千两百五十万美元，以赔偿他五年见不到女儿的损失。

面对如此呕心沥血搏斗的前车之鉴，不知他日赴美的后生可敢仍对金发碧眼们满心憧憬。

39. 当一回美国人他爹如何？

太多的华人到美国立足稍稳后，第一个最为实际的渴望就是生个孩子。稍有幽默感的人自尊地总结说，这么一来，“老子做了美国人他爹”。

美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都是当然的美国公民。这种公民在长大成人到了 18 岁时，可以为自己的双亲申请移民。

多少年来，这项法律激励着无数对美国怀有期望的各国孕妇凭假各种途径奔赴美国。也正因此，美国驻外的使领馆人员多年来也一向不遗余力地对孕妇的签证申请格外慎重，因为其不足挂齿的一念之差有可能就是为美国平添一丁。

在美国，有关儿童的物品相对而言都十分昂贵。一件像样一点的小女孩穿的裙子，即便是在地摊上摆卖，摊主也会张口就要 30 美金。一双几岁大的小男孩穿的耐克球鞋的开价也在 50 美元左右，并不比一个中等身材男人穿的十号男球鞋便宜。

记得去年我的一个关系相当好的女伴生产，我和另一个女朋友为节省起见商量合伙送 80 元钱的礼物给她。原本我们想买一个小小的金饰给她的孩子，去问过价之后也知道我们的钱数是够买一个小小全金“长命百岁”牌的。但后来从同是女人的角度替她想想，觉得还是送她一些实用的物件比较真诚。我们当即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尿布。

在去买尿布的的路上我们着实替这位女伴兴奋了一下，认为这下可将她儿子的整个尿布期“买断”了。哪知到了商店一看才知对于尿布而言，我们的预算根本就是小事一桩。美国尿布的价格每包竟在 10 元上下，好一点牌子的产品价格还会高达 15、16 元左右。细看货色虽倒是物有所值，还依男女婴儿的性别不同做出适合生理结构的两种不同款式。但就价格而言，我们的 80 元加上打税只够买上 5、6 包尿布的。也就是说，以每包尿布内装 50 片来看，如果按小小婴儿每天用八张尿布算。我们这 80 元的结果只会在她儿子的屁股底下磨蹭上一个月零几天即告烟消云散。

后来我们还是揣了一块“长命百岁”去看她，把我们买礼物的周折说给她听，她也笑起来，说是“你们现在知道做美国人他爹的代价了吧”？

相比之下，单就生一个“美国人”而言还是没有什么代价的。美国的孕妇在入院前按家庭平均收入在医院内是会被评定付费标准的，有钱的人生一个孩子往往要耗费两千多美元，而生活清苦的人甚至是一般收入的人生孩子基本上就是免费的。这一种减费或免费的计划各州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在大原则上基本划算。

纽约州的产前医疗辅助计划是针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孕妇提供的医疗补助手段。凡家庭收入在州政府定义的低收入限度之下的孕妇，均可获得包括产前医疗检查、检验、药物、营养、医疗顾问、健康教育以及生产住院的所有费用的全免。这项计划在产后妇婴的补助方面也计划齐备，它包括产妇产后一个月内的所有检查费用，以及婴儿在一岁之内的所有医疗及营养照顾等。

在此计划中，最特别的是对申请者的居美身份问题全无调查，经济情况只要低于指定标准，便可不分大小通通有份。

这种“优惠”竟曾吸引得不少非法移民孕妇不顾一切地前往美国生产，可兼收经济及“生个美国公民”双重利益。

美国女人其实是那种肯为现实牺牲的妇女。传统中的美国妇女在生育之后往往要在家中相夫教子多年的。在美国即使是位尊至政客的职业妇女，也有许多人是这么走完这段路的。

一般而言，美国妇女在生育之后至少会在家赋闲个五、六年乃至十年之久，在陪伴子女渡过幼年之后才重走自己的人生。

所以，在美国做别人的丈夫一般而言是件相当沉重的事情。

近年来，由于受经济不振的影响，美国妇女开始在经济压迫之下展开自己未可预测前景的“生育后期”生涯。一方面是大批妇女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能如以往一样奢侈，大批大批的生育后的妇女开始外出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看护幼儿的人工也有随行就市的问题，也给美国妇女增加了比较自身工作价值及看护幼儿费用差价的麻烦。

“美国人”出生后，托儿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让人头痛的事情。不少年轻的中国移民家庭在孩子出生后往往因精力及经济原因而把孩子送回大陆家中寄养。在新移民在美国立足未稳的情形之下，此一办法确实能解决大问题。

但没有这种方便的家庭则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根据统计，1990年美国已在政府立案的托儿所只有八万家，立案的小型家庭幼儿看护所有十一万八千家，而美国五岁以下等待入托的幼儿却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万九千名，几乎在美国各州都存在着公立托儿所人数爆满的情形。

以纽约的例子来看，纽约全市只有15%的幼儿可以进入政府补贴的公立幼儿园。即使是加上有执照的私立幼儿园，纽约市内的幼儿园总和也不过才两千五百多家，与待入托的幼儿人数相比仍差之千里。因此，市内出现了大批大批无照的托儿所乃至私人看护性的保姆。

在纽约，得以进入公立托儿所的幼儿大多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公立托儿所中的收费标准也视幼儿的家庭收入而标准不同，有的家庭每月只需付几十元，有的家庭则分文不交，所有托儿费用均由政府拨发。而私立幼儿园的收费则在每月350到450之间。

美国在自己家开办托儿所的私人保姆往往是那些自己也有孩子需要看护的家庭妇女，这种儿童看护的行情是如果父母每天接送的话，收费每天二十美元。如果有孩子的家庭需要请保姆入住，保姆通常需要负担一些家务，则每月工薪在750到1000元之间。

令人意外的是，在美国已经盛行了多少年的保姆问题，近年来竟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

仅在纽约一地，大约有50%的有孩子妇女因为生计问题需要外出工作。因此孩子的托儿问题就成为一件困扰千万父母的头等大事。进入1993年，由于全美发生了多起保姆涉嫌虐待或伤害所托儿童致死的大案件，因此，儿童看护的问题也成为社会问题在民间广为讨论。

1993年，在美华人社区也出现了两起震动全美的托儿案件，一个是新泽西州的华人杨赛风因代友人照看其三岁幼子时，幼儿不幸被烫伤而被定罪；另一个是纽约市皇后区华裔保姆张南茜被控大力摇晃其所看护的婴儿，导致婴儿死亡，婴儿家长一状告上法庭的案件，华人社区也因此对慎选保姆的问题重视起来。

一时间，整个美国有幼儿的家长都和家中的保姆关系不自然起来。

这种遍及社会的紧张关系被无利不图的美国商人洞察，这些商人们不失

时机地制出各种有关物件来防止（或者说是纵容）这种事态的发展。美国商人推出的这类物件总归来说是各种电子监测设备，细致讲起来不外就是隐藏式摄像机、或者干脆就名为“婴儿监视器”。1993年8月份上市的一种新型的“婴儿监视器”十分含蓄地做成类似于台灯底座或花瓶模样，可以十分含蓄地放在婴儿及保姆时常活动地点的附近，大人、孩子的所有活动均被录影及录音。这种设备竟也可租用，每三天的价格为199元。

在美国这个事事讲求证据的地方，这种监视器的应市具有相当的意义。据报道，加州的一对夫妻在自家的电视机顶上安装了一隐藏式监视器，结果发现他们雇用的19岁保姆经常用木勺敲打他们孩子的头，这位保姆后来据此被判刑入狱。

40. 猫狗作伴

我是绝对的嗜猫族，除从小到大一直逼着家里父母接连不断地养猫外，而且一向也是在朋友中鼓吹养猫之乐的积极者。

早在赴美之前的两年中，我在北京的住处有一天被一位朋友安插进一位美国女孩，该女孩爱上了我这位朋友的朋友，她和他原是师生关系，她是他的外语教师。为着这份爱情，这位叫朱迪的美国女孩虽阮囊羞涩却执意在北京苦等我这位朋友的朋友为她去签美国签证。我这位朋友的朋友当时在学，是清华大学学水利的研究生。他后来是退学和这个女孩共赴美国的，说是水利系统一时把这桩事情传为恶话。

和朱迪同住的日子里，我除为她的寂寞暗自担忧，也深深领教了美国人对宠物之爱。我和她见第一面时就知道她在美国的家养着两只中国的西藏狗和一只没有血统的猫。

毫无疑问地当时我养有一只猫，因为是朋友从农贸市场花十块钱为我买来的，因此抱回来之后也没起什么名字，只依着判断叫它“野猫”。回想起我那时相信还并不心智成熟，所以一有心烦事时，野猫如果趋前搅扰一定会遭受我的“非礼”。朱迪来时，就对野猫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表示不解。而且，自她进住后，我对猫的这种有感而发的非礼开始显得不得人心。朱迪不会当面说什么话，但每每我非礼过猫之后，她都会在我当时看来十分虚张声势地对野猫竭尽呵护有加之能事，其实这种非礼往往不过是骂它一句“走开”一类无关宏旨的话，朱迪的一番动作弄得我十足一副恶棍嘴脸。

有一天下班回家，在路边看到一个年青农民在卖狗，看到小狗在风中瑟瑟可怜的样子，不免又动了恻隐之心不顾一切地将它买了下来。抱着小狗回家后，朱迪果然不出所料地欣喜异常。这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日子里，朱迪和该狗相敬如宾。有一个晚上，该狗从晚上八点钟起发出间歇的吠叫，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九点钟还没有收场的架势，为此我不禁火从中来，我当时对着狗大喊：“你如果再叫，我就把你杀了吃掉。”

这话才一出口我就猛然觉得有点不妥，果然话音才落就听得原本轻声哼歌的朱迪那个方向变得无声无息。我当下觉得有点愚鲁，但又不好立即更正，她那边无论如何是不再继续唱歌了。关于狗的这个僵局一直持续到半夜。

第二天早上，当我都快把这件事忘掉的时候，朱迪在早上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你千万别那么做，狗是朋友。”她后来紧接着揭露了一句对我十分不给面子的事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中国人最喜欢拿狗下菜。”

我和她合住了几个月，她就搬走了，听她男朋友说当时她走得不大高兴，听到这时，我不

禁心虚了一下：该不是为了猫和狗的事吧？

美国人对猫狗的感情无可言喻。在纽约街头，我曾见到一个男人花一块七毛五在街角买了一个热狗，当即蹲下身来和他的狗一起，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美国人对于自己宠物的爱怜及依赖实际上是可以与对儿女的亲情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养猫养狗的目地是为了子女高兴，目的多半是要娱乐下一代；而美国人养宠物则基本上是为了自己，目的是要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美国的亲子观念淡泊也造成了太多美国人把宠物看作最可依赖的终身伴侣。也正因此，美国的有关法律也基本上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判定对宠物犯罪的罪犯的。

1993年，俄亥俄州的一位名为普威尼基的男子为了想证实猫从任何高度

下落时是否都能以脚着地，把一只猫从一座公寓楼的十层高处丢下来，结果，猫被摔死了。这件案子在 11 月 19 日被最后宣判，普威尼基被判三十天徒刑。法官在宣判这项裁决的同时，还向他判罚了五百美元，并且在他出狱后还需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观察。

在这项人与猫的讼案中，唯一显得比较“人道”的，是法官判定摔猫者可以在 1993 年圣诞节过后开始服刑。

这个案件由于被告把自己的认罪态度从“不承认有罪”改为“愿意认罪”，所以得免遴选陪审团专门开庭。“保护动物协会”的人对此项判决十分不满，因为他们原本希望能在法庭上要求陪审团给予摔猫者更严厉的处罚。

另外的一件有关宠物的案件更加著名。

1990 年 12 月 25 日，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条名叫“塔罗”的阿基塔种狗咬伤一名十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之后去医院问诊，医院方面随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警方。该“塔罗”随后被带走关进出事所在柏根郡中的监狱中，并被以触犯“凶狗法”而被法庭执意要判处死刑。但狗主人的代表坚持说“塔罗”只是用爪子碰伤了小女孩的嘴唇，要求不判该狗死刑。

这一讼案争执不休，坚持以极刑处理狗的人士要求新泽西州长出面干预这件事，但被州长拒绝，说是因为该狗“还在法庭手里”。在“塔罗”自肇事之初的 1990 年直到有关诉讼案越闹越大的 1993 年，其命运经由媒体报道全球皆知。法国当今著名的动物保护者、原名为“性感小猫”的电影女星碧姬·芭铎曾特别写信给新州州长要求释放该狗，而且日本政府也曾要求新州把这一血统源自日本的阿基塔狗交给日本。一名肯尼亚商人也说，他正在游说非洲国家救助这条狗。

该狗的肇事地柏根郡几年来已为该狗付出了一万八千元的费用，其中包括看管该狗的监狱人员的费用，而狗的主人为救狗命也已付出两万五千元。

而在 1993 年末，美国又发生了另一件著名的有关宠物事件。1993 年 12 月 30 日，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斯波坎的一架波音 727 客机才刚起飞，驾驶员就接到地面控制人员报告说一只狗和一只猫被误放在了没有暖气的货仓中。当时，飞机正飞在高达三万尺的高空中，气温低达华氏零下 55 度。客机的驾驶员听到地面报告后立即在邻近的威斯康辛州的麦迪臣机场紧急降落。客机降落后，猫和狗被带下飞机进行暖身，之后被带入有暖气的货仓。这场整个围绕着猫狗的事件使得联合航空公司损失了总价两千三百美元的燃料油，飞机也为此误点两个小时。

在美国养动物贵则可贵，便宜则可便宜，端视主人与宠物的感情而定。

以猫为例，美国便宜的猫食可以说是再低收入的人也能负担得起。比如，猫食可分子、湿及半湿三种。湿食即罐头食品，这种食物种类繁多各种肉类鱼类几乎都有，还有猪肝一类的奇怪货色。这种猫食装潢一点不输入食的罐头食品，开盖后味道酷似中国人早年常带出野餐的“午餐肉”，最便宜时每罐仅 25 美分，最贵也只在 8 毛钱左右。而干食及半干食往往是一块钱左右可买得一大纸盒。

在猫用品方面最贵的要数猫用来如厕的沙子，美国的这种沙子多半是挽了去味剂的，既除了臭也抬了价，大约每包沙子的价格在 5 至 10 元左右，这一袋沙子正常情形下可用一个月。因此以一只猫每天吃一罐罐头计算，一个月的“猫开销”也不过是 25 元左右。

而舍财的美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财则就不那么容易计算了。美国宠物

医药费之贵，并不比给人疗病的东西逊色太多。刚来美国的头一、两年正清苦的时候，有一天我当时豢养的小黑猫病了，病症而且是遍地如厕，十分不雅。比我更对猫有研究的人就告诉我把猫骗掉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我接连给家附近的各宠物诊所打电话，心虚地查问有关的价格，不曾想这一对猫而言十分稀松平常的问题大多数诊所竟收费在 100 元以上，而且电话线那边多半还言之凿凿地说这还因为我的黑猫是公猫的缘故才会如此“便宜”。

后来总算是找到了一家价格能接受一点的诊所，但价格便宜得有限，为 98 元。带着小黑猫过去之后，医生把猫摊在床上一检查，立即说，你的这只黑猫生理异常，它的睾丸一个在身体外一个在身体内，如果做阉割手术的话，还得开膛。一番话当下把我说愣，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是为了黑猫的另一个睾丸问题此番价格一定不善。果然，再心虚地问一下这类手术的一般费用时，医生告诉我：“这可不好讲。”

在美国市场上，猫狗的玩具每件至少三元以上。至于逗猫用的鸡毛杆、铃铛线一类的中型玩具每件在七、八元左右。而猫狗的布窝、攀爬的梯架及相当具有童话色彩的意境环境玩具少则四、五十元，动辄一百元以上。

我的一位朋友家狗的事更是骇世惊俗。他的狗有一天忽然不吃不动一脸不高兴，拉到医院去，医生派给这种狗病一个名称之后就治开了，而且狗还小住了几天医院。到了结帐时，这狗的医疗费竟为两千多美金。

美国的猫狗也是有医疗保险的。这种险比人保险倒便宜不少，大抵因为猫狗毕竟是一介畜类，不那么不具抵抗力的缘故。在我家周围的宠物诊所中就有每年才交一百多块钱就可以在猫狗们偶染病痛时去诊所痛享医疗的好处。

热爱宠物其实只是美国社会对猫狗一类家畜的基本感觉，但时至今日，美国的一些动物保护主义分子的言行已到了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步。这些人一味地强调动物保护，弄出慈悲为怀面目，和一切他们所认为的不“动物道”的行为过不去，由于论调过于偏激，已到了讨人嫌的地步。

问十个美国人相信会有至少五个人认为近十几年来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嘴脸已经越变越莫名其妙了。但即便到了渐失人心的地步，这些已明显在往死胡同里走的新型动物保护理论发明者兼捍卫者仍绝对乐此不疲。

受这些人“动物保护理论”的影响，在美国穿毛皮衣服会是有风险了，但这种风险说到头还是道义上的风险。早自多年前，美国的动物保护风潮就在国际大环境的附和之下愈演愈烈。发展到今天情形已成为每到秋季天气转凉时，就有动物保护倡导者在街头尤其是出售皮革的大型商店门口进行各种类型的示威。之所以说是“各种类型”，是因为这些示威活动中有时示威者自己干脆不穿衣服，用以表明自己“宁愿赤裸也不残杀动物以求其毛皮”的心态。为适应这种潮流，美国政府也自很早开始就制定了一些有关法规严格限制对珍稀动物的捕杀，但其在一些执行细则上又有些可笑之处。比如美国政府规定象牙不准进口买卖，但仅只限于对“现代象牙”而言，而对所谓“古代象牙”则此限制令不适用。其实如果单从一个古董一个是“捕杀”而言，分辨这种道理倒也不难，但这种双重标准的规定平白无故地给美国相关的检验工作带来极多的不便及消耗。

但究竟这种示威的效果如何，则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们所无从控制的。纽约皮革业的代表们说，1992 年，皮革大衣一项的销售量仍增加了 10%。

我在这里引用这个事态并不是想单纯地指责这种抗议的是与非，如果说由此类抗议而阐述的“动物保护”单纯是指对个别珍稀动物从保留物种的角度来对人类奢华行为进行某些要求，这种要求则听上去绝不过份。但事实上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些风头极健的动物保护倡导者和一些从物种上讲相当稀松平常的动物合影并大谈保护之类，这就未免让门外人觉得费解，不能对其倡导的真髓心领神会。比如这些人往往会对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山鸡野鸭关爱倍至、呵护有加，爱得不可开交，但在私人生活中却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猪牛羊鸡一类的生灵每天大批量地被送入庖厨宰割加工，而且自己也每每进入角色大嚼而不觉残忍。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说人工饲养的所谓“肉猪”、“肉牛”食之不悖动物保护者的良心，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我身上穿的貂皮大衣也是从人工饲养的所谓“皮貂”者流身上扒下来的，那么就可以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眼中得到绝对的豁免了吗？

时至 90 年代，动物保护主义的大旗干脆发展到了阻挡人类文明进程的地步了。以美国科学工作者对爱滋病治疗药物发现中受到的来自“动物保护”的困扰便可明白这种“极端动物道”与“人道”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冲突究竟荒诞到什么地步。

据统计，到 1992 年，美国平均每天死于爱滋病的人数达 92 位之巨，政府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截止至 1993 年，爱滋病已经成为二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美国男子的头号杀手，同时也是同年龄 25 层美国女人的第四号杀手。基于恐惧，对爱滋病特效药物的研究工作也一直是受到全美民众关注的头号大事。而即使迫切如此，动物保护组织仍不依不饶地在为爱滋病研制药提供临床实验的动物身上施放同情。

比如对于可供实验用的大猩猩，动物保护主义者强烈要求研制单位须对每一个被用于实验的动物提供实验后的一切赡养工作，这甚至包括把曾用于实验的大猩猩送入“动物养老院”直至它们自然死亡。这种所有“善后”费用的总和十分惊人，仅以一个大猩猩为例就要花费一百万美元才能“善始善终”，更不要说一次药物实验往往需要三只大猩猩。面对如此昂贵的实验费，不少新药的研制到了临床动物实验时就会被“动物为”地搁浅。

如此，宁愿听任每天 92 个人去死亡也不愿意打破自己框定的动物慈悲，这就是今日美国的动物保护主义的理论及实践。在对动物保护主义者就此问题就教时，该组织的人振振有辞地反问：“你们知道这种实验会无辜地杀死成千上万的小老鼠吗？而且你能保证每杀死若干数量的动物就能真正研究出一种新药来解救病人？”

更由于美国社会整体就可说是动物的天然慈悲土壤，因此在任何有关动物问题的官司中，动物保护者一方几乎每次都能大获全胜。

如果仍旧延用爱滋病新药研制的个案观测这种动物保护学说产生的恶果，则十分令人心寒。按联邦药物管理局要求，各种此类药物必须经由动物实验才能用于人体，而事实上，即使是经过了动物实验的新药，常常也会发生在人使用时剂量过大的现象。通过动物保护者的“搅局”，新药和病人就更隔起一层名为保护动物实为草菅人命的透明玻璃。被逼无奈，一些垂危的病人强烈要求把自己做为新药的实验者，但这种在无医可救的情况下也算是试着救人一命的要求又是绝对违法，要遭牢狱之灾惩罚的。但在采访中，据一些医护人员讲，相当数量的爱滋病患者们每次用餐时都会私下服用形形色

色“不下 200 种”不知其名的药品，这种私自出现的“乱抱佛脚”的自我实验虽然在动物保护方面及法律方面比较站得住脚了，但却对人类文明无所补给，因为一来由于缺乏医生的指导而更具危险性；二来即使有所斩获也不大可能被系统地加以规纳整理真正为人类成果。

鉴于动辄得咎的科研道路，不少医学研究人员在自己的研究室门外张贴了一张“双手被绑图”，形象地解释医药科研所处的困境。

由这个角度去看美国“动物保护”的鼓吹者，实在万恶。

卷四

41. 拎包小心

美国有一个机构建议人们在因家出门旅游时不要彻底关闭屋内的所有灯火，最好到电器商店买来定时开关的控制器，在人去楼空后仍能每天定时在晚间自动开闭。而且，卧室的灯光要比起居室的灯光稍晚关闭才合情理。

建议中并希望人们在出门较长时间时，仍须要求为自家门前剪草的公司按时前来剪草，

不要让外人察觉屋内暂时没人。

向邮局申请暂时停止邮件投递，一切邮件请邮局代收，以防止外人看见邮件成堆，知道是空门而登堂入室。

更正确的做法是在家中无人的时候开响收音机，不停地播放，造成屋内有人留守的假象。

这个不厌其烦的机构是美国警察局。

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治安问题即告上升为社会问题中的超级项目。

在传统的美国进境城市，例如纽约、旧金山等地，外来人可说是一下飞机就能体会到治安不靖的隐忧。美国的不少城市目前已在机场地区就开始采取严格的防止犯罪措施，但形形色色的犯罪仍是防不胜防。其中尤以纽约的状况为最。

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是全美各型大小机场中少数配有警卫人员在旅客出门时逐一要求旅客出示行李牌核对行李的机场先驱之一，也是目前少有的接机人在旅客提取行李之前完全不能与旅客接触的机场。但即便保安程序严密至此，仍有无数大小窃案在这种严密中悄然进行。

据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统计，1993年前七月中，肯尼迪机场有案可查的行李失窃案已有一千五百六十九件，比去年同期的一千零九十七件有大幅增加，比1991年同期的七百三十七件增加了一倍多。

港务局说，肯尼迪机场的情形甚至糟到整个行李车上的行李都会被偷走的地步。而且这种机场窃贼偷窃段数极高，快中有稳，令人防不胜防。

来美四年，工作中几乎每天制作防犯罪新闻的我竟也在机场偷儿的手下被操练过一回。

1992年夏季，我由外州度假回纽约，因为深知机场道中高手无孔不入，遂一路上百倍警惕地呵护我录了整整一盘黄石公园景观带子的录影机。对该录影机我是睡觉时拥在胸前，看书时压在书下，连进洗手间也和其如影随形。一路无话。

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我提着一件小箱子和那个录影机到提行李处取了一件半大不小的箱包后就遇见了前来接机的朋友，全程不过二百米远。

到家后，第一件事是要向朋友炫耀黄石公园风景，返身去找录影机时，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事发后，我一点不为偷案的出现而惊讶，只是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我会在百倍警惕的状态下还会对这种行径防范不力。据朋友说，他在机场看见我时就没看见我肩上背有录影机，这种说法让我更是根本无从判断录影机失窃的可能地段。

只能将其认做天命。

回到电视台，同事们闻听此事吵着要对我这个窃案苦主进行第一手采

访，颜面尽失。

但与另外一些受害深重者比，我的遭遇仍是小巫见大巫。

1993年冬，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曾经率团访纽，五天之内，总统代表团内损失惨重，回到马尼拉个个现身说法，一肚子苦水。据马尼拉的报纸说，当菲律宾国家电视台的摄制小组初抵纽约，在曼哈顿西城的霍华德·强森汽车旅馆登记住宿时，摄制组的一架价值七万四千美元的摄影机就在大厅中失踪。稍后，在该旅馆内的一个房间中，总统随行电视摄制组的一个装有无线电缆与摄影机电他的袋子又告失踪。总统的法律顾问紧接着又抱怨他的手表在客房中丢失；另有一位女记者也表示说，她放在旅馆客房中的一对耳环不见了。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估计，全美每年由于各种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四千二百五十亿。

在纽约打工的大陆学生王小东在一个夏夜从餐馆收工回家，下了地铁后，在距家仅一箭之遥的路上被不同的人抢劫了三次。第一个抢他的两个南美洲人拿走了他的钱包，在搜出所有现金后把装着信用卡和学生证的钱包还给了他，临走还半开玩笑地对他招呼了一声“GOODNIGHT(晚安)”。第二个抢他的人是一个事先躲在暗处的黑人，这人一无所获。他在看过王小东的空钱包后，没听完王对自己几分钟前亲历的第一宗抢案的描述就转身走了。第三个抢他的人是两个黑人，王小东这次没掏钱包也没讲什么话，这两个黑人从一言不发的他身上掏出钱包来，看到里面分文没有，二话不说就掏出枪来。王小东当时气愤已极，伸手就和面前高大的黑人格斗起来，慌忙中黑人的枪击中了王紧握着枪柄的手，王小东的手当即血红一片。

这一声枪响没能引起任何反应，王小东在两个黑人匆匆走脱后自己打电话报的警，对方在听完简单情况，用警车把他带到医院后就没了下文。想来这种事情在纽约已是再普通不过了。

王小东在医生那里得到了当晚最好礼遇。医师为他做了极为周密的手术，他和医师共同度过了不少疼痛难耐、大汗淋漓的日子。王小东的伤手后来比较著名，由于恢复得奇好，该外科医生将它做为自己医学得以施展的一个范例反复他讲给其他的病人听。

美国警方在对付日坏的治安方面显得力量薄弱。纽约警察局据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员编制多达三万人的市级警察单位，历史超过了三百年。但其对纽约的治安混乱的防治问题仍停留在一筹莫展阶段。这种无力感甚至体现在其在应付街头最常见的抢劫妇女的背包一事上。

纽约皇后区警方防犯罪小组的一位女警曾到皇后区福寿老人中心做有关自我防卫的治安讲座，该中心一票老人会员尊崇地前往聆听。该女警告诉老人们，出门背包时一定要注意姿势，为防止歹徒抢夺，一是背包不能挎在肩上，因为这样的话歹徒可以从后面一拉就跑；二是背包也不能斜挎在胸前，因为这样的话歹徒很可能在拉背包的同时，把受害人带倒在地，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三是背包不应该抱在胸前，因为这样的话歹徒仍可能在分散了当事人的注意力后从侧面用利刀划破背包底部行偷窃之举。女警随后郑重其事地告诉老人们，警局防犯罪专案小组研究出来的正确的防抢劫背包姿势应是自始至终把包包抱在胸前，并在背包的底部垫置一个硬垫或一本厚书。

女警一席话，直说得老迈年高、手乏缚鸡之力的老人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近五年来，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美国穷凶极恶的抢案也开始大量增多，抢劫银行等恶性大案时有所闻。为应付越来越多的犯罪，美国的不少银行都开始进行遭遇抢劫的教育乃至演习。在由警方提供指导的这类演习中，被制银行职员除给出钱外所有要做的就是将钱袋中尽可能地放入红色染色包。这种看来是专为银行劫匪研制的染色包，在放置后十分钟即自行爆炸，将钱染成红色。与此同时，对于穷凶极恶的抢劫行动并没有任何制时办法，警方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职员应“顺应歹徒的要求，在按照歹徒的要求做每一个动作之前事先知会对方一声，以免对方在紧张之中开枪”。

“消极应对”可说是美国警方教导民众对付各种小型犯罪的不二法门。有鉴于警方的态度，美国民众一般采取的预防歹徒因抢劫伤人的作法是出门前带足二十元钱，使得抢劫者因不虚此“抢”而不至于恼羞成怒。而且据说这二十美金是美国“收入”一般的歹徒心中绝不可能兴奋也不至太失落的劫款数字。此有一讲，叫做“保命钱”。

曾有一位名叫郑慧婴、年仅二十多岁的华人妇女在纽约地铁上被人抢了手提包，当时，这位妇女的包中只有一元现金。也是该着她倒霉，她被抢时手提包的带子是缠在手腕上的，加之她当时落坐的座位较靠车门，歹徒一把抢过她的包后从地铁车的边门夺门而出。郑慧婴当时被手上的提包带子猝不及防地带着也冲出边门，而当歹徒身手敏捷地跳上站台的时候，她却被拖进两辆地铁车厢的中间，遭车厢挤夹而死。

这样一件事情后来经美国传播媒体分析，竟然责备这个华人妇女不应该因为不舍一块钱而害得自己丢命。警方的一些人士也有这样的指摘，认为当时那个华人妇女如果没有提包带缠在手上，则无疑是用一块钱换回了一条命。

更有媒体分析说，这个妇女的死是“财迷”所至。

在中国接受惯了“要勇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斗争教育，乍看美国对犯罪活动提倡的“绥靖政策”，实在觉得虽是一百个有理，但实在难转其弯。

目前，治安不靖的问题给民间带来的恐惧使得美国民间已产生了空前的防范心态。《纽约时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采访到一位对这种防范颇有心得者，这位26岁的机械工程师说：“我以前从来不用担心犯罪的事端会轮到我的头上，可是现在我必须随时提防。现在每天下班回家下车后我都会做一个360度的转身，以此来检查周围的环境。”他说他在自己家连续三次被盗之后，他的老板主动建议把自己的枪借给他，但他婉拒了。现在，他和他的妻子每天上床前都会锁上卧室房门，并在床边摆着一根棒球棍。

治安不靖的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大都市居民选择在夜晚不出家门的方式来应付现实。洛杉矶居民、来自广州的家庭主妇任中婷为了方便丈夫工作及儿子读书住进一处治安口碑相当不好的区内，从住进该地的当天他就和丈夫及儿子制定了“夜间不出门、不开门”的家规，天一黑下来，不但一家三口坚持足不出户，遇到任何种类的敲门声也都果真概不应门。他们就这样过了整整两年。直到去年他们一家三口回中国广州探亲时，她才再一次饱尝夜晚沿街吹过的晚风滋味。她说：“美国给我的只是白天的印象，我对黑夜的印象几乎全是广州给的。”

42. 在劫难逃

刚来美国时英语相当差，因此，我每天晚上都会懵懵懂懂地看晚间十一点播出的 ABC 新闻，以锤炼英文。指天发誓，我从电视中因为听得多而记下的有限的一些词汇中，“谋杀”即是其一。

说来惭愧，我至今仍不大能确定“谋杀”这个英文单词的正确拼法，但我在梦里也绝对能准确他说出这个词的发音。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内，每当遇到无论是交通例检还是警车追踪有罪嫌的车辆时，无论原因为何，警察要求受检人采取的应对姿态一概是警车停在被检车之后，接受检查的车内人心须留在车内不得走出车门，警员则从后面走上前来居高临下地进行各种检验。严重的时候，这种“注意事项”还会被警车中的扩音器喊出来做为重要警告。

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怕被检查的车内人抄家伙。

回想中国的交警们每当遇到查验项目时，十之八九是听任车内身份不明的人士走出车门，和警察肉身对肉身地一迎，警察方面还照规矩要给对方敬个礼。相信这也是被与美国相比太过纯良的社会环境娇惯出来的“中国特色”规章。在美国这个越来越无一定之规的国家里，小到街头平民会被有原因的火拼流弹无因地打死；大到客居闲住的某国王子王妃查不出原因地在自家的房内自家的床上被人夺命。治安不靖导致形色人等的种种死法，让人看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1993 年 10 月公布的调查报告说，在全美范围的各州及主要市内，洛杉矶的居民是最饱受犯罪侵害的人口，该地区沦为犯罪受害者的比率比全美的平均比率高出三分之一而且沦为暴力受害者的比率是全国的两倍。

更细一点的数字是，洛杉矶的暴力犯罪率为每十万人中就有一千七百七十八点六件；而纽约的这项数字为每十万人中有一千两百三十八点三件，洛杉矶比纽约高出 44%。

在联邦调查局的统计结果中，全美每二十二秒钟就有一人遭受暴力侵害。

为了表示打击暴力犯罪的决心，联邦参议院 1993 年下半年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叫“三振出局”的重要法案，法案规定：任何人只要在联邦法院被判定触犯三项严重暴力罪，就将被强制判处无期徒刑，这项议案的支持者说，这样呵以使由联邦法院审理的大部分暴力罪犯终老狱中，因为这些人多半也是犯罪活动最频繁的人。最近三、四年中，华裔社区内的仇杀案也开始大批涌现，而且内中纠葛往往光怪陆离。“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见诸报道的命案发生率接二连三，频繁时几乎周周都有。以致华人聚集区内街头忽然发现死尸，或在哪个高速公路边、哪片湖水中发现华人尸体侍领的事层出不穷。这些案件往往与帮派纠纷、感情恩怨、财务纠葛及人口走私有关，几乎就发生在侨社每一个人的身边，华人社区本来就不大，死者往往七拐八拐地和活着的不少人都有关系，让人不寒而栗。

比较起来，发生在各地唐人街的命案往往最具“特色”，其虽不具有十分鲜明的“民间性”，但胜在场面恢宏、手笔庞大。华埠帮派青年寻仇时，大庭广众之下持枪互相追杀，枪手手持武器在满坑满谷的人流中敏捷追逐，

场面如同在拍电影。常常是大白天寻仇者彼此撞见，双方一言不发举枪就射。枪声一响，看不出苗头的路人纷纷寻处掩蔽，一时间匍匐的匍匐、逃窜的逃窜，一副战地实景。近年来偷渡人蛇抵美后拒付区蛇人钱款的事件增多，因此，华埠的寻仇枪战更加频繁，令人闻之魄散。

这种案件中死伤者往往不是一个人。有一个晚上，纽约华埠附近的一个小型停车场内一下子发现了三具年龄相若的青年人面孔朝下的尸体，鲜血一片，连警方也叹说肇事者实在胆大。

美国的新闻报道一向侧重有人员伤亡的事件，美国的各华文媒体也秉承这一宗旨。由于电视报道强调的是现场图像，所以对于往往事先毫无预兆尤其是发生在夜间的凶杀案件，电视报道往往难于“驾驭”。有几年，尤其是1991至1992年间，这一类频繁出现的社区命案让我和我们台里另外的记者吃足苦头。那些日子里，每天早上都害怕去翻看当天的日报，总怕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华人新命案出来，那样的话，我们又要在每天例行的新闻讨论会上领略主管的满脸阴沉了。

盛传美国大型英文媒体的记者部有和警局连线的对讲电话，说是警方一有什么重大行动，记者往往能够优先知道。这个说法一时间让我们艳羡不已。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堪称是杀人者的乐园。如果是惯犯，能把现场处理得很干净，原则上可以在毫无查循的状况下随处信步。而且，只要他不工作或只要他即使工作也未向雇主提供社会保障号码，或者他甚至改了名字，那么从原则上讲，他是能躲过法网的。

而且，在全美治安恶化得不像样子的大都市内，大概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更是杀人者的乐园了，因为纽约州现行的州法中令人惊愕、原因不明地没有死刑。

虽早自八十年代起，纽约州民就一个劲地要求恢复死刑，但一任接一任的州长在主政纲领的制定上却是一个更比一个深具“自由化”观念，相当的诗人气质。为此，虽州参众两议会一再通过恢复死刑案，但最后均遭州长否决。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以反对死刑著名的现任州长葛漠在1989年州内民意测验中有76%的人赞成死刑的大环境下，仍奇迹般地能够获选连任。

时至如今，纽约没有死刑一事让听者都觉得是在痴人说梦。在90年代，废除死刑如果就秀色无边、繁花无数的巴黎而言或许多少贴边，但对世界闻名的猖狂城市纽约来讲，无疑太过造做。

与此同时，美国警法机构在办案过程中的面面俱到、煞有介事的原则，也令人觉得“世界真奇妙”。比如说，在1993年中，美国的一位男人当着他女友四岁大孩子的面枪杀了女友，法庭却表示四岁幼儿的话不足以采信。在找不到其他证据之前，杀人者仍可貌似清白地混迹人群。

可有多少神志清醒的杀人犯会挑选人声鼎沸的酒肆茶楼做为作案现场呢。

1993年出现的一个地铁抢劫犯获判胜诉案更是让人气冲牛斗，让人对美国一些听起来堂而皇之的法律气恨交加。

这项获判抢匪胜诉的案件发生于1984年6月28日。当时，年仅23岁的抢劫犯麦可·康明斯伙同另一个劫匪在纽约曼哈顿96街地铁站内一同抢劫一位年已71岁的老人桑德斯基。

在康明斯等人作案时，主管地铁罪案的捷运局警察罗德·古里斯在听到桑德斯基的呼叫声后赶赴现场，亲眼看见歹徒正勒着受害者的脖子进行抢

劫，受害者已被打得大衣撕破、眼镜损毁、遍体鳞伤。在看到警察赶来时，两名歹徒拔腿就跑。警察罗德·古里斯在追捕歹徒康明斯的过程中，曾喝令其停下，在喝令无效后拔枪向奔跑中的康明斯连开五枪，其中两枪击中其背，导致康明斯腰下瘫痪，终生需乘轮椅。

案犯康明斯据此控告捷运局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此案在历时多年的审理之后竟真的判定歹徒康明斯获胜，捷运局警方须赔偿康明斯四百三十万美元。

现已八十一岁的受害老人桑德斯基在听到判决结果时气愤不已，但他被告知说，他现在如果要告当年对他进行抢劫的案犯已无可能，原因是他的上诉时效已过。

据《纽约邮报》报道，当捷运局在尝试将此案向高等法院申诉时，高等法院拒绝受理。

对待犯人，美国体现出的彬彬有理相当周到而体贴，事事从人道角度着眼，深怕对作奸犯科者的人权有所伤害。比如说，即便是有一万个人目睹了一件命案，千夫所指的杀人者在正式经由法律程序定罪前，所有传播媒体不能称其为“凶犯”，只能变通地称其为“凶嫌”。

而一旦经由定罪的人犯，政府也是十分呵护其身心的。凡进过邻近纽约华埠的白街监狱的人无不为其中的设施齐全感到惊讶，许多人说那里各种康乐体育用品齐全，而且书报杂陈，不像是一个监狱，倒像是一个收费疗养院。

面对这种匪夷所思的法律，许多受害人家属常常指天发问：那么，我死去的亲人的人权由谁来维护？如何来维护呢？

43. 漫天飞子弹

在美国，我有一位半熟的朋友，该朋友身躯高且瘦，嗜舞如命，每逢听说各种中西场合有舞会举办，一概慷慨买票。常常是舞散人尽，他和他的太太或者其他身份的舞伴还处在一种意犹未尽的状态，一脸怅然。这人为人和善，常常未语先笑。

有一个夏天，我途经他在华埠开的肉食批发店，遂进去求水。一向未见，他笑声朗朗，相当热情。看到他在为我起身拿饮料时，腰后的衣服不太平整，我当时随口讥讽他说应该“先正衣冠再见客”。

听我说起这话，我的这位朋友这时微微地笑道：“你看看清楚，这种衣冠怎么个正法？”

我没太在意地低头往他手中一看，不由得一瓶桔汁几乎洒在地上，他从自己腰后摸出来的竟是一柄闪闪发亮的手枪。这位朋友随后咋咋作响地扳动着枪上的零部件说，他时常要出门收肉帐，往往一收就是十几家，回程时一定弄得满把现钞。“这年头，出门没把枪你以为你能走多远？”

可能是这次求水之行印象过深，致使后来每次再见到他在舞池中央欢乐异常，就总觉得他的腰后暗藏着杀机，未语先笑乃至歌舞升平，全是有条件的。

在美国的德州，不少人嗜枪如命，并隔二差五地举行枪展一类的名堂，其中就也有中国出的“黑星牌”、“红星牌”。但美国其他州的不少人与枪同在，则决非一句“嗜枪如命”所能了结。据美国卫生部 1994 年 1 月公布的报告说，美国境内包括纽约州、加州在内的六个州，目前已进入死于枪击的人数比死于车祸的人还多的年代。治安专家们预测，目前美国的社会秩序不做大调整的话，到 2003 年，美国全国的情形均将跟进。

这领先于全国枪击死亡人数的六个州是纽约、加州、路易斯安那、内华达、德克萨斯及维基尼亚。

《纽约时报》说，根据联邦火器局的统计数字，在 1950 年，美国只有五千四百万支枪。但发展到九十年代，美国枪支的数量几乎和人口一样多。1992 年，美国人口大约为两亿五千五百万，而枪的数目为两亿一千一百万支。这一数字比 1990 年多出一千万支，更比 1970 年多出一倍。

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是一个极度困扰治安当局的重大难题。

在美国，可以说是各色人等人人有枪，持枪人中最小的可能还是小学生。在美国的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由于有人玩枪不慎走火，子弹穿墙而过打中墙这边无辜邻居的新闻。这种听起来相当荒唐的事件，曾让不少人惊呼：美国人应该呆到什么地方才可以安全一些呢？

据《纽约时报》报道，眼下在纽约市，每隔 88 分钟就会有人被子弹击中。1993 年截止到 11 月中旬，据报全市已有 4796 人遭到枪击。其中有 306 人为无辜破流弹击中的行人或旁观者。纽约市在 1905 年以前每年遭人杀害的市民人数只有 143 人，凶杀率为每十万人中有 3.3 人；到了六十年代中叶，凶杀案中的死亡人数开始超过车祸死亡人数；及至 1990 年时，凶杀率已升至每十万人中有三十一人。

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一块名为“死亡钟”的大型看板开始耸立在纽约曼哈顿 47 街与第七大道交口，自 1994 年开始的第一天起计算全美死于枪击者的人数以及美国枪支的数量。据出资 25 万元兴建这块看板的新泽西州百万富翁布瑞南表示，他的弟弟于 25 年前死于抢劫者的枪下，而这也是他立志在

此方面做出动作的重要原因。

自 1990 年之后，死于美国枪支泛滥恶果之下最著名的人士非詹姆斯·乔丹莫属。

詹姆斯·乔丹，90 年代全世界最著名、最富有的职业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ON) 的父亲。他于 1993 年 7 月 23 日清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伦伯顿市 74 号及 95 号公路的交叉口附近被人一枪毙命。他致命的“过错”是因为驾驶劳累而在公路旁停车睡觉。詹姆斯睡觉时未将车门上锁，一扇车窗也开着。

警方说，詹姆斯死得很干净，他所驾驶的 92 年份的莱萨斯红色跑车内几乎没有血迹。他死时还戴着儿子送给他的象征全美职业篮球冠军身份的戒指。向他开枪的人现年 18 岁，是高中辍学生。

此案的主要作案人是两位，同样的岁数、同样的辍学经历。他们是在进入詹姆斯的车内进行抢劫时，惊醒了被害人，害怕被害人有所反应而将其射杀的。18 岁的两位害人音均有持枪抢劫的前科，其中的一位两个月前才假释出狱。

事发恰在 7 月，当时美国 1993 年职业篮球赛结束未几，迈克尔·乔丹所在的芝加哥公牛队刚圆三连冠之梦，乔丹姿态谦和的明星风采还是举国上下的谈资，恶耗传来，震撼全美，也让几乎所有乔丹迷心痛不已。

据称，这两位 18 岁的凶犯也是乔丹的球迷，前往过堂时，这两位无知的黑人青年当着全美电视观众的面泪流满腮。

在全美范围内，重大攻击刑案中使用枪支的比率为 31%。

纽约警察局认为纽约的民间拥有枪支在一百万支之谱，而且大部分是非法枪支。在过去的十五年之中，纽约每年大约有两万支包括四四口径的马格那枪、以色列制的乌刺冲锋枪、俄罗斯制的 AK—47 枪等枪支被用焚烧的方式处理掉。这些枪被送进与纽约邻近的宾州等地的鼓风机，被融化后再经循环处理制成人造圣诞树上使用的金属线，或是钓丝锤及钉子。

纽约警方表示，到 1993 年底，纽约警方仍有 11 万多支库存的枪支没能处理。它们之中很多因为有所涉案，必须予以保留，当做证据。

警方说，他们在纽约街头甚至查获过一架火箭发射器，而且警方也曾关闭过用意不言而喻的“租枪店”。这种租枪店为那些“需要使用枪的人”服务，一支枪每晚的租金才二十美元。

据统计，在六十年代，纽约市曼哈顿单区各种恶性谋杀案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案件使用了枪械；而在 1992 年，区内谋杀案即使在成十倍地增长后，仍有将近二分之一强的案件使用了枪械。为因应各种犯罪集团越来越精良的作案武器，一向抱怨在街上执勤时，武器装备远不如歹徒精良的纽约市警察被告知于 1993 年底获准携带 9 毫米半自动手枪工作，这种手枪可以一次射击十发子弹。如前所述，近年来，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早已波及到学校中。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今年二月，十七岁的青少年米歇尔在加州的一所中学的走廊上被他的同学开枪打死，原因是那个同学认为米歇尔对他做了一个鬼脸。更有纽约的一家报纸在对布鲁克林及曼哈顿的公立学校做调查时，许多学生都说他们有能力可以在 48 个小时内搞到一支枪。而且，美国中学生对枪支的谈论越来越随便，中学男生们把枪称为“带花生米的 M&M'S (美国一种十分大众化的低档巧克力糖)”。

为更广泛地制止枪支泛滥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于 1993 年 11 月 30 日签

署了手枪管制的“布雷迪法案”。这项以里根主政时期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JAMES BRADY）之名命名的法案，要求对购买手枪者必须经由提出申请、接受背景调查及五天等候时间的手续，在申请获准后才能提货。

原任里根政府新闻秘书的布雷迪在 1981 年里根总统被刺案件中被流弹击中身受重伤，虽经多方抢救，他还是半身不遂了。自从受伤后，布雷迪和他的太太莎拉·布雷迪开始成为美国最知名的枪支管制鼓吹者。事也难怪，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的布雷迪身驾轮椅，不能行走，正值壮年却因长达十多年的轮椅生涯而变得体态臃肿、面庞肥大。在克林顿的“布雷迪法案”签字仪式上，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克林顿的特约贵宾。

获准通过的“布雷迪法案”除在美国对购枪者基本毫无限制的 27 个州内实施外，一些已经制定有比此一法案更严格法规的州将获准保留原法规。在后述诸州内，加州的法规早已要求购枪者必须有 15 天的等候期，维基尼亚州也设有对购枪人立即进行背景调查的法规。该法规宣布禁止制造和贩卖十九种火力强大的攻击武器，其中包括乌兹冲锋枪和自动步枪 AK47。

曾在美国 1992 年万圣节误入歧门而被屋主当做劫匪射杀的日本交换学生服部吉弘的父母，也是美国禁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自儿子在美国死于非命后，这对夫妇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内疚”，1993 年夏天克林顿访日时还曾致电慰问他们。在美国即将开始严格枪支管理时，这两位日本人带着一份有一百七十万日本人和二十万美国人联署的枪支管制请愿书进入白宫，当面交给了克林顿。

克林顿在签署这一法案时讲了一段他在阿肯色州时遇到的一件难忘的往事。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卖出过一把枪给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男人，结果该男人在拿到这把枪后接下来的 12 小时内接连杀死了六个人。

“我的朋友至今都无法忘记这件事。”克林顿说，“别对我说这个法案无关重要，那是错误的。”

克林顿接连两遍地说，那是错误的。

来自支持这一法案方面提出的资料显示，在已立有背景调查法规的各州，多年来已阻止了数万名罪犯从枪店或者枪支经销商处购买手枪，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1989 年以来，部分州实行的对购枪人进行的背景调查和等候期制度已经阻上了四万七千余次购买手枪的企图。

但对于这项法案，美国的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种对良民购枪的限制，根本起不到防止枪支犯罪的作用。比如全美步枪协会等团体就指出这一法案只具有象征意义，侵犯了为自卫目的购枪者的权利。

这种说法不巧被证实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美国，不良分子几乎人人都有枪。纽约警方 1993 年冬天甚至在布朗士的一家快餐店内起出数十把类型不一的枪支。这家快餐店所在的街区内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家店的老板真实身份是售枪人，每个人在有一点钱时都可以随时进入店内买到一把自己所能负担得起的杀人武器。所以，“布雷迪法案”对民众买枪的禁止，限制的只是一种从正规的枪店买枪的途径，而不是杜绝歹徒拥有枪支的办法。

更富于戏剧性的事情是，在布雷迪法案通过后没几天，一位名为柯林·佛格森（COLIN FERGUSON）的黑裔移民，在沿线多为富人区的长岛铁路列车的车厢中拿着一支半自动手枪向车内拥挤的人群开枪。这位在随身携带的笔记资料中但承自己仇恨白人及亚裔的种族主义者在这次深知后果的射击行动中，当着乘客的面打完枪膛中的子弹后又填装了一次子弹再行开枪。佛格森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打伤了十七人，打死六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佛格森用来行凶的半自动鲁格 P89 手枪是在全美公认购枪手续最严地区之一的加州买到的。佛格森于 1993 年 3 月至 5 月暂住在南加州长滩的几家汽车旅馆内，他把汽车旅馆的地址登记为自己的家庭住址，先取得了加州驾驶执照。从原理上讲，在加州，只要有一张驾驶执照就可以通过层层检查买到枪支。

加州方面负责检查枪支购买的机构从未查证佛格森报住的地址，即视他为加州居民，准许他在 5 月 9 日购到所要的手枪。为满足加州的购枪者必须等候十五天的要求，佛格森在一家汽车旅馆内果真呆够了十五天。

佛格森案件的突然出现，给了才刚为“布雷迪法案”获得通过而兴高采烈的一些美国人当头一棒。因为从佛格森购枪的过程来看，即便是对购枪人审查条件相当苛刻的加州也不能杜绝歹徒欺诈购枪的行为，那么条件相对宽松的“布雷迪法案”实施后的效力如何以已不言而喻。

尤其是自此次血案发生后，全美又出现了北加州一名失业电脑工程师向夫业救济办公人员开枪，在打死四人后被警方击毙；从加州自家卧室中被人绑架的 12 岁女孩宝丽·拉克斯在失踪两个月后被警方寻获尸体；圣地亚哥学校爆发枪手连杀三人后自杀事件；芝加哥的一名少年枪手在午餐时间在闹市区向行人开枪等恶性案件，不少美国人惊讶地发现，现在的美国杀人者不再是为了钱而杀人，而是为杀人而杀人。在这种惶惑无主的感觉中，自 1993 年年底开始，美国民间掀起了一股空前的买枪热，几个月之内，美国各地枪支零售商每个月的销售增长率都高达 50% 到 60%，一些地区甚至达到 100%。

据《纽约时报》引述休斯顿一家枪店老板的说法是：美国民间诚实的老百姓们，已经把拥有一柄枪视为对付严重的治安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

44. 毒品诱惑的汪洋

1994年一开头，全美曾播出一则有关校园内毒品交易的广告。广告中一个才下学的男孩正在校园附近往家走，迎面遇上了他的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要男孩“享受”一下他所提供的一个小烟卷形状的免费毒品。

该男孩一脸的为难，推脱着说要走。他的同学这时面露真诚地劝说男孩和他玩一个游戏，看看天意是怎样的。这个同学把他要提供的免费“小烟卷”在两个手中倒错了一下，然后两只手掌握拳手心朝下地要该男孩做一下选择，要哪只手。

小男孩犹疑了一下应付着指了指伸在面前的其中一只手。那位同学把手二翻开来，其中恰好有那个“小烟卷”。这位同学紧接着兴奋地说：“今天你真走运。”

小男孩在此情况下还是拒绝了免费毒品的诱惑，支支吾吾地走开了。

这时，电视的画外音说：你平时最好的朋友，可能并不是你的真朋友。

再看镜头上，小男孩的那个同学转过身来摊开的双手上，两个手心中竟各有一个“小烟卷”。

美国的毒品泛滥已久，受用过的人不在少数。上至总统克林顿，下至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克林顿的吸毒史有案可查的只有一次，这一次是在他竞选过程中被人揭出其有吸大麻的前科后而著名的。但克林顿对此提出的牵强解释却让美国人整整笑了好几个月。

克林顿解释说，面对大麻他当时并没有真正“吸进去”。这种显而易见不是那么回事的解释立即贻笑大方。这个笑柄后来还被克林顿的竞选政敌美国南方富豪裴洛在和克林顿的副手高尔做电视辩论时拿出来嘲讽。裴洛当时在一场辩论高潮时不着痕迹地要高尔“吸气，你吸进去”，惹来明白人大笑不止。为追随名人风范，九十年代克林顿的上台除给美国政界带来年龄上的骤变外，甚至还带起了一股大麻热。这使得沉寂了多年的大麻文化又重新抬头。

早在八十年代，由里根政府发起的反毒运动竭力丑化大麻，效果昭彰，大麻一时间成为一种相当丑恶的东西。但自克林顿上台后，出于崇拜效应，美国文化中又出现了强烈的大麻热，不仅流行乐团开始不明缘由地讴歌它，连时装、电影中也都开始“进入情况”

在高级时装界，美国现在甚至开始有二十几个厂商供应由大麻纤维制作的服装。由于美国禁止种植大麻，因此这种大麻布料一概经由中国外进口。而且，大麻文化涉及的领域还体现在项链、耳环及刺青上面。一说是高度流行的大麻文化，为反应灵敏的美国厂商带来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生意。

美国人的吸毒风气相当醇厚，在一些治安不好的街区内随处可见地上有人们用来吸毒的小瓶、针头一类的东西。美国人买毒品是一件既危险又平常的事情，危险到美国警方甚至在一般的例行交通检查时也可能查一下车内是否有毒品藏带，一经查到立即予以重罪起诉。但毒品这种东西却又普遍到在民间广为流传，可以说已成为美国大都市中最有利润的街边交易。在美国大都市的大多数街区，为了怕警方找到线索，毒贩们利用BP机和公用电话进行交易联络，而且这种联络到了九十年代已是遍地开花。所以，在九十年代，美国纽约等犯罪超级大城市中的公用电话陆续被拆除了原本标在电话机上的

电话号码，一些设在店铺内的公用电话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方法以使毒贩无法骚扰。

但是从细地观察美国社会，当局对于毒品的禁堵明显底气不足。美国人崇尚刺激，对现实生活的平淡无奇感到极度厌烦，毒品对太多美国人的意义形同一种解救。况且，美国人在除了对毒品上瘾之外，还对药物甚至其他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上瘾，所以，在当代美国的毒界，如果你只描述说“毒品泛滥”四个字还是不够全面的，全面的说法是“药品泛滥”。

认真讲起来，吸用、服用或注射可以改变心态的药品或物品都被列为滥用药品。这些通常和“毒品”意义连在一起的药品包括鸦片、吗啡、可卡因等。滥用药品的情形虽相对观念新鲜，但却也是风行全美的一种“自我享受”。举例而言，美国的许多止痛药包括TYLENOL、CODEINE及DARVON等，都和海洛因一样可以刺激人体脑内的舒适神经区，因此很容易使服用的人上瘾，染上这种痛症的人同样需要用类似戒毒的办法来戒除。但如果以为这种药瘾只有买不起毒品的美国穷人才会上瘾，那则错了。美国有太多富有的大明星包括麦克·杰克逊都承认自己染上过药瘾。

多年以来，美国的毒品中以吗啡最受欢迎，而且相对价格昂贵。这种毒品通常以注射为主。据过来人描述，吗啡这种毒品的好处是见效快，而且不易留下后遗症。“当针管进入皮下才轻轻一推时，你的鼻子里就会一下子冲出一股清香。”在旧金山就读初、高中时是个著名的“玩闹”，后来浪子回头成为一家印刷厂规规矩矩一介老板的华裔李东平说：“这种东西一用之后就会豁然心情开朗，感觉身体腾云驾雾，一切烦恼全消。”

“不少人喜欢偷偷地用它来壮阳。这种东西一用之后就会在腾云驾雾之余兼收持久力强的功效。但用的过滥又会不举。”李东平笑着说：“依我看，吗啡的功效却在另一方面，任何人一旦用过吗啡之后，你赶快向他借钱，一定能借得到。而且，我甚至建议，想自杀的人最好是打吗啡过量而死，那样去死的话，人对世界留下的印象会十分美好，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痛苦。”

李东平对大麻和可卡因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前者的功效不太美妙，常常使吸食者“毫无缘故地大笑不停”，而可卡因的功效又会让人在用过之后产生头痛等后果。近十几年来在美国十分流行一种叫做“快克”(CRACK)的毒品，据知其成份就是用可卡因加苏打粉和水煮干而成。这种毒品的价格不高，特性是见效快、消失也快，查验是否用过十分不容易。

在八十年代，曾经有一度美国人中甚至流行吸食强力胶。这种令圈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流行是将普通强力胶放在塑胶套内然后放在嘴上吸其味道，其后果据称和吸毒相仿。

在美国青少年中，滥用毒品及药品的现象是近年来少年不良行为中发展迅速的一支新军，校园也成为毒贩生意眼中的必争之地，有报道说，进入九十年代，美国大都市内的初中生中有1/6的人抽大麻；高中生中有1/2的人有吸毒经验。和本章最前提到反毒广告相同，美国不少颇有“远见”的毒贩还利用将毒品先行免费发送给青少年使其上瘾的办法来推销毒品。在佛罗里达州就曾出现过才满九岁的儿童带毒品上学，准备发送给班里同学。

近年来，美国大都市的学生家长们除了要和自己经济前景做拼搏，还要和逐渐向子女靠拢的毒贩较劲，十分艰辛。由于美国的毒品商业过于发达，美国在教育方面也将此作为学生的重要社会知识教育课程。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有关毒品的知识从初中就开始灌输给学生。同时，防毒工作也在校园

中猛烈展开。例如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纽约初、高中校区内干脆贴出大字招牌明示：校园内禁止毒品，不少学区也开始申请经费设立专门的反毒办公室用来解决有关问题。更有一些学区甚至在校内使用警犬来搜查毒品。纽约市1994年的新市长朱里安尼在竞选之初就把把在全市每一所学校内建立“无毒品区”的政纲列力上任后的施政重点。

但由于毒品生意的利润惊人，美国社会问题又有一些难解的死扣，因此，据专家估计，毒品生意在美国未来的发展仍将走旺。在联邦对毒品禁绝不止时，美国联邦公共卫生署署长1993年甚至曾有提议说干脆将吸毒合法化，以更有效地防止相关的其他罪案发生。但此一念头才刚萌芽，就被吸大麻“没吸进去”的克林顿一口回绝，他说“不行”。

45. 金钱之于美国人

在美国才明白美国人严重的拜金情绪坦白而直露，在这一点上连最不能俗的大学校园这一类地方也深受池鱼之殃。

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评定一个教授的好坏大致上需依据两点，一是是否有著作出版，所以，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中流传着这样的名言：“不出版即毁灭”；但另外的一个评定标准就不那么好意思捅破了，这个评定标准是看一个教授是否在争取研究经费中有好的记录。而且，这后一种标准越来越显示出其强烈的重要性，不少学校在这方面的评定真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其实，学校把着眼点放在“教授钱”上的原因无他，因为一般的学校是会从教授们争取来的经费中抽取3%到5%的费用的。因此，在美国，一个“好教授”通常是手上握有大笔经费、能够养活一大批研究生的人，这种能招财的教授也因此不可能不讨一向经济窘困的美国大学的欢把“教授”和“搞钱”如此风马牛的东西那么紧密地相提并论，可以想见美国社会拜金气盛程度的一斑。

回到中国国内时常破旧日的朋友问起，你到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每到这时我都会不加思索地说：“我想我只能说我和美国已经是一样的拜金了。”

1988年底我出国前，中国的一切都还是十分按部就班，人们对钱的概念也还至少停留在无可比较之上。而在美国，关于“你的钱不够多”、“你的日子不如别人好”的刺激却是每分每秒都存在的。你开车在路上，永远有比你的车好上几倍的车子与你并驾齐驱；你走在街上，看进眼中的房屋形色各异，在价值上永无止境。每到这种时候，稍不具沉着素质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内心翻腾。

刚到美国时，看到曼哈顿无数美伦美奂的整整一幢大楼都被告知是属于私人的，常常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讲，来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是大钱。

美国人对金钱的崇拜相当直露，在这种造就大起大落的国家中，钱的标准几乎就是衡量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与统计境内究竟有多少流浪家庭相类似，美国另具着眼点的机构也会定期进行另一种情调的统计。比如，美国的《富比士》杂志每年都会对美国前400名最富有的有钱人进行排名，而后公布出来的富翁家财数字往往眩目得让一般人干脆毫无知觉。比如在1993年，美国的首富华伦·巴非特的资产净值高达83亿元。

所以，美国有钱人的生活状况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拿美国最著名的暴发户唐纳·川普的金钱生活来讲，就足以令人吃惊不已。

川普的发迹是在他还年青时的八十年代，他是由搞房地产业而告暴发的。由于他对自己的形象擅长鼓吹，而且在富豪之中他的确也属于英俊潇洒一类，因此，他很快为全球瞩目，成为当代美国暴发富人的代表人物。多少年来，无数美国人一提到有关钱的问题，对比之中无论是自我解嘲也好、讥讽他人也好，提说富的一方，一定是这个川普。

可惜川普光彩了大半辈子到了九十年代却开始吃瘪。由于美国经济九十年代大走颓势，使得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川普受此带累在1992、1993年顶度过了一生中最艰困的日子。当时，川普付不出他举债修建的赌场及其他建筑的贷款利息，他的债权银行在答应再借给他一些钱款以应急需的时候，对他个人进行了“经济萧条期间”的私人花费限制。

被限制花费的川普，每月的个人花销和家用钱款据悉不能超过四十五万美元，下一年减低为三十七万五千元，再下一年减为二十五万元。

这种数字乍听之下有点做作，因为如果说每月四十五万美元的个人开销还算是“限制”的话，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真得要叹说自己的日子当真牛马不如了。但为该大亨细算起账来却不离谱。川普在全美国境内著名的私住华厦就有三大栋，每栋房屋部分别有四十五到一百一十八间房屋不等，对有这样排场的人来讲，每月请来维护房屋、洒扫清洁、修花改草的人就在百余人之谱，每且四十五万的数字这么折算下来就不太稀奇了。更何况，川普的家居生活还包括了私人喷气式飞机、私人直升飞机、私人豪华游艇等附件，每月维修费、管理人员的工资的开销也都在在数十万元之谱。其他如川普自己吃、穿、用等方面的开销更是无疑奢华，也难怪川普的下堂妻伊凡娜·川普在听说了四十五万一个月这个数目之后，勉强地概括说：“我想他还是活得下去的。”

在美国，对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往往是和中国人的有关定义相反的。在中国人的评判眼光中，一个人如果给人的印象是“白胖”，猜想中该人的生活品质一定不会和穷困联系起来。但在美国，“白胖”已经基本上是“穷人”的代名词了。因为白胖的人意味着这人没有时间去旅游、晒太阳、进健身房健身。在美国，有闲、有钱的人参加一个健身俱乐部已是中等收入者再普遍不过的事了，不同的是俱乐部的档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准进行选择，确实有钱的人还多半会聘请一位家庭教练到自己的家里来进行特别的一对一辅导。因此，正规地说来，美国富人的外形概念是“身材健美（至少是适中）、皮肤黝黑”。有一部美国小说的卷首一开言就是“这里充满了贫穷、浅肤色的胖子”。推而广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美国哪个地区皮白体胖者多时，这个地区必定贫穷无疑。

更加有钱到一个地步之后，美国的有闲阶级会向慈善机构捐款赠物，多年来，捐赠行为也已为美国富人的另外一个标记，并且蔚为风尚，美国的法律规定，适当程度内的捐赠是可以冲减税赋的，虽说美国不少富人的捐赠行为是以避税为出发点的，但在美国这种人與人关系日趋恶形恶状的社会，尤其是从经济萧条时人人自危的角度来看，这种捐助给人的感觉已是十分体贴，也让人印象深远。

也正如此，“发了财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好人”这个理念在美国整个社会中屡试不爽。这也就是说，一个生性善良的人如果一辈子穷愁潦倒，既不能拿出钱来捐献又无法每天不去挣饭钱而花大把的时间去做慈善义工，那么他则庄定今生空有爱心了。以著名歌手麦克·杰克逊而言，多少年来当他大红之后，每年都会有一些大手笔的捐献行动出台或者是招一些素昧平生的儿童到自己的私人游乐园中免费玩耍。他积极地从自己用不掉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捐给他看着有意义的慈善、病痛机构，一来可以为自己抵税，二来可把自己在超级饱暖以后鸟瞰众生滋生的怜悯之心变成行动，真成了慈善代言人了。

当然这种举动本身绝对是崇高的，如果麦克·杰克逊不把钱捐出，而是去用来用电话招妓，那也是旁人无可奈何的事。

为富者比较容易“成仁”。否则只有空想。

近几年，美国捐献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数前美国烟草大王的独生为富成仁的事了。

二十年代继承了“美利坚烟草公司”东主杜克一亿美元家产一半的十三岁女孩道瑞丝·杜克(DORISDUKE)，于1993年10月28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身后遗下多达12亿美元的遗产。她于1993年4月签署的遗嘱于1993年11月1日在法庭启封。按遗嘱所嘱，财产中除部分财产分赠亲友外，十亿美元将用来成立“道瑞丝·杜克慈善基金会”，一百万元捐给纽约动物学会，两千万美元由杜克大学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均分。

道瑞丝1912年11月22日生于纽约市。她幼年丧母，1925年10月10日丧父。道瑞丝13岁时即成为父亲的遗产继承人。由于遗产款额惊人，她一度被称为“美国最富有的女孩”，随着她的长大成人，她又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女人。

由道瑞丝身后财产建立的基金会虽然与基金在60亿美元以上、早年间成立的福特、吉拉克等基金会比仍是小巫见大巫，但其规模也位居前十二名之内。

46. 美国人贫穷的难言之隐

从小到大，我一直先入为主地把“美国人”和“有钱人”两个词划等号。可当真到了美国之后，才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是那么穷。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上大学时就对上海青年人中盛行的“节前买衣节后退衣”的伎俩记忆犹新。当年，上海不少青年人尤其是“毛脚女婿”

一类的角色，每到节假日要会丈母娘或参加聚会时，往往会为没有一件新的见人衣服而苦恼。

精明的人就会在节日前到商店里去买一件高级衣服，在节日中穿着风光过后，节后再找理由到店内退货。

当年时值中国的物质相对贫乏，这种“买衣退衣”的勾当还说得过去，但想不到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这个寸时寸金的地方，这种伎俩竟也大有市场。纽约节后的大百货商场内的退货部常常是人头济济，大排长龙，让人很难想象平时走路都神色匆匆的纽约人会一趟又一趟地为一件应节衣服而往返奔走。这种情形多少也说明了当今的美国人在花钱上不但已经不再豪气十足，而且还得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程序来满足自己。纽约的不少服饰商店除了向顾客昭示店内有关退货的政策之外，还特别设有专门的“节日退货条例”。在这种条例中，除公布了更苛刻的退货天数限制外，还要求所退货品上必须依原样带有价格标签等使人无法穿出去示众的“附件”。

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测量，手头一旦不宽松，生在东西南北各种地方的人秉性都相差不多。

数十年来，美国成为开始新生活的一方乐土，吸引着世界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几乎就是全世界百余年来一个历久不衰的风潮。虽说美国是以“金山”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在事实上，统计数字显示，贫穷问题其实已成为困扰美国人的严重问题。我的一个在有着大量美国同事的公司做事的朋友说，在他的公司洋同事中，不少经济窘迫者几乎到了日日等米下锅的地步。由于美国的公司给员工的薪水是以支票形式发下的，一般而言，员工在拿到薪水支票后须存入自己的银行户头，员工的开户银行再凭支票向开具支票的公司所属银行索取现金，所以，一张薪水支票发下之后，员工存支票、等兑现之类的往往要耗时三、四天之久。我的朋友说，他身边有太多的同事连这种短暂的时间都等不了，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他的这些穷同事往往火急火燎地到银行去要把薪水支票贴些钱给银行而求立即兑现。

1993年，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低收入的美国家庭比加拿大及七个发达西欧国家的低收入家庭更贫穷。

按1992年美国政府制定的贫穷标准，凡一家四口年收入在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五元以下及单人年收入在七千一百四十三元以下者，均可被统称为“穷人”。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表示，美国国内的“穷人”人数到1992年底已增加到三千六百九十万，占总人口的14.5%。此数字也是美国十年来最高的。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自美国经济衰退以来，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显现出不平稳发展的局面，使得对国内经济前景的预测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难题。在1991年，美国国民的人均收入为19169元，在1992年中，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有大幅上升，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人平均年收

入为 23120 元。同年中，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为 30786 元。1992 年被排名为世界人均收入第一的是瑞士，其人均所得为 36230 元。而到了 1993 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降为 20114 元，与前一年相比有大幅锐减。

但如果把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非法做上的真实收入也计算进来，则这份统计数字相信远不能反应美国人的真实人均收入状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目前的低收入家庭已到了几乎无法过日子的地步了。

据该报报道说，居住在佛蒙州的戴佐是一位在曲棍球杆场做全工的一家之主，他有太太和一个患有哮喘病的女儿。戴佐每周的工资数目是 188.4 元，付了房租、水电等费用之后，他每周仅剩 20 元的生活费，在他们的生活中，任何一笔额外的开销都负担不起。

美国的低收入家庭除了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乃至非法移民家庭，就境内相对而言的“土著”来讲，大多数“贫困户”是只有高中毕业程度、居住在乡下的白人家庭。自 1980 年至 1990 年，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上没有做过调升，因此，从 1972 年至 1992 年之间，美国的低收入劳工家庭剧增了 44.3%。从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提供的一项数据来看，现在的美国已有 28% 的成人劳工不能使一家四口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标准上。而在 1979 年，这项数字仅为 21%。

联邦政府在对贫困家庭的考量上制定有各项相关标准，而从这些经济考量指数之间美国贫困家庭实际的浮动来看，解决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已成为当今美国政府的一大沉重负担。按目前的标准计算，美国领取最低工资者的年收入才达 8840 元，比联邦制定的一家三口的收入标准少了 2300 元，而 1979 年美国的最低收入者的年收入比政府制定的一家三口收入标准高出 459 元。美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4.25 元，面对这个实行已久的最低工资数字在经过八十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后，按这种标准领取工资的人，还不如伸手向政府领到的救济金数额多。

为此，《华尔街日报》列举了蓝领工人巴斯基夫妇的例子来做说明。巴斯基夫妇在 1992 年春天全部失业了，因此，他们每个月可以从政府处拿到一千美元的补助金。后来，当他们都找到工作后，每个月的收入总和也不过才一千两百元，而且他们每个外出工作的日子里，还要每小时付给他们的保姆两元钱，请她来照看两个女儿。

但严重的情形并不仅如此，由于贫穷，美国的不少人家甚至连医疗也成了问题。比如，“补蛀牙”这种即使在中国也是人人都能得到解决的简单医疗问题，在不少美国人中竟也成了一件大事。

美国公共卫生署 1993 年 11 月底公布了美国民众中牙病泛滥的程度。这份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牙医收费高昂，一般的医疗保险又都不保牙险，因此全美国目前有大约一亿五千万人仍旧没有有关牙齿的医疗保险。这种情况导致了即使一向相当重视医疗的美国白人儿童中也只有 87.5% 需要补牙的人能够如愿；白人成年人中有 93% 的人能够补牙；而在少数民族方面，儿童中只有 69.6% 患有蛀牙的人能够如愿补牙。

谈到美国人的贫穷，相信是一般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向往出国挣钱的中国人一向把美国等发达国家当成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实现地，殊不知在美国那边也有大把关于贫穷的苦言。再举一个更实在的例子吧，综观 1993、1994 年中美两地的物价，感觉中除了个别产品具有不可理喻的当地价格外，中美间的实际物价基本上距离相差不过二分之一，许多商品甚至就是

同价。

但严格地说起来，美国穷人的日子并不难捱，至少不会像早年中国穷人那样严重地“缺油”。因为，美国最便宜的食物即是鸡、猪肉一类早年中国平常家庭中过年节时才有得一吃的东西，而且一只整鸡的价钱也不过是三、四元钱。如果再不讲究的穷人可以专吃鸡翅膀、鸡腿等超级市场中已清洗包装的干净漂亮的“鸡零件”，这种东西更是便宜得几乎不要钱，花个一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上一大盒。

刚到美国时一方面是因为钱不富裕，另一方面倒也确实是为了开祭，我可真是狠吃了一通鸡零件，这种在我母亲这种江浙人口中鸡的珍宝“叫、飞、跳”（鸡的脖子、翅膀和腿），我当时每天都用白水煮一下然后蘸着番茄酱吃，足足吃了一个多月才告吃腻。

与这一类肉类相比，美国的青菜倒是相对昂贵的食物。美国华人超级市场中，合华人口味稍不“大众”一点的青菜，每磅价格往往在一美元以上四美元以下，十之七、八比鸡、猪肉贵。

为了解决美国民间日甚一日的贫穷问题，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在上台伊始就提出了“让工作值得做”的口号，以期使得美国现今存在着的四百九十万低收入民众，特别是其中60%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美国现政府在这方面提出的目标是：“止美国规规矩矩的全职工作者有能力养家”。已这种听上去毫不稀奇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了。1993年10月底，美国劳工部长瑞奇曾计划提高全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各种压力下又延迟了这项计划。来自美国商界的应对抗议是，假如美国最低工资数目提高的话，雇主将不得已采取裁员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或是将工厂迁至外国，再或是改为自动化生产的做法相因应。这样一来，美国劳工的失业情形又将趋于严重。尤其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以来，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工市场的吸引力更成为资方的杀手锏，美国劳工阶层的贫穷问题也因此而雪上加霜。

但在美国最惨的阶层还不是这种低级劳工，比这种低收入者更穷的人则是无家可归者。再举纽约的例子，近年来纽约市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数字远远超过了专家估计的数字。新的研究指出，1992年一年内在市内收容所住过的就有八万六千人，而五年内住过收容所的人为二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五人，达到全市总人口的3.3%。

以往纽约收容所中被收容人员多以酗酒者、精神病患者或吸毒者为主，但在九十年代，这种相对单纯的事情已经没有了，被收容人员的成份开始日渐复杂，贫穷的市民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收容所。据宾州大学卫生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地区经济有了问题、工资下降、福利金减少和房租剧增等，都是导致当今流浪人数剧增的肇因。

而且，在美国当今社会中，整个家庭都在流浪的比例开始增多。根据美国市长协会1993年12月公布的一项对全美26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到了1993年，城市游民人口中，全美申请紧急收容的家庭已经几乎和单身男游民数量相同，即各占43%，单身女游民则占11%，剩余的为独自游荡的儿童。由于游民数字的不断增多，全美各地对游民的收容能力越来越显得吃力。1993年，全美各地收容所中的床位平均增加了4%，但据抽样调查，仍有85%的收容所因为床位紧缺的原因，拒绝了一些游民被收容的要求。在另一方面，以对游民家庭的统计来看，1991年在全美26个主要城市进行的调查发

现，遭到收容拒绝的游民家庭占总申请的 15%，到 1992 年，这项数字增长至 20%，而至 1993 年，此数字升至 29%。

美国房屋及城市发展部目前已将减少游民家庭的总数作为该部的首要目标，并希望能说服国会增加用于紧急收养所的联邦拨款使这方面的经费在 1994 财政年度中增为 8 亿元，而到 1995 财政年度增为 16 亿元。

坐在中国遥想美国，念头中总是飞光流彩，如果不是眼见，我也不敢全信。要命的是，我看见了。

47. 包起个英俊男人

在国内看报，常能看到在描写域外的一些犯罪及肮脏的去处时，总是会夹杂着这样的一些话——“这里吸毒者、同性恋者聚集”之类，其实以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眼光来看，这种说法相当想当然。

在当代美国人口中的说法是，美国的有钱人才玩得起同性恋。事实上，美国现今新潮一点的不少有钱人早开始以“包”起一个英俊的男人为时尚。

这些被雇佣的英俊男人开始扮起传统中漂亮女人的角色来，不声不响地完成了社会中这一令人惊诧的角色转换。

甚至有人说：如今在美国，只有乡下人和城市的穷人才会去嫖妓女。

所以，美国人口中的“CONDOM”含意应是“保险套”而不是“避孕套”。

在我的美国经验里，仪表不俗的美国男人中似乎多半已经“寡人有癖”了。我这么说可能言过其实，但美国同性恋意识的漫延的确已经到了非常的阶段。

美国的著名同性恋地区在美西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出名的城市旧金山，这个四季温度宜人的城市内有同性恋固定聚居的街道和酒吧。刚到美国时因为对此万分好奇，因此还央求住在旧金山的朋友开车去到这些街道和酒吧去“长见识”，但即使是在当时，同性恋们也已经修炼得面对好奇旁若无人了，相形之下我反倒是一派鬼祟。

相比之下，我对美东地区的同性恋聚集地 CAPECOD 比较熟悉。

靠近波士顿的 CAPECOD 地区山清水秀，傍在海边。中心城市普尔万斯城里繁华热闹，物价极高。城中最大的特色是专卖海货的高级餐馆贴身擦背地林立，最畅销的招牌菜清蒸龙虾肉质坚实、口感特殊，每只按个头大小价格在 16 到 22 元之间。

更让人感觉身临其境的是进入餐馆，连男侍都是显而易见的是同性恋者，举止斯文，长相英挺，云鬓油亮。

CAPECOD 是一个以男同性恋聚居为主的地区，在街头，在海边，在任何一家餐厅里，你可以随时随地看见穿着时髦名牌衣服的男同性恋人状至亲昵地比肩而行。这些人中大部分相貌绝佳，身材一流，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尽是一派富绰的古铜色。这些人牵手搭背，有时还当街亲吻，相互抚摸。

在城里的街头，虽不时也能遇到一些男女成对同行的，但多半形容平庸、磕磕绊绊、一片土气，一望便知是人地两生的外来观光客。传说中，这个由于同性恋聚居的缘故才繁荣起来的小地方却是大名鼎鼎的麻州富人“金屋藏娇”的地方，只不过此地之“娇”个个年盛气壮、孔武有力。也正因此，普尔万斯城附近的房价极高，与纽约郊外“高尚区”的房价相比毫不逊色。城内的旅店业也十分发达，价格昂贵，城内街边几乎家家都经营公寓招租的营生，每晚索价九十九元之谱的都大书特书广而告之是“特价”。

在 CAPECOD，最有看头的是每天晚上同性恋俱乐部的活动。在普尔万斯城里，有两家俱乐部的活动最有名气，每到夜间才予开放。俱乐部活动的最盛时从晚上十点左右开始，几乎清一色全是英俊男人的天下。人数稀少的女客买票进场，无人阻止也无人理会。俱乐部的活动以跳舞为主，震耳的快节奏音乐一旦开始播放就一夜不停。男同性恋者一进舞厅大部分人立即脱去上

衣别在腰中，马上溶入满满一舞池的男人堆中。坦白地讲，这种舞跳到兴酣舞热时不太雅观，一些人会忘乎所以地拉下裤子拉链，露出风格不一的内裤。一些舞者还会和舞伴配合，大做男同性恋性交的动作。

回顾美国同性恋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实在应该算是在倒吃干蔗。

至少在六十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者还被人所不齿。当时的同性恋者不但在社会中被人排斥，甚至还曾饱受暴力的侵害。为配合当年的社会风气，美国也曾有若干关于限制同性恋者权益的法规出台。比如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政府就在美军中实行差别待遇来歧视同性恋者。五十年代中，美国军中明令禁止军中同性恋行为。而到了八十年代保守主义高涨时，同性恋的日子更形艰难。当时，在新兵入伍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新军人都要被追问其性向，一旦对方答说是同性恋者，那则将遭到拒绝其入伍要求的后果。美国国防部为了杜绝军中同性恋行为，每年要花费两千七百万美元用来调查处分军中有同性恋嫌疑的军人。从 1982 年至今，全美军中已有一万三千名同性恋男女遭到革职。而且在同性恋权益问题渐进佳境的 1992 年，美国军中也还仍有七百件因有同性恋行为而遭到行政隔离的案件。而且因为这种原因被迫离职的人，在其离职文件上还会被写明革职原因，以供其未来的雇主参考。

在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者通过不断地争取权益，顽强地展开“走出密室”(GETOUTOFTHECLOSET)的行动，使得情形有所扭转。在目前的美国，不光同性恋这种恋情为人不怪，而且自九十年代起，由于同性恋者的声势日壮，还成为政客政争之中大肆予以争夺的一股力量。纽约州、加州、阿拉斯加州等六个州甚至更是走前一步，通过了准许同性恋“夫妇”领养子女的权利。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同性恋者都会举行走期的大型游行行动，为争取选票，却便位尊至市长、市议员者每到此时也多混杂在游行的队伍中，代为摇旗呐喊。

纽约的同性恋大游行被认为是纽约每年几起大型游行中最引人入胜的一起。游行队伍中的人们着装竭尽千奇百怪之能事，尤其是男扮女装的游行者更是引人注目，相当抢眼。

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同性恋现象之普及已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美国的录像带出租店里有描述同性恋性交的三级录像带出租，不少大学中有男女同性恋组织。而且非但仅是大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加入这种类似性向游戏的行列。目前，全美不少高中也已开始正式面临对同性恋学生包容与否的问题。在学风浓厚的麻萨诸塞州，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成立了一百多个高中生同性恋组织。一些高中还曾为此举行丝毫不比毕业典礼逊色的同性恋学生“招供大典”，提供有勇气“招出”自己性向的学生把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众。当然，在涉世未深的美国高中生中也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即一个女生在声称自己是女同性恋者之前一直未曾同男性发生过性关系，在某一天她突然尝试了这种双性恋关系后又恍然意识到自己是双性恋，她然后推翻了以前的声明。也就是说，当前的美国高中生们比中国的高中生们更多了一项自我评估，对自己的未来他们不但要有有关职业倾向、角色定位的判定，还有对自己性向的分析。

为配合这种社会风气，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任伊始就推出了含混准许同性恋在军中服役的政策。这项政策要求美国军中对同性恋军人的性向采取“不问、不讲、不追”的折衷方式，新政策同时也规定了同性恋男女在军中服役时不能有体现同性恋的举动出现，必须对自己的性生活保持缄默。

平心而论，克林顿政府的这项听上去不伦不类的政策是对同性恋者的极大让步，这种让步甚至比美国社会中“正常人”的性向观念都有所超前，这虽和同性恋团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绝大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也是克林顿对同性恋团体在其竞选时为他筹集了三百万美元的酬谢。但克林顿的这一让步却未能获得同性恋组织的满足，甚至招来了同性恋组织的大愤怒。因为克林顿在竞选之初曾允诺其在主政后要让更多同性恋者得以在军中公开服役，“不问、不讲、不追”的绥靖政策与当初的允诺相比显而易见有一些退却，感觉被人欺骗了的同性恋组织为此愤怒地说，他们将对这种新规定挑战，诉诸法律后谋求进一步解决。

而在平头百姓身边体现出的更真实的状况是，假如你偶遇一位绝妙异性，哪怕你对自己再有自信，也请你千万三思而后动。鉴于美国现下混乱倒错的性恋关系，你的真情可能让对方或毫无胃口或毛骨耸然。摸清对方的性向，成为近年来每位尚满怀情愫的美国人热恋前最为重要的必做功课。

造成同性恋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的另一个原因，也要归于美国出名一点的名人，在出名的同时竟也会变得性向不明起来。

比如在美国名气如日正方的麦克·杰克逊，出道早年间还偶有一些和明艳女星的绯闻出现，被娱乐记者抢拍的照片也时常上报。但到了他的名气一天大似一天的时候，他的性向就成为一个问题出现了。对于他是同性恋的传说早有传播不说，1993年夏天，在他前往亚洲做名为“危险”的巡回演出时，有关他性方面同样“危险”的事情在他的“后院”发生了。在这场“危险”中，先是好莱坞一位医生幼小的儿子指控杰克逊在与其过从甚密的时候，对其有亲昵及非份的动作。这一指控使社会大众大感兴趣，不少人甚至推测麦克·杰克逊以往留下男女绯闻全是他为遮掩恋童癖施放的烟幕。但有一点，他爱和年幼男孩相处倒是被报道有些年头了的事了。在以往报道中，撰稿人为解释笔下人的这一奇特嗜好，还有板有眼地说这是因为麦克·杰克逊幼年的生活太清苦、缺乏童年乐趣所致，他因此希望以和男孩玩耍进行重新体验。

美国另一鼎鼎大名的巨星玛当娜成名后在性向上更是扑朔迷离。

这位美国的超前卫歌手在演唱中有时以女性面目出现，有时则像男性，更有时干脆就扮得不男不女。她于1991年推出了自传式纪录片《真实或大胆》，1992年底为配合其名为《情欲》的唱片上市出版裸体写真集，以及在这之间被美国电视台拒播的MTV《为我的爱辩护》，均大大咧咧地对自己的性向进行翻手云覆手雨的表现。她在自己的形象塑造上游走于异性恋、同性恋及双性恋各区，相信她也深知这一出乃当下最时髦的题材，因此，其对自己在“性”、“性别”上的形象颠倒与控制也到了稔熟的程度。

似乎也正如此，1993年，当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一部有大段同性恋描写的大片《霸王别姬》在纽约出现时，玛当娜当即大加褒扬不说，还直露地表示渴望一见在片中性别倒错的张国荣。而她的这番做为，在对其性向稍加留意的人都认为她与片中人是“惺惺相惜”的后果。

48. 无所不往的爱滋病

爱滋病究竟是怎样成为悬在当代人性爱生活头上的一柄重锤的，谁也说不清楚。在近几年的美国，看到过太多次内容同一的连环画及电视广告，内容大致是说男女双方到了火热得要做爱时，女方忽然说：“你带来那个东西了吗？”在这句问话之后，长一点的连环画就会做出这样的男方反问：“难道你不是非常爱我？”更长一点的连环画还会出现男方百想不通之后甩手就走的场面；而如果在分秒数寸金的电视广告中，男方就大半是立即从衣袋中掏出“那个东西”，两情继续相悦。

这种病的出现使得美国的一些人更加相信“生物链”这种生命乃至机体的内在制约关联。与之同来的美国社会男女交往新特点是在关系才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寻问对方：“喂，你做过爱滋病测试没有？”

在美国开始对同性恋摒除蕃篱的同时，社会中对爱滋病的防范也被提到空前的地位。受爱滋病阴影的威胁，在美国的学校中，不戴保险套的性交竟已经和吸毒一样被列为“高危险行为”。

进入九十年代的美国人在对爱滋病的治疗毫无展望之后，开始把对爱滋病恐惧的排除全部寄托在小小的一介保险套上。美国的保险套的销售工作普遍到令人感觉无所不自在的地步，非但在街头的一些小型杂货店内有售，不少地区甚至发展到用自动贩卖机来贩卖。早在几年前，美国一个大学的一家校内商店停止供应保险套，结果竟引起该校女生集体游行示威反对的轩然大波。

爱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是由一种名为 HIV 的滤过性病毒引起。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全球感染 HIV 病毒的人将达四千万人。

美国的第一位爱滋病人是于 1980 年 11 月在洛杉矶发现的，这是一位三十岁的男同性恋者。但这个病例并未引起注意，直到 1985 年，美国的著名影星洛克·哈森（ROCK HUDSON）因爱滋病死亡后，美国人才被这种病界咄咄逼人的后起之秀吓坏了。两年之后，当时主政的里根政府开始设立爱滋病委员会，但直到今天，虽然美国政府有关经费已从当年的 20 万增加到将近 20 亿，但在这方面研究的真正进展可仍说是一无斩获。

目前据报道，美国的 HIV 感染者已达一百万以上，是三年前的 20 倍强。自 1981 年起，全美得爱滋病的人大约有 20 万人以上，已经死亡的人数到 1991 年为止已达 12 万 6 千人。仅在 1992 年全年，美国就约有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人死于爱滋病。估计到 1994 年，死亡人数将增至 21 万 5 千人以上。

1991 年，闻名世界的美国职业篮球明星约翰逊（IRVING JOHNSON）于 11 月宣布自己感染上了爱滋病毒，因此决定将退出洛杉矶湖人队。这位 12 年来一向抱着篮球和美国人同在的明星语出惊人，哭倒一片美国篮球迷，不少人在哀痛之余更加心惊胆战。

这种病一向被美国艺术界人士视为大敌，一些艺术先锋们往往在做公众发言时不由自主地展露自己的心有余悸。一些先锋们还曾泣不成声地描述他们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半个乐团的同事一个一个的因为这个相同的病因死去的。据说受爱滋病荼毒最严重的地区是时装界，有太多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因此而英年早逝。

纽约华人社区中最著名的爱滋病死者是于 1990 年死亡的华人摄影家曾

广智 (TSENGKWONGCHI)。曾氏 1950 年出生于香港, 16 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他 10 岁开始学习中国画, 七十年代赴巴黎接受正式的艺术教育, 先攻绘画, 后改学摄影。他于 1979 年到纽约发展, 很快成为下城艺术圈中的活跃人物, 同时也和许多华裔艺术家结识。他和纽约著名街头涂鸦画家 KEITHHARING 结为知己, 以致于后者的很多街头装置及表演作品, 都是由曾广智摄影。曾氏死时曾在华人社区引起不小的震撼, 让不少认为“爱滋病只有洋人才爱得”的华人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据纽约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纽约 1992 年有一千六百一十名亚太裔被确诊为爱滋病患者, 也就是每十万亚太裔人口中有 3.8 的人患有爱滋病。但这种比例在和其他族裔比较之下仍是低得可怜, 在黑人中, 目前每十万人中有 52.2 个爱滋病患者。

就青年人成堆的美国大学而言, 对爱滋病的防范已成为最普遍的意识。据九十年代的抽样调查, 美国大学生中的爱滋病感染者比率约为 0.2%。在这方面, 十几二十年前, 美国大学生们面对的只是如何避孕和预防各种普通性病的困扰, 而现在则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爱滋病恐慌。这种恐慌也逼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干脆在校园内就卷起衣袖接受爱滋病血液检测, 给自己找一份心安。不少学校甚至出现了爱滋病检查工作供不应求的现象。比如美国著名的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虽自 1986 年起就在学院内增添了此类检验服务, 但一直是人头寥寥, 但等到了八十年代末及至九十年代初情势则急转直下, 检验机构开始大喊顶不住了。目前该校平均每周会有二十五名学生申请检验, 而学校诊所的检验容量却只能容每周二十位。该校学生不甚满意地说, 在校内申请做检验已经变得很难, 通常要花上一个月左右的等候时间。在这种自觉检验的风潮中, 有些性行为频繁或性伴侣不固定的男女更会每隔两个月就检测一次。

但正当美国人普遍开始对爱滋病的防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最早进入防范的人群中却有人出现了对防范的厌烦情绪。

在美西同性恋大本营中旧金山, 不少人已对无限期地预防爱滋病开始感到十分厌倦。在爱滋病出现的早期, 不少美国人认为, 只需短期的改变性行为就可以出现治疗的特效药。但等来等去、年复一年等到的却是对爱滋病更严格的防范, 而无休无止对性爱活动的限制干脆惹毛了不少喜爱享受的美国人。根据来自同性恋大本营旧金山市的调查, 目前在旧金山每三人之中就有一人从事不安全(也就是不戴保险套)的性行为, 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者。

这一现象迫使许多公共卫生人员探讨该现象的形成趋势。按早年间的约定, 许多同性恋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曾宣布要改变自己的性行为, 因此使得不少教育人员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达成。在 1982 年时, 旧金山同性恋者中每一百人就有 13 人染上爱滋病, 是当地的发病最高峰期。而目前, 在旧金山同性恋中, 每一百人中就有两人患有爱滋病, 此比例比 1982 年虽已下降很多, 但比 1985 年该地区防治颇具效果的每一百人中只有一人患病的比例还是高出一这种多少有点形同“视死如归”的味道, 成为九十年代人类性行为中抛开种种错综复杂的道德考量之外的另一新权衡点。

而这一新权衡点相当险峻, 一面虽仍是男女欢爱飘飘欲仙; 另一面则改成撒手人圈。

49. 我出钱，你出一切

没来美国时，时常把美国都市的繁华和人们感情的泛滥想当然地拼凑在一起。来美国后才意识到，在这种感觉冰凉的社会中感情的难寻与可贵。

如果说在美国生存的一些中国人寻找到了情欲的突破口，那么这之中十有八九是因为感情过于寂寞所致。

在美国，你不难区分情与性的真实区别。在中国国内人现今都已十分崇尚以性补情的新段子——并说这是从西方人的生活真谛中提炼出来——的时候，美国的大多数人在某种角度上则早已开始将性和情划分得泾渭分明了。

可以把美国说成是性泛滥的国家，但绝不是情。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意见研究中心社会调查小组调查指出，年在 18 到 29 岁的美国人中，平均一年有 81 次性交经验；40 岁以上的人平均每年性交 65 次；而 70 岁以上的人平均每年性交 9 次。关于性，美国有大把的去处可供受用。有男人找女人的去处，也有女人找男人的去处，更有男人找男人的去处及女人找女人的去处，各得其所。在这种场所中出现的男女，无论是买的还是卖的，都极具专业精神，讲究的是认真做生意。

美国最著名也是最“浮皮潦草”的色情场所是合法遍布各地的“上空酒吧”。

所谓“上空酒吧”即是有不穿丝毫上装女郎表演的酒吧。参加表演的女郎赤裸上身，下身仅着一条 T 型内裤，在酒吧中央的一张台子上扭摆走动，看客们则分坐台子的周围。由于这种行业过于发达，因此，除了较具名气的酒吧，一般小型店内对上空女郎的表演要求并不过高。因此，在这种去处有时也能看到生过孩子的肥胖妇女赤膊上阵，这种场所不需要门票，客人只须入内买够指定数量的酒水就可以了。当然，这种地方的酒水价格比外面要高一些。

在美国纽约，市内著名的“红灯区”就是曼哈顿四十二街。该街非但在美国国内，即使是在国际上也可算是声名赫赫。可能是当初市内规划缺乏从长计议的眼光，纽约四十二街“性事”最旺的地段恰恰地处纽约巴士总站进出口，匆匆过往、初来乍到的外州人和背傍淫秽图片面街而站的四十二街纽约人无论在神情、状态上都具有强烈的反差。近年来，四十二街偶尔也出现一些从衣著到神态绝对迥异于纽约人的中国大陆访问人员，在灯红酒绿的各个场所中“浅乍嘎止”，以了解美国社会。

四十二街的各种“服务”收费相对低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为你单独展露身体“所有部位”的价格，每五分钟收费五块。如果再加上小费，男人一次大饱眼福的机会代价也只是七、八元钱。而脱衣舞场内的收费相比之下则更加“合理”，进门票虽收费十块，但进场后则无所拘束，宾至如归，看客想看多少人表演就能看多少人，想呆多久就能呆多久。看得兴起了，看客可以给舞小姐小费，但每次也不过是一块钱；看得不起兴者或阮囊羞涩者，尽可以身浸暗处做各种无动于衷状。

另外，在曼哈顿二十二街、公园大道乃至消费水准最高的中央公园南端，入夜也均会有妓女沿街延揽生意，价钱从每“次”二、三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随着近年来爱滋病的流行，美国的妓女们普遍地对“工作条件”有所要求，客人基本上会被要求使用保险套，并不能与她们进行唇齿相碰的亲吻。

与这样的去处相比，纽约华人及韩国人开设的夜总会则显得收费昂贵。这种夜总会比照台港及南韩的做法，有小姐唱歌、坐台，小姐可以被客人触碰、抚摸，也可转台。在这种地方，仅是给小姐的小费一项就要花上几十元，一个晚上下来花上个几百元稀松平常。在这种地方混事的小姐在赚钱速度上也十分拉风，往往三几个月就能挣上万把块钱。早年间，去这种夜总会捧场的以帮派青年居多，常常一言不和即刻驳火。但近几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在风月场所肯花大钱的就只剩下以此为唯一消遣的餐馆大厨之类在社区内挣钱稍多的人了。

在小姐的来源方面，以往在这种地方混事的以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女子居多，但近几年来情势已经大转，来自大陆的女孩进入夜总会赚钱的开始增多。到目前为止，大陆女孩尤其是上海、北京的女孩干脆已成为这类夜总会的“业务骨干”，这批人文化层次相对旧的夜总会从业人员为高，而且个个灵牙俐齿，身材及长相也都经得住挑剔，她们从大陆初来乍到，缺的只是钱。

有一个叫蓝燕的女孩据说是来自北京，讲话时带一口不明出处的南方口音。她一到美国就在加州“下海”了，两年之内即由身上只有几百块钱的穷女孩，一跃成为存款超过四万的富婆。由于她性擅交游，因此在早几年，华人社区内有不少人都知道她。

她周围的人都怀疑“蓝燕”这个名字不是她的真名，但不少懂得规矩的人都深知，在美国这个地方无所谓真的还是假的，几乎所有外国人心目中的最高统辖就是移民局，移民局信的东西就是真的，否则就都是假的。

蓝燕身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见人时永远穿一双高跟鞋。她报称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她从到美国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就进入夜总会做小姐，从一个羞涩的生手磨炼成八面玲珑的酒吧女。但也有在夜总会里和她谈过话的人讥笑她，说她有本事竟能在被人“上下其手”时还不忘讲一些有关鲁迅和茅盾在写作笔法上的异同，让捧场的大厨恩客哭笑不得。

但到头来她在头四个月里还真挣够了一万五千元，这使得她体验到美国对她的“诚恳”，这之后她一做就是两年。在这期间里她每天都不愁吃穿，两年中她先后曾和四个男人同住过。这之中除了最早的一个是和她一同从加拿大坐大货车同车偷渡入美的患难朋友外，其余的三个全是她在夜总会里结识的客人。

她的第一个男人由于在美国生活无着，又不肯出外做苦活，总向她要钱，她忍无可忍就和他分手了；她的后三个男人千篇一律地给她买东西，但具有规律的是和这三个男人同居的时间一超过半年，双方就会“握手揖别”。

她明白和这样的朋友会最终分手是在一开初就该预料到的结局，但每次事到临头又忍不住有点怅然所失。

她的最后一个同住人是不辞而别走的。那人和她同租了一间公寓同住，每个月的房租都是由他付的。有一个月里他忽然不再回家，她开始还以为是他是一时在外玩闹也就没太追究，但有一天她凌晨下班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他曾经回来过，并且把放在家里属于他的衣物全拿走了。她直到那时才感觉到自己做的夜总会这份工作份量之轻，第二天，她就告诉领班她不再做了。

出了夜总会后，她决定去上学，先从英文班上起。

她叮嘱过身边相识的朋友不要再提她过去的事情，但她还是常常被当年的“恩客”在不同的场合认出。有时是在餐厅里被“恩客侍者”指指点点；

有时甚至是在路上被“恩客过路人”点破，这些人中有的还好心地寻问她现在在哪一家做，好去捧场。

她后来找到一份在一家礼品公司当厅堂销售员的工作，一个月拿底薪八百元外加她接待的客人购物的抽成。那一段时间里她深居简出，每天除了上下班时会人多的地方出现，其他时间一概以在家看电视消磨。她无疑是希望时间会使人们淡忘她的过去。没想到她唯一予以寄托的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干了还没到半个月，有一天，一个既和她老板相熟、又在夜总会曾经坐过她台的客人偶然进门见到她，到她老板那里用三、两句玩笑话一说就把她的饭碗轻描淡写地砸了。

不久后她就从加州消失了，和所有人断了联系。有人说她只身去了德克萨斯州，具体干什么去了则没人知道。

美国女人消遣的去处一般比男人来得高级一点，大众之中口耳相传的最著名男脱衣舞厅非“柴本戴尔”莫数。这家男脱衣舞厅世界闻名，消费水准不低，该处的门票每位二十五元，不准男宾进入。如果客人指明要坐前排，还需另外加付十到二十元的费用。而交了这些费用也并不等于完事大吉，每位入场者落座后还必须购买一至两杯高价饮料，例如，三寸高一杯的桔子汁价钱为六元。

该舞厅 1979 年在加州成立，目前在纽约、洛杉矶及英国各有分店。

但即便收费昂贵，仍有不少女客认为物有所值。事实上“柴本戴尔”的服务从客人一进门即告开始。舞厅内的男“演员”高大健美，身高几乎个个都在一米八以上，上身一律赤裸，只著牛仔长裤，一身结实的肌肉十分抢眼。客人甫一进入，先是得以和脱衣舞男合影，然后可以和钟意的舞男交谈。这期间，舞男们会不失时机地向女客们兜售印有“柴本戴尔”的内裤、T 恤和男性半裸画报等杂物。出钱购买的女客可获舞男一吻，并可“享受”把钱直接塞入舞男裤内的特权。

由于美国民风开放，因此像“柴本戴尔”这样多少有点过份的娱乐去处，竟也是都市内相当著名的景点，除吸引无数不同年龄层的女游客光顾外，不少纽约中产阶级女性还时常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或为朋友祝寿，或久别重逢在此叙旧。

舞男的表演毫无疑问是以性事为主题的，自始至终都会引起四座女客忍无可忍般的惊呼和狂叫，前排的女客还常常会被表演者拉进场内“合作”一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舞男们在舞台上无论如何动作，他们下体的最后一块小布是绝不脱除的，即便是舞男用各种带有性象征的物件在周身比划的时候。这大概也是“柴木戴尔”为它英俊的雇佣者保留的最后一块“天机”吧。

50. 苛税猛于虎

如果有一个规矩人对你说，他在美国每年可以挣到三万块钱，你千万不能把他的生活水准就认定定位在每月可拿到三万除以十二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之上。这之中的区别在于，美国是一个税赋极重的国家，每个美国人在人生中所做的任何和钱有关的事，几乎都和税有关。

在 1994 年以前，一般美国人的大致纳税比例是 28%。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月赚取一万元的薪水，其中的 28% 要交给各级政府做为缴税。一般结构严谨的公司会在发工资时就扣下这部分税钱。比如一个薪水为一千元的人，在拿到实际工资时，往往只有七、八百块钱。在扣除的薪水包含了各级政府多项税务，比如联邦税、州税、市级地方税、社会福利税等。

所以，美国人动辄以“纳税人”的姿态评点美国时事，实际上政府的一切开支的确也摆明了是从美国人口袋中掏出来的，不说一说，他们着实肉痛。

美国人和税打交道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比如说去商店买东西，买一条四十美元的裙子决不是说你去交款台交上四十元就可以把裙子拿走了，你必须还为这条裙子的四十美元上零售税。纽约的零售税基本上为 8.25%，也就是说，你如果想买一条价值四十美元的裙子，你所要花费的钱数应该在 $40 + (40 \times 8.25\%) = 43.3$ 美元。

美国各州对税的要求不一，在纽约，除了买可供吃喝的入口货不需零售税外，购买其他的东西一概要付零售税。在新泽西州，除了买食品之外，买衣服也是可以上下税的。所以，纽约的不少喜欢穿衣的人往往都是要开车跑到新泽西州去买衣服的，这样可以省去大把的税钱。

据说关于上税的规定还有更可笑的，一说在美西某州还有这样的规定，民众如果到 PIZZA 店中去买 PIZZA，买第一个时是免税的，但买到第二个时，你就得依法上税了。据说官方的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你买第一个 PIZZA 时是为了充饥的，而你买第二个则是为了“吃着玩”的。

除了零售税之外，美国人需要上的税还远远没有说完。在美国，人们买房需要交税；使用自己的房子也要交地税，临到卖房也需要交税；工薪阶层挣到工资需要交税，失了业后领取失业保险金也要为这笔保险金的领取而交税；非但如此，家里老人死了留下遗产还要交遗产税。

美国人对税务问题是相当敏感的，他们对税赋过高的抱怨已达到空前的地步。

为了解决联邦庞大的财政赤字，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筹措新税制，以期在未来五年内减少四千九百六十亿元。1993 年 8 月，政府内部曾达成增税两千四百一十亿元的协议，并削减联邦开支两千五百五十亿元。这增税部分中的 90% 从年收入在十几万以上的美国富人家庭及个人中取得。细一点说就是，从 1994 年开始，税前收入在十四万元以上的夫妇及收入在十一万五千元以上的个人，其税率将从以前的 31% 提高到 36%。而税前收入超过二十五万元者，税率将增至 39.6%。新税法的第二个特色是迫使相对富有的、所得超过三万四千元个人及超过四万四千元的夫妇退休者在今后五年内为自己的社会安全福利付较高的税，此方面的最低税率将从现在的 50% 提高为 85%。

美国的税务制度之严格，已经到了令人不敢违命的地步，税号局每年都会对所有的纳税人进行抽查。尽管这种抽查的“命中率”几乎和中“六台彩”一样低，但一旦被国税局逮到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仅有几百块钱的出入，罚款也一定会是重得你倾家荡产为止。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年就中了这样的一次“六合彩”，真可以说是天降横祸。那几天他说他翻找自己几年内的报税资料直翻得心慌腿软，真到了该去税务局的那天，他被未卜的前景折磨得几乎麻木。

他在税务局的大门前准备进门时，看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相貌相当丑恶的胖黑女人，平素养成的礼貌习惯使他在自己进门之后特地为身后的这一位丑女人把门拉开。我的这位朋友说，当时，他看到那个奇丑的黑女人十分感激而且诧异地对他投以激动的一瞥。

当他按照税务局的通知书上所标明的房间号找到自己该去的房间时，一进门，他一下子看到端坐在查税员椅子上的人正是他在门口遇到的那个黑女人。那个女人见到他也是一愣，但很快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我的朋友说，直到这时，他的心才不那么慌乱，私下里竟生出自己今天一定能过关的直觉。

果然，那女人只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地翻看了一下他带去的几大迭资料说：“你可以走了。”

几乎每个合法入美国境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名为“社会保障卡”的卡片。这种东西上给每一个申请人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在美国的各种事务中，在政府的财会存档中，每一个美国人都只是一个号码。美国人用这个号码报税、在银行存款、开设电话户头，举凡大小各种正式的申请，接受申请的机构都必会要求申请者出具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在华人社区中，老华侨们一向喜欢把这一号码叫做“工卡号码”，而且认为有了这个号码的人就可以工作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卡也是分可以工作或是不可以工作的两种。几乎所有经由自费留学身份入境美国就学的自费留学生得到的社会保障卡都是不能工作的卡，一旦有人用这个卡上的号码工作并纳税，美国有关部门可以十分容易地查到其非法打工的记录，这对其今后在美国改转永久居留的面谈地点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美国各族裔社区，历来就有不少人私下里是拿现金薪水而不是正正规规地拿工作公司的薪水的，当然这种现金工金在数额上是要比支票来得少，原因就在于少了税钱。也有很多的公司负责人为了雇到低薪员工而故意压低现金工资，使一些不具合法工作身份的人不得不接受。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非法做工的人得以免除税务局得知其非法做工，对劳资双方也能起到免受处罚的保护。但美国稍具规模的公司大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利益不多又风险太大。

除了领取现金薪水之外，华人社区中的另一种瞒税方法是员工的每月薪水一部分领取支票，一部分领取现金。这样来的好处比光领现金薪水还大。因为一旦有了支票收入就可只按票面数字报税，而这种往往是真实工资一半的薪水还可以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给低收入者诸如政府楼宇分配、子女就学午餐补贴乃至看病就医的低收费等好处。

因此，华人社区内的低收入者不少人是这种“假冒产品”。

不但一般打工的人如此，社区内许多餐馆业老板每日所得的现金收入更是想尽办法藏掖。美国的银行一般规定，任何人在银行内的一次现金存款数

额超过一万元时，银行方面必须向国税局报备，聪明人等为逃避此规就每天向银行中存进九千元，利用数额的差距逃税。

在美国，逃税的游戏几乎每个人都在玩，而且，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乃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公开地教授大家“如何合法地省税”。美国的税赋的沉重已使“如何合法地省税”一说成为一门联系每个人钱袋的学问。

当然也有没玩好的人。九十年代最著名的一个华人“没玩好”案例发生在加州旧金山。

来自香港的华人夫妇邱应泉和其妻邱卢育仪，原在香港经营珠宝业，开有“恒艺珠宝有限公司”。自1983年开始，他们夫妇的生意扩展到美国。为逃避美国的税赋，他采取整赚零存的手法，每次存款额都不超过一万元。同时，他利用其母及其他熟人的姓名在其帐户内存储现金，而且还在多间不同的银行动作。据旧金山联邦检察官指出，在1991年，邱应泉曾在六个月内二十二次存进存款，每次都没有超过一万元。但是这六个月的累积存款数额高达十七万七千多元。

这对夫妇在1983年至1989年及1992年度都没有向国税局报税。一查之下，联邦法院首先查封了他们在湾区购置的一栋一百九十万元自用住宅、三栋总值在一百三十五万七千无的其他房屋和两辆90年豪华“奔驰”汽车，查封总值达三百二十多万元。

51. 义工生涯

在美国，我遇到了许多以往想象不出来的事。

“时间就是金钱”是一句对美国人而言很要紧而且很实际的说法。有钱的人因为有钱，可以尽情地享受时间，而这无疑也等于是在挥霍金钱；缺钱的人则视其缺钱的程度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挣钱而紧缩自己的时间。

换句话说，有钱人是用很少的时间赚钱。等于用钱为自己买下时间了。而没钱的人却是在用自己的时间赚钱。

“利用时间”这句中国人常摆在嘴边的话，在美国人而言很可能就是周末的另一份兼职工作。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在美国身兼三、四份工作者毫不稀奇，时间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也就是钱的份量。

但与此同时，相当矛盾的另一情形是美国的义务工作者之多，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举例而言，一个慈善机构或非牟利团体在美国如果想征招不支领薪水的义务工作人员，竟会是易如反掌。由于供大于求的义工市场状况，不少团体甚至于还要在报名做义务工作者的人中进行筛选，优胜劣汰，以限制人数。

了解了这一点后，常常会觉得美国社会充

满了让人不能理喻的现实。

法国的一位知名美国文化观察家阿里克斯·托克威尔 (ALEXISDETOCQUEILE)曾在自己的观察报告中做过这样的一句总结：“美国，一个充满义工的国家。”

事实上，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义工 (VOLUNTEERING) 事业与美国商品社会成长并驾齐驱地成为专门的、十分发达的事业在美国民间推广开来，被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事着。据美国盖洛普民意研究所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举办的民意测验显示：年纪在 14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占半数的人做过义工。在当时，美国义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已达三个半小时左右，发展到今天，美国的义工大军已经有三万多人，全美范围内已成立有至少八十个大型的义工团体。

在美国，义工现象普遍到在各教会中、各社会团体内、各老人服务机构里，义工的身影触目皆是。这种机构中往往只有一两个算做是管理人员的“编制”内人员是支领薪水的，主要起组织作用，其余真正做事的人基本上全是义工。也许是入境随俗的缘故吧，美国的华人社区内一向也有一些义工组织，为社区内的华人免费提供调解家庭不和的意见，并协助政府解决社区中存在的各种不利发展的状况。

我到美国后即进入在纽约市内外外国学生中颇具名气的非牟利机构“国际中心” (INTERNATIONALCENTER) 中补习英文。这家专门提供义工服务的组织相信在中国的留学生中，鲜少有不知其名的。该中心的主要服务项目除了提供英文补习外，还有组织市内旅游、会员聚会等项目。中心内每年对每位学员的收费是一百五十元左右，提供的英文教学是为每位会员提供一位一对一的美籍义务工作者与之交谈，每星期交谈一次，每次一小时，时间任选。会员和义工可在该中心的大型教室中对话，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交谈。

该中心的任何一位义工都不收任何教学费用，义工们每天风里雨里地来到中心为会员上课全凭自己的兴趣，学员每年缴纳的会费只是用来做为中心的简单维持费用。

算下来，国际中心对每位学员的收费每堂课仅两元多，几乎比市内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大型英文补习中心收费都低。但即便如此，中心每隔一阵都会因为学员的匮乏而向现有学员发出告示，要大家为中心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请求学员们能力中心带进更多的新会员来。如此求生若渴实在因为美国政府完全是视这类机构的服务人员数量而行拨款的，学员人数的减少无疑为中心请领经费带来不力。但在对于义工教师的招募工作中，中心则似乎从未有过不敷之虞。

我在国际中心断断续续将近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先后曾换过三位义工教师。第一位是一个在德克萨斯州出生的老人杰克。我之所以称他是老人，是因为他的岁数确实已经快六十了。但我真这么叫出口又有点觉得言不由衷，因为杰克不但常常一身牛仔打扮，而且从来不开车，每天不是骑摩托车就是骑自行车上街。

他早年高异，孤身一人住在他于十几年前花了八万美元买下的一条船里。他的船就停在曼哈顿上东城外的码头上。他在纽约一共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期间，他靠自己当年的一些积蓄过活，生活相当节俭。他生性酷爱观剧，但又买不起售价高昂的大型百老汇戏票，就时常在剧院门口等戏演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收票人已不再验票之后进场。他靠这种办法看遍了曼哈顿百老汇剧院区及外百老汇剧院几年来所有的大小演出。在国际中心有时会有十分廉价的次一级百老汇剧票出售，杰克有一天直白地告诉我，他就是想占这种“小便宜”才到国际中心做义工的。

他从教我和美国人说话要尽量放松开始，和我共度了一年的时光。后来，他由于对纽约的寒冷忍无可忍，搬回到南方去住了。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位在银行做机要秘书、四十岁左右的美国妇女，我和她的师生之交相当短暂，只维持了几周就因为她要去外州度长假而告结束。但在短暂的交往中，她还是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她那个阶层妇女的所思所想。比如我们一同翻妇女生活杂志，她告诉我哪份杂志办得脱俗。当时正是克林顿夫妇尽全力向白宫冲刺的时刻，我的老师对克林顿的是非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对克林顿夫人进行挑剔，或者告诉我一些有关未来第一夫人的小道消息。

我的第三位老师史蒂夫是位现年四十五岁的美国律师，专做商业法律方面的诉讼事务。他属于那种不具大背景的小律师，他和成百上千的美国小律师那样，与别的律师合伙共用一个接听电话的秘书，自己动手处理各种繁杂的讼案准备工作，包括打字、编文件号码，常常忙得周末的两天还要彻夜工作。每到这样的日子，他在给我上课时即会秽言不断，骂出在纽约黑人区也难得听到的脏话。他性情随意，不喜欢受任何拘束，是典型的纽约人脾气。自我们师生关系一开始，史蒂夫就把自己身上的各种不羁的积习说成是因为身处纽约才养成的习惯。他的某些积习实在不雅，不要说他总是张口闭口叫我“我难看的笨学生”，而且，我们在上课时他在说到自己大不耐烦时会对着我猛做鬼脸使课根本上不下去。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就都停下嘴不说只笑。但他的不羁仍不仅只限于此，比如说，他一直心仪在墨西哥旅店小住时邂逅的一位墨西哥籍年轻女服务生，他在献过少许殷勤之后有一天又重返墨国以去那里学习潜水为由寻爱。他致电给那女孩，两人约好了在墨西哥的见面地点，但届时却是史蒂夫空等一场。他在回纽约向我叙述这个“骗局”时紧接着就给那个女孩下了一个未假思索的评语：“这个婊子。”

史蒂夫住在曼哈顿的富人区上东城七十余街，养了两只十岁以上的猫。听说我小时候偷看过我父亲当年抗美援朝时发下的对美军喊话的小册子，就每个星期都缠着我要我给我父亲写信请家里寄来这本小册子给他看。

我的这三个老师背景迥异，层次不同，但却做了同样的选择。最甚者是最忙的史蒂夫，他每周除了陪我共渡在他来说一定无聊透顶的一个小时外，还要在星期天的晚上去市内的流浪者收容中心做整整一个晚上的义工，帮他们做一些文件的准备工作，夜里时常还得睡在那里。在课堂上，我时常会忍不住问史蒂夫何苦在这里干这些不拿钱又没什么意思的工作，但每次他都是做着鬼脸说：“你不要管。”

后来我开始觉得美国人实际上是很孤独的，他们习惯于自成一体，以满足对独立生活和生活自由的需要，但也算是这种独立生活连带出来的一种因果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又得忍受同这种与自由俱来的空虚，他们于是渴望遇见新鲜刺激的事和人来调剂生活。

都说美国生活声色犬马，但得看是怎么说了。

在国际中心学习的同时，我有时也去另一个免费的学习场所锤炼英文，这个去处是“法拉盛社区调解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由义工组成代为力附近居民调解家庭纠纷的地方。每到每个星期三晚上，调解中心都会由义工来教授英文，老师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只二十出头、美国出生的漂亮女孩，中心的英文学生名额则向社区无定额开放。

这里的教学形式采取大家一同聊天的轻松方法，学生和老师围着一张大圆桌插间坐着，大家随意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调解中心内的固定教师大约有四、五位之多，全部是一分钱都不拿的，学生也是一分钱都不用交。但常常到了星期三晚上，老师倒是来齐了，但学生中只有一、两个人到场。

近年来在美国，不光是中年人及老年人，年轻一代做义工的事也已经越来越普及。“纽约市义工社团”（CITYVOLUNTEERS CORP.）就是美国最大的青年义务服务组织，其提供的义工服务计划包括照顾老人、修建花园乃至课后辅导等三百多个不同的服务计划。该社团手笔不凡，平均每年都面向社会招收七百五十名 16 到 20 岁的义工，许多华人新移民子弟也是这个社团中的骨干份子，为自己日后走上社会做出铺垫。

为了提倡青少年义务服务社会的风气，1993 年下半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又签署了有关扶持青少年义工力量的条文“全国与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鼓励青年学生进入社会提供义务服务。法案中明确规定，对于做满一千四百个小时的青年义工，美国政府将每年奖励其四千七百二十五美元的奖学金，而且这笔钱既可以用来抵做大学学费，也可以做职业训练或偿还大学贷款之用。

发达的“义工现象”在我看来其实是出现在美国这种发达社会的一个异数，因为其与资本主义大色彩有太多的不协调之处。但无论如何我对美国的义工们充满无限敬意，因为正是经由这些一文不取的人使我在寒冷的异国感受到了人间最大的温馨。

多少年后，也不能忘。

52. 性话小心

你是一个心理健康的男人。假定有一天阳光明媚，你进入办公室，看到一位女同事面色纯正穿着一件低胸外衣，你顺口对她说：“你今天看起来真性感。”此情此景在九十年代之前是美国同事间最司空见惯、顺理成章的亲昵，但到了1991年之后，这种事如果再发生，结果则可大可

小。因为，那位穿低胸衣、的确是想让别人觉得性感的女同事可以一笑而过，但也可以告你。

当美国进入所谓“后民主时代”之后，性骚扰开始以介于“民主”与“不民主”之间的一种特殊嘴脸浮出水面。

1991年底，一项轰动全美的案件遏止了成千上万爱和女下级或女同事开玩笑的美国男人。

1991年10月，一名黑人女教授突然向一位男性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提出告诉，指控他在十年前同她在一起工作时对她进行了性骚扰。

这两位涉案人均均为黑人，男方为四十二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黑人法官提名人托马斯（CLARENCETHOMAS），女方为同样毕业于耶鲁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黑人女教授希尔（ANITAHILL）。此案发生于10月6日，也就是参议院预定为此项提名进行投票的前两天。由于传播媒体对此案的披露，使案中两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鉴于此，参议院一方面决定把投票日期延后；一方面将全案交由司法委员会重新听证。

此案立即全美瞩目。

从10月11日起，由电视媒体向全国转播的听证会一连举行了三天。除主控人希尔和被告人托马斯之外，双方又找来20多位证人一并亮相。结果全美民众得以免费观看了一场由高级知识分子主演的一场“低级对话”，当事双方事实上两败俱伤。

由于希尔的搅局，参议院在对大法官提名人进行投票时，历经数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终于以52票对48票的投票结果惊险地通过了对托马斯的提名。

虽情事发展如此，但托马斯案还是让不少美国人对美国政争之中愈演愈烈的“赤膊上阵”状况表示不可理解。想想也是，如果政治权力斗争都成了如此这般的“一丝不挂”，那么人类历经几千年的进化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实在和人类早年茹毛饮血争夺食物无殊。况且，美国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也显示了大多数人对托马斯的同情。从对此次事件争辩过程进行实况转播的电视屏幕上，早年间涉世未深时都没能对此类骚扰口出恶言现在已不甚年轻的希尔，十年之后当她的一个校友将鹏程万里的时候突然挺身而出撕破脸皮，其用意显而易见不是为了使自己受过的“性骚扰”得以昭雪本身。更何况，这种指控是在美国遍地都是性泛滥的今天拎出来讲，让不少男人觉得后脊梁发寒。更有消息说，这次托马斯事件之所以成为全民的笑柄，也要功归民主党籍参议员或他们的助理，有意无意地把原先列为机密的文件泄露给新闻界一举。

而这也显示不少美国政治“性情外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民主进入“走火入魔”境界的抨击显得证据昭彰。

此案甫出即成为社会探讨焦点，“性骚扰”一同瞬时成为美国人的一根

敏感神经。这种在当年熊熊燃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都能大致被含混带过的事情，在九十年代开始成为一个禁区。

那一阵子，美国的大小报纸都罗列出多条他们认为的“性骚扰”，典型言论和举止。比如说，男上司在与新来的女性应征者谈话时问她：“你结婚了没有？”又比如说男职员当着女同事的面说有色笑话；更比如说男同事私下或当众夸女同事的衣饰漂亮。受这种舆论的冲击，当时美国许多公司果真被弄得人心惶惶、啼笑皆无。不要说语多开放的美国人，即便是我这样一个一直在相对刻板的华人公司任职的女职员也被提醒得六神无主，反复检讨自己是否已被别人在言辞上“骚扰”过了。

为此，美国的新女性运动者更是认为，性骚扰反映了男人在社会中的无理支配地位，其除了对女性造成羞辱外，对女性的工作效率也造成损害。

记得那一阵出外采访，每次都会有人问起这个话题。有个十分熟悉的朋友还相当认真地把手悬在我的肩膀上方，笑着问我：“喂，我是不是可以拍你左肩膀一下和你打个招呼？”一语即出，满桌皆笑。

其实美国在 1964 年通过的民权法第七章中即有禁止在工作场所因种族、性别、宗教和国籍方面的原因而受到差别对待。1986 年最高法院首度解释第七章时明确指出其涵盖性骚扰。当时也是由九票对零票的优势通过决议，认定在性骚扰猖獗到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充满敌意或滥权的工作环境时，就构成一种性别歧视。受到汤马斯案的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干脆于 1993 年 11 月以九票对零票的优势通过了一项更深一步的裁决，即员工不必证明雇主的性骚扰行为给他们带来了心理障碍，或使他们无法工作，即可以在性骚扰控案中获胜。这个判决被妇女团体认为是一个大胜利。

事实是这种约束使得美国人的工作环境开始显得暗淡无光。原本在美国社会中，不少公司女职员除了自身的卫作外，还的确或多或少地充当公司内男职员们的“心理调剂品”。在美国几年来，我时常听到有男人抱怨说“我们公司里的女同事没有一个漂亮的”。甚至男女同事之间的相互私下约会，也是美国社会的流行风尚之一。在此方面，美国以往的各种心理测验也反复说明，男女混杂的工作环境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甚至于在大空飞行这样一种要求高度精密的行为中也刻意放进了女性参与。相信这种测验结果也是大多数心态正常的女性所乐于接受的事实。“性骚扰”问题的猛烈提出，使得美国举国草木皆兵。

紧随其后的是，除了社会上的风气趋于剑拔弩张，美国校园中的“性骚扰”问题也被揭出，成为不少家长放不下的心病。

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教育基金会 1993 年 6 月在为校园内的性骚扰问题所做的调查报告说，在全美八至十一年的学生中，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在学校中曾受到形式不同的性骚扰。这些骚扰事件除学生内自发的案件之外，骚扰者竟还有来自学生言行当效、为人师表的教师。虽然纽约等大多数州法均对年满 21 岁的成年人与未成年儿童发生性行为给予重罪制裁，但这类师生之间的性事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在有的案件中，涉案教师干脆就是和几个学生进行性行为。

美国的一份以青年人为阅读对象的杂志《十七岁》所做的有关的调查得出的竟也是近似的结论：在受访的两千名二至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 89% 的人说他们曾经成为性骚扰的对象。一位在纽约曼哈顿区就读的高中女生甚至说：“我敢保证，如果你找任何一位女学生，她们都会告诉你她们自己各种

不同的被性骚扰经历。”

那么，近年来美国女学生甚至有相当的男生究竟经历过怎样“不公生活”呢？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学生最常遇到的性骚扰问题是：

1. 被人挑逗性地触摸、抓握或挤捏。受害者中女生占 65%，男生占 42%。

2. 常听和性有关的粗话。受害者中女生占 51%，男生占 36%。

3. 被人用挑逗的眼光瞟视。受害者中女生占 49%，男生占 41%。

4. 衣服被拉、被掀。受害者中女生占 38%，男生占 28%。

在美国大学中，对这类案件的认定比较困难。如果客观地说，在六十年代曾是自由性爱城堡的美国大学校园，在九十年代其实早已成为性骚扰的大本营。与发生在中小学校中的性骚扰现象大不相同的是，在大学中，一般的性骚扰事件在程度上更深，而且以男女学生在幽会时女方遭到男方粗暴对待的事例为主。所以，在性骚扰事端出现以后，美国人关于“约会强暴”的讨论也开始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被归纳为“约会强暴”的性骚扰案本是介于可忍和不可忍之间的一件微妙事。亚利桑那州的心理学教授考斯在她名为《强暴的范围》一书中曾经做过统计，她指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在约会中都被约会人强暴。多少年来，这类情事一向延绵不绝，只不过性骚扰的问题一直没能正式放在社会的桌面上被讨论才被事音不太当一回事地忍了下来。为防止约会强暴案的出现，美国不少大学制定了有关的各种规则，其中尤以美国俄亥俄州安提阿大学的所谓“卧室规则”最为严格。这间大学在相关的一纸长达 22 页的校规指导中要求学生在进行“每一新层次的肉体或是性行为时”，做每一个动作前都须征得对方同意，而不是仅仅问对方一声“你愿意和我做爱吗？”

53. 请投一票

每到选举季节，美国的街头便陷入到一种异样的狂热之中，别有一番滋味。

美国的选举是最能看出人欲的时辰，每到这种时候，竞选人为了达到一己之利会完全撕去表皮的。即使是在同一政党内，由于党内提名未能尽如己意，而与党部大骂出口，并且立即声言退党的人也不鲜见。

在那一阵子，电视里的竞选广告也必定相当热闹，经常会飘出阴森的音乐及连串指责竞选对手政绩不佳的声讨之声。

美国政客的坚忍品格，绝对是在超平常人之上的很高层次之中。

一位在外州竞选众议员的华裔女竞选人在一次到纽约华人社区来做筹款时，大抵是为了更生动地描述自己的历尽苍桑，便不厌其烦地

拿出其竞选对手对她做的反面宣传单向来宾进行展示，并向前来聆听其政见会的人大发感慨，比如说，她嗔怪对手选用了她最难看的一张照片等等，以期以此换得与会者的一些从民族角度的同情。

这个女竞选人看上去一派柔弱，在选举季节中剑拔弩张的大环境中出现，而且对美国的选举流露出的巨大不适应，使人无不为其捏一把汗。

后来，她真的就败了。

美国的选举每每都闹得举国沸反盈天，一场选举下来，美国人往往经受的是民主和泛民主的双重感受，一个无疑是享受；另一个绝对是煎熬。

美国的选举比较庄重竞选人背景及财务等方面的透明度。以纽约四年一次的公职选举来讲，为使民众对候选人多有了解，每次都会有英文及西班牙文的专门选举指南在各公众场所发送，自九十年代开始，这种选举指南更加上了中文部分。指南上刊有竞选人照片及个人简历、从属党派、职业背景、教育背景、支持机构乃至施政纲领等细项，以便民众对竞选人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为制约个别财大气粗者倚仗财势获选，市竞选财务理事会自 1987 年纽约市选举起还为自愿加入一项名为“纽约市竞选财务计划”的竞选人提供与其接到的民间小额捐款相同数额的共同基金来赞助其竞选，以为合格的候选人提供公平的参选机会。此计划规定，每位捐助人捐助的最高数额只可为 1000 美元，接受此项计划的竞选人必须同意将自己的竞选财务状况向选民公开，并随时可以接受有关财务部门的财务核查。

美国的政治竞选从本质上看其实还是离不开其社会核心，也就是一个“钱”字，拿 1993 年纽约市长竞选中两大候选人所耗的竞选经费来看，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的竞选过程中财务力量仍是绝对重要的关键。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籍竞选连任市长候选人丁勤时的竞选花费总和竟为一千零六十万美元。他的对手、共和党籍检察官出身的朱里安尼的开销紧追其后，总和为八百六十万美元。这种动真格的竞选角钱多数会用在广告、会计、选举工作人员工资、民意测验、印制宣传册、文宣材料的邮寄费用乃至拉票费用。

纽约市五项重要公职的职能及薪金也一向公开。以九十年代为例，纽约市长年薪为 130000 美元；市议会主席（自 1994 年更名为“公众利益倡导人”，一旦市长职位空缺或市长因故离职，将代理市长职权）的年薪为 105000 美元；市审计长的年薪为 105000 美元；纽约市下辖五个行政区区长的年薪为 95000 美元；代表纽约市市议会 51 个选区的 51 位市议员基本年薪为 55000

美元，所不同的是市议员除领取此一份固定薪水外，还十分令人不解地可兼做它职。

这种竞选筹备工作不能说不够周密、坦诚，但这种民主的副产品也接踵而至。以 1993 年纽约市选举为例，参加市议员竞选的除了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政治家”和新生代德才皆有的竞选人外，还有退休公共汽车司机、幼儿园园长、眼科保健技师、锁匠及失业者。其中竞选纽约第 35 议会选区的一位失业者在自己的竞选陈述中毫无实际的施政方针，只是明白地在谈到参选动机时指出：“我在为我自己遭到解雇的事而进行力争，而现任的市议员拒绝帮助我。”该人气魄宏大，把个人的一己之念坦白地放在本该是为他人谋利益的栏目内，完全不顾任何“群众影响”。

美国社会千奇百怪，固然是无论如何人等，能拉到选票者就能获胜，理论上讲的确是机会均等，但如上述失业者的施政陈述所列，讨论起这种动机者竞选的获胜前景，对常人来讲实在是一种一目了然的煎熬。

参看竞选诸公所填报的履历，个把资历智力均属一塌糊涂的人竟也是竞选老手，每隔几年就是一通山呼海啸，次次部来，场场不拉，把把全输，一折腾就是十好几年。

或者说美国这方面民主的真谛是——那么好吧，就给你一个做梦的机会。

真要那样的话，梦游的人猛来“项庄舞剑”，只是糟蹋了满庭云鬓飘香等着献技的当朝姐儿们趋前操练。

你说急人不急人。

相信令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新奇的是，美国的政党概念相当松散，甚至可说是比任何民间俱乐部的组织结构都不如。比如，纽约的选举机构在选举知识普及的问答中，对“我如何报名加入一个政党”一问是这么作答的：“在你的选民登记表上勾一个政党即表示你加入了那个政党。报名加入一个政党即意味着你成为那个政党的一员，可在那个政党举行的初选中进行投票。”

更有趣的是，每当各种选举将届时，美国街头会有不少人进行选民登记工作，为自己所拥护的竞选人拉票。华人中热衷此道者不在少数，此举无疑为推动华人社区的选民教育及提高华人的投票率不无补益，但在这种活动进行之中的一些对话颇为滑稽，不妨在此一说。比如，最常见及标准的选民登记义工与过路人的对话如下：

“请问你是不是已经登记为选民了？”

“不，我还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为你登记吧。你是不是也还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是的。”

“那你就加入民主党吧。因为我们华人中这次有民主党的某某某参加竞选。”

这之后的事就是等待过路人点头首肯，然后义工为其在选民登记表上的“党派”栏中的“民主党”一栏划勾即可，一个新民主党党员就在街头平白无故地诞生了。

更有甚者，如果该过路人回家睡过多少觉后忽然改了主意想加入共和党了，那他同样可以重新填一张登记表，只须在“党派”中的“共和党”一栏划勾即可。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任何人如果想加入一个政党或从一个政党转入另一

个政党，所有的手续原则上讲只须划一个勾就可解决问题。而从基本层面上来看，由于大选是不分党派投票的，因此，加入一个政党的最外在而直接的好处的确仅仅是如前所述的“可以参加这个党派的初选”。这种轻描淡写的入党态度和手续比起在十年前的中国为能加入中国共产党须积极求索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呕心沥血过程，和“在红旗下宣誓”的庄严入党仪式相比，实在轻慢得有点近乎开玩笑。

有不少政客选择党派的先决条件是竞选易于获胜。拿纽约来讲，市内民主党与共和党员的比例为七比一，近年来逐渐转为六比一。近二十多年来，纽约州长和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中，民主党人总体来讲都占绝对的优势，因此，大多的纽约政客是选择支持者众多的民主党做为自己的政治基石的。199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籍的克林顿在纽约州的得票比率为50%，此一数字仅次于他在自己出身地阿肯色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得票比率。在华人中，据皇后区选民协会所做的估计，社区内民主党和共和党员各占比例约为40%和20%，无党派人士占40%。也正因此，党派是否具有选举优势，在美国热衷政治者的入党考量中，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当然，竞选经费的多寡也是一个竞选人能否获胜的关键所在，而这个“关键”又端赖竞选人的人缘、与社区的渊源及以往政绩如何，这之中的差距有时相当大。以纽约华人为例1991年，皇后区华人家长会会长朱宝玲出面竞选纽约第20选区（法拉盛地区）的市议员，在社区内筹款竟等到十多万元；两年后，同样是竞选第20选区市议员，美华妇女联谊会会长陈道英同样在法拉盛社区筹款，来来回回就只等到九千多元。

在有关美国政治经费的筹集方面，美国华人的贡献颇多，发展到近几年已成为知情政客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据报道，早在美国1988年的大选中，亚裔美国人对各政治候选人的捐款数字就已名列第二，而华人在其中表现得又更出色。

尤其在加州、纽约等几个传统的华裔聚居地区，各政治候选人无不把吸引华裔的财务支持做为一大战略方针。但华人一般在捐款乃至选举意识上还是有着内外区别的，社区内把这种心态总结成为“血浓于水”，本着这种“总结”，华裔自己的竞选人出面竞选哪怕是一个小州的职位，原则上也是可以吧财务目光放至全美各华人社区的。1993年，加州的华裔胡绍基竞选洛杉矶市长，在其募到的总额两百六十万美元的款项中，就有高达45%的部分来自加州及全美的亚裔社区。

因为华人社区对美国政治有这种特殊意义，因此，每到选举季节，全美各地各种职位的华裔竞选人多半会走访美国境内各华人聚集地筹款，纽约华埠这类重镇往往更是各方敛财圣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时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主角不同但形式雷同的筹款餐会举行。

所谓筹款餐会，就是竞选人或是他的支持者先行在某个饭店包起全厅或十几桌酒席，然后在社区内广为卖宴会票。一桌三百元的酒席，主办单位往往卖到五、六百元一桌，中间的差价做为给竞选人筹集的竞选经费。

这种餐会内容单调，不外是买票的人到饭店吃上一顿，在席间听一番筹款政客的政见发言及对社区的感谢，并兼带聆听操办餐会者所能请到的各种政客发言、如果此后尚有闲余时间，餐会通常也加入一些社区人士的支持发言，然后结束。

据社区中一些圈内人表示，早年间，在华裔竞选人属凤毛麟角时，华人

的钱财常常散失进他族竞选人的口袋。当年的华裔在政治上还相对淳朴，对政治领袖有无论族裔普遍崇拜的现象。在政治诉求上华人也不大力求改变决策，只求当政者能在操纵大局时兼顾华裔的利益。华人参政正热的八十年代末期，纽约华人社区一些颇具财力的社区人士还成立了华人参政会，每到选举季节广邀相关政客进入阐述政见，决定该会的支持对象，然后就是出手不凡的捐款。这种专以出面支持、捐款形式出现的社团在早几年还在社区内广有市场，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但随着华人社区内华裔选民玩选举这种政治游戏的段数日趋提高，以及对他族政客的寄望屡屡落空，再加上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华裔开始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财权。

值得一提的是，华人社区中的另一种形式筹款餐会则是为社区内的社团筹集经费。由于华人社区内近十年来涌现了大批的民间社团，比如各种工商社团、妇女社团、选民教育社团、疾病防治社团、老年人社团、同乡联谊社团、校友社团以及各种服务性社团等，华人社区内的结构也因为这些社团的介入而变得迷离错乱起来。由于美国社会结社自由，任何人想办社团只须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报备即可，因此有些性质的社团在小小的社区内出现了“两胞胎”甚至于“三胞胎”。而政府方面虽对一些经过时间及效率考量合格的社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助，但几乎每个社团仍会把在社区内寻求财务补助视为另一重点。一些未能得到政府拨款支持的社团更是把在华人之中筹款做为生存的唯一支柱。

这种餐会票的推销在某种意义上说全凭筹款社团负责人在社区内入缘关系好坏，因此变数一般在主办人的意料之中。

记得当年才从大陆到纽约做记者时，拿到的第一单新闻就是前往采访一个家长联谊会的筹款餐会。当时手捧有关的资料，心里一片懵懂。在采访之前，报社的老板甚至还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为我讲解了这类餐会的源起、发展乃至功效。后来，这种筹款餐会干脆成为我晚上采访加班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社会看政治，会觉得政治如果没有金钱做后盾则将不能完全进入角色。美国的政治与金钱的相辅相成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中一项讲究巨大的学问，不能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算真正的政客。

而抛开了金钱的政治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美国政治。

54. 美国人所享有的著名民主

记得年前大型歌舞剧《西贡小姐》从欧洲挪至纽约百老汇上演之初，因为剧中的欧亚混血男主角由英籍演员担任的缘故，即便女主角已由亚洲的菲律宾裔演员担任，仍遭到了美国亚裔团体乃至演员工会的大力杯葛，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演出机会。该英籍演员在剧界极有地位，在表演上深得制作人的赏识，制作人方面因此放出话来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斯人专美。各派就这么僵持着，一时间闹得沸反盈天。

等到这场争演的纠纷好不容易不了了之，《西》剧在美席未暇暖，紧接着又被妇女团体围剿，说是剧中情节侵犯了亚裔妇女的尊严，应该禁演。

《西》剧耗资惊人，据知是纽约百老汇剧中成本最高的一出。其布景中破天荒地动用了直

升飞机和豪华轿车，想不到才进纽约就得到了目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矛盾攻讦，相当漫画。

而这也是美国民主生活的最原始而生动的体现。

美国人所享受到的民主含义广泛，由此造成的利与弊兼而有之。

有趣的是，几次驱车去华盛顿，在白宫门前总能看到满脸不高兴的示威者在正门的对面担牌游走，有时甚至就是带着铺盖席地而坐。从布什时代到克林顿时代均不能免俗，在感觉中，美国的民主还是存在着不如说法中那么贴近每个人的，比如就示威这种事情而言，也只是能劳动成百上千人的示威有可能起些作用，一般少少几十人的动作则几乎收效全无，其功能也往往仅限于发泄私愤相信这种示威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过滥。

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纽约市政府门前辽阔的台阶上，几乎每天都有几起原由截然风马牛不相及的示威者在向警方先行申请获得示威许可后，按钟点轮番举行不同原因的示威活动。比如下午一点钟是一批人利用市政府门前空地示威，而到了两点钟可能就该轮到另一批人，四点时可能又将换上再另外的一批人。这些人聚集、演说、喊口号然后解散，形式相当的千篇一律，流于空泛。于我而言，美国表现在细处的民主令我十分钦佩。

比如，任何一个人在美国申请信用卡，如果你得到的结果是被拒绝，那么你的查询及上诉权益也会被明列在纸上。拒绝你的机构会在拒绝信上详列这类机构的电话，以防被拒者的不时之需。

如果你申请你应得的失业保险一类政府福利金，政府在评估你的应得金额之后，也一定会在给你的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如果你对此项评估金额有异议的话，你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召开听证会。

在美国，每一位到医院内就诊的人，无论贫贱，都在一进门时就被大幅类似于中国“服务公约”一类的玩艺提醒你作为病人所拥有的诸多权益。按纽约州的现行病患权利法案规定，州内一切病患拥有以下权利：

- (1) 了解和使用病患权利法案及相关法律，如有任何原因不了解该法律而需要帮助时，院方必须提供翻译等协助。
- (2) 不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伤残或付费金钱来源而受歧视。
- (3) 在清洁、安全及不受不必要拘束的环境下接受周到、礼貌的照料。
- (4) 如有需要，可得到紧急照料。
- (5) 有权获知你的主治大夫姓名、职位及参与照料你的任何医护人员的姓名、职位，并有权拒绝接受他们的诊治、检查或观察。
- (6) 有权使用一间禁止吸烟的病房。
- (7) 有权得到有关病情的诊断、治疗和对治疗后状况的推测等资料。

同时，对于任何需要你同意的任何拟议程序或治疗方法，得到有关的资料。

(8) 得到所有你需要的资料，以便确定对同意不接受恢复生命措施所做决定。如你病情过重，也有权指定一个人代你决定。(9) 有权拒绝参加任何研究。(10) 住院期间有独处权，并对有关自己病情的资料和记录有保密权。

(11) 能充分参与与你有关的治疗和出院的决定，并可以免费审查自己的病历卡和取得病历卡副本。(12) 收到一份分项列出的帐单，其中所有费用都作出说明。(13) 有权对得到的所有照料和服务提出意见，并要医院做出答复而不必惧怕遭到报复。如对医院的答复不满，可以向纽约州卫生厅或纽约市卫生及医院部投诉，医院方面必须提供相关的投诉处理部门地址及电话号码。

这种法案和中国大陆医院、卫生所中的服务公约有着根本的不同。服务公约再如何周到，制定的也仅是一个公约而已，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而美国的病人权益则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详列出来的，任何一种与之相悖的言行都属于犯法。

美国的法律讼案往往牵涉到大笔金钱纠葛，因此，类似“病人权益”这种法规，都是逐句逐段经过专门研讨、在符合大法律的前提下谨慎制定的。一个不甚周到，持有道理的人一番斤斤计较之下，败方往往得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类似，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居住环境方面，民众也享有选择权。

比如，一个植根于社区的商业或服务计划出台后，必须经由在当地召开居民公听会征得各种意见之后才能最后定案。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不知有多少“上空酒吧”的兴建计划是由于地区居民的反对而果真宣告作罢。而一些在靠近居民区设置的商业机构哪怕在营业时间这种小问题上，也是要受到当地居民意见左右的。

这类的“民主”甚至于可以延伸进每家每户的家居生活。比如张三的一种享受被李四认为影响到自己了，李四有起而攻之的权利和说理处。我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去年夏天有几天闷闷不乐，因为他有在自己家厨房内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做饭的习惯，但他有一天因此接到了住在他对面楼内一位女士的信。这封信上说，我的这个朋友不穿上衣在自家厨房中走动的行为已经对她构成骚扰，如果不立即予以更改，此女将因此向法院提出告诉。

类似在中国人看来稀奇古怪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张三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心血来潮地修筑了一道高大的木栅，以更好地保护自家的隐私不被外人偷窥。但如果邻居李四觉得这道木栅妨碍了自己的视野，他可以写信给市政府抱怨要求拆除。

在这里，我还想举一个在纽约华人社区发生的例子做进一步的说明。美国颇具名气的柴肯道夫财团曾有意在皇后区法拉盛中心地段兴建一个大型商城，该计划拟在原市立停车场的占地上兴建一组大型商住两用大楼，兴建后的商业城将批租给餐饮、珠宝买卖乃至大型精品百货等多种行业。

该财团在此计划草拟之初即开始在占法拉盛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中广为征求意见，遗憾的是，华人中对此的意见不一，无法拿出一个起码的共识。一些在法拉盛有商业投资的华人为这个计划鼓掌叫好，认为此计划将吸引各种消费人口的进入，使地区的商业价值升高，可以最大范围地繁荣社区经济；而持相反意见的多为社区内的居民，认为商城计划的实施将使地区内交通、人口、市容等方面状况恶化，使居住品质降低，导致房地产价值下降。持两种意见的两方各执一辞，单在华人报纸上的笔头争论就曾厮杀了好一阵子。

最后，商城计划终于没有落实。

我所谓有关民主的“利”与“弊”也全在此了。

民主之“利”其实无需赘言，直接享受就是，但“泛民主”造成的混乱却一言难尽，台湾时下的立法院除了是一方战场，也是“泛民主”衍生物桩桩件件的一柄明镜。

翻看时事，明眼人尽可以明眼。

美国的言论自由曾被不少国家的喜擅言论者奉为圭臬，殊不知这种自由的后半边脸也是以社会秩序做抵押的。

即便搭上了社会秩序，但回顾历史，我相信多少年来美国还都没能走出言论自由造成的困窘。

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美国民众基本上具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对这种言论自由的限制大多来自民众的基本共识，官方一般极少干涉。但美国社会的不少问题也正出在这种绝对的言论自由上面，而这方面的不够完善也造成了美国人对法律每隔一阵就会掀起一波从官到民的公众大讨论活动。当然，美国在国策方面采取的各种政策，也为这种讨论带来了契机。

在这里，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言论自由随着族裔多元化及民主意识的膨胀，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禁区。比如，在美国不能说任何有可能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话，否则就要受到法律惩罚这件事情。

仔细他讲起来，一个白人，他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认为自己可以嘲笑一个黑人的肤色过深。但法律规定散布有关种族歧视的言论者最高可判处数年牢狱之灾。不消说，有关的法律是早年间经过少数族裔的多种要求及各种民权运动制定出来的，这种法律的依据在当年无疑是为少数人制定出来限制大多数人的（不然何来“少数民族”之称），法律就这样保障了少数人的利益而限制了大多数人在这方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一个白人如果认为黑人的肤色过暗则不应该把这种内心感受讲出来，一讲出口就违反了早年间为保护少数人制定的法规，那么这种言论自由到底能不能让那个实在是认为浅肤色的人更美一些的白人满意呢？

我想，美国当今所面临的言论自由困境也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言论禁区的例子在美国还有很多，比如女性问题、犹太人问题、同性恋问题、残障人士问题等等，凡此种种都构成了新的言论自由问题，美国法律本身一直为此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风吹雨打。

一个著名例子是这样的。

1977年，“新纳粹”团体在依利诺州的思卡基（SKOKIE）地区扛着纳粹万字旗（SWASTIKA）举行了颇具规模的游行行动，此举即出，举国惊讶。殊不知在1977年的思卡基地区，是个人口总数有七万但犹太人就占了四万五千人的小城，其中还有三千多人是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新纳粹分子在这个地区举行游行的用意无疑是“司马昭之心”。此次“新纳粹”团体游行的事情迅速传遍美国后，引发了全美犹太团体的强烈抗议。但当地法院在进行各种权衡之后认为新纳粹份子的游行活动符合美国言论自由范畴所框定的权益范围，但同时裁决今后如再有类似的活动则不可携带万字旗，“因为它是大屠杀的符号，很容易引起犹太社区的暴力反应，从而威胁社会治安”。

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明显偏袒纳粹一方、限制了犹太人言论自由的判决最后还是引起了“新纳粹”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法庭无权判定哪种标志不能使用，而对犹太社区暴力反应的担心则可用增加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不应该

以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作为条件，这些人的论点是，“如果仅因为这种游行具有挑拨性就予以禁止，那么当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大游行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为了抗议这项判决，新纳粹分子扬言要再造事端，直到出现让他们满意的“说法”为止。

为了防止新纳粹分子的进一步游行活动，思卡基地区迅速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规定凡拟举行超过 50 人以上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者，必须在 30 日之前向地区当局报准，必须交纳 35 万元的财务毁坏赔偿保证金，同时还需有保证人。

这一法规的增加更犹如捅了“新纳粹”的马蜂窝。为了争得自身权益，有关此案的诉讼活动仍一直在各相关团体的扶助下大张旗鼓地进行。到了 1979 年，依利诺州高等法院以 6 比 1 的比例通过了裁决，认定“新纳粹”高举万字旗游行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行为。

此案历经两年的缠讼虽是有所盖棺论定，但围绕其中关于理、法、情的争论一直不能休止，至今不绝。

而在一般稍知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历史的人看来，新纳粹分子的行径无疑是欺人太甚。无奈的是，这种“欺人”在美国合法。

更要命的是以此类推，相同的“欺人”行径是否也是合乎言论自由的呢？不少美国人为此惊呼，以此类推地话，三 K 党在美国南方社区是否也可以戴白布罩聚会？大张旗鼓地焚烧美国国旗是不是也符合言论自由的标准？这类后民主时代特有的言论自由冲突，成为社会问题各种防不胜防的新契机。

我在这里丝毫无意责怪美国制定言论自由的初衷乃至宪法，我想表述的、仅仅只是对这件事顺理成章结果的无奈。

美国法律的设立及更改，其实也就是国内同意某一件事的人能否说服不同意这件事人的问题。

如果谁也说不服谁，那就得看谁能说服法官。

谁能，谁就可以扼杀另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

美国式的言论自由是否方方面面都真的值得褒扬，十分可疑。

当我的这个心结还没有打开时，有天忽然看见一句别人文章中的警句，说是“宪法只能力言论自由提供一个机会，并不能对其进行保障。民主越发达的国家，这方面的问题越复杂，言论自由是人类一种没有止境的追求”。

我不知道这样的阐述是否能平息别人心中有关言论自由的功过是非，但我想，这几句话给我的启示则是“等候”二字，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也就是说等候这种“追求”的出现或者平息。

等候潮起潮落。

卷五

55. 音乐包裹之下的美国

进入 1993 年年末，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影视编导、名电影演员、歌唱界红人、年逾五旬的流行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在允诺不再开个人演唱会后，答应复出举办演唱会。她的前一个允诺到后一个答应，一耗就是 25 年。这位鼻骨形状怪诞却仪态不俗的好莱坞名人复出的第一炮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演出 1994 年新年晚会。靠在美国一向走运的气势，芭氏为此得到的酬劳竟是每场一千万美元的“劳务费”。

倒也难怪，此消息一经传出，主办单位紧接着就宣称共收到一百万通（1）询问电话，而演唱会的数万张售价自 50 元到 1000 元不等的门票，也在公开出售的第一天内即告售罄。

主办者方面在大喜过望之下还得便宜卖乖地放出话说：“买到票的人都是极有运气的幸运儿。”

不幸的是，我也是个“芭迷”，不然的话一定觉得有关芭芭拉的这条骇世惊俗的报道，多少有点装孙子。

美国是一个用音乐包装起来的国家，走在街上，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几起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开着跑车，把车内音响的声量开到最大招摇而过的景观。非但疯狂者如此，即使是在大的超级市场、小的家庭营运的果菜店，甚至于正规、严肃的办公室内，稍有品味的主事人也都是会让室内有一小缕纤细的乐声缭绕的。美国因此很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全天候音乐电台。

在纽约，几乎全城都听的音乐台是 FM93.1 和 FM106.7。常常的情形是，你开着车上班，车上的收音机中放的是 FM106.7，你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中也正在播放 FM106.7，然后你拨出电话去给你的客户，对方电话中的等候音乐恰也正播着同一台，而等你的熟人拿起听筒来，你隐约也可听到，他的办公室内出现的还是这个 FM106.7。

但关于音乐，美国人还是备有两副嘴脸的。

美国有一个十分著名的笑话，说是一个人在路上问另一个人：“请问通往卡内基音乐厅的路怎么走？”被问的人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不停地勤奋练习。”

美国人，尤其是音乐的性情中人几乎无人不知卡内基音乐厅。这座座落于纽约最商业的第 57 街上的音乐圣地，百年以来几乎成为世界上每一位严肃音乐专攻者心向往之的地方。

卡内基音乐厅主厅有两千八百多个座位，通常一场音乐会的票价定在 70 元到 10 元之间。一个极具天才的音乐家穷此一生也可能只到此一演，但站在这个辉煌的顶点如果用票房来衡量的话，如其万幸能使全音乐厅满座，全部票房平均来算也不过才是 $2800 \times (70 + 10) / 2 = 112000$ ，也就是十一万美左右。在中国音乐迷中素享盛名、由小泽征尔（SEIJI OZAWA）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境况稍好，由于该团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交响乐团，因此到卡内基露面的机会每年都有不少“但其票价最高也只能卖到 65 元，最低票价则达 14 元。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小泽者流到中国演出时，年纪半大不大的中国音乐狂如我哥哥者，为了执意要到剧院门口等退票以求一睹小泽英姿而与阻拦他的父母好一通别扭直至夜半的情状，不免替小泽一类的今天和我哥哥的当年不忍。

而事实是，即使是远道从柏林、维也纳来的世界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到卡内基演出，票价最贵者也不过是 125 元，最便宜的是 20 元。平均下来全部票房也不过是二十万美金左右，才几近芭老太太首肯出山数字的 1/50。

旅美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当年由于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黄河大合唱》等曲曾红遍中国。在美国，他也是极少数能进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演出的中国音乐家。他 1983 年赴美之初曾在卡内基音乐厅做过演奏，1993 年 10 月他为纪念自己赴美十周年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演奏会，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殷氏演奏会当晚的票价虽然最贵的只卖到 35 元，最便宜的 12 元，但整个音乐厅内只坐了 30% 到 40% 的观众。演出中尽管观众的情绪热烈，但无疑在数量上让人扫兴。

严肃音乐式微到今人不忍归纳地步的状况同样出现在音乐唱片店等相关行业上。

在美国的音乐唱片店中，但凡成套贱卖的大部分都是古典名作，这些东西有时便宜到激光唱片四、五块钱一套，一套四、五盘。而一般一盘美国激光唱片的价格平均在 10 元以上，其中以 12、13 元居多。比如前述芭芭拉·史翠珊的任何一盘作品，定价一定在 13 元之上。

从财务角度来讲，美国严肃音乐的发展基本上是靠政府及私人财团的资助维持的，票房起到的只是“填补”作用。

这里所说的严肃音乐包括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对相对零散的艺术项目，政府方面的动作是按个案考量的。

为此，政府每年都会有相当的表格发出，具备资格的演艺团体均可据此申请政府经费。每年，政府方面都要为此组织一批资深艺术家组成艺术评审委员会，统筹对报上来请领演出经费的各种申请加以遴选。但由于各地艺术界进入主流者人数有限，虽每年都会有黑马出现，但一段时期内能把经费请领到位的艺术团体大致不会走样。有时，也会有零散的相关基金出现，这时又会有另外的一次号召。

钱有了眉目之后，当事者是要和政府签订有关合同的，这之中包括作品的完成时间、演出的基本年限等项。

一般而言，政府方面对艺术经费的划拨会因艺术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增减。比如说，按纽约州的标准，一部交响乐作品的创作经费按规定最低不少于 2 至 3 万美元；一部歌剧为 5 至 10 万；一部电影纪录片的音乐创作为 6 千到 1 万美元。与此有所区别的其他门类比如说一部 45 分钟的舞蹈，主创人员的经费大致可以拿到相对离谱的 1 万元。

对于整体的高水准艺术团体，政府每年有专款拨出。一说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每年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款项总额高达两千万元。

这类经费的申请往往费时良久，一般的速度为一年左右。因此，艺术家们需提前一年把自己的计划排出，做出企划书后透过已在政府报备、取得了非营利艺术团体名份的相关艺术组织上报政府。这种工作往往也有不少经验丰富、用辞老到的艺术基金经纪公司承办，但条件无疑是要雁过拔毛，一般要抽取请领款额的 5%。

除此之外，严肃音乐来自另一种途径的经费，是私人财团捐助的款项，这种情形下，过程就比较简单。事实上美国社会中之所以能年复一年地产生出这种钱，也须功归美国的税务制度太健全，并不是美国的大财团决策人多么崇尚严肃艺术。

这种钱款的捐献往往是大财团用来抵税的一种手段。纽约方面对此的有关规定大致是，每年税款中的 5% 可以用做文艺捐款抵税。也就是说，一方是把钱白白地缴税缴到听不到一点响声；另一方则是哺育严肃文化，请君做热爱艺术状，有点思维段数的人多半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

这方面的事例多不胜数，比较著名的是纽约布鲁克林音乐表演艺术中心（BROOKLYNACADEMYOFMUSIC 简称 BAM）每年一次名为《下一个浪潮》（NEXTWAVE）的艺术展。这个号称囊括了世界前卫音乐、表演艺术所有具代表性作品的年展，就是由万宝路香烟厂商赞助的。而政府及商界的资助，也是这一几乎是只反给圈内人的年展能够一开十一年的唯一原因。这十分自然地昭示了资本主义在艺术界的运作可说是表现在两个重要层面上的，一是促使多金的大型企业参与艺术活动；另一则是使艺术品变成有价商品。严肃艺术的境界只能达到层面一，层面二则是后面要谈的通俗项目中的后话。

即使如此扶植，据知美国政府的做法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拨款总额上只接近后者的 1/10。

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谭盾，目前在纽约是少数进入艺术主流的中国人之一。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博士早年求学时曾到曼哈顿东村街头整晚地拉琴以换取生活费。后来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同好中的顶尖人物。目前他自己组有乐队，又由于创作勤奋；在业界风评颇佳，因此每年都有在政府“哺育”下的各种艺术品问世，成为美国少数不需兼职的专职音乐家。

目前，谭盾“已被落实”了的创作计划已经排到了二、三年后，这要算是居美音乐家中所谓相当成功及难能可贵的结果了。

单就美国纽约人在对严肃音乐的认同上来讲则有个特例，那就是每逢世界严肃音乐名流到中央公园进行免费演出时，纽约人必定是倾城出动。这种一流的表演活动在夏季的夜里举行得相当频繁，不少人是举家前往，提前大半天进入露天大草场中占座位。1993 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世界顶尖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露天演唱会。那天，我特意早到了一个多小时，但由于人多拥挤，竟连演唱区都未能进入。那种拥挤的程度实在令人不敢相信是在绝对商业的纽约出现的严肃音乐会中的盛景，我在人群中多次努力，把所有愿望简化到只远远地眺望帕氏一眼，都未能如愿。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我只是有幸随着成百上千个晚到者聚集起的人流从演出场地的一侧拥塞而过，身前身后都是高大结实的纽约男人的胸肌和肩背；帕瓦罗蒂的声音飘到我耳朵里时已不是十分连贯，许多完全没有指望的人干脆就在远远的地方席地一躺，能听到什么是什么了。

我那天拥挤了一圈之后也没了指望，找到一块可坐下的地方时恰好看到旁边的一位仁兄带了一部小型的电视机和一个小收音机，该人一边放着收音机听音；一边开着电视机看画，我也就是在听着远处断断续续的帕瓦罗蒂的真声和近处帕瓦罗蒂的假声中度过这个拥挤的音乐之夜的。

回到家后对这种不合常情的现象多少也想出了一些有关的“理解”，相信前往的大多数纽约客是为了排解自己周末假日的枯燥，而干脆不是为了帕瓦罗蒂。

也就是说，说到底，美国的音乐界是有着被“政府哺育”和被“票房哺育”之分的。

前者如谭盾者流；后者则完全属于一种“工业”。

芭芭拉·史翠珊的例子其实是这种工业究竟发达到如何地步的一个见证。

话说回头，芭芭拉毕竟还只是一个以唱通俗老歌为主的“老歌手”，迎合的大多只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美国人的口味。美国的新生代煽情歌手如玛当娜、迈克尔·杰克逊之流的大走财运，相信又是芭芭拉者流不能望其项背的了。芭老太的这一千万元一场的演唱会毕竟还是她沉寂 25 年之后的头两场，无论如何也有着来自重做冯妇中有关“重做”的开头因素，而玛当娜这类人年年有轰动出现，每回疯狂必定都有数万人陪着，并须有警察看守以防有人激动得昏倒才能了事。

低估这些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绝对是一种幼稚的错误。只拿玛当娜的服饰来讲，就引起美国社会无数歌迷的效仿，她大胆轻狂的行径更为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提供了大把专题研究的素材。这种阵势，当然也更绝非卡内基音乐厅内的两千八百多个座位所能包容。

有一天，就玛当娜等人演唱会的门票问题问起我的一位美国熟人，这位在纽约呆了足有二十个年头的黄毛蓝眼扭脸看着我说：“你甚至想也不要想买票这件事。”

进入九十年代，美国由在通俗音乐中长大成人的克林顿主掌，通俗艺术的势头更加如虎添翼。克林顿在青年时代就是美国声音颤抖、长相甜俗的通俗歌手 ELVIS PRESLEY（猫王）的歌迷，并且在骨子里蕴藏着十分通俗且自由化的处世观念。他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完三本推理小说，爱玩填字游戏，并且喜嗜看西部老片。他有许多通俗艺术界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芭芭拉·史翠珊。该老芭在克氏的总统就职晚会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艺人，上台为他大唱《常青树》一类的歌。他在大学时代，除有众所周知的对大麻“没吸进去”事端，也曾领导反越战大示威。他在校园中留大胡子、喜吹萨克斯风。在克林顿的竞选活动一度限入低谷时，他还曾到深受青少年和黑人欢迎的电视脱口秀中表演萨克斯风吹奏，当时，他选的曲目是猫王的一曲《伤心旅店》，报上竟说，如此一来克氏声望随后即有所上升。

在纽约，有关这种“工业”的一个特例是一年到头演出不断在我看来介乎于通俗与严肃艺术之间的百老汇剧。这些剧目以令人不敢相信总数的演出场次示人，成为纽约不可错失的大景。百老汇剧中《猫》、《歌剧院幽灵》、《悲惨世界》等名剧一经获得美国此中权威，“东尼奖”，中的某几个奖项，就可大肆每晚演出不间断，一演几年甚至十几年，票价最贵的六十五元，最便宜也要四十几元。例如拥有名主题曲《记忆》的《猫》剧迄今就已上演 11 年了，主管人员干脆已把演出的剧场舞台完全照着《猫》剧中的需要推翻重建过了。剧场门口的大招牌上也用斗大的字明告路人：“《猫》剧上演，从现在直到永远。”

但不少老纽约客指出，百老汇剧票房的经久不衰其实是靠看来纽约的观光客支撑。在一般的赴纽约旅游团中都会有观看百老汇剧的安排，毕竟这是纽约的一大特殊。这些老纽约人之中不少人大笑着说：“出去问问吧，纽约人中有几个是看全了百老汇剧的？”面对被音乐包裹之下的美国，给自己归类是一件令人迷茫的工作。美国人在寻常互问中常常专业到要问：你喜欢哪个门类的音乐？

如我而言就至今都没能把我所迷恋的芭芭拉·史翠珊、麦克·波顿、玛瑞·凯丽等人的门类问题搞清楚，因此但凡有人问起，一定瞠目结舌。

或者有时我干脆就是听上十天半个月的京剧《打虎上山》，也算逃避尘世和关于对美国音乐无暇总揽的无奈。

56. 出门购物

我属于无可救药生性爱进商店的那一类人，多少年来在中国及美国进出各类商店的机会相信比常人多上不知多少倍，但比较之下，美国的商店绝对是一处处“名胜”。尤其是美国的中上流时装店，我每次进去每次都会被其中的设计巧思吸引得迈不动步。

在美国购物是一件十分赏心悦目的事。

尤其是在衣饰店内，每次前往几个我常爱去的服装店，基本上都是要腾出至少是四个小时以上时间的。更尤其是在名牌衣饰的减价店内，那种挑选牌子、心算折扣后价格以及两种品牌在同一价格层次之中究竟该买哪个好的种种忙碌，给我带来的内心繁荣无以伦比。在美国紧张的生活中，购衣几乎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另一脉血络。所以，每次进入店内时，心里都感谢美国的商店给我生活注入的生机。

自美国人的劳动力趋高之后，多少年来，美国在平常市场中都是一个以卖为主的地界。也正因此，美国人的“卖术”之高不是一般的段数能够形容。几年来在美国看尽了各色人等的卖法，觉得非但是门学问，而且是门艺术。

美国的店铺规格和这个城市的各阶层人种一样齐全，从最低到极高均有，各色人等玩得了什么“鸟”就玩什么“鸟”。以纽约这个世界购物中心而言，座落在57街及第五大道街口的伯格道夫·古德曼(BERGDORFGOODMAN)服饰商店相信是纽约普通人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的地方，也是纽约一般人与真正富人硬碰硬的分界点。这家极具名气的大型店铺以售卖衣饰为主，专营超级名牌，价格相当耸人听闻，一般的一件毛料上衣也会卖到一两千美元。而且，即使是一件在其他高级百货时装店里卖七、八十块钱的POLO牌衬衣，它那里也敢要价两百多。在该店买东西，花了大钱的顾客唯一得到的“与众不同”只是每件衣饰在商品名牌布标的底下还连着一小块该店的名牌布标，大抵是因为该店名气过大的缘故，店方也希望这样一块布片能给购买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但仅为这一块布标的不同，顾客往往要花上比别家店高出二至三倍的价钱。

奇怪的是，美国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也有五、六年了，各地中下价位的店也倒了不少，但这间及同类超级商店内仍是人进人出一片繁忙，没有任何要破产的前兆。

与此相反，在美国街头遍布的各种廉价货品商店的生意也十分热络。自九十年代初，为适应经济低迷现状，在美国大都市的一些购物区内相继出现了“10美元服装商店”。在这种店中购买衣物，无论衣裤，每一件的价格都是十块钱。开始，这种店只是开在邻近贫穷住宅区的商业区内，但到后来，这种店由于广受欢迎，干脆登堂入室，甚至就在繁华的时装区租下租金剧贵的华丽玻璃门购物大厦开门营业。

在美国购物，货比三家是一件十分明智而且十分“美国”的事，决不是区区一句“小器”所能概括。美国的物价各店随意性很高，同样品牌、同种式样及尺寸的一件衣服在不同的店里，甚至于在不同的居住区就会有不同的价钱。因此，美国都市精明人的购物准则是“看下不买”，比过三家之后再做出的决定才是不吃亏的上策。

近年来，受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许多工厂直营的服饰及家用品售货点已开始深入人心。这些售货点往往设在远离大都市的偏僻小城内，有些名牌货的生产厂家干脆就以工厂的货仓当店面，不花一分运输及零售商店店租

费用就能赚钱。这种地方货物的价格往往仅为都市商店物价的 80% 乃至 20%。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成百上千懂得个中窍门的美国人开车前往这种物美价廉的店内购衣购物，多年来已成为无数身居都市的美国家庭的重要周末节目。

在美国甚为流行的两种间接购物方式一是电视推销，另一是邮购。

电视推销的重点以服装、珠宝最为多见，这些衣物由电视中的模特儿轮番展现在观众眼前，配上播音员旁白及屏幕上对其质地及现货尺寸等项的说明，观众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喜好用电话定购。

而另一种购物方式邮购则相对复杂一点。这种购物方式在几年前的中国也是很出过一阵风头的，但由于其中存在的纠纷过多，近几年已经式微。美国的邮购业务极为发达，不光是做店面零售生意的卖家会沿用此道以期招揽顾客，就是美国许多大型的百货商店也设有邮购部门，频频地往各个居民家寄发新的到货资料。而这又带出了美国社会中一个居民不胜其扰的大头痛：“垃圾邮件”泛滥的问题。

几乎在美国住过一年以上，有保障号码、银行户头等居美全套必需要件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闻所未闻的公司或机构寄来的各种推销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是根据居民在银行等处留下的姓名、住址等登记资讯寄来的。这种被美国人称为“垃圾邮件”的东西数量之大，每天都困扰着无数美国人。在我的经验中，这类邮件在我日常往来邮件的总数中要占到三分之二强。每天一打开信箱，但见箱内被塞得满坑满谷，细查之后，有用的信件却寥寥无几。

一般而言，这种“垃圾邮件”内容包罗万象，小到推销杂志大至推销珠宝，有时甚至就是推销“人”，比如自荐充任家庭会计师的自荐信，美国人的推销术无孔不入。称这类资料为“垃圾邮件”实在只是从大多数收件人的心理感受而言，其实这类邮件大多纸质上乘，印刷精美，绝不会因为是免费发送的缘故就在“邮件”品质上掉以轻心。

事实上，对美国都市人而言，这类邮购业务不太吃香，因为都市人本身就生活在商店中。而对身居僻壤的美国人而言，由于其商业信息不灵通，因此，邮购资料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美国的邮购手续十分简单，购买人只要在邮购资料中看中所要买的东西，即可致电给邮购主持机构告知对方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定购行动即告大功告成。通常，这种邮购只需要加上寄货的费用，货品在两、三周后即可到达。

最具美国特色的购物交易在我看来其实是在美国家庭中十分盛行的“YARDSALE”（庭院贱卖）、“GARAGESALE”（车库贱卖）。这种购物交易通常在美国家庭的后院及车库中进行，在美国的一些缺乏娱乐的地区，这种交易简直就是当地人自己给自己找到的一乐。一般说来，这种交易手法简单，无须广为造势，任何人家都可以举行，举行前只需在家居的路口及交通要道上钉一个纸板，写上“庭院贱卖”、“车库贱卖”的字样，简单说明自家的地址乃至简易路线图，就可以等客上门了。在一些煞有介事的地区也还是会在地方小报上找得到这类广告的。

这类交易中的交易品多为居民家庭中的旧货或者是主人认为没有用处的东西。由于没有用，因此交易价格通常便宜得惊人。比如一个钟表只卖五毛钱、一个半新的桌子售价是五块钱。但在这类展售活动中，出现得最多的东

西还是各种旧了的挂画、旧画册等艺术及相关品。在不少地方，细心的买家甚至能寻到制做粗糙的木雕、艺术瓷器、铜器乃至各国风味的工艺品。传统中的美国人习性是在买时十分富有购买欲，在丢时又十分富有丢弃欲。因此，在这一类市场上出现的家用品几乎全部是还能使用的，有些甚至根本是八成新的。而在这类市场中出现的艺术品更是无法讲清价值，它们被拿出来贱卖只不过因为不得主人宠了。交易中的价钱多半是一种“摆设”，卖者多半只是图个热闹罢了。

就在这种“漫山遍野”的买卖中，识货的买家找到稀世珍宝的新闻时有发生。年前就曾有一件轰动全球的消息，说是一个美国人用四块钱在一户平常人家的“YARDSALE”中买到一幅挂画，回家后却在挂画中的衬纸中找到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的印刷品，到拍卖行拍卖后，此人竟得到百余万美元。

美国的这些贱卖交易几乎全部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两个美国人的法定休息天举行，美国的一些教会、老人院、学校等机构更是干脆把这种摆卖活动当作自己的一件盛事，时常组织自己人踊跃捐输后，举办类似的大型拍卖活动以弥补经费的不足。

一些居民如果搬家的话，往往整个家都会拍卖，到那时，客人可以进入卖主的家中任取自己中意的东西，买下来，带回去。

我的一位十分钟情于美国这类小型而温馨交易方式的朋友每次在逛完这类“市场”之后，都会千篇一律地总结说，这类“市场”的贵重之处是因为所有货品得以再出售都是经过了“第二次选择”的缘故。偏偏我也是个见了这种交易就开不动车的人，因此，私下里很同意这种和事实相去不远的“故作贵重”的说法。

着迷的时候，有时在梦里满满当当的就都是这种“第二次选择”。

57. 周末多半去旅游

美国人中最常见的娱乐活动非旅游莫属，往往是一到周末即阖家出游。

美国人多年来实行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作息，周六、周日全是休息天。于是，住在美国都市中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到周五晚间，大批的车辆载着城里人各自的一家老小、携着简单的旅行用品向城外的方向滚滚外流。到了周日的晚间，在外耽搁了两天的车队又滚滚回巢。在美国人的日历上，大型假期每年多达十几个，而且斗有八九是和星期六、星期日两个周末日连在一起的，因此，这种日子被美国人称为“长周末”。这种美国风俗中的天设地造，也给美国的旅游事业带来无限生机。每到长周末，都市里租车行的生意十分走俏，其中尤以可载六、七个人的小型旅游车为最抢手，租车人往往要提前一个多月订车，才能如愿。

美国的租车费用相对便宜，一个周末的租金往往只在一两百元之间，此于美国工资而言，远不是负担。

在美国旅游可奢可简，通常有多种道路可供选择。最贫穷的人往往采取坐长途汽车的办法出门，中国人在国内常听到留洋者口中提到的“灰狗”等名称，其实就是美国一种著名长途汽车的名字。大多的中国留学生早在来美之初就是靠这种交通工具完成自己在美的转学、到外州打工乃至探亲访友的使命的。与飞机票价格相比，长途汽车的票价虽然便宜，但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经济，但由于只是偶尔一坐，相对还算合算。

收入不太好但还买得起车的人可以驾车出游，这也是在美国居住过一阵的老留学生惯常选用的旅游办法。三、四个人通常合开（或合租）一辆车，大家轮换着开车，分摊旅途中的所有费用。节省一点的旅行花费的只是汽油钱和车辆通过收费高速公路的“过桥钱”。在留学生时代，有太多的人因为舍不得花旅馆钱而睡在车里。往往是车一停，灯一熄，同行者就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寝。才来美国时，我也曾如此这般地因为省钱原因睡在车里过。记得当时是去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如此一夜贫穷的后果直把人睡得疲劳不堪。日上三竿时推开车门，只见周围几乎每五辆车中就有一车贫穷之人带着显而易见一夜贫穷的疲惫。

美国的旅馆收费往往因地设价，同样是希尔顿饭店就分佛罗里达小旅游点的每晚 60 元及夏威夷的每晚 200 元以上多种不同档次的价格。美国的大部分旅店定有淡季、旺季两种收费标准。一到旺季，人多一点的旅游点收费个个骇世惊俗。有一回我和一大群分属几个家庭的朋友去新泽西一处名不见经传的 capeMAY 海边小住，当时正是温度最毒的夏季，又是长周末，无处可去的美国人都蜂拥到海边来消磨日子。等我们到时，离海边 15 分钟车程的地区旅店价格也都到了每晚 175 元之谱。才听到这个价格时还以为是店老板刁钻，见到中国人欺生，但着人去附近乱兜了一通之后，听到的房价竟都是在 200 以上，才知此地着实了得。

由于旅游业在美国高度发达，因此相应的旅行设施也相当完善。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往往也迅速沾染此好，从还是留学生时起就四处巡游。

随着在美国走得多了，多年来，美国公路业给我的感动是与日俱增的。这种质量一流又无所不在的公共设施，成为美国人除房屋之外的第二大需求。早年问总是要驾车出游百分之百的原因是为了省钱；而到后来再驾车走长途则多半是因为喜嗜看公路、看路边的房子这一类旁的原因。

美国的公路质量之美、长度之长堪称一绝。据统计，美国的高速公路总长为 7.5 万英里。多少年来，每当假日出游，几个人轮换开车开得十分人困马乏的时候，脚下的公路却仍是长无尽头，自始至终秉持同样的姿态，宽敞、光洁、各种交通号志齐备而已统一。在平常出游的开车来往中，旅游者几乎看不见有任何关于高速公路维修的工程，公路像是被神工鬼斧造就、静静而立的一个奇迹。多少年来，对于美国的高速公路我无可救药地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开车出游每有这种没完没了的内心感叹，感觉中，这种美国式的宽敞铺垫真能把你带到天边。

一般而言，美国高速公路的定义是分流单方向行驶、最少有四条线路（两来两去）、设有进出口、没有平交只有立交、中间没有交通灯的公路。美国的高速公路的使用率为 22%，造路的费用大部分来自政府，也有部分公路是由私人出资。由于造路费用高昂，在高速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收费站，一般的过路费从两毛五分到十几元不等。

美国高速公路上的一般限速为每小时 55MILE，也就是每小时 88 公里。美国警察也和中国警察一样会躲在公路的暗处截堵超速行驶的驾车人。

但关于高速公路的限速问题，在美国却一直是个争议焦点。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种限速标准定得过低，致使高速公路上的开车人几乎无人不超速，平心而论，此说不假。我一向是最害怕“速度”的人，但每次驱车上了高速公路，尤其是州际高速公路，路面宽阔，且四下车辆稀少，我的开车速度一定会是在 60 至 70MILE 之间。

在去年，美东地区曾有不少民众对高速公路限速过低问题展开过大型抗议，抗议方法十分独特，他们分别开着自己的车，严格遵守当局限速行驶，如此浩浩荡荡的一干把整个高速公路的交通完全堵塞，任凭一些零散车辆归心似箭地在后面大按喇叭。

为了方便旅行的人，美国高速公路边上每隔十或二十英里就会有加油站及方便出门人吃饭、如厕等生理需求的地方。许多这种中间休息站上，并有各种有关附近旅游去处的资料备索。

相对奢侈的旅游办法则是坐飞机。由于旅游业的发达，美国的旅行社多如牛毛，在纽约及加州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华人开设的旅行社甚至于就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所谓旅行社，就是以代买机票为主兼做有关其他旅游项目的小型公司，在中文报纸上，这种旅行社的广告每天都达数页之多，在数量上成为仅次于医生广告的行业，由此，可想而知美国旅游业的发达程度。

乘飞机旅行的人因为奢侈而享有快捷的方便。美国境内各地机场附近都有数量极多、竞争激烈的租车公司，旅行者只要拿着钱和地图就可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租到一辆负担得起的车尽兴游玩。

在中国一向是旅行重头工具的火车，在美国的发展则几近奄奄一息。在美国的多年生活中，我几乎走遍了美国境内各大小名胜州，即使如此游走，也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听有“火车经验”的同事表示，美国火车内的乘客一向寥落，什么时候去都不会赶上人头济济的场面。

事实上，美国人每每出门旅游的去处不大上得了台面，所游之地毫不稀奇，和中国动辄几千年的古迹相比，美国的名胜常常贻笑大方。美国人眼中的名胜常常就是一介仅有几十年历史的废墟或是一个形容稍见怪诞的建筑，这种没有什么根底的东西一经宣扬出去，美国人就热血沸腾地从四面八方赶

来一观。因此，在文明祖国见多识广的中国人到彼一游往往觉得相当无聊，“不知所看”。有一大到一个据称“古迹极多”的地方游走，看到海边上一处“名胜”在一本正经地收钱卖票且游人如织，待买票进门之后才知道大家是在排队看一个面目半新的灯塔。为了这种并不稀奇的名堂如此往返奔走，美国人的目的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角度觉得确实物有所值，但相信也有不少美国人不外是给自己的周末找一点事去做，甚至就可能是为了晒太阳。

发展至今，旅游之于美国人的意义干脆就是生活是否有品味的一个标识。除了周遭的“名胜”之外，美国人也会将海边、森林等自然景观当作去处。本着出门就要花钱的原则，近年来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能负担这笔花费了。报道中说，曾有一户虚荣的美国家庭在一个长周末无力支付外出游玩的钱，但又怕被周围邻居笑话，便向邻居放风说他们一家人这个假期要去外州旅游，实际上该一家人躲进了家中的车库和地下室苦度周末，直到以为他们已经远走的邻居惊讶地发现他们地下室有灯人闪烁并报了警后，这一没多大意思的骗局才告戳穿。

美国人对于太阳的感情是无以伦比的，无论在旅游中还是在平素，到处都能看到美国人在类似中国人“躲在阴凉中”那么谨慎地“躲在太阳里”。即使是在佛罗里达州那么浓烈的阳光中，在街上摆摊子的美国女孩也会把自己的摊子躲开树荫，脸始终迎着太阳直接照射的方面。

没到美国时常想象美国人黄毛蓝眼，面孔一派白皙，相形之下的那种肤如凝脂的高雅一定会让我这样的黄脸人在一旁嗟叹不已、坐立不安。但身临其境才知道，皮肤被晒得焦黄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的富绰之户。而穷人的真正标识除了肥胖之外，就是那种未经风吹日晒的白皙。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和穷人多肥胖一样简单，只有富人才有资本搭机票赔时间去各种地方经风雨见世面，肤色自然黑红得有如农夫。

为因应越来越多人对自己皮肤的深色要求，全美已有无数家采用紫外线照射等技术帮助人们把皮肤变深的俱乐部在默默扭转着美国人的外观。这种关于皮肤的时尚也扩展到了女用化妆品上。进入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时髦的美国女郎采用黄色系列的化妆品，面部底色竭尽深黄，口唇也是一色暗黄。而且在化妆品的制造方面，如果你去买稍为考究一点的化妆品中防晒系列，营业员都会问你是要“阳光透得下来的”还是单纯防晒“阳光透不下来的”。也就是说，前一种防晒品在太阳下用过之后是可以对加深皮肤颜色及防晒两相兼顾的。

58. 疯狂的体育国

我的一个关系很近的朋友有一天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是她儿子由于生急病，不得不放弃一张棒球票。她语意直露他说她是在和儿子反复预测了很久，确定儿子百分之百地不能支撑下来全场才忍痛把这张票让给我的。

恰巧我是个棒球盲，对这种馈赠回应相当冷淡。而这就触怒了我的这个朋友。在我拒绝了她的一片好心之后，听见她在电话线的那头大声斥问起来：“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在美国住过的人？你到底懂不懂真正的美国生活？”

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那种由衷热爱，相信不比中国人熟知的南美洲人狂爱足球的程度有所稍减。才到美国时，深深觉得美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往往也表现在他们的身躯之上，尤其是太多的美国老人，年过七十了仍保持一副在中国人看来“军人身材”的仪表，个个腰杆挺直，令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是一派热气腾腾。

正因此，美国的体育用品价格不低，一件运动衣的价格绝不比一件时装便宜。

美国人全民共同的爱好是观看体育比赛。在这个国家中，每年有数不清的大小赛事，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棒球、橄榄球（美式足球）及篮球三大球类。美国每年这三大球的赛季此起彼伏、接二连三，感觉中，美国的电视台成年累月地都有这种东西上市。赛季一到，有路子的人买票去球场看真人，没路子的人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第二天，往往举城评球，从老牌影视红星到下城的升斗小民均不能免俗。

所以，在美国有句不成文字但成气候的说法：如果你不看球，那你就不该到美国公司去上班。这话我在初听时还将信将疑，但我的一位的确不爱看球又的确在美国公司任职的朋友说，此话并没有过份夸大其辞。他说他在他的公司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每场举城皆知的球赛过后的第二天，他说那种时候他的每个同事几乎都像上了发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把满办公室弄得鸡飞狗跳。那种日子里，只有他一个男人无从插话，和一些女职员坐在一起呆听呆看，自己也觉得自己十分土气怪诞。

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又兴起了保存棒球明星乃至各种体育明星卡的风尚，这种小卡片设价不同，为广大的青少年热衷，他们在朋友之间为此进行攀比，张三如果有某明星的卡片，李四也一定要买到同样的东西。那种程度有点像早年中国的小男孩们收集香烟包装纸一类的疯狂。

由于职业广受欢迎，美国体育明星们的收入也是相当的有看头。以美国的棒球运动员来讲，水准自然居世界前茅，但运动员的薪水之高，也令人瞠目。以九十年代初期的美国 A'S 队为例，队员中年薪超过三百万美元的有五位；另一强队巨人队中，年薪超过三百万的也有三人。

美国球票价格不菲，几十元一张的票价对美国人来讲绝对是合理公道。稍微上道的比赛，门票就可能在球迷社会中掀起有如股票看涨一样的风潮。

以将于 1994 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五十几场球来讲，整个比赛的决赛、半决赛与四分之一决赛票价严格分档。最便宜的四分之一决赛票也要价 55 美元，贵则 140 元；半决赛中最便宜的票价为 90 美元，最贵为 300 元；而最贵的决赛票价则高达 475 元。对此稍有贪婪的人买下一套票的价格一定在千余美元之谱。

中国人所说的足球其实在美国并不很有市场，美国人嫌它太枯燥。美国人所说的足球是指进攻防守都极具野蛮之能事的美式足球。一般的中国式足球比赛美国大型电视台不予转播，只是些由南美洲移民社区租借的电视频道有可能转播。即使如此，因为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南美及欧洲移民，这几十场 1994 年夏季开赛的球赛主办单位于 1993 年 7 月份就开始先在公共传媒上刊出登记表格，球迷填好后还要寄往主办单位参加抽签，中签者可获得掏钱买票的资格。一些求票若渴的球迷还求亲托故地取得了好几个姓名、地址填表以求保险。但后来这几十场世界杯赛门票总体销售情形并不好，个别场次中还出现了低于票价儿近一半的“黄牛票”。惨淡如此，自然是“暴殄天物”，而且也是美国这个“疯狂体育国”中出现的一个“体育异数”。

美国人对他们所钟爱体育项目的疯狂其实历史悠久。早在 1969 年 7 月，美国太空人登月的那一天，全球的人都注视着这一壮举的进程。美国当时已有了现场电视转播设备，因此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放弃了其它节目而专事转播登月盛举。但没想到，在那样的一种具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有关电视台竟接到不少来自美式足球球迷的厉声抗议电话，指责电视台不该背信弃义，为报道登月的消息而取消了原定的球赛转播节目。

在与纽约法拉盛华人聚居区一箭之遥的地方有一个名为“谢亚”的棒球场，实际上它是纽约 METS 棒球队的专练球场。这里每到棒球赛季必定人山人海。有心的法拉盛人曾多次在这些人群身上动心思，筹划着在谢亚球场边上甚军就在球场内设立对法拉盛华、韩裔社区的专门介绍，以求吸引球迷顺道一游。记得当时想大力促成此事的法拉盛华工商促进会在讨论此案时，理事们一致认为，在球迷身上找财发其实就是在全市人身上发财，因为这些人的影响力绝对是能够带动全市的。当时，华商会的想法是如此一来既可以带动法拉盛至少是餐饮业的发展，也可能逐渐使法拉盛成为纽约市的一个观光重镇。

可惜此项计划的推动既乏人手又乏基金，在筹划了几年之后终告无疾而终。

虽是如此，美国体育的魅力可见一斑。

在美国的平民化运动中，最贵的一项活动就要数滑雪了。

在美国只是冬季中的几个月可以滑雪，其它的月份则嫌太暖，滑雪人如果不是自备用具的话，一个人驾车滑雪连付过路费及租用滑雪用具的钱，平均要花上五、六十美元，多少年来，这项运动也被多金的好莱坞影星们喜爱。每到冬天，几乎所有的娱乐杂志都会在各滑雪营对各红星进行追踪，有时甚至只把参加滑雪的明星们之雪场尊容拍下来，就足够民间谈炒一气了。

而高尔夫球这种在中国属于一般人不敢问津的高级消费，在美国却没有那么高的身价。美国的高尔夫球场基本上对社会任何人开放，民众可随便进出，球场内的球按每筐五十多个五、六块钱算，打上整整一个下午也才不过是几十元，是一项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运动。

除了上述需经由体育器具完成的体育活动之外，美国另有一项体育运动也是绝对地深入民间，这就是慢跑。

每天早上，尤其是在大都市内的住宅区或公园内，无分男女老幼，出门慢跑的美国人到处都是。不少人头戴微型录音机、神态旁若无人地从你的眼前跑过，而且越具“雅皮”色彩、衣食丰沛的人越是这项运动的捍卫者。在纽约，前几年曾经爆出过几个不大懂事的少年在早晨慢跑时间内，强奸了一

位年青的女银行家的轰动事件。该女银行家在经历这样一场摧残之后几近呆傻，成为全美人人惋惜的一桩惨案。但即使历经这种惊险，美国的，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慢跑者仍数量未减。看来，慢跑已成为太多美国人家居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容更改了。

这种慢跑之风其实在美国政界也是最出名、最具风采的体育运动，风行了多任总统而历久不衰。延续下来，慢跑几乎成了美国总统的注册商标，相信美国人对自己总统最熟悉的身姿一是在话筒前的讲话神情，而另一则就是关于慢跑姿态的。为了克尽职守，无孔不入的美国媒体住白宫记者每个清晨都会派出一辆新闻车尾随在总统的慢跑队边上，以防突然的新闻出现。事实上，也真有不少新闻是在慢跑之中“跑”出来的。所以，在美国的媒体上，每隔一阵就会有总统慢跑的照片示众。

非但如此，清晨慢跑也被一些政坛人士认为是靠拢总统既绝妙又轻松的机会，不少政坛人士因此纷纷打探总统的慢跑路线以求能够沾光，甚至进言。

一直以来，总统慢跑的姿态也是美国评论界的一项评说项目，在看过几近零缺点的布什连跑了八年的神情，轮到克林顿上台时不少人认为这个新生代领袖在相对“古典”的慢跑这项运动中，难免花拳秀腿。

克氏上台后，果然也跑，但看上去果然不是那么回事。从电视上看，克氏中年发福，在着短衣短裤时分外恶形恶状。但见短短的衣裤下，克林顿露出的是两条肥硕得有点恶劣的胖腿，步履蹒跚。

但知情人说，克林顿的两条“肉腿”绝对了得，无数深怀慢跑之功的人都是他的“腿下败将”。由于有太多的政要在陪跑中曾被远远甩掉，时下的白宫在每回总统慢跑时只好准备一辆厢型车，一路收容“落马者”。

即使是在出访中，克林顿也不能稍辍慢跑，他甚至就和他国首脑一同慢跑。不少国家对这种合作也视为国格不可辱的“城池”，谨慎以待。比如，南韩总统金泳三在和克氏联袂晨跑时，其幕僚就十分周到地把克林顿慢跑速度、时间和穿着打听得一清二楚；克林顿的周围也建议克氏改穿密实的运动衣裤，以免惹恼了保守的韩国人。

如此一跑下来，果然宾主尽欢。

59. 生为女人

女人在美国的位置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

美国是一个少了什么也不能少了女人的国家，从轻松的角度谈，女人对于社会起到的那种调剂乃至装饰作用，相信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甚至于美国如果没有女人，连经济都相信会受到重创。美国人普遍熟知的一个经营理念是：

为女性服务的项目才是赚钱的。至少在当代，此理念屡试不爽。

这也就是女人于美国社会虽最基本，但却石破天惊的价值。

刚到美国时，骤然看见满街有那么多美国女人，而且一个个的长相都不同凡响，心里曾很自卑了几个月。但看过几年之后，美国女人给我的震撼已经全无，回想当年的自卑，反倒觉得不知从何说起，相信当年的那种情怀多数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眉眼的新鲜感使然，如今对美国女人凹眼高鼻之美早已羡慕得几近麻木。

女人和外貌是有着难解难分依存关系的，在美国这么现实的国家里，女人的长相尤其重要，一般而言，如果长相不好无疑是会失去不少机会的。但说到底，长相问题还是女人们自己所不大能掌握分寸的，而女人如果身材不好，那则是十分划不来的一件事。

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曾花了七年的时间专事美国女人的机会与身材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是：美国的肥胖妇女哪怕智力测验的点数高过一般的人，其所赚的钱、所受教育的程度及结婚的机会，平均下来也会比一般妇女要少。这项调查是在十万名以上的成年女人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肥胖的女子在收入上比正常女子少了 6710 元；在学时间少了四个月；结婚的可能也少了 20 %。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美国妇女的肥胖程度绝非一般中国人能够想象。刚到美国时，我常常在街上偶遇肥胖程度叹为观止的各种妇女。这类肥胖妇女常常胖到不能正常行走，身体中尤其是胯部的痴肥竟能达到一个人两手环拢还远远合抱不过来的程度。

更有甚者，一名体重达三百二十磅的美国女人库克甚至在能否工作的问题上还曾遭遇恶梦。原在罗德岛州政府所辖部门工作的库克曾接到必须减轻体重才能重回工作岗位的通知，通知要求她必须把身材恢复到属于正常的限度之内。库克接信后恼怒异常，状告州政府存在雇佣歧视。由三名陪审员组成的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庭审理后确定“关于残疾人的权利法律同样适用于体重过重的人”，库克因此胜诉，不但获赔工资外还获得了十万美元的“精神痛苦损失”赔偿。

在美国女权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二、三十年前，美国女人向社会喊出了无数合理甚至不合理的权益要求，但历经那时的一切之后，时至今日，在女权运动仍方兴未艾的时候，美国女人在真实生活中仍约定俗成地被推至相当具有“装饰性”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也为女权运动者所无奈地默许。

其实，美国女人在社会中一向引人注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个事实的背后是女人作为社会陪衬在有形无形地被社会要求，这也是一个人们心中有数的事实。在美国男性白领中，自己办公室内的女职员是否漂亮，就是谈资中的一个项目。甚至于直至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美国还曾有一位美国航空公司的女职员因为拒绝在当班期间化妆被认为影响公司形象而被解雇。

美国妇女的装饰性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美国自二次大战后起就实施不许妇女在美国军舰上服役及禁止妇女驾驶军用战机的禁令，此项在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妇女眼中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禁令，一直被延用到1993年才告废除。而美国妇女被禁止参加地面战斗的禁令至今仍然存在。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妇女经历了几十年权益风雨之后，不幸又在回归传统。这一点从美国传统女校的兴衰也可窥出一斑。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女性争取平等的风潮曾打破了不少名校不招收女生的传统，男女合校之风蔚为风尚。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女校的学生人数曾一路下滑，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才有所煞车。

据美国女子大专院校联盟统计，自1991年以来，美国的84所女子院校申请入学人数有所上升，增加了14%。就学学生从1981年的八万二千五百人增至目前的九万八千人。而自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由于第一夫人海拉瑞·克林顿的大学是在著名的卫斯里女子学院念的，因此，念女校又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女性重新追逐的目标。在新风潮的带动下，不但卫斯里女子学院1993年的入学申请人数创下新记录，而且其他女校也跟着沾光。

依照美国社会一向的惯例，美国人概念中的妇女生育年龄范围为15岁到44岁之间，传统中，妇女在结婚生子之后，基本上就退出工作，直到把子女抚养成人才可能复出工作。但近十年来，这一传统随着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已经有所式微，因为美国男人中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养家者已经越来越少。如今的美国妇女中的确也有人还是在生育后留在家中照料孩子，但此多半并不是为了秉持传统，而是为了节省请外人看护子女的托儿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1992年，美国16岁以上的女性有58%在外就业，比20年前，也就是1971年的51%增加了七个百分点。而在此期间，男性就业人数的比率反倒有所下降，从原来的78%降为76%。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妇女在就业市场中所占绝对比率从以往的42%升至46%。在女性总的就业人口中，年龄在35到44岁的女性，也就是子女长到可以自己进入学校读书年龄后的妇女是就业人数窜升最快的人群，从1979年的64%增长为77%。

据劳工部的资料预测，到公元2005年，全美女性就业人数将会占总就业人数的48%。

尽管当今已有太多的美国妇女在工作中扮演吃重角色，但高级妇女主管在升迁过程中仍有一定的障碍，而且在待遇上也和男主管有着相当的差别。据美国《工作妇女》杂志（《WORKINGWOMAN》）统计说，目前在美国企业界的最高管理阶层，女性主管仍只占总数的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二。全美上层女性主管1992年的薪资和奖金相加，平均待遇约为十八万七千元，而占高级主管中大多数的男性主管平均待遇约为三十二万七千元。《工作妇女》杂志举例说，在1993年全美女企业家中，待遇最高的是美国外科公司（U.S.SURGICACORP.）执行副总裁杜丽·乔塞，她1993年全年的薪水、奖金加上股票承购权共获得两千六百七十万美元。而在这个专门从事开发、生产和行销一系列供外科手术使用工具公司的男性董事长兼总裁雷恩·赫希一年则可从公司获得七千五百二十万美元的薪水。

这类数字带给妇女更大的忧虑在于女性主管与男性主管之间的差距在连年扩大，而不是减小。因为在1982年，全美女性主管的工资只相当于男性主管的68%，但到了1992年，这项数字却高达57%。而且，这种差距甚至于

超过了全美整个就业市场中男女职工的工资差别。在 1992 年，全美女性员工的平均待遇是男性员工所得的 70.6%。

唯一不同的是在生育等问题上，美国妇女的观念可以鲜明地左右美国社会。

根据人口统计局的统计指出，进入九十年代，美国自愿不生育妇女的人数将达到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峰。美国约有 18% 的妇女在 44 岁结束自己育龄期前不考虑生育。而且，即便是还存有生育愿望的美国妇女，延迟到三十岁至四十岁出头才怀第一胎的，也开始成批涌现。

人口专家说，不生小孩的潮流多半是由于妇女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职业和个人自由的缘故产生的。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采取不生育的人生决策，领养儿童的风气在美国越来越盛。而且，美国家庭领养子女的热潮还曾波及到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不少美国夫妇被人引领着进入中国收养子女。

随着美国妇女人生态度的扭转，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下世纪中的美国人口将发生显著变化。美国的人口杂志预期，到 2010 年时，美国在育龄期自愿不生育的妇女人数将增加至 40%，也就是说将有一千九百万妇女自愿过着膝下无子的孤单生活。

与这一不生育的新妇女思潮背道而驰的是美国当今少女怀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根本还未涉世的女孩就先尝禁果，在九十年代之后，这种美国少女非正常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早，有的甚至早到十五岁之前。

这种问题给美国警方带来的竟是频频处理死婴的问题。几年来，在美国的不少大城市中，警方在垃圾桶、烂草堆等匪夷所思之地发现无主死婴的现象越来越多。1993 年圣诞节前，纽约的黑人及南美州人聚居的一幢大楼外水泥地上还发现了一个带着脐带的刚出生婴儿。这个才问世的小生命被人从十几层高的楼上顺手扔出窗外，为怕婴儿哭叫，扔者还在其嘴上塞了一个红白格子的洗碗布。

奉命勘查这一“杀人案”的警方在遍查大楼住户之后仍不得要领，但无人不怀疑这是又一起少女生子的案例，因为只有这样的母亲才会对子女做出这样的举动以开脱自己。与这一类现象相连带的另一种现象也相当耸人听闻，据美国卫生与人力服务部门研究人员 1991 年进行的首次统计，1991 年内，美国医院中被母亲遗弃或“寄养”的婴儿共有两万两千人。这项统计为“寄养”婴儿所下的定义是：年龄在一岁以下，其生母在离开医院时未能随其生母一同离开医院、但健康状况早已达到出院标准却超期滞留在医院内的儿童。由于机制关系，这类婴儿一旦出现一概陷入美国的法律困境。因为，在医院的工作人员帮助这些婴儿找到一个寄养家庭之前，婴儿们是不能离开医院的，此也为医院增加了看不到头的沉重财务负担。

据统计，在这两万多弃婴中，大多数为黑人小孩，美国政府每年为这样的寄养婴儿所花费的医疗护理费至少达两千两百三十万至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之间。即使数字如此惊人，研究人员仍指出，目前公布的关于弃婴的数字可能还是大大地低估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九十年代的美国妇女，不光有遗弃婴儿的记录，而且还有人制造“残害”丈夫的事端。

90 年代，被美国女性视为一件相当具有时代意义的事情是家住华盛顿近郊的女子洛林娜·巴比特在 1993 年 6 月里的一天夜里用切肉的刀子把丈夫约翰·巴比特的生殖器连根割下的案件。这个案件中的女主角年方 24 岁，是厄

瓜多尔移民，她声称自己是在忍受了受尽虐待的婚姻生活并在出事当夜又曾受到性虐待之后才动了杀念的。约翰·巴比特曾经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担任一家夜总会的警卫人员；而洛林娜则是一名指甲美容师。洛林娜说她的丈夫在四年的婚姻生活中不断地打她，并且对她任意辱骂。在出事的当天夜里，她的丈夫深夜从外面酒醉而归，不顾她的反抗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洛林娜忍无可忍就举刀伤人了。

割下丈夫的生殖器后，她曾携着“这件东西”驾车外出，开出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把“这件东西”扔出窗外。但“这件东西”后来还是被无所不能的美国警方人员寻获，并由医生为其“安装”回去。主治医生说，约翰·巴比特性功能的恢复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看出结果。

有关约翰的虐待罪嫌，早在 1993 年 11 月时即被判无罪，而在 1994 年开始的对洛林娜的审判，事主则面临可依恶意伤害罪被判最高 20 年的徒刑。

1994 年一开头就着手进行的对洛林娜控罪的听证过程，吸引了全美国各阶层人士的高度关注，大街小巷之内一概“性”致勃勃。当时正值国际上风云变幻，北约组织的扩大和独联体内的核裁军问题其实都是美国人以往相当关注的事情，但到了那几天却是谁也无心再过问远处的事了。接连几周，美国各个种类的媒体统统有如吸足吗啡，为这一段耸动的出现兴奋不已。在只能容 45 人旁听的巴比特案听证现场，光各路记者就到了 200 多人，电视转播车多达 14 辆，声势决不逊于总统出巡时美国媒体的新闻陪驾。而且，电视新闻在转播法庭现场状况时也一反以往惜时如金的方针，摄像机一开能摄多少就播多少。全美民众经由电视中的新闻节目，争睹了难得一听的色情描述。

尤其是在听证进行到女方亲自陈述的 1994 年 1 月 13 日以后，话题更加直接，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俄罗斯一带与当地首脑就战争问题达成永久和解，美国的 CNN 电视台在洛林娜自述自己的夫妻生活细节时，偶然插播了身在寒冷异国的美国总统与外国总统会谈扯皮的实况后，竟招致成千上万民众打电话给电视台破口大骂的后果。

美同多个州内都是立有有关“家庭强暴罪”的，此一案件的出现，给司法部门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由 12 位当地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经过接连一个多星期的听证及相关的法律程序，到 1994 年 1 月 21 日，洛林娜终于获判无罪，在 12 名成员中有 7 名是妇女的巴比特案陪审团认定洛林娜的阉割行动是因为暂时“心神丧失”（INSANITY）所致，洛林娜因此被送进心理医院进行为期 45 天有关的心理检查。

为了庆祝洛林娜的胜利，她的家乡厄瓜多尔布凯城的民众涌向大街庆祝胜利。早些时候，厄瓜多尔的妇女组织曾扬言，如果美国法院给洛林娜判刑的活，她们将以“到美国阉割一百个男人”作为报复。

此项判决使得几年来有所稍停的男女位置问题有了重新讨论的突破口，而且婚姻中男女双方的职责问题也成为个讨论热点。美国太多的女性在洛林娜被判无罪后认为这是美国妇女争求摆脱受虐婚姻的一项胜利。但“全美男性组织”（NOM）则表示担心，在今后的美国，男人所受的伤害将可能越来越大，女人对男人施暴的事件将可能越来越多。

此次案件中的“受害人”约翰·巴比特在事发后的一些行为则不那么说得出去。巴比特在事发后积极利用这一事件大赚其钱，先是推销写有与此案有关比如说“爱情伤人”等字句的 T 恤衫，后又出面成为电视节目的特别来宾，一说他在电视中示众一次的出场费高达 25 万美元。

但有一位明眼的专栏作家一句话既把全美人民点醒，也把全美人民逗笑，他说：在巴比特案中，受害最深的是当事两造，“因为他们都已经无法再和别人约会了”。

60. 娱民救国的万民齐赌

凡是到了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长住还是短居，在初抵的前一、两周无论如何是会被明事的朋友们带去赌场的。在美东地区，人们多半会去大西洋赌城，在美西地区则是去拉斯维加斯或雷诺赌城。

其实，“赌”这一好多少年来在美国不少华人的娱乐活动中地位崇高。每到节假日，性情中人中好动者去美国人开的大赌场去“捞世界”；好静者则三五成群在家中支起个桌子就赌了开来。华人中的小赌局多以打麻将为主，一班好友经济情况相当，商定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赌数，一个周末就度过了。这种赌事在美国华裔老人中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是华人社区各大型的老人中心内，群起打麻将的活动也是中心内平素主要的康乐活动内容。

有一次去加州探友，朋友的八十岁老母鹤发童颜，精神极好。她和我们一见面就大谈一周前在老人公寓中的麻将大胜史。朋友的一位生

于美国、见多识广的十八岁的女儿从旁随口插话道：“老人家玩一玩对心情有好处，哪天您也和我们随便玩玩。”

该老母立即扭头就问：“你准备下多少钱。”

那女儿眨了半天眼睛看着祖母说：“只是随便玩玩好不好，我们不赌。”

该老母闻听随即笑着说：“那可就没谁陪着你了。”

美国的赌业是一项壮观工业，近十多年来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罐重要的调剂汤汁，这项工业在 1982 年时的收益还仅约为一百零四亿美元。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年之间，此业发展昌盛，及至九十年代初，美国赌业收益数字已高达三千两百九十九亿美元。

美国的两大赌城——大西洋及拉斯维加斯赌城在地理位置上有着惊人的相同，它们都是设在“灯火阑珊之处”。几年前，我曾从美西洛杉矶驱车前往拉斯维加斯赌城，该城设于荒芜的内华达州内，一路之上，车窗之外扑进眼帘的几乎全是荒地。而且那种地方的荒地上并非寸草不长，而是稀稀落落长了一些成蓬成棵类似剑麻一类的植物，更是给人一种苍凉、原始的感觉。

车子途经中途的一个小型食物补给站时，我下车买了一包辣牛肉干，撕开口袋尝了一口，竟是干辣得不能入口。捧着这一袋东西还没到车上，就看到脚边已经围上来三只身材细小的小猫，盘桓不去。起初没太在意，还只是惊讶它们竟也知道我是爱猫之人而来和我亲昵，可能靠的是神明的一番指引。和猫们正在难舍难分之际，不巧手上纸袋中的辣牛肉干猛然滑落下一条，说时迟那时快，该三只小东西立即疯狂起来，为这一条辣食物东撕西咬地勇猛争夺。

看到自己的猫竟被饿到如此地步，小店中的老板反倒嘿嘿地冲我笑起来，说是“他们总爱这样”。代替这些小东西四顾了一阵，周围不由分说地是一派空旷及荒凉，不知这些小猫们该怎样继续长大。

再开车上路时，心情总是郁郁不快。等到猛然看见眼前现出一片猛烈的灯火姹紫嫣红煞是耀眼，并听说这就是拉斯维加斯了，真觉得是一个梦。

拉斯维加斯，竟是一个比纽约曼哈顿还要明亮而热烈的地方。

不得不提的是，尤其是近十年来美国赌业的发展和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大力参与“缔造”，是分不开的。

据九十年代的统计，亚洲人，尤其是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居美华

人已经取代了早年间美国德克萨斯州靠石油业发了财的美国人，成为赌城新宠。以拉斯维加斯赌城为例，在当地许多大赌场的前一百名豪赌赌客中，亚裔人士占了 90%。

据不少在赌场做发牌员的人士总结出的经验谈中，亚裔赌客尤其是华、韩裔赌客一向出手大方，而且个个赌性坚强，输了再多的钱也不像其他族裔人士一样把沮丧、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或者开口骂娘。

因此，美国各地赌场在八十年代以来，纷纷把眼光投向华人，在华人社区设立华人部，并聘用能讲中国各种方言的工作人员，以方便沟通。眼光远一点、资金雄厚一点的赌场还长驱直入，把办事处直接设进台湾、香港等地，专司招揽中国豪客去一掷千金。

时至今日，周末一赌已是华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文化。每到周五、周六，去赌场度周末的华人同好或自驾车或乘各华人旅游公司的赌场专车同奔一处。多数旅游公司的赌场专车上还向每位乘车人发送十几二十块钱做垫底的赌资。即便如此，据悉赌场还是会按拉去的人头发给旅游公司人头抽成钱。

在纽约，这方面的情形稍见复杂。由于华人社区与只须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大西洋赌城关系良好且一向密切，因此不少来自台湾、香港至大陆的演艺团体多选择大西洋城的某个赌场做为演出地点，以方便华人既欣赏演艺又满足赌习的双重享受。港台演艺界明星刘德华、郭富城、蔡琴、张学友乃至“波霸”叶子楣等人，都曾是赌城歌台的台上客。

这种寓赌于乐、赌乐同在的消费相对高档，因为一张演出门票钱加上顺手随便赌一把的开销一定在一、二百美元之谱。

大陆方面演出团体确切地说是自 1993 年 10 月 26 日开始涉足大西洋城表演的。始作俑者是于 1993 年秋天来美表演、阵容囊括了国内红歌手蔡国庆以及老牌歌手葛军、程桂兰等人的金陵艺术团。

据主办人士程德元表示，此次筹办过程可用一句后来概况，那则是“做足了功夫”。因为这是由第一个大陆派出在赌场演出的团体，在联系演出时又是由赌场方面承担所有票房风险，因此洽谈之初赌场方面的反应十分勉强。

承办这场演出活动的是大西洋老牌赌场金舫大赌场（SHOWBOAT），程德元在自掏腰包反复与赌场有关人员进膳之后，对方才勉强应允承办。金陵艺术团在赌场的演出共两场，每场票价最贵者为 50 元，最便宜的也要 35 元。两天的演出完毕后，结果连程德元自己也小小地吃惊了一下，每场观众上座率竟达 90%。演出结束后，赚了钱的金舫大赌场有关主管欣喜之余给程德元发来感谢函，为大陆演艺团体今后在赌场主办此类活动埋下美好的伏笔。

程德元在对这次演出活动进行总结时也说，这次活动对他个人来讲虽是亏本买卖，但其意义在于为大陆团今后到赌场演出铺平了道路。

而大陆演出团体进军赌城的成功，对旅居美国的大陆人自己来讲也是个不小的惊奇。从观众来讲，一般而言，来自某地的演艺人员在美献艺主要是靠自该地来美的华侨捧场。比如香港人对叶子楣的热衷程度一定比大陆人来得火热而亲切，而蔡琴的捧场客中又尤以从台湾来的老歌迷为最疯狂，大陆演出团体的演出也同此理。而这次金陵艺术团的演出成功虽显示出仍有太多的大陆人乡情浓厚，但无疑也说明大陆移民已开始继承了老辈华侨在嗜赌方面的衣钵，并且其经济力量已强壮到足以支撑去赌场观剧兼带一赌这种“高

消费”娱乐了。

自 1993 年起，全美的赌场在历经辉煌之后开始走向明显没落。以大西洋赌城为例，在十三家赌场中有七家曾经打过或现在正在打破产官司。而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川普在大西洋城所开的三家赌场中，有两家也参与在打破产官司的行列之中。

川普开办的三家赌场之一的川普城堡赌场在八十年代我刚到美国时正值鼎盛，由于急需在华人内推介，因此成为我的广告客户，在我当时工作的华文周报上向华人社区大做广告。记得我的这个客户当时绝对的财大气粗，其雇用的工作人员也深具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曾派旗下众多的工作人员带着数十媒体记者长驱直入奔赴赌场亲自游历，而且在广告付账方面也绝不用人操心。他们当年在任何媒体上选的都是最贵的大型广告，付钱时毫不拖泥带水。

可惜的是，大西洋已雄风不在，这一点不但可以从赌城内此起彼伏的破产官司中看出，而且也可从当地失业率的回升数字中了解。早在大西洋赌场群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办之前，大西洋城的失业率曾是新泽西州全州年平均失业率的一倍。在历经十多年经由赌场的介入及挽救后，该地区的失业率一度相当低，但自 1993 年开始又重新“大攀升”。在 1993 年，新泽西州平均失业率高达 8.4% 的时候，大西洋赌城周遭地区的失业率又开始成倍数地上升，高达 16.4%，赌场往昔能起到的地域失业平衡功能已经不再。除了去赌场赌之外，美国最普及的赌就要算六合彩了。美国的六合彩干脆就是由政府经营，除了犹他州和夏威夷州外，全美其它的 48 个州中都在搞形式大同小异的此类游戏。这种在美国十分普及的赌博可说是妇孺皆会、个个参与。以纽约的六合彩而言，我在抵纽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一赌项，并在别人的悉心指点下仅花了一分钟就通盘掌握了。

由于在美国六合彩的发售历史上，有许多使濒临绝望的人“一夜致富”的真人实事，因此其在贫穷人群中的受重视程度远比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中来得普及。纽约“六合彩”（NEWYORKLOTTO）的玩法是先向彩票发售处索取填单，玩者任意在其中的五十四个号码中选出六个号码来涂黑，到发售处交钱买下印有自选号码的彩券。纽约的六合彩五毛钱可填一个奖单，玩一回。由于此项赌事普及，彩券发售处是多如牛毛，纽约几乎每一家开在街头的小杂货铺、果菜店中均出售彩券，代售处每卖出一元钱的彩券可以抽取六分钱回扣。

纽约的六合彩每星期三和星期六开奖两次，奖金起点是两百五十万，如无人中奖，奖金则被累积直到有人得中为止。有一天到新泽西州的一个朋友新搬入的家中走动，正在夸说该朋友居处的社区条件优裕、地点绝佳时，朋友紧接着就说“我们这里的确是住着有眼光的人，和我们隔着两排房之外就住着一个中了 LOTTO 的黑人呢。”说着就被他带到两排房子之外的一处住宅外，果真看到那家的门外端端正正地停了一辆新款奔驰跑车。

在全美有由政府经营彩券的 48 个州内，其实太多州的彩券数码不单只是六个号码填充的传统玩法，以纽约州的彩票而言，就多达包括“TAKEFIVE5”、“PICK10”等四、五种名堂，虽稀奇古怪但一样深入人心。

在通常的情况下，官营彩券收入中的三分之二会被充做中彩奖金发给中彩者，其余部分则悉数充顶各州的行政经费。由于美国人对增税问题相当敏感，一提就跳，因此，多少年来，美国的明眼政客宁可用赌金来弥补财政的

不足，也对增税问题三缄其口。

61. 精神不能承受之轻

来美国的第二个星期时第一次见到一个白人在拥挤的人流中独自大声独白时，惊异不止，猛看半天。但同时又看到在独白者身边穿梭不息的人流中几无一人停下脚步看稀奇，就更加惊异。

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几乎每个月都能在街头看到同样的景观，也就不得以被磨炼得“处变不惊”了。

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十分敬重的诗人朋友恰巧就是一个心理医师，有一次长谈之后他诡秘地对我说，他的病人职业广泛，“有的人你也认识。”

我听后大大诧异，追问下去，他又坚不肯说。

1993年，美国各大城市均上映了一部名为《FALLINGDOWN》（沉沦）的影片，曾接连几周获全美票房第一。该片由好莱坞大牌演员麦克·道格拉斯主演，描写一位离了婚的失业白领经不住生活的打击，又被周遭毫无品质可言的人与事刺激，最终由善良走向疯狂。道格拉斯在片中的演技未负盛名，相当的炉火纯青。此片出台时，正是全美经济不景气，各大小公司纷纷裁员正热之时，此片的出现虽遭到多达15个亚裔、西语裔民权团体的示威抗议，认为其中有丑化少数族裔的情节，助长反移民情绪，但此片给美国人留下的真正梦魇是片中主人公真实、贴切的精神变化，这部电影为本来已很动荡的美国民间又注入了对时事的恐怖感。

有一个说法，说是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到美国时对这种说法绝对怀疑，但到了后来，当自己也觉得快被紧张的生活节奏压垮的时候，反倒觉得这个五比一的数字不可信处倒在于它可能偏低。

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也有一段是有关这种生命“不能承受精神之轻”、被主演姜文演得十分传神的戏，那就是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在纽约最无奈、又最无法抑制的时候，一个人冲到PARK大道上著名的华尔道夫饭店门前骂人一场。

《北》剧剧组早在开拍之始就曾表示设计了这一场戏，并宣称将拍出实况。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戏的编剧们果真已对纽约食髓知味了。记得当时私下里还曾就这场戏的拍摄过程和替剧组稍稍地憧憬了一下拍摄现场的状况——姜文尽管当街骂人，周围一个围观者都没有。

剧拍出后，那场戏中果然没人围观。

后来，《北》剧的编剧兼导演郑小龙在纽约与侨界座谈，在对全剧进行回顾时特别提到这场戏，但他的提法和一般纽约人的认知不尽相同。他说，这场戏在拍摄中无人围观一事给他个人留下的感触是美国人不认中国的头牌演员，在中国再家喻户晓的人物，到了美国仍是一介平头百姓。

话说到此，露出剧组众生在纽约生活积累稍嫌不够的马脚。其实，精神病患极为多见的美国街头每天都有无数出这种街头独自骂人的场景出现，类似的这一出又一出，纽约人就像见自来水一样见得太多了。真实的情形是，就纽约州而言，过多流落街头的精神病患者已经在许多社区内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为了克服精神疾病在人们心目中的恐慌，美国精神病患者联盟的纽约州分会已开始着手一项计划，他们选定在纽约市内的皇后区、长岛的纳苏郡以及纽约上州的部分学校先行进行有关对心理疾病的认识课程。根据这项

课程设计，该联盟将向所有指定学校的健康教育教师，提出向儿童解说心理疾病的教学参考。计划中，四年级以上的学童，每年至少应有一堂专门介绍精神性疾病的课程，以期能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用于开发此项教育计划的前期费用是十万美元。

与此同时，鉴于游离在社会间的精神病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纽约州在1993年11月已由州议会及州长葛漠共同通过了一项有关法案。这项据说经过四个月讨价还价才达成的法案决定关闭五家州立精神病医院，减少其它医院的精神病科病床，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照顾州内游走民间的精神病患者。

这是一笔相当数量的费用，据估计在未来五年内这种费用的转换将达两亿一千万美元。

据联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在其一生中，最需要精神护理的阶段是25至44岁正值壮年的时候。这项综合考察了1989至1990年正规医院中的病人求诊记录的调查发现，这一年龄层的美国人占有接受精神病专家咨询者的48.2%。而在其他的病症方面，此一年龄层前往问诊的人只占病人总数的27%。

在就精神问题前往求诊的人群中，45至64岁的人在比率上占了第二位，为31.7%；再其次是15到25岁的人。

其实，在美国谈到的“精神病”一词往往不是一个特指，而是各种轻重不同精神疾病的一个统称。身材健硕的美国人往往是最经受不住精神磨炼的，美国因此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罹患同属于精神疾病的“抑郁症”。

这种疾病的症状是疲劳、失眠、做恶梦、健忘、注意力分散以及体重减轻，在心理上感觉沮丧、失望、做事提不起劲，严重者还可能导致自杀。这种病症说白了就是“情绪低落”，病者中不乏在美国事业有成、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

很多美国人即使是家住郊区独栋大房、开上好车、儿女都上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一家之主却常常陷入不明缘由的“不高兴”情绪中。刚来美国时，我曾和与我一样贫穷的一群中国人坐在一起分析美国人这种通病的发病原因，深深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富裕的美国人在我们眼里应该是最没有负担的人，但在美国时间久了才觉得这种“不高兴”的起因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物质生活已绝对充裕，在道理上已无甚可求所导致的。

这种生活没有目标的美国人十分多见，其中多是生活成功的成年人及家境不俗的青年人。在这一类人面前，生活的轻松使得他们觉得人生乏味。这之中一个颇具意义的事例就是，在全世界都谈爱滋病色变的今天，一些美国人反而开始对爱滋病患者忙碌的生活心生艳羡。一些美国人说，当他们看到一旦他们的某个友人宣布自己得了爱滋病后，立即可以招来各方的关注不说，其生活中也立即充满了为人演讲、给人签名、接受别人的安慰与安慰别人，乃至去各地参加反爱滋病的集会等，生活变得忙碌起来，不由得心生羡慕。一个加州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直露地表示：爱滋病在他看来是一个给人以前进方向的“好病”。旧金山的一名32岁的飞机机械师新近得知自己得了爱滋病，在别人纷纷为他忧虑的时候，他自己却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实际上在暗中一直希望自己得爱滋病，因为那样的话我就生活快乐了，因为我因此就好像得了英雄勋章一样。”

据美联社报道，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指出，抑郁症对美国人的影响和心

脏病一样严重。前者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后者更大。心脏病每年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为四百三十亿美元，而抑郁症一项每年会使得美国损失四百三十七亿美金，这其中包括了医疗费用和生产方面的损失费。研究报告指出，1990年，美国工人因为抑郁而缺勤的共达八千八百万个工作日。缺勤者多在30到40岁这个年龄层。这项研究发现，美国每年花在抑郁症上的治疗费用就达一百四十亿元，由抑郁症导致的自杀行为使得其本人个人收入的损失达七十五亿元，而由抑郁症导致的生产方面的损失更达二百多亿元。

事实上，精神疾病不是美国本地人的享受“专利”，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移民的经验显示，新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子弟进入美国社会后，在文化上是会有一段“文化休克期”的，而且，这个时期因人而异，少则几个月的时间，多则持续一、两年以上。这种休克期如果持续时间过久，必然使人产生心理上的病变，如导致忧郁症、孤僻症及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产生。为了防止亚裔精神病患乃至抑郁症的漫延，在美国各地，有关的亚裔医疗界及相关人士还特别组织有精神健康防制社团，纽约的这类社团名字就叫“纽约亚美精神健康联盟”。

为给越来越多存在心理障碍者提供方便的服务，全美第一条24小时心理咨询服务热线于1993年年底正式接通使用，试用期的收费标准是每分钟一块九毛九分钱，但正式使用时的收费为每小时三块三毛九分钱。这条热线的接听人员为三百名有正式执照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人员和婚姻家庭问题治疗师，他们的平均相关工作年龄达十七年。热线主持人认为这一举动是为民解忧的一项重要举措，因为在市面上，一次面对面的心理治疗一般收费标准为一次五十元到一百元之间，而一次电话咨询的平均时间大约为十五分钟，收费锐降。

为了抵挡精神疾病泛滥这一美国社会的洪水猛兽，美国的有关人士甚至提出建立专门的精神保险，使有各种精神疾病的人能够尽早接受治疗。但在美国患上精神病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坏事，一些犯有恶罪的人一旦被诉上法庭，其辩护律师十有八九会首先千方百计地证明案犯心理不健全或患有心理疾病，以为事主开脱责任。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在80年代及90年代均有出现。80年代的这类案件按著名程度首推八十年代初刺杀时任总统里根的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案。当时，虽然有数千万美国民众反复观看过这一刺杀未遂案的录影带，但辛克利最终还是因为心神丧失（INSANITY）原因而告获判无罪。自那之后，美国的司法界开始对心神丧失理由获辩成功案予以高度重视，不少人认为犯罪份子能以这种理由逃避刑责是美国刑事法的一大漏洞。但在1994年，仍有人在一项全美瞩目的大案中因为心神丧失原因而豁免刑责被判无罪。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华盛顿近郊的妇女洛林娜·巴比特割掉其丈夫生殖器案件，此案相信是以这类理由为开脱原由的最后判例。

自辛克利案案发后十多年来，在司法界有关人士的呼吁及促成之下，美国许多州陆续通过了“心神丧失但有罪责”（GUILTY BUT INSANE）法律，希望使精神失常的犯罪者在恢复正常之后入狱服刑。如果说十几年前辛克利能以逃脱刑责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法律不健全所致，但到了十几年后的1994年，洛林娜同样得以延用这一原因开脱，则成功的原因大半要归于“地利”，因为洛林娜案发生地属维吉尼亚州管辖，该州在法律上是尚有所谓“临时心神丧失”条例的。而如果此案的案发地稍微有所挪错，进入华盛顿特区，该区内是没有可依“临时心神丧失”而免除法律刑则规定的，那么洛林娜一

定在劫难逃。

62. 法力无边的美国新闻业

在美国从事新闻业可以说是件艰辛而不那么发财的事。

在中国记者可以为新闻采访而大拿红包的同时，美国的新闻记者为了采访往往需要倒付给当事人一笔钱，才能如了自己的采访愿。

而且美国稍有新闻价值的人都是相当会利用自己的价值去挣这种新闻钱的，而且一开口就不是小数，动辄数十万。

美国的记者除非熬成“腕”了之后才有可能发财，不然的话就只有凭借理想和追求来填充钱上的不足了。

比如说一个著名电视网的重要新闻主持人的年薪可能高达一百多万，但一般报纸中小记者的年薪可能才只有两万多一点。不是“腕”的、即使是《时代》（《TIME》）杂志社的记者起薪也只是两、三万。

也是如此，从商业角度讲，美国新闻业的竞争可以说丝毫不比生意场上的竞争小，但所得却永远不如生意场来得壮观。甚至于美国新闻业界最高奖励普利策奖（PULITZERPRIZE）的奖金也仅为区区三千美元。

大多数美国新闻记者们剩下的就只是心中永存的新闻理念了。

初来美国看到美国的报纸，对其版面之多吃惊不小。在国内看惯了四个版一张的标准中国报纸，到美国之后面对报纸版面的汪洋，时常手足无措地不知该从哪儿看起才好，感觉奇特。庞大的美国报纸群按每日出刊时间不同还有晨、晚报的细分。实际上，美国由于广播电视业的发达，对于一般的新闻，民众都是经由广播电视尤其是广播中的报道得知的。美国的广播电视业对大型新闻的报道往往是即出即报，报纸由于受限于出刊时间，面对广播电视的“及时”也只能是兴叹，但多年的磨炼已使美国的报纸记者采写新闻时往往侧重详尽和多侧面的报道，以弥补报纸出刊时间上的遗憾。

美国报纸的版面分工极细，报纸的广告业也十分发达，因此，即使是一般的地区小报报纸版面也都至少在十个版以上，而正规一点的大报则更是动辄在五、六十个版以上。美国的报纸印刷页中会有无数广告，而且往往全版广告一登就是十几个版，平均而言广告要占到报纸容量的60%以上。

由于美国新闻业发达，美国媒体广告定价也高得听上去有些离谱，以声名遐迩的《时代》杂志而言，其全页广告每次的价格竟在50万美元之谱。美国报纸到90年代初，全年的报纸广告收入已达三百亿美元之上，如若加上其他种类媒体广告的营业额，广告总额将超过一千亿美元。美国的报纸到了周末的星期刊在页数上更是离谱，页数常多达二、三百页。以《纽约时报》的星期刊而言，其重量就在四磅之上。星期刊中不但有适于周末闲读的大块文章，甚至还有供人剪下来到各商店中享受折扣优待的折扣券，美国的一些有闲穷人会认真地花上几个小时来剪下这些折扣券，分别在日后的购物过程中陆续使用。

美国的报业全年消耗新闻纸重量在千万吨以上。全美的报刊中周报有七千余家，日报则超过一千五百家，仅日报的总发行量就达六千万份，拥有至少1.2亿个读者。美国人习惯随身携带报纸以便翻读，但美国的报纸重量已非每个人所能随身负荷，堪称负担，因此，太多的美国人每天买到报纸后，只检出其中自己感兴趣的若干版带在身上细读，其余的通通就地扔掉。

美国的新闻媒体权限无边，可载舟也可覆舟。美国的记者外出采访一般不凭各新闻媒介自己下发的“工作证”，采访时凭的只是一张警局发下的记

者通行证明。这种东西的掌握完全控制在警局手中，新闻传媒每年为自己公司内的新闻从业人员集体申请一次。

历经多年的演变，舆论界之于美国早已发展成为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之外制衡时事的“第四权”。当代，尤其在美国新闻业日趋完备之后，回顾以往，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与新闻界的纠葛都可圈可点。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爆发期间与新闻界出现的不睦就十分著名。尼克松与新闻界的不睦其实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其担任国会议员时就曾埋下伏笔，他在位时时常将美国政治风波的横生枝节与政界丑闻的出现归咎于新闻界的“无中生有”和“推波助澜”。主政后，他对新闻界的痛恨更加暴露，他不但多次与记者发生公开冲突，闹到高潮时，他甚至屈尊与记者互相叫骂。

也正是自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新闻界与政界的关系更加趋于紧张，但彼此又都必须相互依存，双方的关系陷入爱恨交加的微妙之中。

尽管美国新闻界在炒作生事方面确有一套，但美国政治史上，政魁拿新闻界当替罪羊而不敢自己承担责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传统。此两者在行动上虽都有自己方面的“可恶之处”，其在运作上相互制肘时却是不少美国人所乐见的。

在此之中，白宫记者会就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十分绝妙事情。

美国自小罗斯福担任总统就开始了在白宫开新闻发布会的习俗，但在其任内召开的记者会多是形式不拘的谈话。小罗斯福往往被记者们团团围在中间热火朝天地进行国政阐述，当时的情景虽不具有当今美国白宫记者会的气派及规则，却为美国总统直接接受新闻界的联合质询开了不俗的先例。

随后就位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也都是如法炮制。

到六十年代，年青的肯尼迪进入白宫之后，白宫记者会才有了大规模的变化。自那时开始，白宫记者会有了记者可以自由发问而无需事先呈交提问提纲、记者会可以经山电视实况转播的规矩。自那时迄今的几十年来，华盛顿已经成为美国新闻来源重镇，共有三千多名各媒体的特派员驻守，白宫记者会也成为美国不见文字框定的“政治体制之一”，其对不少总统的宦海沉浮起了无以替代的影响和冲击，成为美国总统在民众面前曝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总统在这种场合中的临场表现也十分重要地决定着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这样一个机会同时也给了美国总统抨击新闻界的另一种意外的“场合”，在这种时候，新闻界往往由于自身的职业性质原因，硬着头皮予以报道。

另外一些有关“第四权”制时的著名事例以发生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菲尔（WILLIAMSAFIRE）身上的事为最典型。沙菲尔六十年代曾任尼克松的幕僚，后来转赴新闻界。其在《纽约时报》开辟的专栏在1978年曾因揭发时任总统卡特的亲信蓝斯在财务上的某些不当使得蓝斯不得不辞去预算局长的职务。沙菲尔因此获得了当年的普立策奖，相当轰动。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国防部长亚斯平（LESASPIN）声请辞职后，提名原海军上将殷曼（BOBBYRAYINMAN）为继任人。但就在白宫上下都认为此提名料将无任何大妨碍地获得通过，参议院也已排定听证日期的同时，又是沙菲尔在自己的专栏上指责殷曼在主政能力、性格操守上均不能胜任此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克林顿时殷曼的提名将可能是其提出的最差劲的任命案。由此文而带起的一片椰榆及指责，使得殷曼赶紧声明自请总统撤消提名。虽然外界在对其求去的真正动机上有各种不同的揣测，比如其虽雇用家务助理，却未依法报

税等问题，但至少公众面前，殷曼对自己请辞的公开说法是“因为受不了沙菲尔等人的批评”，他指责对他而来的这一切简直是“现代麦卡锡主义”。

这对沙菲尔及他的职业而言，几乎就是莫大荣耀。

多年发展下来，美国传媒的另一项丰功伟业是其不但进行新闻报道，而且还是美国民意测验的急先锋。

比如，美国最早的民意调查就是由 1824 年美国报纸所办的“稻草票”（STRAWVOTES）开风气之先的。那时的民意测验是列出政党提名的候选人，由读者进行非正式投票，以确定选民对候选人的初步意见。到了 1900 年，这种“稻草票”的玩艺已经非常流行，成为许多报纸在大选前必于的营生。经过十几年的优胜劣汰，到了 1916 年至 1936 年间，美国的民意测验几乎让当时在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文学文摘》（《LITERARYDIGEST》）包办，其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对美国总统竞选预测大都极准。但天有不测风云，在 1936 年其对当年总统获选人预测时结果却与选举结果相去甚远，除了其预测能高票当选的共和党人阿福德，蓝登（ALFREDLANDON）落选外，而且其得票率与民意测验的结果也相差了 20 个百分点。《文学文摘》因而伤了元气，从此无颜再举办类似的东西，而这也是美国报业举办民意测验历史中最著名的一次失败。

美国现今著名的盖洛普（GALLUP）民意研究所、《财富》（《FORTUNE》）杂志及克拉斯里调查（GROSSLEYPOLL）的崛起也正是在《文学文摘》的惨败期间，于当年创办的。

63. 美国华文报业发展回顾

在美国的华文媒体比中国人坐在中国想象之中的要多，要更发达。

人在中国，根本无法想到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与其发行地域的民生民需有着多么大的关系。以纽约华人社区而言，在几个华人聚集地区，充其量也只有数千户华人的生意运转，而这数千个“门坎”也就成为众多华文媒体为寻求广告而轮番进攻不止的阵地。在这么小的周转余地中，社区与报纸已不很分得清了。

美国的华文媒体中分新闻记者和工商记者两种，工商记者的职责是写当地工商新闻及跑广告，而新闻记者的工作才和国内普通意义上的记者概念相同。

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做的多是小本营生，因此，一般规模的新闻机构中的记者也是要兼做广告的，而这也使得华文媒体的言论更难于做到公正、客观了。

于是，华文媒体与华人社会的纠葛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搞不清楚了。

多年来，美国几个华人聚居大都市的华文新闻市场历来是港、台乃至大陆各路背景的各路报人必争之地。十几年来，各路人马来来走走一派繁忙。

发展到巅峰时期，以纽约为例，地区内本地印刷出版的华文报章杂志多达十多种。这些出版物除几份大型日报及杂志标价出售外，其余的周报及娱乐性杂志大致上均以免费发送为主要发行途径。如此一来，形成的局面是，报纸和社区经济及变革成为同出一脉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种情势下，每到周末，左右方圆出不了十几条街的报摊乃至华人超级市场，均放有大批各种名目的中文报刊杂志待人拿取。

早年间在华人社区办报，对办报人来讲，财力、专业人手乃至读者都十分匮乏。那个时候，中文报纸剪贴港台报纸上的文字与图片拼凑出版付印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消息来源方面，即便是相对大型的报纸也基本上采用翻译当地英文报消息的办法，其本身大都没有直接的电讯来源。

华文报业进入佳境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进入八十年代，除社区小型周报及周刊外，美国的华文媒体渐渐发展成几乎家家都订用了国际性通讯社的电讯及传真照片，有的更使用了人造卫星传版设备，个别的华文媒体由于财力雄厚，其在设备上的先进程度可与世界一流的报纸相提并论。

直到这时，华文报纸在美国的一片天下才算真正打开。

自 80 年代中期至今，美国的华文报业形成了以来自台湾报人王惕吾麾下联合报系的美国《世界日报》为大的局面。该报创刊于 1976 年 2 月 12 日，创刊之初纽约版和旧金山版每日出报三大张计 12 版，每周出报 6 天，星期天无报，据《世界日报》社社长马克任回忆：“创刊之初，我们每天渴切地拆阅来信，希望信里面装的是订报单，我们就是那样每天十几份、几十份、上百份，在不断的辛苦中增加发行量。”

1980 年 7 月纽约《世界日报》总社在法拉盛自购了一幢办公楼宇，到 1982 年时，该报已达每天出报 32 至 42 页的规模，发行范围也从全美各地华埠推广至全美许多边远城镇及加拿大的不少地区。

到了 1984 年 3 月，《世界日报》开始一周出报 7 天，及至 1993 年，该报又改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节假日每天出报。如今的《世界日报》绝对已成为北美地区头号华文报纸，每天出版四套报，达八十多个版，每套报纸的头版及底版均套色。

创刊之初的头几年，《世界日报》的言论相当偏激，对来自大陆的情、事、人除非其中途改念投奔台湾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者外，余者几乎一概痛予贬损，时常做些设立中国大陆同胞投奔自由基金会等呼吁。该报早年的社论绝对荒唐，社区内几乎每出一件不得人心事，该报因为有倾而显得相当幼稚的社论必鼓噪舆论，言明应查清肇事者是否是来自大陆的赤贫。

在海外办报，检测一份报纸的发行是否普及，看社论是测不出名堂的，行内人往往多从分类广告的篇幅着眼。因为这种广告来自平头民众，多是百姓卖房、租房、招工乃至小型服务的媒介，最能体现一份报纸的真实阅读人数，同时也是测量报纸在民众间口碑的一个途径。

1993年时我曾在前述《世界日报》上刊登一则面积最小、价格只在几十元之间的分类广告，预备将家中剩下的一点早年间从台湾进的百余盒新娘头饰剩货卖掉。广告被预知该刊登的那天早上，我把该报上分类广告栏看了几个来回都没有发现我的广告，正说是下午要给该报打电话抱怨一气时，不期然中午就接到了一通要货的电话。

直到我帮着要货人把剩货搬到他的车上装好，我都没敢问他我的广告究竟被放在了报纸的什么地方。后来多想了一下觉得追问已毫无意义，但无论如何对中文报纸分类广告的功效感佩有加。

在海外办报最忌财政窘迫，因为这种“窘迫”足以使整个报纸因为不得不去媚金而丧失报格；但如若有钱，报纸越办越有规模则又是不算稀奇的事了。报纸也是一个标准的工业，没有坚强的后盾是难以为继的。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的新闻机构不得由外国政府出资资助创办，但华人社区中的大型华文媒体鲜少能够免俗。对于《世界日报》，传说中其与台湾国民党“渊源深厚”，但究竟如何，各种说法中并没有什么实例。《世界日报》十多年来的昌盛与其言论的逐渐趋向中立固然有关，但与其财大气粗似乎也更有关系。该报老板王惕吾据传有钱非凡，连唐人街内常年与《世界日报》为敌的一些报章，对其财富也是无言可讽，提起王氏通篇以“身家连城”描绘。1993年9月中国第七届全运会上，辽宁女将王军霞在万米长跑赛中破了世界记录四十多秒，王惕吾一兴奋即刻放风奖赏王军霞两万美元；紧接着，辽宁女将曲云霞又在一千五百米比赛中再度打破世界记录，王惕吾又一高兴，也扬言要给曲云霞两万美元。

在美国学新闻的中国人出路并不太好，由于英文媒体人事竞争激烈，因此，华文媒体就成为华裔新闻学生学成之后的一个重要出路。在华文媒体中，来自美国名校的新闻毕业生不在少数，相比之下，美国报业对华裔所开之门更形狭小。在美国重要的报刊杂志中，华裔的加入事实上鲜有所闻，在早年间，即使是加盟了美国主流报章的华人处境也是未可乐观的。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时代》杂志社任职长达三十年的姜敬宽就是个中例子。

姜敬宽祖籍山东枣阳，1949年赴台，1954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曾在英文的《中国邮报》任国际新闻助理编辑。1960年他获得美国FULBRIGHTFELLOWSHIP奖学金赴美深造，1961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英文系硕士学位，后又获得“亚洲基金会”奖学金，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进修，1962年再获新闻硕士学位。1972年，他在纽约圣约翰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姜敬宽凭借这样的学历在《时代》杂志社仍是从图书资料室资料员、《时代与生活》丛书部编审逐步爬升到目前的《时代》杂志的亚洲新闻编辑。姜敬宽说：早年间单打独斗地进入美国媒体因为英语不是母

语的问题吃了很多亏，而且当时的美国主管在这种问题上也存有想当然的误解。姜氏在这种吃亏的环境下努力往往过份感到“时事弄人”，在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一耗就是十年。

近十几年来，由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比重迅速增大，因此各媒体对各族裔的报道及在人员配备上也开始有所顾及。仍以《时代》杂志为例，近年来该杂志陆续接纳了两位有华裔血统的专业人士，一位是具有华菲双重血统的资深编辑 HOWARIDCHUA；另一位则是香港出生的华裔女记者 SINTINGLAI。

而于九十年代初加盟《纽约每日新闻报》（《NEWYORKDAILYNEWS》）的华裔女记者陈婉莹可说是在纽约英文媒体中相当活跃的一位，她与华人社区的熟悉程度也是几乎任何一位英文媒体记者所不及的。在九十年代初震动了全美的华人偷渡热潮中，陈婉莹经过在大洋两岸的周密走访之后所做的有关偷渡者从源起直到结果的全面报道，曾轰动一时。

64. 打开电视机

在美国的家庭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主妇，但有一个现象几乎是家家都发生的，那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家庭中的子女放学回来，书包一丢就躺在地毯上看电视。尤其是卡通频道，更成为美国儿童每天必不可少的“要件”。

据知，早自八十年代，美国家庭的电视机平均每天至少要开四个小时以上，成为儿童们成长时期最熟悉的东西。儿童们长到五岁以后，更是每天平均要看上五、六个小时以上的电视节目

目，这个据称已是保守的估计数字往往与儿童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不相上下。

住在美国几年来，每次到我的几个有孩子的朋友家中作客，印象最深的就是该家中的小孩无一例外旁若无人地把电视卡通频道的声音开得响声震天，那种由尖细声音组成的吵闹不堪，让人心乱如麻。

电视文化在当今美国家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电视工业对美国人的影响力，实在是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美国民众对电视的依赖已经达到空前地步。由于美国的电费相对不贵，因此，处于永远开播状态的电视机在美国家庭中比比皆是。

在美国的几年中，我也渐渐染上了这一美国病。比如说，我每天早上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机在 NY1 这一台上看时时刻刻显示在荧光屏左下角的室外温度情况，以决定穿什么衣服。然后我就把电视转到 VHI 这一台，看这一台每天 24 小时播出的世界各类通俗歌手的 MTV、艺术展示及艺术家专访的早上时段。

刚到美国，对美国电视工业的发达十分吃惊。美国有上千家电视台，内中还有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之分。区别是商业电视台的广告收益惊人，其广告收益占全美电视广告收益的 95% 左右，而公共电视台的此项数字则仅为 5% 左右，是基本上不做广告的。因此，在美国看电视往往无法仔细阅读电视节目详细预告，常常是电视一开，出现什么就是什么。比如在纽约，如果加上有线电视频道的话，每天会有多达六、七十个频道播出节目。在这些频道中，除全美著名的三大电视网之外，还有全天都是新闻节目的频道、全天都是卡通节目的频道、全天都是动物节目的频道、全天都是战争及历史类题材影片的频道乃至全天都是电影老片的频道等。这些主流电视节目之外还有各族裔租用的频道，每天播出自己民族语言的电视节目。

因为美国的电视工业过于发达，因此，美国政府不但早已开始限制办台数量，而且对电视节目中的广告时数也做有严格的规定。忽略了电视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及教育力，无疑是要吃亏的。

在这方面，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就闹出过令其心惊胆战的事情来。

1992 年 5 月 19 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奎尔在前往旧金山进行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指责一部当时在美国极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莫菲布朗》（《MURPHYBROWN》）美化了独身母亲的形象，影响了社会风气，他认为独身母亲的出现是社会无法无天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导因之一。

奎尔此言即出，全美大哗。

当时，这部电视剧正在连续放映中，由三大电视网之一 CBS 播出。剧中的女主人公莫菲布朗由在美国十分受欢迎的女星康迪斯·培根（CANDICEBERQEN）担任，剧中的女主角是一个十分能干的电视女记者，性格

坚强。在奎尔公开指摘的时段内，她在剧中未婚先孕，而胎儿的父亲身份不详。最后女主角顺利产子，她的同事和朋友皆大欢喜。

奎尔的原意其实不外是要呼吁建立家庭价值观，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这种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他不甚选了一个“错误的例子”，亦即他不谨慎地错用了一个民众喜爱的电视形象，结果遭到全美无数新闻评论员、专栏作家乃至脱口秀主持人一类谐星的一致揶揄。而当共和党人士注意到《莫菲布朗》在季末的一集中竟有三千八百万人收看时，不由得为这些选票有可能因此而流失暗自担忧起来。

如果说《莫菲布朗》在全美是一枚影响民众观念的炸弹，那么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著名的赖利·金（LARRY KING）访谈节目则更是了得，干脆就是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科技各行业的风向标。在赖利·金的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高级官员、采访的外国政要、本国名流、作家、演艺人员直至著名医生等，均是座上被访之客。

赖利·金在广播电视界 37 年，目前每周都在 CNN 主持一小时访谈节目，并在现场接受观众用电话提出的问题。据报道，CNN 的访谈节目有一百万人收看，全球有二百个国家的一亿四千万个家庭收看。赖利·金每天并且为联合电台制作三小时的节目，有四百家电视台播出。除此之外，他每月还有两次演讲，每场索价五万元。

在 1992 年，赖利·金的节目更是了得，在一年中他好似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主持人。他不但全面地介入选举、采访有关竞选人，并在节目中主持了多场有关的辩论。1992 年出来搅局的总统竞选人、德州富豪罗丝·裴洛（ROSS PEROT）其实就是在赖利·金的节目上宣布竞选的。

到了 1993 年，新任总统克林顿及夫人又分别上了这个节目，然后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好莱坞最当红的性感影星莎朗·史东、篮球好手麦克·乔丹，再然后是落选的裴洛与副总统高尔两人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举行电视辩论。

裴洛和高尔的这次电视辩论所起到的作用几乎就是导致这一协定在众议院中走向通过的里程碑。在此次胜利中，白宫对传播媒体的应用可说是恰到好处。在众议院对此一协定投票表决前最后的一个星期里，克林顿在美国 NBC 的电视节目中公开谴责劳工领袖对北美贸易协定的反对。紧接着，口材一向被人不看好的副总统高尔冒险指名向反对这一协定最力的前总统竞选人罗丝·裴洛挑战，双方在赖利·金的节目中进行电视辩论。这场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裴洛会赢的电视辩论以相反的结果告终。

而高尔的这场辩论胜利也为协定的通过提供了先兆，使得协定在未来的日子里气势如虹一气呵成地获得通过。裴洛方面由于在此次电视辩论中发挥失误，被美国评论界宣布将可能进入政治生涯的完结期。

对此，加州日裔众议员松井有一句十分贴切的形容，那即是：“电视辩论后，水坝崩塌。”

1994 年才一开始，克林顿又重做冯妇，在赖利·金的节目中畅谈任职一年感言。克林顿在这一节目上第一次表示：美国总统提出的政府官员任命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程序越来越繁琐复杂，因此，他将要求两党检讨这一程序。

一个区区电视访谈节目能左右国家大局至此，该是美国这一特定社会中的特定景观吧。

其实，电视依中国人概念中是一个贵重“大件”，但在美国实在不算什么。美国人对电器的更新如同儿戏，一家之中往往有少则一台多则五、六台电视，看时各选各的，互不干扰。在美国，一个不太讲究的电视机往往百十块钱就可买到，即使是中国人眼下相当崇敬的二十五英寸以上的大型名牌彩电，价钱也不过在四、五百元之间，再穷的美国人也是能够买得起一个电视和放相机的。如果还想省钱的话也可以到街头去捡一台电视机回来。当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住进了纽约长岛，剧组的人一到纽约就捡到一台硕大电视机，抬回去后放在借用的中国五矿在长岛的公房中，图象质量仍不算太差。该电视陪同剧组的所有人等昼夜“伺候”，几个月下来不但从没麻烦，还一本正经地入了戏，充当发了迹的郭燕舅妈家的一宗摆设。。

与此相互呼应，美国的录像带租赁业十分发达，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型街区内不具备一两家录像带店的，太多美国穷人周末的重要娱乐就是从街上租借录影带来全家观赏。美国的电影票相对昂贵，每人每场电影的门票钱大约是6到7块钱左右，至于其它的演艺节目票价更是起码在15元以上，相比而言，每晚租金仅两、三元而且不限制收看人数的录像带租借活动十分普遍。

为了保障电影发行作业中各环节的利润，美国的有关制度规定一般影片在上映后全美的录像带市场六个月内不能制作，凡盗录翻拍者一律受到FBI参与的追究行动。

美国的华人社区中录像带租赁店也十分发达，但由于客源有限而且盗版盛行，因此每盘录像带的租价十分低廉，客人可花一块钱租一盘带子看上一个星期。在九十年代以前，华人社区内基本上只有来自港台的电影、电视片的录像。租赁店内采用会员制，客人在交够50或100元钱后就可以自由借阅。九十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多，而且大陆电影、电视的整体质量有所提高，因此大陆录像带生意开始兴旺。这种录像带店的店主与大陆的不乏电视台等机构关系密切，对大陆影视状况反应灵敏，通常是一个大陆电视综艺节目一经上演，一个多月后在美国的华人录像带店中一定也会出现。至于大陆每年一度的重要节目“春节联欢晚会”等，在美国的华人录像带店及中文电视台往往能拿到联欢会彩排的录相，经由时差的调整，美国华人也可以在除夕看上联欢会的节目。

多少年来，在美国电视界，华人能够进入主流的人实在是风毛麟角。最著名的莫过于均为美国出生的宗毓华（CONNIECHUNG）和董凯悌（KAITYTONG）了。这二位女电视主播中又以宗毓华为名气最大。

宗氏长相端庄，现年四十七岁，早年间进入华盛顿WTTG电视台以做电后接线员为职，后由于手眼勤快，跳槽到了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NBC台，从地方记者等职逐步爬升至重要主播的位置。1989年，她又跳槽到了三大电视网之一的CBS台主持名人专访节目，年薪高达百万元以上。1993年6月她被升为该台最重要的“晚间新闻”主播，和美国另一最负盛名的“晚间新闻”白人男主播丹拉瑟平起平坐。

宗毓华获选主持晚间新闻的报道曾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因为此一改变，打破了美国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几乎全部是由白人男性把持天下的局面。她也是继美国家喻户晓、最负盛名的女主播芭拉·华特丝之后第二个有幸问鼎此职位的女性。

从事电视工作二十四年来，宗毓华“从无到有”，曾荣获1974年美国十

大杰出妇女名衔，成为美国人口中的“康妮（宗毓华的英文名）奇迹”。她与美国人波维奇恋爱八年最终结婚，一直与华人社区鲜少联络，而这也引起不少侨界社区人士的微辞。华埠的一个大型社团有一年颁发风云人物奖，其中就有宗毓华，可直到颁奖典礼开过都没见到宗氏出面，弄得大家很没面子。在这之后，就甚少有华人社团先入为主地把宗氏自说自话地列入“很中国”的圈子里了，不大敢妄动。

而另一华裔女主播董凯悌的命运却没有宗毓华好。董氏生于1950年，毕业于史坦福大学，1982年进入美国三大电视网中ABC台，并在WABC（ABC的纽约地方台）任最重要的晚间新闻主播多年。此节目虽比宗毓华的全国收视差之千里，但她在纽约地区则是无人不知。她与纽约华人社区关系甚好，社区内的不少大小集会都能看到她的出现。

九十年代初，董凯悌与ABC的合约期满，双方磋商之后未能达成很好的新交易，董氏最终竟失去了在WABC的职位。消息传出后，纽约不少华人曾多次前往ABC台门口示威，高喊“我们要凯悌”，但奈何ABC当局一片铁心不肯就范，董凯悌只好改弦更张转去收视率更差的纽约十一频道主持新闻去了。

在美国NBC电视网芝加哥台任新闻主播的还有一位华裔女主播余莲黛（LINDAYV），她于1979年进入美国新闻界，先担任记者，后任新闻主播。但由于芝城虽历史悠久，毕竟不太算文化重镇，因此她的声名远逊于前述两位。生于旧金山的余莲黛曾发起成立过亚裔美国人新闻记者协会。

65. 影视暴力

不夸张地说，在目前的美国影视界，有谁能想出一个奇特的死法搬到银幕上去，或有谁能想出几种出人意料的人与人追杀办法，那则一定至少保住了在美国青少年中的基本票房。美国这一年龄层观众品味的低俗和电影业界对票房的计较，造成了美国影视产品中出现令人越来越担忧的超级暴力倾向。

我到美国后在电影院看电影每次都会被美国编导们能想出可能在人类中出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死法表示由衷佩服。凭良心讲，美国“日常”影片之中滥片极多，要想找到一部高品质的片子难乎其难。美国的电影院常常设有四、五间小型放映室放映不同的电影，按规定，一张电影票的持票人只能看一场电影，但是由于大部分电影院内无人专司查看有无“串间”之职，不少脑筋灵活的人就一口气看遍电影院内的所有电影。美国电影院内常常是同在放映的几部片子中片片杀声震天，弄得胆小如我者实在不知该进哪一个门才好。

记得年前看到美国的惊险片《THE SILENT OF THE LAMB》（港台译成《羔羊无语》）之前并没有做好参观“凶杀大观”的心理准备，一旦看到此片在我看来无以伦比的凶杀手段及死亡镜头时，直被吓得久久无话，几天过后每想起来还不免惊出一身颤抖。

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影视产品干脆还起着社会治安恶化的催化剂作用，与美国色情电影院中常有妓女在银幕下暗地拉客或是观众中有人当众自我“操练”一番的心态相类似，报章中常常也有发生在惊险片电影院银幕之下的驳火案件报道，美国电影的功能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它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了。

以1993年美国片中的几个票房佼佼者而言，排名在前三名的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玩艺。

1993年，美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了四十九亿八千万元，成为近几年来业界成绩最显赫的一年。此一数字不但比1992年高出7%，更创下了超过1990年创下票房巅峰数字的1%。

在1993年年内，美国卖座最好的电影是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柏格的所谓儿童片《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此部用大量篇幅描写幻想中的恐龙对儿童肆无忌惮侵略、被恐龙“追吃”的片子创下了惊人的票房记录，单部影片美国境内票房收入高达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这部片子的票房同时也几乎是1993年票房名列第二名《逃亡者》（《FUGITIVE》）总票房的两倍。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如此可观的儿童影片的票房收入中，并没有包括史蒂芬·斯皮尔柏格自己子女的门票钱，他在这部电影才上市之初就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不打算让自己的子女们看这部片子，“因为很不适宜”。

名列第二名的《逃亡者》虽没有《侏罗纪公园》那么凶神恶煞，但是影片也是以凶杀案开头的。开头之后，满篇都是一个被冤枉的逃犯如何在各种险境下摆脱警察的追杀，而他的同事又如何地为了一己之利而杀人不眨眼。

名列第三的是《律师楼》（《THE FIRM》），此片的主题是一个才出校门的法学院学生在误入一个待遇优厚而于违法勾当的律师楼后，如何明白觉悟而摆脱出来的。片中也充满人物离奇死亡和歹徒与正义者险象环生地追杀情节。

几部片子的内容不同但却在手法上“殊途同归”，一概不能少了“追吃”、“追杀”。美国电影工作者和美国青少年观众的情趣的相互扶托，已经把美国观众鉴赏人类相残的水平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而发生在电视方面的事情比这还糟。

美国的一位为影视暴力而忧心忡忡的参议员杜根在对 1993 年 9 月 28 日到 10 月 4 日普普通通的一个星期内所做的调查发现，美国电视观众经由主要电视网和有线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中，平均每周看到一千次以上的暴力镜头。这项调查对象包括了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国家广播公司（NBC）以及数家有线电视频道。事实上，这项调查的范围并不广泛，只包括了晚间节目及周六早上的卡通节目。

我的一位朋友说，在他们的孩子成长成人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不放心电视节目了。他说他的一个十五岁、在美国出生的儿子每天晚上工作就是拿着电视遥控器在电视中找“打仗频道”，而且他的儿子每个晚上都能如愿，在数十个频道中，不是 A 频道在“打”就是 B 频道在 A 频道打过之后继续又“打”，而且有时干脆就有三、四个频道都在很精彩地打，每到这种时候，他的儿子就把家中的几台电视机占满，自己把着一台观瞻，另外的几台一并代其录下其它“打”的节目。他说他儿子多年的打斗电视生涯下来已对各种武器的外形了如直掌，稔熟各种犯罪法律。因此，每当提到美国电视，这位老兄就会满脸不高兴，说是美国的暴力教育已经发展到防不胜防的地步。他甚至愤愤地说，如果他的儿子哪天因持械犯罪触犯刑律而被关起来，他一定状告他家中所有可以收到的电视节目所属的电视台，告诉理由就是这些台妨碍了他们一家的美满生活。

不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在美国民间，民众对电视暴力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有无比广泛的抱怨。在 1993 年 10 月盖洛普的一份民意调查中，美国民众对电视暴力渲染也是坐卧不宁，把此列为导致青少年犯罪诱因中的第四位（68%）。其它排在前三位的是家庭缺少道德教育（97%）、法院及监狱过于拥挤以致于欠缺应有的惩戒（83%）及学校教育品质低落（77%）。

迄今为止，美国出现过太多青少年为了模仿电影或电视中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真形”。去年，美国曾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拿出家中父母的手枪，对着来串门的与其同龄的一个孩子的眼睛开了枪。事后，他在回答讯问时说他的这种举动是从前一晚上的电视节目中学来的。

美国的电视暴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九十年代初终于首先激火了全社会，自 1993 年起，全美广泛地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从而也成为克林顿政府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的重点。在具体行动方面，美国国会及司法部长雷诺曾威胁说：如果电视业者们再不自动限制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凶杀及伤害镜头的话，美国将正式制定有关法规，强令加以限制。在雷诺的支持下，美国民间甚至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电视暴力公民专案小组”的组织，此小组成员网罗了美国医学会、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全美家长协会、全美教会协会、全美学区委员会协会等有关组织参与，就此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一向举止感性、与好莱坞感情不错的总统克林顿在 1993 年底也开始激动地呼吁好莱坞减少暴力描写，转为更加留心流行文化对于失业及缺少家庭温暖的青年们的影响。

迫于各界压力，在 1993 年，全美三大电视网 ABC、NBC、CBS 以及 FOX 公司，在 7 月份同意在播出有暴力场面的节目前先播放警告字句。与此同时，

有线电视公司也已拟定了新的节目分级制度，并聘请立场超然的监督人员来定期评价播出的节目。这项计划提出了采用新科技造成的V晶片使得定户在安装之后能够自动去除电视上含有暴力级别密码的暴力节目的设想。此一举措使得美国继限制色情方面之后，又开始了一项重大的新限制。

66. 万卷美国书

在美国的前两年，一来由于经济窘迫，二来因为根本没有看书的时间，也就几乎和书断了来往。

那几年中，我手边仅有的只是不超过五本的小型英文读本，再就是一个英汉辞典及一个汉语辞典。

那几年，紧张而不读书的日子过得飞快，每天关切的只是银行中私人户头中的存款数目，再就是每周一出的报纸上，自己的稿子是否被打字小姐又打出了笑话。

这么着，没有书的日子一晃就是好一阵。

在我的感觉中，美国的所有东西中最贵的品种是书。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我有兴趣在这里故作风雅，实在是到美国之后，最让我不敢问津的就是书店。

在美国，书之于一般人的概念实在是一种奢侈品。一本书在看过之后基本上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对其进行保留好比对钱进行保留一样，不是十分狂热的爱书之人一般是不会想到拿自己的辛苦钱去买书的。

美国的书包装精致、用纸考究，书的封面大都采用极厚的硬版包以铜版纸封皮，使人看上去觉得相当受用。一些读来轻松的书纸质地也十分有特色，可能是为了便于携带的缘故，这种书拿在手里竟是一派轻柔。

美国一般书的书价大都在十元、二十元不等，一些教科书一类的专用书籍往往要卖到每本五、六十元。也正如此，在大学中，经济不富裕的学生往往在上完一年学后，赶紧把自己的教科书在学校内贱卖掉，或者卖到旧书收购处去。美国因此也有着不少卖旧书的地方，不但有单独的旧书店，甚至在有名的大型书店中也设有旧书部，售卖旧书。

和中国演员刘晓庆 1993 年在深圳文槁拍卖会上被传已把尚只有腹稿的自传体文稿《从女明星到亿万富姐》以一百来万的天价卖出的事情异曲同工，泰半美国人在对待举止骇世惊俗女艺人在私人心态上也是不能“免俗”的。美国著名的通俗女歌手玛当娜 1993 年曾出了一本以披露自己性爱好及性趣闻为主的《性》，在美国也是创下了出售奇迹的。此书以未加修饰的金属极为封面，在“性文字”中间添加了许多玛当娜毫无美感可言、构图杂乱无章的“性动作插图”，每本售价在高达 50 美元的情况下，全美统一发行的当天不出意外地造成了举国轰动。由于出版发行者四处鼓吹此书的出版是限量印刷，买到的书“可以保值”，因此美国立即出现抢购热潮。当时的情形热络到华人社区内不少还背不下 26 个英文字母的餐馆厨师也都走进书店去买来一本“看画”。

美国的中文图书业发展局面十分有限，这一来是因为在美华人多以新移民为主，购书一事对他们而言在时间及财务上都是一大负担；二来，中文图书在美国的价格也高得离谱，不少人宁可等到回乡探亲时一并购买，也不愿意在美国当买书的“冤大头”。而图书贵卖的现象近年来在大陆书籍的海外售卖上体现得最彻底。在美国，中文图书最大的经销网是世界书局系统。此一系统建立已有十年历史，其在美东地区有十一家、在美西地区有五家门市部，号称供应全美 60% 以上的中文图书。此一隶属于台湾报人王惕吾所办《世界日报》麾下的关系企业，图书基本上来自台湾，但也有少部分来自香港。自 1994 年起，该书局系统也开始着手经销来自大陆的书籍。

大陆的中文书在美的销售工作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不光存在品种少的缺点，也存在售价高的现象。在 1993 年中，虽然大陆方面已开始动作，展开开办书展等类型的推介活动，但大陆图书在海外的发行存在着一些影响发展的弊端。

据了解，在美国出售的大陆书籍由于从订购到外销的流转期间中间环节过多，造成了售价高得离谱的状况。据悉，大陆专门向美经销中国大陆书刊的《国际书店》在向美国销书时，给对方的价格是十分低廉的，一般是在大陆的原书价上打八折。而买方不但可以不用美金支付购书款，而且还由中方负责运输。但书到美国之后，价格往往就是原书人民币书价把计量单位直接换上美金的数字，有时比这还要高。也就是说一本十块人民币的书，在美国书店的货架上的出售价格一定在十美元以上。以中国读者熟悉的周励所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为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此书在中国的售价是九元一角，在纽约的售价是十多美元。而此书在经过台湾的出版社改为竖版排版出书发行到美国后，不但因为排版的关系书成了上下卷，而且售价竟高达 35 美元。

但在美国对爱书人来讲偶尔也有例外的“免费午餐”好吃。比如台湾企业大亨王永庆在 1993 年 8 月发行了集其个人经历、经验于一体的中文书《生根·深耕》，在美国采取的发行方法就是索性通过世界书局赠阅，有意索阅的人士只须到书局去登记自己简单的资料即可拿到一本一寸厚的王著。

大抵多少是因为书价非常人可以负担的缘故，美国人对图书馆的利用率是惊人的。

美国的图书馆之多早年间曾令我觉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点不能理解。但在美国住久了，看到图书馆的实际功效后，觉得其数量过多也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美国的图书馆毫不夸张地说其实是民众的生活必需，不但在每一个小型街区中均有设立，而且居民们年长至老人年幼至学龄前儿童，几乎人人都和图书馆有所往来。有人要出远门，临走前会到图书馆去借一份全美地图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有阅读习惯的老年人，每天都会到图书馆中翻看当天的报纸；甚至于不少家庭主妇也多会去图书馆翻找食谱及家居布置手册，调理家居生活。美国的不少中、小学乃至大学中的学校作业也会有相当数量要求学生去图书馆查书完成的部分。因此，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学校放学之后，图书馆中无一例外地会涌进大批才放学的学童，几乎各个图书馆内，均设有儿童阅览厅，不少儿童干脆就是趴在图书馆的桌上做完功课的，状至宾至如归。

美国图书馆的真正角色其实是美国人家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调剂品。

美国的都市人无分长幼都是有一张图书卡的。新到美国的人，凭着自己的护照也可以办理图书卡。这种卡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通用的。以纽约市而言，市内的图书卡按各大行政区区分，区域内图书卡可以通用。例如，在纽约皇后区的公立图书馆系统就有着 62 个分馆，区图书馆系统电脑联网作业，持有皇后区图书馆借书卡的民众可以在区内的任何图书馆凭卡借书，而且也可以在区内任何一个图书馆还书。

纽约的图书馆图书的出借量十分庞大，每个人每次可凭借书卡借出 25 本书籍，而且归还期限十分宽松，期刊的归还期限在一周左右，书籍的借阅期则可长达三周。借书者如在三周年仍未看完书，可带着书到图书馆去续借，

如此一来，又可以是三周的时间。即使是忘了还书，每天的罚款也只要一、两毛钱，并不是负担。

美国图书馆图书的出借量往往是评估一个图书馆“型号”的重要标准，借出书籍多的图书馆就可能在评比中升级，成为中型馆或大型馆，与之俱来的是政府对其人员配备、经费拨款的数额会相应增多。在纽约采访图书馆类新闻时，每到采访完毕，一些热心的馆内工作人员总要笑着让我多借几本书回去。这种主动借书的姿态与当年我在北京对图书馆的印象截然相反，闹得我时时不知身在何处了。

记得七十年代末期，北京图书馆是北京城内向寻常民众开放的最重要图书馆。当时北图设在北海一带，每天大清早大门口就会排起等候阅览的长长队伍，晚到者连门都别想踏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一辈人考大学的年代，记得当时每每需要去北图查资料都会因为不愿意去加入长龙阵而头皮发麻。说来说去，这还只是阅览室的情景，至于那些可以把书借回家的事情我当年是从未敢想的，只是遥遥地听说那是要办特殊借书证的，而借书证似乎仅发给“高级知识分子”或“高级别人士”的。

在美国，图书馆也是可以各种人用来为一己服务的，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没什么文化但抓准时机暴发过的人中，不少人在自己的身后都立下一个图书馆以供他人缅怀。如此，也算是图书馆功用的另一种演绎吧。

值得一提的是，七十年代时有一大批台湾留学生进入美国攻修图书馆管理学。十几年后的今天，纽约市内各大图书馆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均有这批当年的留学生，而且表现优异。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系统，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区内各图书馆分馆中，华人囊括了不少重要的领导职位，有的分馆甚至正副馆长都是华人。其中，中国一代文人钱歌川的女儿钱宁娜即是中型馆阿姆赫斯特图书馆馆长。

在不少美国的都市图书馆中，为适应不同族裔读者的需求，还设有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的图书可供借阅。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纽约图书馆为适应华人新移民的不断增多的现实，开始不断地增添中文图书借阅。在纽约皇后区，馆方甚至为势头汹涌的中文借阅计划取名叫做“你好计划”。上架出借的中久图书除来自港台等地，1993年起也出现了大陆出版的书。在中文藏书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前文提到的钱歌川的女儿钱宁娜主持的阿姆赫斯特图书馆，该分馆的中文藏书多达一万册，中文杂志多达一百种，中文图书平均每天的出借率高达三千多册。

除了出借图书乃至相关的文化出版物外，美国的图书馆还在居民的生活中起着各种辅助角色。比如，纽约的不少图书馆定期举办为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文补习班、开办职业教育讲座乃至开设各种门类的教育训练。

当代的美国图书馆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只营借书的“图书之馆”形象，于民众的真实感受而言，已成为一介名符其实的生活中心。

67. 纽约的博物馆

在 20 世纪，美国的纽约当之无愧地是世界文化中心，在这个城市中，一年到头有换不尽的各种艺术展览以及听不到头的各种音乐会，而且，不太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稍具规模的机构或者学校，乃至各种规模的旅游地点动不动就也都设置有展览厅，美国人只要有兴致，就有看不完的新鲜。

由此看来，美国的确是一个不失时机地肯定自己成就的国家。

身为美国的大都市人可以享受他人难得享受的东西，比如在纽约，市内民众有时在公园大道等处街头竟不时也能看到一些名闻遐迩的名艺术家把自己的巨型雕塑经有关机构批准有规划地摆放在行人绿地等处，做为巡回展出的项目之一。这种展览有间隔地撤旧换新，成为纽约人的一种“享受特权”。

无穷无尽的博物馆及艺术馆所，已经把纽约人的艺术神经弄得疲惫不堪，类似于中国在城内有几个画展开幕往往城中妇孺皆知的景观，已成为天方夜谭。

纽约的博物馆最是引人入胜的地方，各地来人无论入不入流，均会拜访博物馆。纽约的博物馆琳琅满目，大到举世闻名的大都会博物馆，小到一位名为蓝浓·哈蒂（LENONHOYTE）的老太太在自己家里举办的“蓝阿姨玩偶博物馆”，在种类上极尽五花八门之能事，范围从传统历史类、文学类、族裔文化类、科学类、手工艺类等博物馆直至终生热爱自己职业的锁匠开设的门锁博物馆、或者只有十几架收藏的钢琴博物馆，而且各款馆所一概收费入场，团体优待，煞有介事。

创立已届一百二十年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绝对名实相符，它与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博物馆及罗浮宫被人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号称是最能体现美国富足一面的博物馆。

该馆内藏品上至远古，下至本世纪，藏品总数超过三百五十万件，其中以埃及、希腊、罗马等地的艺术品；欧洲的绘画；美国的纯艺术作品为最具价值。这些藏品中大部分来自私人捐献或收购，传说中财大气粗的馆方还曾以最高五百五十四万的巨款买下过一幅画。

“大都会”的建筑横跨曼哈顿五大道的整整四条街，馆内员工超过一千五百人，除此之外并还有大量的义务工作人员时时帮衬。要想在一天之内流览完馆内的全部展品几近不可能，人们通常要花上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才能大致地看完馆内展品。

馆内三百万件展品大致分成十八大项，他们是：美国收藏、古代近东地区艺术、武器与甲冑、服装、素描、埃及艺术、欧洲绘画、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远东艺术（其中竟包括中国的苏州庭园的真实尺寸模型，据载是特聘中国精专此道的工匠，运用由中国运来的建材精制而成）、希腊与罗马艺术、回教艺术、以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绘画艺术为主的罗伯特·莱门收藏馆、中世纪艺术、乐器、太平洋群岛及非洲美洲艺术、版画与摄影及二十世纪艺术等。

相形之下，具有丰厚收藏资源的中国各种博物馆内容的从一而终和无所可展的毛病显露无疑。但这可能和中国国民习惯上一向不大给予博物馆一类的文化以面子的传统有关。

大的馆如斯郑重，小的馆也并不可以敷衍了事。位于哈林区 141 街的“蓝阿姨玩偶博物馆”（AUNTLEN'S DOLLAND TOY MUSEUM）可说是从最让人想不到

的角落里找出了展出题材。该馆的主要展品竟是主人收集的大小五千多个形容各异、大小不等的娃娃及玩具。据说该博物馆的主人收藏玩偶的初衷只是为 1962 年兴致所至地举办一次玩偶展览。当时的蓝阿姨相当的“阮囊羞涩”，只有十个玩偶，靠向别人借用展品才得以完成展示。自那以后，早年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蓝阿姨开始在全美各地努力地收集各种玩偶。二十多年来，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兴致干脆成了她生活的主要部分。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在她的博物馆中，既有二十世纪初乃至十九世纪晚期制造的珍稀玩偶，也有新潮的成套玩偶，甚至还有根据中国老式婚礼迎娶队伍制作的系列玩偶。

纽约以“奇”致胜的博物馆为“金氏世界纪录展览馆”（GUINNESSWORLDRECORDSEXHIBITHALL）。在这家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帝国大厦地下室的展览馆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世界之最。比如，按比例塑造的世界上最高（272 公分）的人形模型；价值近万美元的比基尼泳装和皮鞋；人类口含 110 根香烟的模样等。该馆以著名的《金氏世界纪录大典》（THEGUINNESSBOOKOFWORLDRECORDS）为主要构想，把书中较突出的“最大”、“最高”、“最慢”、“最小”等项目用实物或模型展出，在全市一百来个排名在前的博物馆中，华裔开办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也榜上有名。该社是由杜威、胡适等一些中美学者在 1926 年创立的，办社的初衷是想协助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近年来，该社以举办和中国有关的活动为主，社内设立的中国研究学校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为民众提供有关中文、粤语、中国艺术收藏、中国生活习俗、在美华人研究及中国艺术方面的多项课程。

更加令中国人感觉特别的是，纽约的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上，竟有一个名为贾奎斯·马谢斯西藏艺术中心（JACQUES MARCHEL CENTER OF TIBETAN ART）的博物馆，展示千余件有关西藏及佛教方面的艺术品以及相关书籍。此是由一位从未去过西藏的美国东方古董商贾奎斯·马谢斯所收藏收藏物衍变而成，全部展品都是从美国境内收集来的。该馆于 1947 年在史坦顿岛上建立，占地一英亩，其中包括一个西藏式寺庙、一座花园和一个图书馆。

该馆创建人马谢斯于 1948 年去世，但馆内迄今逢到周末仍常举办与西藏乃至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美国和中国比起来，其实在可展示的东西上相当的匮乏。中国即便散在各省的展品动辄上溯多少代，排出来一大片，收起来满坑满谷。相形之下，美国的展品要讲“古”，年代上基本只能以百来计算。纽约下城东 4 街 29 号的一处国家级古迹“老商人的住家”（THE OLD MERCHANT'S HOUSE）就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一间造型稍具别致的普通民房而已。但这处在纽约不少旅游指南中都榜上有名的“普通民房”的确是收费入场观瞻的，成人两美元、老年人及学生一美元。这是一座座落在如今已十分颓败的曼哈顿下东城保存完好的古希腊复兴式建筑，是由一位叫做约瑟芬·伯维斯特（JOSEPH BREWSTER）的人于 1831 年建造的。1835 年，经营五金进口生意的商人思伯瑞·崔德维（SEABURY TREDWELL）将其买下，他的整个家族在这栋楼中一直住了将近 100 年，直到他最小的女儿于 1933 年过世为止。

但即便平凡如此，它还是被正府批准成为博物馆，不断地有人进出瞻仰。我想，如果深究起来，这类“博物馆”在中国一定遍地都是，只不过中

国相对人贫国穷一些，手头即使有这种东西也会先住进去再说。

纽约最具名气的现代艺术馆首推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MUSEUMOFAMERICANART），其也是无数中国艺术家心中的圣地。这家创立于1930年、由雕塑名家惠特尼（GERTRUDFVANDERBLITWHITNEY）创办的美术馆，标榜以致力于发掘未成名艺术人士为己任，并不断收藏二十世纪艺术精品。该馆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双年展更是美国美术界的一项盛事，吸引了太多的艺术家处心积虑地要打入参展圈。

该馆目前共收藏了将近九千件艺术品，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造型美术、新抽象、新自然、普普艺术等收藏入手，范围涵盖绘画、摄影、雕塑等各美术领域，力图收藏尽二十世纪美国艺术的各种具代表性的足迹。

令人可惊可叹的是这种收藏其实相当具有魄力，这种魄力不是单就收藏本身而言的，而是将收藏与二十世纪现代艺术连接起来，情况就有点严避。举例而言，同样是一个马桶，一个自称艺术家的人在它的桶沿上打破一个缺口，然后把这个缺口马桶命名并称说是件颇具寓意的艺术品，这种时候对一个该掏钱出来购买这件艺术品的收藏家来讲就不是一句“叶公好龙”能讲得清楚的。在目前纽约鱼龙混杂水平参差却又让人抓不着痕迹的现代艺术界，惠特尼的每一件藏品都着实是一次惊人的探险。

我在参观惠特尼1993年举行的一次双年展时就曾饱尝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现代艺术对我这种平头百姓鉴赏力的折磨。以往，我对过于抽象的艺术基本上不甚欣赏，也不大情愿曲意逢迎，因此我基本上与在我看来有“盗名欺世”之嫌的现代美术相互排拒。纽约惠特尼的此项展览据宣传是美国现代艺术的阶段大巡礼，而且1993年各类作品的主选人中一位具相当份量的人物还有着华裔血统。但在看过展览之后，我又觉得对所谓的现代艺术失望了一回，此次惠特尼的双年展除几件作品看得出颇具构思和厚度外，其余的在我看来不外是或在展示制作人所能想到的最新可上作品的材料乃至形式；或在卖弄先进的电子科技。芸芸作品中仍有诸如把几摞报纸堆放在墙边然后命上一个让人不知所云的名字后，就权充一件艺术品的“艺术品”。这种样式的现代艺术我在记不清地点的美国艺术展中遇见过不下两次，不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展中又能不期而遇。更有些作品是将人让进一个帷幕中去，内中东南西北各方各放一盏灯，灯们轮流开亮，灯下不时传出动物叫声。

我因此更常常觉得我对当今大部分“现代艺术”有一种洞察的感觉，无论如何激动不起来，实在觉得不少作品把艺术应带给人类的可咀嚼的美感一扫而空。

68. 难解的美国老人杂症

美国华人社区中一句流行的描述是：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

在美国街头，你常可以看到孤独无靠的老年人一个人在超级市场中采买东西。美国家庭崇尚简单化，父母往往是最早被“简单”出来的人。每到年节假日，儿女们往往打个电话或是寄来一张贺年片就算尽了孝心，因此，美国的父母们往往至死都是独享孤独的。

我所熟识的一个美国人的父母都住在美国的渡假胜地佛罗里达州，虽然从纽约到佛州的机票才几百块钱，但我的这个朋友说他时常会连着几年都不去看一回父母，甚至于他每次哪怕为了别的事去佛州时都尽可能地不去看望父母，他每谈到这里时就会说：“我可不愿意自动跑到监狱里去呆着。”

也正因此，常听说不少中国人找到了在美国老人家里吃住全包的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陪伴老人聊天说话，满足老年人的倾泄欲望和家中“人气”的富足。

美国的老人问题是一个既触目又麻烦的事情。随着美国人口老年化趋势的加剧，这个问题无从掩饰地浮上了台面。美国对境内年老居民一向采取特别关爱的政策，美国各个城市之中都设有规模庞大的政府建造的老人公寓，供低收入的老年人租住。这种老年公寓中设施齐备、保卫严密并且租金低廉，每套房间的租价往往比市场上的租金便宜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如果一套房子在房租市场上需五百元左右，那么同样的房子在老人公寓中则可能只需一百到两百之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当年在国共两党大打出手时声名赫赫的国民党军界高层，如今有不少人就是在美国的老人公寓中安渡晚年的。

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困窘，早在 1935 年就开始实施的美国社会安全养老制度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三十年代中，按社会分工，美国每三、四十个劳动者所缴纳的社会安全金平均用来供养一个老人。但到了 1945 年之后，美国人热衷于节育，到了八十年代，局面则成为美国社会中每四个人养活一个老年人。再到九十年代，由于美国移民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又未能缓解，因此老年人越来越贫穷的问题成为一个阴影，紧扣在每个美国人的心头。

据 1984 年的统计数字，全美有 60% 的老人年收入在五千美元以下；有 27% 的老年人年收入在五千到一万元之间；只有 13% 的老人年收入超过一万元。九十年代，一个美国的非牟利研究机构在做过有关研究后甚至表示，美国竟有近五百万老人三餐不继。

这个组织在对低收入老年家庭十分集中的十六个社区中用信函方式调查了 2734 户老年家庭个案后又进行了 4277 次家庭个别访问，结果推测发现总数将近五百万人的老年人在一年中可能有六个用处于“三餐成问题”状况。在老年人中，最贫穷的人群是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的妇女，1990 到 1993 年期间，她们的平均年收入为八千两百元，平均每月才有六百多元的进项。如果没有政府的老人公寓，这些人的每月收入连房租水电部不够交。

美国老人的普遍状况如此，旅居美国的华裔老人的境况更未可乐观。

据美国国家自杀研究所 1994 年发布的一项调查说，年逾八十五岁华裔老年男性的自杀率比相同年龄层的白人高一倍；而八十五岁女性华人的自杀率比白人高十倍。

这项报告初步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华人与美国社会文化隔阂以及美国社会对这群人关照不够。

在美国的华裔老人并不会因为在美国就能免除儿女不孝、婆媳不和等中国式的烦恼。更有甚者，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中国家庭是以老人先到美国为整个家庭移民的开始的，所以这样的老人还得负担把子女们按美国的移民类别及排期一一移进美国的重任。实际上，所谓在美的华人社区认真来讲是以华裔老人为社区中坚的。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主要因为华裔老人在美国生活相对闲散，家庭的约束相对为弱，因此相对热衷参与社区内的大小活动。与此情形相同，另外的一些社区中坚则是家庭主妇。几乎在任何华人社区内非专业性的讲座和各种展览中，最多前往的一定是老人。而华裔社区如果有什么非专业性的争取权益示威，游行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也是老人。由于华裔老人多半是在美国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基本上个个都是具有选票的美国公民，因此，无数中外政客到华人社区拉票时，最不能少的就是拜访几个规模庞大的老人中心。

华裔老人在美国的一个共同感觉是生活无聊。居住在美国几个有中国城的大都市内的一些华裔老人情形还好，长年的华人社区生活使得他们还会有一些老来的玩伴，但在其它一些华人稀少州内的老人则日子过得就没那么顺心了。

有太多的华裔老人在退休后来美国投靠儿女，但是儿女却因为工作紧张根本无法抽出时间来照顾老人。

我的一个朋友把她母亲从国内接来美国，本说是要好好地陪着玩上几个月的，所以，在母亲来之前地每天都是满肚子憧憬。几个月后再碰到她时，她母亲已经走了，问她是否把自己的憧憬一一兑现，她说她现在又全剩下一肚子追悔。

她说本来她是和自己所在的公司请了假要陪母亲的，但事到临头，她们公司的一位小姐出了车祸，人手猛然吃紧，老板的脸一下子拉长许多，所以她直到母亲走了，都没敢再和老板提一句关于“请假”的话。

她说她自己为了生活每天都是早上八点就出门上班了，到晚上六点才回家，她母亲到美国之后就判了几个月刑似的。我的这位朋友每天下班回家吃饭、洗碗之后天就黑了，出门游玩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不会英文，她母亲既看不懂报纸也不敢出门，每天只能坐在家里看中文录相带。而这些录相带是从别州的中国城借来的，她每月只可能抽出一、两个休息天开车几个小时专为母亲去借。由于一次借得太多，还的时间太迟，她已多次被租带店的老板半真半假地责备过了。

即使是这样，她每次给母亲借来的带子，母亲不到三天就看完了。

她说她母亲的签证本来是可以住上三个月的，但是她母亲只住四十五天就还乡了。

在大多数无所事事的美国华裔老人中，也有人恰恰是在美国才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早年间毕业于上海交大的老土木工程师王成泰丧偶多年，八十年代在中国退休之后就于子女的操办之下移民到美国。从跨进美国的那一天起他就誓言要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再干一番事情。

到美国时，他已经是 60 高龄的老人了，但他从下飞机的第二天起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前途问题了。他是自己的儿子申请移民美国

的，他的儿子一直劝他干脆踏下心来在家里带带孙子，每个月也可以从家里拿到几百元“保姆费”。但王成泰摇头说不，他觉得这样多少还是要“仰人鼻息”，他不情愿这么做。

几个月之后，事情还真是让他打听出来了。听说市政府有专门的为美国老人介绍工作的机构，王成泰就前往找工了。他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汽车旅馆作简单的清扫工作，接到这个工作之后他一干就干到现在，前后八年。

王成泰当初是连人带行李一同搬到那家汽车旅馆的，他对老板讲：我是一个只是有一些力气和有得是时间的老人。他的老板果真给了他一个白天清扫庭院、中午打理花圃、晚上兼管入住注册的“时间工”，并给他每月一千八百美金的工资。

在这家汽车旅馆干到第六年头上时，王成泰说他收到了政府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因为他已在美国纳税，就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一、二年，他将有权享受美国的养老福利金。王成泰后来又曾再婚，他说美国给了他第二个春天。

69. 民不畏死

199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大受欢迎的奇妙书籍，书名明朗而阴险，它叫《自杀指南》。

此书建议病人膏肓且有意了断自己生命的病人可以采用最简单易行的用塑料袋进行自我窒息的办法达成目的。这种事说白了就是，你如果想死就去找一个塑料袋自己把自己闷死。书中把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经验之谈称为“透过塑料袋的自我解脱”。

该书于1991年3月出版后一年之内，纽约全市厌世者立即有样学样，采用“透过塑料袋自我解脱”者增至33人。而1991年3月之前的一年内，此项数字仅为8人。

纽约市法医局声称，他们已在9宗自杀现场发现了这本《指南》。

目前在美国人中，自杀已经成为全国名列第八的死因。随着美国社会向着更坦然的方面推演，在美国，死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坦然接受。

据报道，在1991年，美国共有三万多人自杀，而在同一年，美国境内因他杀原因身亡的人才只有两万六千多人。

据加州大学做出的统计，美国妇女及黑人的自杀率超过了全民自杀率的平均数字，妇女自杀者的总数比平均数字高出6%，而黑人的自杀率比平均数字高出15%。而且，在美国人中自杀情形多半发生在人的岁数进入整数时。其中，30、40、50及60岁的整数年龄人群自杀率最高。主持这一研究的大卫·菲力普教授说：这是因为许多人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整数年龄时就会衡量自己的现况与以前制定的预期人生目标是否一致，但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失败了。

在1993年下半年，纽约市甚至连续发生了多起警察自杀案。

自杀案多至如此，自杀企图案就更是数不胜数。据估计，美国每出现一件自杀案的同时，就伴随有一百到两百个自杀未遂案件。美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有有关防止自杀的机构在积极活动，纽约等一些城市早几年就开始设有自杀预防热线，每年都要回答平均三万通求助电话。

美国的新生代领袖克林顿上台后，在全美民众间对死亡的意义又强力注入了新一层的意义。克林顿夫妇在上台的当年就向美国人展开积极签署“平安纸”（LIVINGWILL）的呼吁。这个据信能兼收减轻垂危病人痛苦及节省大笔医疗费用的“平安纸”，即让濒临死亡的垂危病人在少受痛苦的前提下允准医院不采取暂时延长生命的治疗方式得到解脱，也就是死亡。“平安纸”中可供选择的项目包括不做人工呼吸、不要心肺复苏、不要胃部穿刺插管、不要大剂量止痛药等暂时延长生命的治疗。克林顿夫妇首先在全民面前签署了自己的“平安纸”。

虽说这种举措说穿了是当局旨在节省全民医疗保险的分摊，因为单以人工肺机为例，每天的使用费用就高达八百美元之谱。但归根结蒂，这种呼吁对美国人而言还是一个如何面对死亡的事情。

美国有关自杀最著名的人物是家住密西根州、被称为“死亡医生”的65岁退休病理学家杰克·凯佛基安。

这位对人类死亡有独到见地的人自1990年起在底特律地区先后固执地帮助20名重病病人自杀。其中的五例发生在1993年初密西根州议会有关禁止协助病人自杀的法律生效之后，他因此成为当地检方的头号头痛人物。

据悉，“死亡医生”每次助人自杀都是应病人的需要而动作的，而且向他寻求帮助的都是一些晚期癌症患者或者患有其他不治之症的人。他最开始

是使用液体毒药帮病人死亡，后来他改用了一种更进步的办法，给病人戴上一个面罩，让病人通过软管吸入一氧化碳，从而达到窒息死亡的目的。凯佛基安每次在协助病人死亡之前都会要求他们留下自己的录影带，说明自己生前所忍受的痛苦及希望以死来得到解脱的意愿，并言明他们都是自愿寻求“死亡医生”协助的。

对“死亡医生”的行径，不少美国人持支持的态度，死亡医生尤其在近两年之中和司法当局别别扭扭，每当他“出事”的时候即有大批人士走上街头为他大鸣不平，甚至在他进入法庭受审时还受到支持者的热烈鼓掌欢送。美国的不少民权组织也对“死亡医生”表示支持，认为在美国人人都应享有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赋予人们的“自决权力”。

几年来，“死亡医生”一直与密西根州检方对峙，屡次向法律挑战，这种状况持续到1993年11月5日达到戏剧性高潮。在此之前，凯佛基安已两次被控罪。密西根州并于93年9月立法通过对“协助他人自杀者足以形成被判四年徒刑的重罪”的法律细则。对于州内通过的有关新法，凯佛基安评价为“极不道德”，因为他认为医生的天职就是帮助病人减轻痛苦。就在此法被通过不到八小时，凯佛基安依然故我地帮助另一名病人自杀成功。

此举使检察机关忍无可忍。

“死亡医生”随即被传入法庭。极富戏剧性的事是，11月5日在底特律法院的保释听证会上，法官下令迟到的凯佛基安缴交两万元保释金（其中含两千元现款）以换取自由时，神情淡定的凯佛基安却出人意料地转身向端坐在旁听席上的亲友挥手微笑，随即倒坐椅中一动不动。

法警随即将其拖出法庭用轮椅送入监狱。这是他三年来头一次入狱。

“这就是我所要的。”凯佛基安在被拖出法庭前几分钟时对记者说：“在我的生命和这项不道德的法律之间，有它无我。”他在狱中开始了全民瞩目的绝食行动，后来则被无计可施的司法当局强行释放回家。

事实上，美国的司法界对“死亡医生”行为是否违法的判定也十分矛盾。

底特律韦恩郡巡回法院的法官考夫曼就曾就“死亡医生”的案子判决密西根州所制定的禁止一切协助他人自杀的法律违宪。他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1990年的一项判决确认人民有权力拒绝维持生命所需的医疗协助的判例。

但“死亡医生”最后还是自己决定退出这一场关于死亡权利的争执。他在自己第二次入狱之后，出人意料地作出了暂时不再协助人自杀的承诺，这之后，他获释回家。

美国最著名的自杀场地是位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两年前我到旧金山观光的时候曾到过旧金山这处桥身颜色暗红的著名旅游热点。在这个气势磅礴，车辆平静来去的去处，自1957年5月使用迄今，竟已成为938名自杀者的最后归宿。而且，在这938名统计数字之中，还不包括另外420个未能寻获尸体的自杀疑案。

1993年初，更有一位身为人父的轻生者是在把自己三岁的女儿扔下大桥后，自己才接着跳下的。

记忆中的金门桥保持着相当沉着的平静，桥的两旁有粗大的铁柱链拉曳。为了表现大桥气派的恢宏，在桥头的一方还摆放有取下的一段铁柱链，供人惊叹其粗并合影留念。我不能免俗，也有这样的一张合影。

该大桥桥身距水面达220英尺，百分之百地符合致人于死地的高度，多少年来从桥上飞身跳下的人中据悉只有一人幸存。

在金门大桥边的礼品店里能看见自杀者撒手人寰的最后一跃。礼品店中的一位出纳说：“我丈夫以前在桥上工作时曾听到过那些跳下去的人的尖叫声，他相信有不少人在跳到一半时，半途后悔了。”金门大桥现年 32 岁的主管杰克森·方说，他手下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经常包括劝说有意轻生的人回心转意。他在介绍这项“工作”的工作办法时说，工作人员有时的做法是给对方一杯热饮，然后进一步和轻生者进行攀谈；而有时候工作人员的“工作”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得假意递给态度坚决的轻生者一支烟，等他们伸手来拿时迅速抓住他们的手。

为了防止金门大桥进一步成为自杀的圣地，旧金山市府就有关是否应在大桥上设置防人跳下的障碍物一事进行了多年的争执，有舆论甚至主张干脆拆除大桥。

如果认为美国人对死亡问题的认知只停留在“人”的身上，那就错了。美国人在对“未成型人”死亡权利的争执更加严重，而且对这种“未成型人”生死权利的争执还会影响到“成型人”的生死问题。

美国的堕胎是否合法的问题是美国多年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此一问题自六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争论了三、四十年也未见结果。至今，堕胎问题不但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派政争之中的重点问题之一，而且也是全社会争论的焦点。在美国社会已经成为全世界开放生活的焦点之后，闻听美国还在为这种名堂争执不休，直感到匪夷所思。

美国对堕胎问题的争论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暴烈。为了这一些与世界从未谋面的人类胚胎，世上的人为此不光有示威游行一类的温和行为，甚至打斗不休。

概括来说，赞成堕胎自由的人依据的是美国人所追求的自由选择权利。这一派人中以民主党的自由派为主，拥护人有自己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而且认为应该把这一项诉诸法律予以维护。但反堕胎的人则认为生命始于胚胎，所以堕胎就等于是杀人。在这一派人中，尤以共和党拥护者为多。

在有些行动激烈的州，反对的与拥护的两派人马时有激烈交锋，其中尤以堕胎反对派表现得充分。这些人以人类的守护神为号召，把实行堕胎的医生称为“婴儿杀手”（BABYKILLER）。这些医生经常遭人骚扰，而且他们的子女在学校中也常遭到威胁。

由于美国在克林顿主政之前的十几年中一直是共和党坐桩，因此，反堕胎势力的相对坐大也是其来有自，但是近年来此一问题已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犯罪问题，不免令人为事态的继续发展捏一把汗。麻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就曾表示，反堕胎暴力和阻挡活动已经漫延至全美，这种活动有组织、有系统地威胁了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活动，在程度上已经到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

为了遏止社会中的反堕胎恐怖活动，美国参议院于 1993 年 11 月 16 日以 69 票对 30 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一项有关的联邦法，禁止在堕胎诊所放置炸弹、纵火和阻挡进出，也不准对堕胎医生及护士开枪或采取其它暴力威胁行为。这项克林顿政府大力支持、在常人所见相当顺乎情理的法案，还规定了另外一些更是本来就是法律之中的规章，比如还规定将允许联邦调查局（FBI）调查堕胎诊所遭受攻击案件，并允许司法部长做出指示。

这个法案的提出是鉴于 1992 年在美国出现的一连串反堕胎暴力事件而被提出讨论的。当时，佛罗里达州的堕胎医生大卫·根恩被反堕胎者列为“缉

拿要犯”，并于3月份在诊所外被大胆的对立派人士枪杀致死。根恩的案件虽然使得全美举国哗然，但对于此案，最高法院竟裁决不得援引联邦民权法律保护堕胎诊所。

此一判决更加助长了反堕胎人士的暴力行为。

闹到最盛时，美国电视中每天都有有关的大型示威，一些“胚胎卫道士”固执地坐在堕胎诊所门口，而两派扭打、撕扯一类的情事更是毫不稀奇。有一次，在两派交战中，竟有人拿来一个婴儿胚胎标本助阵，那几天中有一天我才一打开电视一眼就撞见了那个著名的“标本”正在被示威者扔来扔去，黄黄白白的一团，令人观之反胃。

当时用手按着电视按钮，直觉得“我的天啊”。

繁衍至今，美国人的秉性已经变得与纯良的祖上大有区别。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无论实事还是虚事也在重兴之中被重整。

但美国人无疑已变得心硬如铁了。

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国人已经进入刀枪不入的境界了，世上的任何稀奇在美国人看来已都不算什么阵式。已然达到民不畏死的地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美国人已把淡泊披挂起来。

从中国来美国的人落入夹缝，爬上去的是一个爷，爬不上去的不是一个爷。

70. 结尾

这么一说下来倒竟是拉拉杂杂的将近七十个章节。

我的本意其实并不在多，只在于能告诉你。

古话说：“金马门如万里遥，哪知青海城头事。”古话还说：“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我常常在想，这几句话说的都是美国的凡此种种。中国人时常是非常相信古话的，饥肠辘辘的时候相信；酒足饭饱的时候也信。

那就多想想这些古话。

著者后记

早在这本书还没有动笔之前，我一直不明缘由地对它的价值和我不在此方面的能力深怀疑虑。

等到这本书正式完成之后，我才知道，这是我迄今做出的少数几件踏踏实实的好活之一。

在完成这件“好活之一”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常常觉得心中飘浮着许多欢乐和苦涩，这种驱赶不开的情绪时时让我回想起在美国生存的艰难，再回到桌边打开电脑继续操练的时候，总有一种难以为继的牵强。而且，美国的统计机构极多，关于同一问题形形色色的统计数字也极多，这给我的写作时也会带来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我的这一类感觉和麻烦就这么一直袒露着，无遮无拦。后来我学着每当这类杂物到来时，就转过头去看窗外，纽约多半的季节里，天蓝草绿。

书完成后，我觉得我应是无愧于这种无遮无拦了。

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至少，我无遮无拦。

也想在此感谢华夏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及工作人员，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陈泽顺先生。

陈燕妮

1994年3月28日

